

目 录

回忆何鍵統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	曹伯聞(1)
何鍵軍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	彭松齡·黃維漢·胡 达(25)
第四路军在湘黔滇阻追红军北上抗日的经过	李 觉(53)
第四路军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围剿”	
和“追剿”入滇的概况	郭雨林(70)
回忆湘西“剿共”的几次战役	戴季韜(88)
蒋军第五十三师追击红军经过	李清献(109)
何鍵在湖南的搜括概况	
.....	刘岳厚 毛綢群 甘 融 左仲文(117)
我驻军湘西时和主黔政后与何鍵的关系	王家烈(133)
记何鍵在湘西设厂制造吗啡	戴季韜(139)
黄飞贩毒被捕记	程藩斌(143)
何鍵解决陈渠珍经过纪略	王尚質(146)
一九二九年常德兵变真相	陈揚汉(155)

萧学泰案(宁案)始末.....李定国(161)

罗介夫被刺真相.....吴健人(173)

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的罪恶史.....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76)

“活阎王”胡凤璋.....欧阳泗(193)

关于湖南“左社”.....文千之(204)

“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三)

“馬日事变”后醴陵大屠杀的片断回忆.....程星龄等(213)

长沙东乡白色恐怖一斑.....罗文浪(225)

“馬变”前后反动派在临湘屠杀的片断见闻.....吴日三(229)

“馬日事变”后湘乡屠杀概况.....宁纯宦 李良佐(237)

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谢宣渠(239)

三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时期的几件事

曹伯闻

何鍵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統治湖南达九年之久。我在何鍵統治湖南时期，曾任民政厅长六年，有一段时间，并兼任了湖南清乡司令部和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长；加以我和何鍵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在唐生智部下共事（时唐生智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我任第二旅參謀主任。何鍵系第一师騎兵团团长，駐桃源，受二旅指揮。以后唐任第四师师长，我任第四师參謀长，何在唐部下任旅长），多年相处，关系比較密切，他有什么大事，往往找我商量；因此，对于何鍵在湖南所作所为，知道的頗多。现就个人記憶所及，对当时一些較大的事情，略述梗概如次：

何鍵的上台

何鍵于一九一六年在保定軍官学校毕业。一九二〇年譚趙之爭后，任第一师騎兵团长。以后追隨唐生智，水涨船高，步步高升，到一九二七年已任第四集团軍第三十五軍軍长。第四集团軍另外还有两个軍，一是第八軍，軍长李品仙；一是第三十六軍，軍长刘兴。同年秋，唐生智“东征”討蔣失敗后，由譚延闓、程潛和桂系組織的“西征軍”繼續向唐部追击，何、李、刘等都退回湖南。其时，唐生智已經下野，东渡日本，大家感到群龙无首。于是何鍵、李品仙、刘兴和周燾（时代理湖南省主席）等四人組織了一个联合办事处，

定期开会，商議軍情。这时我任湖南省政府建設厅长，又因我曾在唐生智的老第四师担任过參謀长（何、李、刘等人都是第四师旅长），人事熟悉，他們就公推我为联合办事处秘书长，負責联系，勾通关系。

何鍵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的人。他回湖南以后，表面上和李、刘、周等敷衍，暗地里却另有打算。当“西征軍”打到武汉时，他一方面派人和桂系勾搭，同时又以旧屬和同乡关系向指揮“西征軍”的程潜表示好感，以图在“西征軍”入湘之后自己有一立脚之地。对于周燦，則想一脚踢开，取而代之。某次，他对我說：“唐老总下了野，周燦还代理什么主席；我的意見，湖南省政府可以改組，另外推人出来負責。你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指李、刘、周等）商量一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从这几句話里，我已看出何想当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意图。因为在他看来，他們四人之中，以他的資历最深，对湖南的情况也最熟悉，要另外推人負責，一定会推他的。我按照他的意思，試探李、刘、周等人的口气。李、周都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刘兴則坚决反对，說：“‘西征軍’节节进逼，結果如何，尙不可知。現在要考虑的問題應該是軍事問題，而不是省政府改組問題。”由于刘兴的坚决反对，李、周二人不表示具体意見，这事以后也就沒有再提了。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軍”李韞珩、譚道源等部直趋长沙，刘、李的軍隊經潭宝公路向澧浦撤退。“西征軍”进入长沙后，湘鄂政務委员会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这时，何鍵的軍隊分駐湘西常德、沅陵一带，已与李、刘等分道揚鑣。他看到程潜繼任湖南省主席，便通过刘岳厚和程接上了关系，除繼續与桂系勾結外，更进一步靠攏程潜，终于在程的蔭护下，被任命为湖南省清乡会办。至是，何在湖南境內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

实权。

一九二八年五月，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为桂系掌握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汉口将程潜扣留，任命鲁滌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得到桂系的支持，蝉联清乡会办。其时桂系的势力已由桂、湘、鄂、豫直达北平，白崇禧并在北平坐镇。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急剧发展，已经感到不安。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削弱桂系和其他地方军阀的实力，遭到白崇禧等的极力反对，从此蒋、桂关系日趋恶化。在桂系和鲁滌平的关系方面，由于当时湖南已成桂系联系鄂、豫、平、津的枢纽，等于桂系军队的后方，而鲁是譚延闓的嫡系，譚、蒋在南京正靠得很紧（时譚延闓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对桂系是个很大的威胁。桂系以鲁主湘，本是权宜之计；而这时何键与鲁又因争夺清乡督办署的实权，矛盾加深，致使何、桂进一步勾结共同倒鲁。早在一九二八年春，我住汉口养病，与李品仙、叶琪等时相过从。大家都是老朋友，说话无所避忌。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得知何键同桂系确实来往密切，桂系将领自李、白以下也都认为湖南处于桂、鄂之间，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极力拉何，以策应时局的变化。某天，叶琪到我家闲谈，他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滌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别号）了。”从叶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桂、何已在积极准备驱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叶琪率兵直逼长沙，鲁滌平仓皇出走，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梦寐以求的统治湖南夙愿，终于得到实现。

何键是一个深沉、圆滑、善于多方应付的人，平日喜怒不形于色，碰到问题，口虽不言而心中有数，对事常常采用狡兔三窟的办法。从上面叙述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作风。又如联桂倒鲁，何本是主角，当桂军从武汉开抵长沙前夕，他却向鲁讨好，

告訴魯說：“鄂方有軍隊南開，請預為準備。”並對魯的撤退，暗為掩護，表示他置身事外。當武漢政治分會任命他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命令發表時，他又惺惺作態，不肯貿然登台，直至南京政府於二月二十七日任命他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电報到後，始由醴陵來到長沙就職。這樣，既不開罪於桂系，又敷衍了南京，更有利於他爾後的見風使舵。

何鍵還有一套籠絡手段。他上台以後，承襲封建統治階級“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政治哲學，對地方各派勢力盡量拉攏、應付。他特別注意譚延闓、趙恒惕和唐生智三個方面的關係。因為這些人都是湖南的頭面人物，在地方的歷史較久，與各方面淵源較深。同他們的關係處理得好，不僅可以消除阻力，做起事來比較順手，並可借以造成聲勢，擴大影響，對巩固自己的統治有利。何鍵這種用心，在他上台後對第一屆省政府委員人選的考慮中充分反映出來。當他開始着手組織省政府的時候，曾到武漢找我和周潤商榷，大體確定了各廳人選。那時蔣介石也到了武漢。何鍵當將初步名單向蔣請示，經過再度磋商，得到蔣的同意，始由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發表。確定何鍵、賀耀組、葉開鑫、宋鶴庚、陳渠珍、曾繼梧、曹伯聞、張開璣、黃士衡等九人為省政府委員。這些人中間，賀耀組是蔣介石指派、得到何鍵同意的。蔣之指派賀，自有他的用心，賀也有他個人的打算。在何鍵看來，賀是趙恒惕的人，可以勾通一方面的關係。葉開鑫是趙恒惕的死黨，何接受他，當是出於同樣的考慮。並且賀、葉都是反對何鍵的人，現在將他們拉進來，也可使其他的人對何發生好感，重演一下“雍齒且侯”的故事。宋鶴庚在湖南軍界資望很高，在譚趙戰爭之後，完全依附了譚延闓；曾繼梧和譚私交甚篤，在魯滌平主湘時期，是譚再三動員他回湘替魯撐腰的；何鍵利用他們，可以在譚延闓面前講點好話，也可沖淡一

下何、魯之間的宿怨。陳渠珍是湘西地主武裝的代表，籠絡了他，對何的根基未固的政權來說，可以起一定的安定作用。我是追隨唐生智很久，與唐關係很深的人。黃士衡在唐生智主湘時期，先後任過實業司長和教育廳長，與唐也有一定的淵源。張開璣是何鍵的親信，早在趙恒惕任湖南省長時就作過財政廳長，魯滌平主湘期間，又由何鍵推薦，擔任這個職務。總之，在上述諸人中，不論是蔣介石指派的也好，別人推薦的（如黃士衡的入選，曹伯聞提之于前，叶琪提之于后）也好，何鍵自己羅致的也好，在何鍵的想法上，都是符合他拉攏地方勢力的原則的。至於他的嫡系將領如劉建緒、陶廣之流却一個也沒有安排。這是他有意避嫌的一種計謀。

何鍵的清鄉反共

何鍵對共產黨的刻骨仇恨不是偶然的。他幼年的業師凌恩鳳兄弟是醴陵的封建大地主；後來他進長沙崇古學堂讀過三年書，這個學堂的主辦人王先謙又是最頑固的反動派典型人物；可以說，何鍵的封建統治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是有由來的。他搞瀏醴游擊隊起家，就是實行封建武裝割據。他以後的官運亨通，是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八軍的前身原是地方軍閥部隊，雖然它在一九二六年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參加了北伐戰爭，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投機，並非本質上有所改變，當革命進入高潮，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它的本來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何鍵是第八軍的主要骨幹之一，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北伐期間，他對各地的工农群眾革命運動，就非常不滿，經常大罵共產黨和農民協會“搞得不像樣子”。一九二七年三月，何率第三十五軍（那時第八軍已擴編為第四集團軍，何鍵遞升為三十五軍軍長）移駐漢陽。不久，上海爆發了“四一二”事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公開背叛革命，

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他看到形势突变，便蠢蠢思动。四月底，即利用唐生智率领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自武汉继续北伐的机会，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的军事叛变计划。这时唐部第八军留驻武汉，军长李品仙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被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李深夜来到我家（时我住在汉口），对我说：“你看怎么办！何芸樵逼我真逼得厉害。”我问他什么事，李说：“芸樵硬要我在武汉动手。这是一桩大事情，怎么乱动得！一来没有唐老总（指唐生智）的命令，二来在武汉的军队我不一定都指挥得动（时第四军叶挺师驻武昌），将来闹出乱子，谁来负责！”我说：“这话很对，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没有唐老总的命令，就是不能乱动。”其时，两湖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许多大地主豪绅逃到武汉，大嚷大叫农民运动“糟得很”。我和李品仙等人在闲谈中也常常说“糟得很”。对于何键的要动手，不是不同意，只是怕将来担当不起责任，因而不赞成在武汉搞。据传说，何键为要发动叛变，曾经请示唐生智（时唐在河南前线），唐的答复是要他就近请示汪精卫。这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但是何键和李品仙等曾继续研究过，最后决定避开武汉，先在湖南动手，因而有这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的发生。

何键在一九二八年“西征军”入湘，程潜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他任清乡会办时，就决心继续完成其“马日事变”的未竟之“功”，企图将全省革命火焰彻底扑灭下去，把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尽杀绝。一九二九年他当了省政府主席和清乡督办以后，第一步便是将清乡督办署改为全省清乡司令部，自兼司令，加强反共的指挥机构。其次是实行整顿团防武装、统一团队经费收支等一系列措施，以逐步把各县团防武装控制起来。何键这样作，是考虑到要实现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单靠他的军队还不行，有必要把地主豪绅

的武装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何鍵对于对付共产党，确实挖空了心思。当时地方团队沿用旧名，还叫“挨戶团”。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要改为“鑪共义勇队”。我問他：“挨戶团”这个名称已沿用很久，大家都习惯了，为什么要改？他說：“你不知道，共产党禍根不除，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我們用这个响亮名詞，可以大大激发民众鑪共的决心。”这里还可附带举一件小的事情，說明何鍵是寢食不忘消灭共产党的。他在宴会中，常以紅色葡萄酒待客，并必举杯对客人說：“讓我們干一杯，赤色的东西要一口把它吞掉！”

当时，湖南团防武装共有槍三万多支。何鍵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設区指揮一人，大都以資历較深的县长兼任区指揮，負責“清剿”。一般县长也以清乡反共的成績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他常常对我說：“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媽媽当什么县长！你今后任用县长，唯一的就是要看这一条。”当时我任民政厅长，有时候沒有完全照他的意图办，于是他要我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參謀长，使我无可推諉。

何鍵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除了軍事“清剿”以外，还利用軍統、中統特务和叛徒进行特务活动，例如中統特务韓中石、軍統特务李琼以及叛徒譚影竹等都被何鍵重用。何鍵的清乡反共政策是“宁可錯杀三千，不可輕纵一人”。当时湖南清乡司令部（后改为保安司令部）設有參謀处、执法处及副官处等机构。执法处即专司共产党案件的审讯和审核。在何鍵所謂“大清剿”时期（他上台后的两三年間），每年清乡司令部直接判处死刑的、核准各区指揮部判处死刑的，以及核准各县判处死刑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达两千人以上。这还是所謂正式审讯了的。至于未經审讯或在“清剿”战斗中被杀害的，更是无法統計。如长沙县旧“清泰都”鑪共义勇队长梁鎮球，即任意杀害农民群众和进步人士三百七十余人，其他可以概見。

一九三〇年长沙的两次失守

一九三〇年春，南方的桂、张（发奎）与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联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一致反蔣，一时声势頗大。这时，何鍵的处境很尷尬，因为他仍是脚踏两边船，一方面繼續保持同桂系的联系，一方面又企图进一步投靠蔣介石。五月間，桂、张軍隊由柳州、桂林一带傾巢向湖南进攻。何的嫡系刘建緒部节节后退，一直退到衡阳还没有放一槍。何的这种曖昧态度，引起了蔣介石很大的怀疑，于是由武汉行營派刘文島来湘觀察动静。刘文島来了之后，何鍵不能不表示态度，但思想又很矛盾：打，怕同桂系的关系从此断絕；不打，又无法向蔣介石交帳。某天，何为此事找我商量，我說：“我們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蔣。当前桂、张、閻、馮反蔣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們之間意見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結果如何，很难逆料。”他覺得我的看法很有道理，当对我說：“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給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我这时已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參謀长。几天以后，何即約我偕同刘文島到株洲去督战。当我们到株洲时，桂、张軍隊已攻下衡阳，打到淞口一带，我們住在株洲已能听到前线的槍炮声。这样一来，才释去了刘文島的疑心。

当时桂、张的攻势很銳，长沙究竟守不守，是大家爭論得很激烈的一个問題。何鍵为此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四路軍总部參謀处的意見认为长沙必須坚守；它是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担当責任不起。我和刘建緒則主张放弃长沙，退守岳阳，等援軍到达后再行反攻。几經研究，最后何鍵同刘文島都同意我們这个意見。刘并即回武汉复命。我当时出此主张，完全是为何鍵保存实力着想，因为我們既然已經投向蔣介石一边了，他不会不支持我們的，万一岳

阳守不住，就退到武汉去，一切都以保存实力为主。刘建绪和我的主张相同，但想法不同。他是想靠湘桂系的，根本不想同桂系打。当我们到株洲时，我问他为什么一枪不放，只顾回头往后跑。他只是说：“打不得，打不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以后何键还是决定要打，他也没有办法。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桂系军队逼近长沙，何键正准备向岳阳撤退的时候，忽然接到武汉行营的电报，要他率部退守湘西，待援反攻。当我们退到常德以后，谭道源、李韞珩等部自北边，陈铭枢率领蒋光鼐、蔡廷锴等部自东南边，一齐向长沙反攻，何键也从常德、益阳方面反攻。桂系军队以三面受敌，遂即从长沙退走。

长沙这次失守，蒋介石虽然没有追究何键的责任，但何为了洗刷自己，免不了要向下面追究一番。当何询问刘建绪为什么不战而退时，刘从口袋中拿出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晴初要他不要打的电报作证，说自己是奉命行事的。何键无话可说，便将刘晴初撤职，以新编第七师参谋长刘膺古（刘是蒋介石派来的人）继任。这次人事更换，对何键来说，既可达到洗刷异己的目的，也可向蒋介石表明态度，以进一步取得蒋的信任。不过刘建绪的一枪不发，并不是完全由于刘晴初的电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和桂系靠攏的，否则，像这样的大事，他在得到刘晴初的电报以后，为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何键，就一直向后撤呢？

当桂、张出兵攻湘之际，红军在赣的势力剧增，有进攻平、浏，威胁长沙之势。一方面是桂军的进攻，一方面是红军的威胁，对何键的压力确实很大。于是何键派张慕先赴南京谒蒋请示机宜，并求援助。蒋的答复是：“芸樵可以放手去干，只要遵照中央指示范围办事，不会要他一人负责。”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红军已开始向平、浏一带进攻。当时何键的主力部队因追赶桂军已开往湘东、湘南一

带，留守长沙的仅有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的第四十五旅（旅长王东原）。红军在平、浏一带全歼第十五师和第十九师的四个团后，直薄长沙。何键看到情况不妙，急调刘建绪部回长增援。但刘部行动迟缓，到达长沙时，红军已越过靖港进入七里港、八里田等地，离城只有一二十华里了。刘部到长沙后，并不积极迎战，反而暗地把自己的罗树甲旅调开，说兵力不够，向何键商调陈光中旅增援。时陈部远在湘南，远水难救近火。结果，红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入长沙。何键匆匆渡过湘江，逃往益阳。

先后不到两个月，长沙两次失守，对登台不久的何键，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何的嫡系部队是刘建绪的第十九师，在这两次战役中，刘都不肯积极应战，引起了何对刘的不满。何曾对我说：“两次丢长沙，都是吃了恢先（刘建绪别号）的亏。”据传，蒋介石曾有电令要撤刘建绪的职，何碍于多年旧交，面子上下不去，把电报压下来了。但刘本人是知道的，于是称病跑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后，发表他为第二十八军军长，才回湖南）。南京方面，由于长沙的两次失守，不满何键的人纷纷指责，并向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何键。这时的何键如坐针毡，多方派人向南京有关方面疏通。不料蒋介石对这问题却一肩扛起，说“中正应负其咎”，使得何键如释重负，衷心感激，更加倒向蒋介石一边了。

何、刘、陶、李的矛盾

刘建绪与何键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从何键一九一八年在醴陵搞游击队起，就同何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很深，后来成为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重要人物，地位仅次于何。陶广也是一九一八年同何键一起搞游击队的（当时何任支队长，下辖四个营，陶广和刘建绪都是营长），以后随何步步上升。一九二八年何任第三十五军军

长，由安徽退回湖南，陶任第三师师长，驻安化（何的三个师，除陶广师以外，第一师戴斗垣，驻沅陵；第二师刘建绪，驻湘乡）。李觉是何键的女婿。一九二三年，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到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第二旅（旅长刘兴）当连长。时何任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后来李被调在何键部下，由唐生智作伐，同何的长女结了婚。李在何键统治湖南时期，先后任过长沙警备司令、第十九师师长及湖南省保安处长。何、刘、陶、李关系如此，以后又怎样发生了矛盾呢？我和他们都常接近，就我所知道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一）一九二九年四月，桂系败回广西后，蒋介石以桂系军队未彻底消灭，终为心腹之患，于是，委何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出师讨伐。第四路军共辖三师两旅，即新编第七师，何自兼师长；新编第八师，周斓任师长；第十九师，刘建绪任师长；独立第六、第七两个旅，由陈汉章、陈光中分任旅长。第十九师是何的基本部队，装备比其他师好，骨干也较充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军队整编（新编第七师改为十五师，王东原任师长，新编第八师改为十六师，彭位仁任师长；第十九师番号仍旧，刘建绪任师长），何键想把第十九师的力量平均分配到三个师，以普遍提高部队的质量。刘建绪不肯。何以刘霸住第十九师不放，心里恼火，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刘升为第二十八军军长，以李觉接充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升了官很是满意，但丢了第十九师，心里又不舒服，对何的这个作法有了意见。

（二）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于一九三三年改为全省保安司令部，何键自兼司令，以刘建绪为副司令，并由我兼任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保安司令部成立以后，将全省划为六个保安区（后改为九个保安区），各区设保安司令一员。当时全省保安司令部共辖二十四四个保安团，两个保安旅。关于保安团、旅的编练、调遣、人事任免、工作考核

等等很不简单，于是又在保安司令部之下，成立保安处，具体领导和指挥这些团队。保安处是个肥缺，不但掌握全省十几万团队，是一项重要政治资本，而且掌握每年上千万元团款，大有油水可捞。因之何键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很厉害。何键把它给与自己的女婿李觉，引起刘建绪、陶广很大的不满，认为何键不应把好事都照顾李觉。陶广某次找何键发脾气，说：“十九师师长给李觉就很够很够了，现在又把保安处长给他当，我就不服。这个保安处长他当得，我也当得。”气得何键浑身发抖。事后何键对刘岳厚说：“思安（陶广别号）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怎么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刘建绪对此也很不服气。一次何键因公离省，指定保安处长代理全省保安司令，而不按惯例由当时任副司令的刘建绪代理；同时，李觉在行文时，也不署何键的名，直接用“代司令李觉”。刘建绪非常生气，跑到我家对我说，“芸公干的好事！他出去了，要李云波（李觉别号）代理保安司令。那好，你和我都归他指挥了。”以后何键知道刘、陶二人对此都很不满，于是把这个职务改派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膺古兼任。刘膺古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刘、陶当然没有话说。尽管如此，何、李和刘、陶之间又增加一层隔阂了。

（三）一九三四年江西红军北上抗日，何键以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堵击不力，将其撤职，以章亮基接任第十六师师长，并说，章亮基这人可靠。刘建绪听到这话，对我说：“是李云波的姐夫子，当然可靠囉。他能当什么师长，一听见枪声就吓倒了的角色。”词意之间，对何键提拔章亮基很不满意。刘继何键任四路军总指挥后，终于把章亮基撤换了。

（四）一九三五年，李觉因堵击红军，率部驻防常德、桃源一带，

施蘇三人負責。某次，陶廣到沅陵，對我說：“李云波真胡鬧，怎麼設卡抽起稅來了！他說他可以把眼給我看，我看他什麼眼！這件事根本不應該作。”其實，當時的軍隊在交通要道設檢查哨和稅卡勒索錢財，是常有的事，陶廣對李覺有意見，可能是二人分贓不均，在經濟利益上發生了矛盾，因而鬧了起來。

從上面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何、劉、陶、李之間的矛盾是很大的。產生矛盾的原因，無非是爭權奪利，而何鍵對李覺的逾格提拔和照顧，又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關於何對李的私心，還有不少具體事例，因事涉瑣細，這裡就不臚舉了。

何、劉、陶、李矛盾的發展，最後集中到何、劉兩人身上。劉自升任第二十八軍軍長後，在何集團內部地位越來越高，軍權越來越大，也就逐漸產生了取代何鍵的野心，主要從他同何鍵爭奪第四路總指揮一職反映出來。劉當時看到蔣介石對何鍵的扶植和依靠，已漸漸轉移到自己身上來了，有些軍事上的重大問題，蔣往往找他商量而把何鍵撇在一邊。這自然使得他有勢可恃。一九三五年春，劉竟通過凌璋向何鍵“逼宮”。一次，凌對何鍵說：“這個總指揮職務，你只掛個空頭銜，實際上都是恢先負責，何不干脆讓給他，他也好做事。”又一次，凌進一步威脅何說：“這件事你要好好考慮，莫惹出事來。”凌璋是醴陵人，與何同鄉，追隨何鍵多年，當時任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處長，並兼省府機關報《國民日報》社長，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他的父親又是何鍵的業師。凭着這種不平常的關係，他對何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恰在這時，凌想擠掉我搞民政廳長，有求於劉的幫助，於是兩人相互利用。凌為了使劉達到目的，不惜使用各種手段，甚至走內線，疏通何家裡的人，勸何把總指揮一職交出來。

凌璋，字伯章，湖南醴陵人。曾任湖南第一師團長，後任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處長。凌璋與何鍵關係密切，曾向何鍵建議，將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改為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並由凌璋兼任處長。凌璋在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工作期間，曾向何鍵建議，將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改為第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並由凌璋兼任處長。

拿过来以后，对何更不大卖账。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时我已离开湖南省政府）碰到何鍵，何对我說：“你看恢先真逼得我不像样！說什么四路軍总指揮部的账，交代不清，要我交账。”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刘矛盾已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了。刘建緒要何鍵交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何鍵把軍隊指揮权交給刘建緒后，一直把經理权保留在自己手里，从刘任第二十八軍軍长到四路軍总指揮，都是如此（最后还是把經理权也交出了）。在何鍵任內，南京政府积欠四路軍經費甚巨。刘任总指揮后，曾派张干群到南京要来五百万元。按何鍵的想法，这五百万元應該归他，因为是在他任內欠的。刘建緒則认为他已經繼任了总指揮，何鍵應該連賬帶錢一并交給他，故有逼何交賬的事（据随刘建緒最久的刘君武說，刘建緒非常爱錢，他同何鍵为这五百万元爭得很厉害，結果爭得了四百万元，却未发放部队欠餉，全部入了私囊）。

何鍵与甲、乙派斗争

何鍵对于湖南党务向来很重視，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一九二九年春，南京政府任命他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之后，他来到武汉找我和周燾，說他初被新命，一切都生疏，要我們回去帮他的忙。他最初是想要周燾当民政厅长，我搞党务。周燾的答复是，他愿仍旧帶兵。我說：“我对搞党务毫无兴趣，同时自己不爱活动，搞党务也不相宜。”他看我坚决不干，也就沒有勉强。不久，国民党中央又派何鍵为湖南省指导委员会委員并任常委。这时湖南党务完全由彭鈞、张炯集团把持（彭、张集团后称甲派）。彭、张等系譚延闓的亲信，代表湖南官僚政治势力。魯滌平是譚延闓的嫡系。何鍵勾結桂系赶走魯滌平，彭、张对何仇恨很深，因此何鍵在省党部非常孤立。彭、张集团的人常常找机会攻击何鍵，以致党、政之間經常发生摩

擦，形成对立局面。何鍵对此很伤脑筋。一次，何鍵对我說：“看来党务非抓不可，你又不愿干，怎么办？”我說：“現在无适当的人，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他們那边拉一两个过来？”何很同意。当时在彭、张集团中，以省党部宣传部长譚常愷最活跃，而且年輕。何看中了譚，就保譚为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厅长。黃家声在省党部委員中，也是比较活跃的人，也被何鍵拉过来任省府委員。何鍵这样做，对他在省党部的处境虽然略有改善，但拉过来的人終究有限，就整个局势來說，並沒有多大改变。一九三一年秋，何鍵又对我提起党务問題。这时正当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第三届执监委员会。刘岳厚以何鍵的关系当选为候补监委。何鍵对我說：“我們硬要搞一个人抓党务。你不愿意干，你看刘岳厚如何？”我說，“很好，这个人精明能干，堪当此任。”从此以后，刘岳厚在何鍵的全力支持下，利用全国道路协会湖南分会这个合法社会团体（时刘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兼道协分会会长）进行了和甲派对抗的乙派組織活动。

刘岳厚这人搞党务，确实有一套。乙派組織逐步形成以后，对彭、张集团积极进攻，使彭、张招架不易，从而轉移了彭、张对何鍵的攻势。何鍵对此非常满意，每月从四路軍总指揮部經理处拨給刘岳厚的活动費达数千元。但是彭、张方面也不甘示弱，看到譚常愷被何鍵拉过去以后，心里非常恼火，对譚的攻击不遺余力。一九三二年秋，抓住譚常愷（时任建設厅长）把一批矿砂卖给日本人的錯处，向南京政府告发，說譚以軍用物資資敌，請求撤职查办。后来譚果被撤职，并受到“停止任用十年”的处分。

彭、张集团把譚常愷搞垮之后，还想打进省政府，以便同何鍵对抗。他們曾通过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向蔣介石疏通。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譚的被撤职，何鍵想找余籍传繼任建設厅长，要我到南京謁蔣請示。蔣介石对我說：“湖南省政府委員出了缺，彭国鈞和张

炯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参加一个进来？”我说：“他们（指彭、张）和何主席摩擦很大，只怕何不同意。”蒋听了我的话也就没有再提了。

甲、乙派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在湖南的CC势力同何键的地方势力的斗争。我虽是何键比较亲信的人，但并没有参加乙派，在甲、乙派的斗争中，我是采取双方敷衍、都不得罪的态度。一九三一年，蒋介石政府举办什么“约法会议代表”的选举。这时甲、乙派的名称虽然还没有正式出现，但在湖南国民党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两个集团，为争夺“约法会议代表”，双方斗争非常激烈。民政厅是承办地方选举事务的。当时在民政厅成立了一个选举事务所，我任选举总监。因此我就成为双方拉拢的目标。何键交下一批名单，限定要选出；彭、张集团送来一批名单，也要求保证当选。彭、张集团为了想进一步控制选举，还提出要派王祺到选举事务所当总干事。对于双方的这些要求，我都答应了，但是提出一条，就是双方在选举中不能直接插手，否则提出的名单选不出，不能怪我。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条呢？因为当时所谓基层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实际上候选人早已由各方面分了赃，名单发到县里，由县长掌握，民政厅可以控制县长，只要县党部不从中作梗，是不会发生问题的。表面上看来，选举运动仍旧轰轰烈烈，至于选民究竟投什么人的票，那是与选举结果没有关系的。下面一个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有个衡阳人李沅松，在赵恒惕时代当过省议员，这次决心要竞选“代表”。他派人在衡阳、衡山等地大肆收买选票，结果担回了几担，共计一百五十万张。那时正是溽暑天气，他发动全家夜以继日地赶写选票。因为采用的是记名投票，一时要凭空捏造一百五十万个投票人姓名颇不容易。于是他拿出“百家姓”，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顺序编造了许多名字。选票写好之后，又派人分成几担挑着去投。但选举结果，他却没有获得一票。当时李住在宾步程

家里，宾曾目睹其事。事后，宾对黄士衡（当时的教育厅长）说：“曹伯闻做的好事，真不怕害死人，大热天害得人家全家几晚没睡觉，结果连一票也没有得到。”这件事是黄在事后告诉我的。

这就是当时选举的真实情形。由于我坚持了“双方不插手”这一条，彭、张集团虽然把王祺派进选举事务所来，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占到多少便宜，但何键是乙派的后台老板，而我又是他认为亲信的人，对于我这两面敷衍、都不得罪的态度，当然不满。一九三五年湖南省政府改组，我被挤出民政厅，可能这也是原因之一。自一九三二年以后，乙派组织已经正式形成，甲、乙派的斗争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何键也就不再和我谈党务问题了。

红军北上抗日与何键的“送客”

一九三四年，江西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北上抗日，开始历史上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紧紧追击，并委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妄图不出湖南境就把红军的主力消灭。但事态的发展，与蒋介石的愿望完全相反。一贯反共的何键，这时对于“追剿”任务却并不十分起劲，他的思想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一方面想在“追剿”战斗中侥幸成功，消灭红军，讨蒋介石的欢心，赢得更多的“奖赏”；一方面看到历次参加“围剿”的部队都吃了很大的亏，慑于红军的威力，又怕在堵击中输掉老本。当时我仍兼任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参与何键的军事计议，得知这一情况。从来何键遇有较大的事情和我商量，我替他考虑问题，总是从两点出发：一是靠拢蒋介石，二是保存实力。靠拢蒋介石是为了保存实力，也只有保有实力，才能为蒋所看重。归根到底只有一条，就是保存实力。我这样为何键打算，当然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现在又临到紧要关头了，权衡轻重，我认为还是不能硬打。因此，

当何鍵問我的意見时，我說：“这有什么可打的，还不是送死。”何鍵同意我的看法。經過反复考虑，决定下面两条办法：一、派人同广西联系，看广西的态度，以便决定自己的态度；二、如果不得不打，只尾追，不硬堵；但須做出打的样子，紅軍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过必須使部队同紅軍保持一天的行程，尽可能避免接触。何鍵当即派人同广西联系，白崇禧表示：“硬打，沒有那么蠢”。何得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对我說：“广西也不准备硬打，我們还打什么！”其实何鍵心中早已打定主意“送客”，其所以要派人同广西联系，只不过是看看风色而已。何鍵是最善于四面八方应付、保存自己实力的人，他对这个“送客”的办法，自觉很满意。

紅軍首先过境的是蕭克將軍率領的先遣部队，主要从湘南方面突入。当时何鍵的嫡系王东原、彭位仁等师駐防郴、桂、藍、嘉一带，应该是首当其冲的。但是他們在何鍵的指示下，一聞紅軍准备經郴、宜西行，就紛紛向耒阳、攸县退縮，而要当时的郴州区保安司令欧冠率領地方团队防守郴、宜公路，虚张声势。不久，紅軍主力也通过这一地带向西行进。何鍵的军队都是讓开路来，等紅軍过了，才远远地尾追。

紅軍安全通过湖南境地以后，蔣介石追究責任。这时何鍵又把責任往下推，說这个部队追击不力，那个部队临陣后退，撤換了几个將領，向蔣介石交賬。在撤換的將領中，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就是一个。彭位仁被撤換以后，何鍵对我說：“十六师太糟糕，要‘送客’也得送出一个样子来。”其实，何鍵并不是真的認為彭位仁追击不力而把他撤职的，一方面是应付蔣介石，另一方面，也是前面提到的，要把章亮基提拔上来。

一九三五年湖南省政府改組真相

一九三五年七月，湖南省政府突然改組。事前我不知道。这次改組，我和財政厅长張開道都被免職，由凌璋、何浩若分別繼任民政厅长和財政厅长。我和張開道都是何鍵比較親信的人，在當時有“曹、張二將”之稱，張並是何鍵政權財政方面的要角。還在魯滌平主湘時期，何即向魯推薦張任財政厅长，作為他的私人勢力安插在省政府內，以利後來倒魯。我和張的突然去職，外間不明真相，一時議論紛紛。實際上，這是何鍵統治集團內部繼何、劉、陶、李矛盾出現之後，繼續分化的結果。

我和何鍵本來關係很好，他有什么重大事情總是找我研究商量，同時他對我也很尊敬，一向稱我為“伯聞先生”。我們兩人之間產生距離，主要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蔣介石拉我，引起了他對我的猜疑。一九三二年我到南京參加內政部召集的內政會議。這時蔣介石因兼任行政院長的关系，接見了與會人員，接見之後，並請吃飯。在吃飯前閑談中，蔣突然問我加入了國民黨沒有，我說：“我是北伐時在廣東入過黨的，民國十七年舉行黨員登記，我就沒有登記了，等於還沒有入黨。”蔣介石聽到我說的這個情況，似乎感到很惊奇。吃飯以後休息，適陳立夫也在座，蔣問陳立夫入黨要什么手續，陳答要填申請書、入黨表……。蔣說：“這太麻煩！我替曹同志做介紹人。”過幾天陳立夫即送來申請書、入黨表要我填。一九三三年，南昌行營召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剿匪”軍事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如何配合軍事“圍剿”從各方面對付共產黨的問題，因之四省的保安處長、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和省府秘書長都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蔣介石單獨約我去談了一次話，並留我在他的官邸吃飯。蔣在談話中對湖南的情況問得很詳

細，并对何鍵在湖南成立航空处表示极不同意。他說：“航空事业只有中央可以搞，地方何必搞呢！”最后他对我說：“湖南的事你要多負点責，这里有密碼一份交給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单独用密碼告我。”蔣介石前此关心我入国民党，这时又向我交任务，显然是要利用我窺察何鍵的行动。但我考虑到，我并不是蔣的亲信，何必替他做工具；而且我和何鍵的关系很深，以后还是要靠何鍵的，所以我后来并没有按照蔣的指示办事。我在南昌开会回来不久，省政府交际主任胡蔭槐突然对我說：“省政府的几位厅长中，論資格只有伯聞公司可以当主席。”我揣想何鍵是个耳朵很长的人，蔣介石的拉我，他不会不知道，因此对我起了戒心，授意胡来試探我。

我在几年民政厅长任內，有时候不大卖何鍵的賬，也是何逐渐对我不滿的原因。記得在清乡督办公署改为清乡司令部以后，何鍵派出了大批清乡督察員到各县监督县长的清乡工作。这些清乡督察員到各县以后，等于“欽差大臣”，动辄借口某某县长清乡不力，提請清乡司令部撤換，而清乡司令部没有直接撤換县长之权，一定要提請省政府交民政厅办理。一批一批撤換名单交到民政厅以后，我常常把它压了下来。何鍵对此事很伤脑筋。其实我对清乡司令部提請撤換县长的名单，不是完全没有照办，只是有时候认为今天才委派的县长，明天又撤，民政厅委也委不贏，因而拖了下来。像这样的事情，在何鍵看来，可能认为我是有意搞他的蛋。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被突然免职，是因为我同何鍵已經有了矛盾，可以理解。财政厅长张开建为什么一道免职？事后有人告訴我：张管财政，何鍵虽然滿意，但由于他对其他方面卡得厉害，激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和反对；而何浩若又在积极活动这个位置；何鍵对张的去留，已在躊躇之中。这时何正要把我拉下来，而我在何集团內部，資格較老，单独把我拉下，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两个人同时拉下台，

就比較好講話些。

当我和张去职不久，蒋介石由南京到了重庆，来电报要我同张到重庆去见他。何鍵知道我要到重庆见蒋，怕我在蒋的面前讲他的坏话，很抱歉似地对我说：“你这次下来，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想讓凌璋、何浩若和你三人調动一下；四路軍总指揮部的秘书长一职（原由何浩若担任），請伯聞先生屈就一下吧。”我对何这番話未置可否，随即同张开鍵到重庆见蒋去了。蒋派我为軍事委员会参議，考察河北、山东、广东、广西四省民团組織工作，从此割断了同何鍵的关系。

何 鍵 与 段 道 人

何鍵統治湖南期間，大肆宣揚所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經常亲自到机关、学校、部队講演，并通令部队和行政机关在牆上和公文紙上一律写上、印上八德字样，以广宣传。据我所知，在这件事情上，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就是段道人。段道人名正元，傳聞他是上海反动会道門“道德学社”的主持人。他除开堂收徒，搞封建迷信活动，进行誑騙外，政治上主张尊孔和提倡八德。并对老子的《道德經》和儒家的《論語》、《大学》、《中庸》等书大肆牵强附会，演为荒誕不經之談。这本是騙人而又騙不了人的勾当，但何鍵既是自幼就由封建思想浸潤出来的人，这时又正挖空心思，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欺騙和麻痹人民群众，借以巩固其封建統治，段的这一套，适投其所好，故一經人介紹，就表示大为傾倒，連电請其来湘。約在一九三一年間，段正元来到了湖南，何鍵对之恭維备至。他曾对我說：“段道人講的以八德治天下，很有道理。”一天，何鍵請段道人吃飯，約我作陪。他长袍馬褂恭而敬之地請段上坐。席間，段道人大談其“道”，說什麼道有三种，即天道、性

道、人道。为了自圆其说，他竟篡改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几句话，说这是后人讹传，他有个古本，原文是“道道道，非常道；名名名，非常名”。《老子》一书，开宗明义，即在标举三道。“道道道”，即指天道，性道、人道；“名名名”，即指三道之名。又荒谬地解说《论语》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和《大学》中“是故君子必正其本也”等句，说什么孔子所谓君子有几种，有“不亦君子”，“是故君子”。并说：“关尹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君子，因无君子之口也（是说，尹字下面没有口字不是个君字）”。像这样的一派胡言乱语，何键却说是“道德真言”。何键究竟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套呢？人人都知道何键所作所为，是既不符合“八德”，更无一点“君子”气味，他的装腔作势，无非是要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已。段道人带来湖南的徒弟，何键一律优礼相待。如段的徒弟张树璜，何键到处宣扬八德的讲演稿多半出自他手。何键为了酬劳他，于一九三五年任命他为湖南国学馆馆长。段的另一个徒弟杨三生也给何键写过这类稿子。何键每次去南京，总是带杨同去，几乎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何键对段道人确也有笃信的地方。他曾两次约我到段道人处“悟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信服段，他说：“段有神通，能未卜先知。”事后我知道这完全是段的一套骗人的把戏。原来段在上海、南京一带走江湖，徒弟甚多，常常四处打听一些消息告诉段，特别是南京方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有时比何先知道。每当何键问他，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一通。何键竟因此对他五体投地，称之为“活神仙”。

何键信段道人，他的部下如刘建绪、陶广等却不信。有时他们到我家，问我信不信，我说我不信，大家一笑置之。段道人在湖南没有呆多久就离开了，但何键对他总是念念不忘。一九四八年淮海

战役之后，蔣介石的军队土崩瓦解，蔣家王朝摇摇欲坠。何見大势已去，自南京去香港，路經长沙，我会見了他，他还談起段道人的事，說：“段道人預卜罡風即來，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將一掃而光。”

这些事实說明，与人民为敌、把自己置于完全孤立地位的反动統治者，以至不得不寄幻想于江湖术士，其思想之空虚，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

結 束 語

何鍵自利用蔣、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以后，統治湖南达九年之久。在当时軍閥互併、動盪不定的局势中，他能够保持在湖南的統治地位这样长的時間，基本原因在于他自一九三〇年以后即完全倒在蔣介石一边，頗为蔣所倚重。蔣介石之所以倚重何鍵，一是由于湖南地处兩广門戶，兩广对蔣的态度自北伐到抗日戰爭爆发以前，始終是反反复复的，他需要何鍵这样一个力量作为緩冲。其次是何鍵的坚决反共，得到蔣的賞識。当时江西紅軍势力不断扩大，对蔣政权是个很大的威胁，湖南与江西接壤，需要何鍵这支反共力量牽制紅軍。再次，何鍵上台以后，对湖南各种封建势力，采取拉攏、利用和分化打击的办法，逐漸使自己成为地方各派势力的中心，也使蔣介石有所顾虑，不得不对他采取羈縻、利用的手段。

尽管如此，蔣、何之間仍然是存在矛盾的。蔣介石搞的是軍事独裁統治，慣于消灭异己。何鍵并非他的嫡系，为了不被消灭，保存实力，自然遇事要多方应付。这就更加使蔣介石不放心，終欲去之而后快。蔣介石是善于玩弄“打进来，拉出去”手法的人，他除老早就派进郭持平（任四路軍总部參謀处长）、刘膺古等人外，更主要的是从何的集团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蔣、何关系如此，何鍵能否維

持其統治，就要看形势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了。

一九三四年，紅軍离开江西根据地，北上抗日。一九三五年，蔣介石拉攏余汉謀，搞垮陈济棠，迫使桂系重新和他妥协，兩广問題得以解决。与此同时，蔣介石扶植的刘建緒又代何而起，掌握了湖南軍权，旋即率部开入浙江，与何鍵彻底分了家。刘膺古在任保安处长和西路軍的第二纵队司令之后，又掌握了大部保安团队（他后来即在这个基础上，将湖南保安团队改編为一个軍，开出湖南）。何部將領如王东原等也进一步投靠了蔣。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蔣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以嫡系部队留在后方对付共产党，而把杂牌軍队調赴前綫。刘建緒的第四路軍就在这个情况下参加了抗战，部队受到很大的損失，都以湖南的保安团队补充。何鍵不仅失去了基本部队，即他一向吹噓的十几万保安团队也大大削弱，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何政权的武装基础。何鍵这时所保有的只是一些有名无实的空头銜，賴以統治湖南的凭借全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蔣介石調任何鍵为国民党政府內政部长，何鍵在湖南的統治于焉告終。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何鍵軍事集團的形成和瓦解

彭松齡 黃維漢 胡 達*

何鍵在一九二七年製造了長沙“馬日事變”，給湖南革命運動以嚴重的摧殘以後，又於一九二九年利用蔣介石和桂系之間的矛盾，取得湖南政權，從此統治湖南達九年之久。這個雙手沾滿血跡的國民黨新軍閥能够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長期統治湖南，主要是由於他在革命潮流開始低落、反革命氣焰日益高漲的時候，代表着湖南封建地主的勢力，積極反共反人民；並繼續利用蔣介石與兩廣之間的矛盾和蔣介石疲困於“剿匪”的時機，進行政治投機，其次，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牢固地掌握了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形成了一個封建的軍事集團。

我們在何鍵的軍事集團擔任過重要的職務，對於這個軍事集團的形成、發展和瓦解，略知梗概。現就記憶所及，敘述如下。

何鍵軍事集團的形成

何鍵是由醴陵搞游擊隊起家的。

一九一八年，南軍與北軍在湖南混戰，北軍紀律蕩然，人民恨之刺骨。何鍵利用這一時機，與張國威同在醴陵組織游擊隊，擁

* 在何鍵統治湖南時期，作者彭松齡歷任第二十八軍參謀長、第四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黃維漢歷任第四路軍總指揮部參謀處長；胡達歷任第四路軍總指揮部總參議、第四路軍各師旅長。

有槍支近千杆。駐在郴州的湘軍總司令程潛委任何、張為瀏醴游擊隊正副司令。下轄兩個支隊，何兼第一支隊長，轄四個營，以陶廣、王本仁、劉建緒、劉德昭分任營長；張兼第二支隊長，轄三個營，以余湘三、李石如、何敏丞分任營長。旋將劉德昭營裁并，并撤銷支隊長名義，由正副司令各轄三個營。一九一九年，何、張率領游擊隊開赴資興，听候改編。何鍵企圖改編為旅，自任旅長。由于張國威所部實力超過何部，張不甘屈居何下，突然率部撤離資興，公开与何分裂。何、張分裂后，由唐生智（时任湖南陸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三團團長）分別改編何、張兩部為騎兵兩營，以何、張分任營長，名義上直隸第一旅，实际受唐生智的調遣指揮。何營轄三個連，陶廣、王本仁、劉建緒分任連長。一九二〇年趙恒惕驅逐譚延闓后，唐生智升任旅長，何隨升為騎兵團長，轄兩個營和一個機槍連，以陶廣、劉建緒為營長，王本仁以非醴陵籍而被擠走。何升任騎兵團長后，除留用了共同搞游擊隊的醴陵人如劉建緒、陶廣之流作為主千外，还延攬了一些保定軍校的同学。如羅樹甲是由原籍耒陽率領團防隊投靠何鍵的；鄭翼超、曾廣國、段珩，胡大亞和叶新甫等都是由何的中校團附危宿钟函約他們來到騎兵團的。他們随后都成為何鍵軍事集團的高級骨干。

一九二三年，唐生智升任湖南陸軍第四師師長，何鍵隨之升為第九旅旅長，轄三個團，以陶廣、劉建緒、危宿钟為團長。一九二六年，唐生智參加北伐，被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何鍵隨之升為第八軍第一師（后改為第二師）師長，轄三個旅，以劉建緒、危宿钟、陶廣分任第四、第五、第六旅旅長，以段珩、叶新甫、钟光仁、李覺、曾廣國等為團長。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駐武漢，唐生智升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以原第八軍為基礎，扩編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軍三個軍，以李品仙為第八軍軍長，刘兴為第三

十六軍軍長，何鍵得以升為第三十五軍軍長，轄三個師，以叶琪、劉建緒、陶廣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師師長。危宿鍾調升第四集團軍獨立第×師師長。何鍵從被收編為騎兵營長，六、七年之間，遞升到軍長地位，完全是依靠唐生智發家的。

何鍵既擁有第三十五軍的軍事力量，在蔣介石的“四一二”事變的影響和湖南封建地主的支持下，遂於一九二七年指使反動軍官許克祥等發動了血腥的長沙“馬日事變”，進一步獲得了蔣介石的賞識和湖南封建地主的一致擁護。

一九二七年秋，唐生智率部“東征”，以何鍵為江左軍總指揮，進駐安慶，並一度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這是何鍵插足到政治舞台的開始。是年冬，唐被程潛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西征軍”擊敗，宣佈下野，東渡日本。何鍵從此脫離唐生智，開始創立自己的局面。

唐部撤退到湖南後，繼續與“西征軍”對抗，何鍵、劉興、李品仙等為使原來屬唐的門炳岳、危宿鍾、何宣、王錫勳、羅霖等幾個獨立師的行動統一，便於作戰指揮起見，即將各獨立師編組為第十二、第十七兩個軍，以第三十五軍副軍長叶琪升任第十二軍軍長，第三十六軍副軍長周瀾升任第十七軍軍長。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軍入湘後，唐部與桂系停戰言和，桂系將唐部改編為四個軍，原第八軍軍長李品仙以廣西籍升為第十二路軍總指揮，由吳尚（原任第八軍的師長）繼任第八軍軍長；第三十六軍軍長劉興以忠於唐被撤免，改以廣西人廖磊繼任軍長；原第十二軍改為第十七軍，叶琪（廣西人）仍蟬聯軍長；原第十七軍被裁併。叶、廖兩軍由白崇禧率領北上，參加第二次北伐；第八軍調駐湘鄂邊境。至是唐部或被改編，或易主帥；獨何鍵所領第三十五軍以醴陵同鄉和旧部關係投靠程潛（時任湘鄂政務委員會主席兼湖南省主席），得

以完整地保留建制，并留駐湖南境內。何旋又兼任湖南清乡会办（程潜兼任督办），实际掌握湖南清乡督办署的实权。这些都为何鍵窃夺湖南政权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当年五月，程潜被桂系軟禁，魯滌平繼主湘政后，桂系曾將所屬軍隊进行了一次改編（改軍为师），何鍵所領第三十五軍改編为第六师。

何鍵既拥軍在湘，复利用蔣、桂之間的矛盾，施展两面手法，于一九二九年，取代魯滌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旋又附蔣討桂，兼討逆第四路軍总指揮。从此，何鍵得以武装割据湖南，逐步形成一个封建的軍事集团。

何鍵軍事集团的发展

一九二九年何鍵取得湖南軍政大权的时候，桂系在平、津和武汉的部队虽被解决，但广西势力未被消灭，蔣介石仍視為心腹之患；同时，湘贛鄂三省的工农紅軍的势力日益壮大，更使蔣慄慄危惧。何鍵既拥有一定的軍事实力，又是发动“馬日事变”的反共急先鋒，此时又出兵討桂，表示效忠于蔣。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利用他作为对付桂系（后来发展到对付两广）的緩衡（何鍵曾公开倡言“联络西南，拥护中央”）和“剿共”的可靠力量。这是何鍵得以巩固湖南政权，发展他的軍事集团的主要因素。

此外，蔣介石力图扩大嫡系部队，借整編之名，极力排斥非嫡系的所謂“杂牌”軍。其时，不少“杂牌”部队，主要是程潜和唐生智的旧部，散布在湘贛鄂之間，既无固定的割据地盘，又不堪蔣介石的歧視和压迫。这給予了何鍵对于这些部队进行收买和拉攏的机会。其次，“馬日事变”后，湖南地方的土著部队包括团防和挨戶团之类的地主武装和土匪，在“反共”的旗帜下，乘机发展，大肆活动。这些游杂武装，后来也成为何鍵軍事集团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总之，何鍵利用了当时的复杂形势，纵横捭阖、强取巧夺，从扩编嫡系部队、吞并和拉拢杂牌部队、收编土匪和整编保安团队等多方面来发展他的军事集团。

先是，何鍵由皖、鄂收退沅陵时，仅率同刘建緒的第二师和陶广的第三师。其第一师师长叶琪已调升第十二军军长，由周磐继任师长，率部驻防湘北。周磐目击何鍵退蹙一隅，餽糈匮乏，不足与有为，遂即脱离第三十五军，而为驻常德的湘西宣撫使刘鏞所拉去，将该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刘自任师长，以周为副师长。其时，戴斗垣的独立第十师（辖四个团）驻在沅陵。戴原属陈渠珍部，为图个人发展，借词率部开至沅陵，弃陈投唐（生智）。唐初委戴为河孟剿匪司令，旋改编为独立第十师。唐下野后，戴正徬徨无依，何鍵遂即利用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拉拢了戴，将独立第十师改编为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抵补周师。同时，何利用戴在湘西的历史关系，得以顺利地就地征筹给养，并提用沅陵关税，渡过了餽糈无继的难关。

一九二九年四月何鍵就任討逆第四路军总指挥时，第四路军共辖第十九师、新编第七师、新编第八师等三个师和独立第六、第七两个旅。

第十九师是由第六师亦即原第三十五军改编的，是何鍵军事集团的基本部队，初由何鍵自兼师长，以戴斗垣、刘建緒、陶广分任旅长。旋何鍵改兼新编第七师师长，而以刘建緒升任第十九师师长，辖第五十五旅（旅长罗树甲）、第五十六旅（旅长陶广）、第五十七旅（旅长李觉）。原第十九师的戴斗垣旅改编入第十六师，戴任副师长兼第四十七旅旅长。程潜被桂系扣禁后，所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开赴江西前，何鍵通过张其雄、张空逸、张乔等人拉得第六军第十七师副师长周希武（醴陵人，保定军校毕业）率同部分队伍来归，编

入第十九师，即以周为第九团团长。

新编第七师是由张其雄、門炳岳、危宿钟三个旅編成的。张其雄旅原系程潜的第六軍所屬部队。张其雄，醴陵人，保定軍校毕业，原任第六軍副官长。第六軍开赴江西时，何鍵利用与张的同乡同学关系，慫恿张将第六軍所屬的易維揚和张穀中两个团拖回，初編为独立第十九师（仅轄易、张两个团）。編組新編第七师时，将独立第十九师縮編为旅，即以张其雄为旅长。門炳岳、危宿钟两个旅原駐岳阳，隶第十七軍叶琪（屬桂系）部。蔣桂战争爆发后，門、危两旅归路遮断，被何收容，遂与张其雄旅合編为新編第七师。何自兼师长，危宿钟副之。

新編第八师是由程、唐旧部所編組的，其中主要是唐生智的旧部。唐的旧部有閻仲儒旅和刘济人、彭位仁各一团；程的旧部除周希武部編入第十九师、张其雄部編入新編第七师外，其他被何陸續勾引而来的（第六軍士兵和中下級干部多是湘籍，其中又以醴陵籍为多，不愿远离乡土，因此，当第六軍开赴江西时，容易受何勾引）均編入新編第八师。新編第八师以周燦为师长，轄第一旅（旅长唐哲民）、第二旅（旅长閻仲儒）、第三旅（旅长彭位仁。彭原任周燦的第十七軍第一师师长，桂系整編部队时，将彭降为团长，拨归叶琪軍，蔣桂战争爆发后，彭即反桂投何）等三个旅。

独立第六旅和第七旅是收容著匪陈光中和陈汉章两部所改編的。陈光中部盘踞武岡、新宁之間，陈汉章部盘踞芷江、洪江之間，何鍵分別改編为独立第六旅和独立第七旅，即以陈光中、陈汉章分任旅长。

此外，盘踞在湘西的陈渠珍部，蔣介石曾給以独立第十九师的番号，何初将其編为第一路警备队，旋改为新編第三十四师，以陈渠珍为师长，名义上归入四路軍建制，实则仍盘踞湘西，不受何的

調遣。又吳尚的第八軍被改編為第五十二師，僅受四路軍的節制指揮，參與討桂，不屬四路軍的建制。

四路軍初成立時，實際擁有如上所述的三個師（陳渠珍師除外）和兩個獨立旅，合計兵力約四萬多人。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唐生智率第五路軍在河南舉兵反蔣。何鍵妄想中立於蔣、唐之間，坐觀風色，由於蔣一再追逼，何始於十二月九日通電表示“擁護中央”。蔣復電“嘉許”，並令何“妥輯部曲”。何鍵即將第四路軍作了第一次整編。

一、新編第七師改為第十五師，仍由何自兼師長，轄第四十三旅（旅長張其雄）、第四十四旅（旅長危宿鍾）、第四十五旅（旅長王東原）等三個旅。其時，與何關係不深的門炳岳已被蔣拉走，後來門被任為騎兵師師長。

二、新編第八師（時駐邵陽）改為第十六師。原師長周燭、旅長唐哲民、團長唐生明等反對何的背唐，均被免職，改以新編第七師副師長羅溶瀛（曾充第三十五軍參謀長）為第十六師師長，謝煜燾（歷任賀耀組師的旅長、中央軍校第三分校教育長、何鍵所主持的編遣分處少將委員）接任第一旅（後改第四十六旅）旅長。當時，邵陽方面謠言很大，甚有謂何、周將以兵戎相見。因此，羅不敢率爾前往邵陽接任師長職務，而在益陽另組師部，但令謝煜燾前往邵陽接旅長職。謝到職不久，即被唐生明等襄脅他率領該旅投桂。部隊去桂後，謝旋被釋。該旅番號虛懸達半年之久以後，始由原第四十八旅第九十六團團長章亮基調升為第一旅旅長。第二旅（後改第四十七旅）閻仲儒部他調，改以戴斗垣旅抵補，並以戴為副師長。第三旅（即第四十八旅）仍以彭位仁為旅長。

三、盤踞洪江的陳漢章被團長李國鈞刺殺後，余眾由其弟陳暉統率，於一九三〇年五月，與第十九師的第五十六旅合編為新編第三

十一师（旋改为第六十二师），以陶广为师长，轄三个旅，以陶柳、鍾光仁、陈渥分任旅长。一九三二年春，陈渥仍率部叛归湘西老巢为匪。

四、第十九师和独立第七旅仍旧。

至是，第四路軍已扩編为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这四个师中除第十九师为其基本部队，兵員武器都比較完整外，其余各师名义上虽各拥有三个旅，但实际只能各編足两个旅。因此，官兵人数仍与过去差不多。

紧接着这次整編，部队在与桂系和紅軍作战中遭到了一定的損失，需要作适当的整补；同时，何鍵感到所屬高級將領多已老大頹預，不能适应要求，因复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对紅軍作战之后，作了一次較大的整編。

一、将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第十六师师长罗藩瀛、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緒免职，改以旅长王东原、彭位仁和李觉分別接替。不久又将以上三个师合編为第二十八軍，以刘建緒为軍长。

二、何鍵命彭位仁旅討伐盘踞芷江一带的李国鈞匪部，李降，遂将其扩編为第四十四旅，即以李国鈞为旅长，編入第十五师。

三、将曾經背何附桂，旋又弃桂投何的李国强及×××等两部各編为一个团，并招撫盘踞芷江的土匪賀竟成部編为一个团，合共三个团，均編入第十六师。

四、独立第七旅旅长陈光中已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升任湘东“剿匪”司令。十一月遂将该旅扩編为新編第三十二师，旋改为第六十三师，仍以陈光中为师长。該师旅长陈子賢原系程潜的第六軍的炮兵营长，程被桂系扣押后，陈即率領該营由汉回湘，投靠何鍵。何将其收容，并拼凑一些湘西的土著部队，扩編为一个旅，以陈为旅长。至是将該旅編入陈光中师，为一八八旅。由于陈光中采用严酷

的封建办法統馭部屬，別的部隊難于插足其間。在陳子賢旅編入該師之前，何鍵曾委戴斗垣部副旅長童珉為獨立第九旅旅長，令其收容戴旅在文家市戰役中的殘部。不久，以之編入陳光中師，為一八九旅。陳光中即將該旅吞并，逼童去職。陳子賢吸取了這個教訓，故該旅名義上劃歸陳師，實則始終未歸建制。在作戰中，陳旅由李覺指揮的時間頗多。

五、一九三〇年，長沙在桂軍與紅軍先後進攻之下，兩度失守。何鍵深感長沙須有一素質較優的部隊負責防守專責，故以軍官講習所畢業的學生和教導總隊軍士大隊結業的學兵為基干，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呈准增編長沙警備第一、第二兩個團和一個獨立連，並以胡達為長沙警備司令指揮之。後又將其改編為獨立第三十二旅，仍以胡達兼任旅長。

六、同年十一月，何鍵因羨慕廣東軍閥擁有空軍，乃借口長沙兩度失陷，是由于缺乏空軍，不能及時偵察敵情所致，遂成立航空處，以黃飛為處長。當時曾購進美造飛機十四架，開設航空訓練班，並以高薪羅致南苑航空學校出身的和廣東方面的一些航空人員來湘駕駛這些飛機和訓練學生。後來，蔣介石以統一空軍為理由，多次企圖裁并湖南航空處，均為何鍵所婉拒。直到一九三四年秋，黃飛因用飛機運毒，事發被槍決，何鍵乃不得不遵令將航空處撤銷。

與正規部隊整編的同時，整編了向無統一指揮的各县地方團隊。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何鍵下令將各县的團隊，按所轄人數多寡，分別改編為保安團或保安大隊。計長沙、湘潭、湘鄉、益陽、邵陽等二十七县均改編為保安團，茶陵、湘陰、寧鄉、攸县、安化等三十县均改編為保安大隊，其他如江華、酃县等十多县則暫時仍舊。所有保安團和保安大隊都歸湖南清鄉司令部統一節制指揮。

至此，何鍵軍事集團的實力雖有顯著的增長，但關於統一地方團隊，各縣的地主惡霸與何鍵的清鄉司令部之間有着尖銳的矛盾，地主惡霸不甘於放棄對本地方武裝的直接掌握，群起反對。何鍵為了和緩矛盾，改編的初步辦法是委用當地的地主惡霸充任團長、隊長。僅有極少數縣由縣長兼任團長，例如瀏陽縣長柏式諾、平江縣長王紫劍都兼任保安團長。各保安團和大隊都冠以縣名（如某縣保安團、某縣保安大隊），以示仍為地方性武力。地方武力改編後，何鍵將全省劃為二十二個團防區。保安團隊的指揮調遣權仍直接屬於各團防區的區司令，各區司令又類由當地的大惡霸充任，仍未能達成何鍵整編地方團隊的企圖。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何鍵請准將湖南省清鄉司令部改為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自兼司令，以第二十八軍軍長劉建緒兼副司令。同時，在省政府增設保安處，實際掌握全省的保安團隊。

保安司令部成立後，分兩步整編全省的團隊：第一步，將全省劃為四個保安區，進行整編，每區編成十一個團，共編成四十四個團；第二步，不分區域，將全省四十四個團縮編為二十四個團又五個獨立營。編組時，一般保留各縣原來挨戶團的建制，按各縣原有的人槍數目，或一縣編為一個團，或兩縣乃至三、四縣合編為一個團，廢除以縣冠名，改用番號。團分甲、乙兩種，甲種團為十二個連，乙種團為九個連，每連槍兵約九十名。團的編制裝備略等於一般步兵团，僅無迫擊炮。按這些保安團隊的兵力將及四萬人，相當於四個步兵師。

保安團隊再次整編後，何鍵逐年將第四路所屬部队的幹部調充保安團的骨干，到一九三五年前後，所有保安團的排級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從四路軍所屬各師調補的，因而保安團的素質已無異於正規軍。

在整編团队的同时，何鍵將全省初划为四个保安区，后改为六个区，又改为八个区，最后改为九个区。分別委任正規軍的骨干或地方的地主恶霸为各保安区的正、副司令，一面繼續分区进行清乡屠杀，一面在省保安司令的統一指揮下，不分畛域地配合正規軍进行“剿共”。这是何鍵軍事集团分布到全省各个地方，用以鎮压农民的一支强大的沾滿血腥的部队。当时担任保安区司令或副司令的如段珩、欧冠、胡凤璋、曹明陣、楊道南等都是有名的劊子手。各保安区的正副司令前后屡有变更，茲仅就一九三五年六月所划分的八个区的正副司令記述如下，

区 別	司 令	副司令	駐 地
第一区	罗树甲	楊道南	岳阳
第二区	郭伯藩	曹明陣	益阳
第三区	罗寿頤	余范传 陈国鈞	沅陵
第四区	张其雄	楊石松 謝 龙	洪江
第五区	段 珩	王昌燭	衡阳
第六区	晏国涛	譚有晉	邵阳
第七区	刘济仁	蔣 声	零陵
第八区	欧 冠	胡凤璋	郴县

何鍵任第四路軍总指揮后，他的軍事集团的实力虽不断扩大，但連年在“討逆”和反共战争中也遭到了一定的損失。一九二九年四月，何鍵奉蔣命出师討桂，以新編第八师师长周燭为第一縱队司令，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緒为第二縱队司令，第五十二师师长吳尙（不屬第四路軍建制）为第三縱队司令，分三路进入广西。中路刘师深入柳州，遭受桂軍伏击，潰败回湘。右翼的周师和左翼的吳师聞敗訊后，都反旌疾遁，互不救援。是役，第四路軍死伤逃散約三四千

人。十月，复奉蔣命，在邵阳以西堵击由鄂假道回桂的张发奎部，也遭受了部分损失。十二月，新编第八师第一旅旅长唐哲民和团长唐生明在邵阳将举兵反何，何命李觉和陈光中两部予以夹击，两唐遂即率部投桂，又损失部分实力。一九三〇年六月桂军入湘，何部王东原、彭位仁和张其雄等旅在醴陵泗汾阻击桂军，蒙受重大损失。七月，危宿钟率领第十五师和第十九师各两个团即侯鹏飞、汪之斌、唐伯寅、刘建文等四个团在平江被红军击溃，损失近半。八月，戴斗垣旅四个团在浏阳文家市被红军围歼，损失巨大，旅长戴斗垣、团长田应棠被击毙。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第十五师第四十三旅在江西永新沙田被红军击溃，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植被俘，部下死伤和被俘者甚众。在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几年中，第四路军还多次参与“围剿”红军，尔后还会再次“追剿”入黔入滇，但在许多战役中，他们力避与红军接触，力避与红军打硬仗，因而狡猾地保全了实力。

何键在其部队于历次战役中遭受一定的损失以后，为了保持和扩大实力，不能不设法补充。一九三三年夏，他以第四路军所属各师连年“讨逆”、“剿匪”，损失巨大，各部队远戍前线，不能适时补充训练为理由，呈准成立第四路军补充训练总队，下辖两个补充训练处（相当于旅部的组织），以成铁侠为第一补训处主任，辖补充第一、第二两团；何平为第二补训处主任，辖补充第三、第四两团。名义上是为其他部队补训，实则各团的装备齐全，与正规部队相同，在“剿匪”战争中，经常参与战斗。至一九三五年四月，四个补充团分别编补各师，成铁侠、何平即分任第六十二师及第十六师的旅长。

到各县保安团队彻底整编和补训总队成立之后，何键军事集团已拥有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正规军、四个补充团、二十四个保安团、五个保安独立营，合计兵力达十万人左右。这是何键军事集团

的极盛时期。

此外，还有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二十四师（师长許克祥）、第五十师（师长岳森）、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韞珩）和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等六个师原来都是湖南部队，既不屈“中央”嫡系，也不属第四路军建制，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間何键兼任西路“剿匪”军总司令时，这些部队曾被編入西路军作战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替何键军事集团壮大了声势。何键为了拉拢这些部队，对于各部队长都餽贈有差，先后共花費了好几百万元。

何键搜括軍費的种种办法

在何键統治湖南以前，湖南地方养兵最多，为赵恒惕統治湖南时期。那时拥有陆军四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約五、六万人。何键却训兵达十万人，幾超过当时的一倍。軍費浩大是前所未有的。何键军事集团既是由地方封建割据所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軍費就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中央完全担負，大部分必須从湖南地方竭力搜括。

一九二九年何键接任第四路军总指揮时，按所有部队編制，月需軍費一百五十多万元。当时国民党中央只准由湖南盐稅項下月拨七、八十万元，烟酒印花稅項下月拨六万余元，其余要由湖南地方自筹。不久，国民党中央調走了門炳岳等部分队伍，他們的軍費免由第四路军总部支付。至是湖南的軍餉本可維持，但何键不顾地方負担，不断扩充部队，每月仍需軍餉一百三十多万元。曾派刘膺古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請求增拨軍費，結果仍只准由湖南盐稅項下月拨九十万元，烟酒印花稅項下照旧拨发，每月仍不敷三十多万元。以上仅就正規军的軍餉而言，至于保安团队的經費則完全依靠湖南田賦附加来挹注。此外，何键用之于收买和拉攏“杂牌”部队以及

私人餽贈等特別費，為數亦巨。

何鍵對於巨額軍費的支付，除請准國民黨中央就湖南各項稅收項下撥發一部分外，還迭次獲得蔣介石撥發的臨時軍費。就我們所知道的有如下幾次。一九二九年四月初，蔣桂戰爭爆發前，何派張慕先馳赴南京投靠蔣介石，張在安徽謁見蔣，當由蔣手令一次撥發何鍵軍費七十萬元。四月下旬劉文島奉蔣命來湘，趣何出兵討桂，又面交何一百萬元。一九三七年春，何鍵派彭松齡（時任第四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赴南京謁見財政部長孔祥熙，請求補助臨時軍費（劉建緒接充第四路軍總指揮率部入浙後，所需軍費仍要由湖南稅收項下撥發，時何鍵尚任省主席，遂以當月稅收淡薄為由，請求財政部撥發補助費），獲得四十萬元。

為了彌補巨大的軍費包括他們慾壑無窮的貪污，何鍵對於湖南地方搜括的苛酷是空前的，並且是不擇手段的。首先是公開護運鴉片抽收“特稅”以及製造和販賣嗎啡。其次是田賦附加，專供保安團隊的軍費。各县保安團隊未整編以前，它的軍餉概由各县就田賦附加挹注。整編以後，由省統收統支，每年附加達一千多萬元。再次是剋扣軍餉，除了一般的剋扣，例如吃空額以及浮報濫支等等而外，還有特殊的剋扣。例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西路“剿匪”軍總司令部裁撤時，積虧達數百萬元，國民黨中央對此項亏空不肯認賬，何鍵只好將第四路軍所屬部隊的薪餉從一九三四年七月到十月停發四個月，以抵補亏空。

何鍵統治湖南時期的軍費不僅是空前的巨大，而且是一筆糊塗賬。何、劉之間曾因分贓而爭吵。何鍵任第四路軍總指揮期間，南京方面積欠第四路軍軍餉為數甚巨。劉建緒接任總指揮後，即派張千群到南京索領。當時，蔣介石正想進一步分化何、劉，亟欲收買劉建緒並迫使第四路軍離開湖南老巢，故不惜餌以巨款。因此，張

干群索得五百萬元。對這筆巨款，何、劉爭奪甚烈，結果，何分得一百萬元，劉分得四百萬元。一九三六年何鍵在南京對曹伯聞說：

“你看恢先（劉建緒字）真逼得我不象樣！說什麼四路軍總指揮部的賬交代不清，要我交賬。”由此可見一斑。

何鍵對其軍事集團內部人事的控制

何鍵軍事集團的封建割據性質，表現在部隊人事控制方面特別顯著。這個集團的首腦向有何、劉（建緒）、陶（廣）、李（覺）之稱。劉的地位僅次於何，後來繼何任第四路軍總指揮；陶、李都歷任軍、師長，李更一度總攬全省保安團隊的實權。何、劉、陶都是醴陵人，又都從瀏醴游擊隊起家；何、劉且為保定軍校同學。李覺雖只是保定軍校出身，但他是何鍵的女婿，所以也能躋于劉、陶之列。由於這個集團的首腦出身如此，這個集團的高級骨幹也大都是瀏醴游擊隊出身和保定軍校出身的，並且多是醴陵人。如位至軍、師長的鍾光仁、陶柳、唐伯寅等都是瀏醴游擊隊的排長、班長出身，鍾、陶且是醴陵人；位至團、旅長的劉建文、湯新昭、謝龍、袁繼謀等也都是醴陵人，其中除劉建文是從劉建藩部過來的，其餘都是瀏醴游擊隊的戰鬥兵和勤雜兵出身的；位至師、旅長和高級幕僚的羅樹甲、危宿鍾、彭灼、張其雄、王東原、彭位仁、段珩、閻仲儒、黃維漢、何平、胡達、王育瑛、彭松齡、楊石松、吳家驥、熊士鼎、徐冒乾、黃素符等都是保定軍校出身的，幾乎完全沒有黃浦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側身其間。

至於中下級干部的擴充則採取自己培訓的辦法。早在一九二六年，何鍵升任第三十五軍軍長後，即曾招募青年學生和選拔部隊中的優秀士兵，組織漢陽學生隊，以李覺兼任隊長。次年又成立第三十五軍教導團、學生大隊和學兵大隊；一九二八年又創設第三十五

軍軍事干部訓練处于长沙，以培訓下級干部。这些訓練都为时不长，所培訓的人数也不多。何鍵任第四路軍总指揮以后，复开办湖南軍官講習所，以胡达为所长。这与蔣介石的統一全国軍事訓練的方針大相抵触。蔣曾拟將該所并入南京中央軍校，何不敢公开抗命，乃提出恢复中央軍校长沙分校的請求以为抵制。一九二九年夏，蔣介石来到长沙，在又一村集合湖南軍官講習所全体学生訓話时，顾盼着何鍵說：“何主席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暗示湖南不应另树一帜。会后，蔣明确地指示，湖南軍官講習所办完这期結束。何只好遵令于一九三〇年停办。該所只办两期，毕业的學員学生約八百余人。此外，还办过团防訓練所，調訓保安团队的干部。

湖南軍官講習所結束后，一九三一年又創辦第二十八軍（何的嫡系部队）軍事干部教导总队，办到第三期以后，扩充为第四路軍干部教导总队。設在四十九标旧址。何自兼总队长，以刘建緒为副总队长。在第一、二期內，以徐旨乾为教育长，第三期以后，由陈浴新繼任教育长。总队下設軍官和軍士两个大队，专輪訓第四路軍所屬部队包括保安团队的下級干部和軍士。至一九三五年，办到第六期結束，延續四年之久，共輪訓了六七千人。

一九三五年刘建緒接任第四路軍总指揮后，又在醴陵設置第四路軍軍事干部訓練处，廣續調訓所屬部队的下級干部，直到抗战开始才結束。

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来年中先后办了六个軍事教育单位，合共培訓了軍事干部一万多人。

何鍵軍事集团的瓦解

何鍵虽然利用各种矛盾巩固和发展了他的軍事集团，但他的武装割据和蔣介石的軍事統一的矛盾是始終不能統一的。一九三四年

紅軍北上抗日，“剿共”的局势缓和了，蔣介石就开始利用何鍵軍事集团的内部矛盾和其他的矛盾，采取各种手段分化和瓦解这个軍事集团。

何鍵軍事集团的内部矛盾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何、刘（建緒）之間的矛盾和以刘膺古、王东原为首的自命为“中央嫡系”与以刘建緒为首的“醴陵系”之間的矛盾。

何鍵与刘建緒既同乡，又同学，且同从浏醴游击队起家，在利害一致的情况下，他們之間的关系原来是很好的。但当他們的“事业”有了較大的发展，利害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了。特别是当何鍵极力培植和提拔李觉（一九二三年何鍵任湖南陸軍第九旅旅长时，李觉在刘兴的第二旅当連长。这时，李成为何的女婿），有觊凌刘、陶而上之势的时候，遂为刘、陶所大不滿。表面上是刘、陶与李觉之間的矛盾，实质則是集中为何、刘之間的矛盾。

第十九师是何鍵軍事集团的基本部队，原由刘建緒充任师长。一九三〇年，何鍵提升刘为第二十八軍軍长，而以李觉繼任师长，既剥夺了刘的实际兵权，又不以資深的陶广繼任第十九师师长，已深为刘、陶所不滿。接着成立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处，何、刘兼正副司令，而何以实际掌握全省保安团队的經理和人事大权的保安处长畀予李觉，遂引起刘、陶的公开反对。其时，何鍵因身兼党、政、軍的职务过多，忙不过来，指定保安处长代理保安司令（例应由副司令代理），李觉用“代理湖南保安司令”的名义行文，这就引起了刘建緒所不能容忍的憤怒。刘曾对曹伯聞（民政厅长兼保安司令部參謀长）咆哮地說：“芸公（何鍵）干的好事！要李云波代理保安司令，那好，你和我都要归他指揮了。”陶广也曾背后发牢騷，說，“云波不仅要把他設在桃源的临时稅收机关取消，連保安处都要拿出来。”这些話传到了何鍵的耳里后，何曾对刘岳厚說：“思安（陶广）跟

我多年，何以竟說出這等話來呀！”此外，何指摘劉過於自私，作戰不力；劉諷刺何昏聩無能，領導無方，彼此都經常流露於詞色之間。例如一九二九年第四路軍整編為三個師的時候，第十九師是原來第三十五軍的底子，實力最充實，劉任師長。何想把第十九師的實力均勻分配到三個師，劉不同意，何頗惱火。又如長沙兩度失守，何歸咎於劉的作戰不力，指責劉只圖保全自己部队的實力，說：“都是吃了恢先（劉建緒）的虧。”又如劉建緒升任第二十八軍軍長時，何答應讓劉掌握全軍的經理，隨即又撤回了劉的經理權，使得劉啼笑皆非。又如一九三四年第十六師師長彭位仁以堵擊紅軍不力被何撤職，而以李覺的姐夫章亮基繼任師長。何說：“章亮基這人可靠。”事後劉對別人冷嘲地說：“是李云波的姐夫子，當然可靠。他能當什麼師長，一聽槍聲就吓昏了的貨色。”抗戰初期，劉還是借故把章亮基撤換了。

其次，以劉膺古、王東原為首的“中央嫡系”與以劉建緒為首的“醴陵系”之間的矛盾，在何鍵軍事集團中長期貫串着，直到這個軍事集團瓦解為止。

早在一九二八年何鍵開始反桂擁蔣的時候，蔣介石即指派他的親信郭持平（浙江人）為第四路軍總指揮部的參謀處長，劉膺古（浙江人）為新編第七師的參謀長。何鍵為了表示擁護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對劉膺古倚重，而劉却凭借“中央”和何鍵的關係，大肆派系活動。他首先通過陳誠拉攏了第十五師師長王東原（王與陳為保定軍校同期同學），逐步形成以劉、王為核心的隱然以“中央嫡系”自命的派系。劉膺古升為第四路軍總指揮部的參謀長後，並曾一度充任省保安處長，掌握全省保安團隊的實權，這已為劉、陶等醴陵人物所側目。一九三三年，劉膺古以四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兼“剿匪”西路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劉建緒恐其獨攬大權，乃出任總參謀長以抑制之。

四路軍的將領除王東原傾向“中央”外，第十六師師長彭位仁也以湖北同鄉關係搭上了何成濬，又以鄉誼兼學誼和晏勛甫、賀國光拉得很緊。土匪出身的陳光中也野心勃勃，與王、彭等搞得親熱，想走“中央”路線。彭、陳都依附劉、王，與以劉建緒為首的“醴陵系”相對立。

王東原在第四路軍一向是受劉建緒的壓抑的。就我們所知有如下幾件事：早在一九二八年，何鍵擬編組教導師時，劉建緒請調升第十九師的團長（其時，第十九師師以下無旅的編制）羅樹甲為教導師長。何卻以王東原充任。劉頗憤懣，電何說：羅以未獲教導師長職，不安於位，我亦慊然，為圖補救，請免去我的師長職務，以羅遞補。何復電，溫語慰勸說：教導師是臨時性的機構，終必撤銷，不宜爭一日之長短。劉的意氣稍平，但對王則厭惡益甚。一九三三年何鍵派王兼任湖南警備司令，以第十九師的旅長段珩兼任副司令。段曾任岳陽區的警備司令，今警備區改制，却降正為副，意殊不平，向劉叫屈，並表示不願就職。劉斥責之，說：“怎麼干不得，胆子小！無用！你不能用人嗎？你不能調遣部隊嗎？你不能指揮各县嗎？你行使你的職權就是。”表面上是斥責段，實則暗示並支持段去搞王的亂。段隨即馳赴衡陽到職。對於司令部的人員不管王已否安排，逕自委派參謀、副官、軍需、書記等。接着在行事方面又故意與王參商，專橫跋扈，不由分說。王對之無可奈何，只好辭去警備司令兼職，請調往湘贛邊區“剿匪”，由段接充司令。是年何鍵成立補訓總隊（相當一個旅），關於人事安排，由劉建緒全權負責。劉調第十九師的團長何平負責主持，所屬團、營長等也多是由第十九師的營、連長調升的。其他各師很少染指。在各師中第十六師是由散雜隊伍編組的，第六十三師也是由地方土著部隊改編的，這兩個師的素質較差。第六十二師是由新編第三十一師改稱的，成立不久，其

中有一部分是收編的散雜部隊，經過整理淘汰，各級官佐已經多有升遷。當時不從這三個師調選幹部是說得過去的。唯有第十五師是何鍵親手編組的，並且是何鍵領過一個時期的部隊，又經過了四年多的整訓，素質較好，理應為補訓總隊輸送一些幹部。可是，劉建緒為了使師長王東原難堪，沒有從該師調升一個幹部到補訓總隊去，並且故意在該師幹部中製造一些“跟着王東原干下去沒有出息”的論調。恰好該師的團長黃新因性情古怪，群眾關係太壞，經該師的旅長汪之斌、張毅中等向劉推薦，劉才把黃新調任補訓總隊第一團團長。雖是同級調動，也算對王東原敷衍了一下。一九三五年劉接任第四路軍總指揮後，部隊官佐依次遞升，各師（陳光中的第六十三師除外）人員均有升調，獨對王東原第十五師絲毫未動。總部參謀長彭松齡感到太過不去，乃向劉建議，願將所兼第十五師副師長職務免除，而以該師的旅長汪之斌升補，劉從之。這就算是第十五師也升了一個人。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間，紅軍北上抗日，劉建緒率部“追剿”時，將第十五師先後撥交第二十三師師長李雲杰和第十九師師長李覺（其時，在軍隊區分中為某路司令）指揮。李雲杰是湘軍宿將，王東原歸他指揮還沒有什麼問題。王與李覺則是同行列、同班輩的，升拔李覺固可，抑壓王東原則已甚。論者竊為不平。但王不露慍色，對李仍極表恭順。王接任師長後，曾就岳麓山赫石坡建立該師公墓，埋葬該師一九三〇年八月五日“收復”長沙以來的死者，並規定每年八月五日到墓地公祭一次，稱之為“八五公祭”，名為慰其“鼓鼙將士”之思，實則炫耀他“收復”長沙的“功績”。行之數年，劉建緒深惡之。劉接任第四路軍總指揮後，即欲將該公墓地址由總指揮部收買，改名為第四路軍公墓。經過數度磋商，雖未得王的同意，但在劉的堅持下，最後還是由總指揮部收買過來了。

王东原在积怨之下，久已蓄意背离。抗战初期，他乘部队赴沪参战的机会公开投靠了蒋介石。彭位仁虽早已去职，但得王东原的荐拔，重为蒋介石起用，历升至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光中也于抗战中被刘建绪撤免，且被扣押两年多，刘欲将其置之死地而未遂。刘膺古则抽调部分保安团编组为第八十七军，不久即率部离开湖南，分化了何键一部分实力。

蒋介石除利用刘膺古、王东原等从何键军事集团内部加以分化和瓦解外，更利用了何、刘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分化和吞併这个军事集团。

早在一九三四年刘建绪调充庐山训练团第一营营长时，蒋介石即极力拉拢，企图先分化何、刘，为瓦解何键军事集团开辟道路。此后，蒋对于湖南军事上的重大问题开始撇开何而专找刘商榷。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利用时机，以刘建绪专责“围剿”湘鄂川黔边区的红二方面军为词，调使何键辞卸第四路军总指挥，而于七月以刘建绪继任。何、刘的分化，实为何键军事集团瓦解的肇端。

刘建绪获得第四路军的军权后，何键仍任湖南省主席并兼“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刘感到何键仍踞其上，类似“太上皇”；李觉伺其下，专候接班，不能“畅其志”，颇想率部离开湖南，脱离何、李的牵绊。一九三六年春，刘率部“追剿”红军，入滇之后，即有久驻滇西练兵之意。自以为只要拥有强大武力，可以坐观天下之变，伺机而动，不必株守湖南一隅。不久，刘部由滇调湘，部队尚在黔湘路上行进时，刘又亲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求将第四路军调赴苏浙，准备“应付困难”。在蒋的“嘉许”下，刘遂率领第四路军的主力远离湖南。从此，刘、何分家，表象上是刘建绪“如愿以偿”，实质上是蒋介石进一步分化何、刘和“调虎离山”的阴谋得逞。刘建绪率领主力离开湖南是何键军事集团彻底被瓦解的关键。

蔣介石为了彻底瓦解何鍵軍事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步骤。

先是，一九三四年长征的紅軍胜利地通过湖南以后，蔣介石即将何鍵所指揮的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五十、第五十三和第七十七等师分別調离湘贛边境，脱离何的指揮，从而削弱何鍵軍事集团的声势，这是第一步。一九三五年以刘建緒接替何鍵为第四路軍总指揮，使何、刘分化表面化，并促使刘与刘（膺古）、王（东原）之間的矛盾更趋尖銳（何鍵任第四路軍总指揮时，他們之間的矛盾尚可暂时緩和）。这是第二步。一九三六年蔣令刘建緒率領第四路軍的主力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远戍黔滇，旋又調赴苏、浙，使割据湖南多年的封建武装离开巢穴。这是第三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蔣介石更利用“抗日”的大帽子，一面命令何鍵軍事集团的部队（包括大部分保安团队）傾巢离湘，开赴前线，一面采用分割使用的办法，将其軍隊以师为单位逐次分調苏浙贛皖等省交給其他的将领指揮，担任战守，使刘、陶、李等不能掌握自己的嫡系部队，从而彻底消灭这个軍事集团。这是第四步，也是最后的一步。

在上述的步骤中，何鍵軍事集团的嫡系首脑何、刘、陶、李，都被各个击破，都被剝夺了兵权，都被蔣介石踢到垃圾堆中去了。

何鍵于一九三五年，被迫交卸第四路軍的兵权后，野心不死。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何企图将第四路軍主力从浙江調回湖南。不久，蔣介石被释回南京，何又惊惶失措，急止原議。一九三六年何鍵在长沙綏靖主任任内接受該署中校附員吳子健的建議，拟将全省保安团扩編为三十六个正規团和八个保安大队，仅将八个保安大队分属于八个保安区，至于正規团則按三三制編为十二个旅、四个师，并配屬騎炮兵，以旅为单位集中組訓。吳子健原是复兴社

的分子。他一面向何献策，一面密报蒋介石。不仅使何健的阴谋落了空，并且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疑。何仅编成六个团，就被蒋介石调去了两个团。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拟调何健为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权。正拟议中，何用书面向蒋建议，重新编组一个军，交其直轄，并推荐刘膺古为军长，由“中央”拨发军餉一百万元以及械弹装备等等。蒋介石认为何健另有野心，不受抬举，就在一怒之下，改调何为内政部长。从此，结束了何健武装割据湖南九年的历史。何健调充内政部长后，还对他的部下解嘲似地说：“委座（蒋介石）调我入阁，主持内政部。这个职位在前清为吏部尚书，系皇上股肱，朝廷重臣。这当然是由于中枢对我历年主湘所著微劳的特厚酬答。”

刘建绪接任四路军总指挥后，比之何健已是江河日下。首先是仅有军权，并无政权，特别是率部远离湖南，失了乡土的地盘依据；其次是所能掌握的部队也大大地缩小了，不仅庞大的湖南保安团队，他已无权调遣指挥，甚至四路军直属的部队，由于“醴陵系”与“中央系”之间的矛盾和刘、李（觉）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分化了。一九三六年“追剿”红军时，刘建绪仅率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和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深入黔滇。其时，蒋介石企图利用“阻击”红军来削弱乃至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包括刘建绪部在内。刘等深悉蒋的阴谋，对于北上抗日的红军，都只追而不击，因而侥幸地保全了实力。一九三六年秋至一九三七年夏这段期间，第十六师调驻浙江江山附近，第十九师调驻浙江丽水、平阳一带，第六十三师调驻江西上饶附近，第一二八师（系新三十四师改编的）调驻皖南，分别担任对闽浙、浙赣、浙皖等边区历史性的土匪的进剿。其时，刘兼任闽浙赣皖边区主任，驻浙江衢县，尚能控制所属部队；但内部矛盾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一九三七年五月，第十六师师长章亮

基在南京陆大将官班受训，乘机图谋将该师列入蒋介石的第一期军队调整计划，有脱离第四路军、依附“中央”的趋势。刘建绪乃先发制人，将章亮基与总部参谋长彭松龄对调职务，得以暂时保留了第十六师。刘、李（觉）之间的矛盾也继续加深。刘率部入浙后，何键曾托刘岳厚向刘致意，请其对李“不吝照顾”，刘建绪忿然对刘说：“那就要云波对思安放客气些！”

抗日军兴，蒋介石更利用“抗日”招牌，任意分割使用刘的嫡系部队。当上海“八一三”战幕揭开后，苏浙闽地区成立第三战区，刘建绪被任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路军总指挥和闽浙赣皖边区主任，驻杭州，担任东海沿岸防守，其所指挥的部队仍是第四路军原有的部队。迨淞沪战事进入紧张阶段，刘所率领入浙的部队以及第四路军还留驻在湖南的陶广部的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和第六十二师陶柳部都逐次被调往上海方面，先后分别拨归陈诚、薛岳、胡宗南、黄杰、张发奎、黄琪翔等人指挥，担任险要处作战，损失很大。这时，刘建绪几乎是个光杆的集团军总司令，驻在杭州虎跑寺里。上海战役结束后，刘建绪收集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和第一二八等师的残破部队，并先后成立第一九二师（以独立第三十二旅为骨干，辖三个团，以胡达为师长）和一〇七师（由暂编第十二旅李国鈞部、暂编第十三旅杨永清部及湖南新兵训练处两个团合编而成，辖两个旅共四个团，以段珩为师长，王校磨、欧阳烈为旅长），担任杭州湾的防守。刘曾率领第一二八师，并指挥原张学良的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在嘉兴、嘉善一带与日寇接战后，退回杭州湾附近，旋即不战而奔杭州。此后，从一九三八年春到一九四一年夏的长时期内，担任温州湾、台州湾、迄杭州湾南岸沿富春江南岸之线的防守。刘本人先驻义乌，后驻金华。在此期间，与日寇并未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斗。后来，第六十二师与第一九二师被调往浙西，归入第二十

三集团军唐式遵部作战序列；第六十三师又被调往皖南，归上官云相指挥；第一二八师和第一〇七师则被先后调入江西作战。至是，刘建绪所能指挥的只是一些地方保安团队而已。一九四一年夏刘建绪奉召赴渝，当即奉令撤销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并将第十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交由王敬久接替。刘被调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当时，刘对在渝部属段珩、郭雨林、李国源等说：“此次撤销四路总部，乃大势所趋，不便要求收回成命。今后我愿弃军从政。”刘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尚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这个兼任的军职也被解除了。从此，何键军事集团的第二号头子刘建绪的封建割据的尾声也寂灭了。

刘建绪的军权被剥夺后，第四路军各个部队也逐步被蒋介石所吞并。下面略述其梗概。一九三五年，陶广接充第二十八军军长，所遗师长先由鍾光仁、后由陶柳继任。先后一度拨隶该军而又陆续拨出的第六十三师和第一二八师，于一九三六年由刘建绪率领入浙。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十八军所属的第十五师王东原部即奉调开赴上海。脱离了刘、陶的掌握。因此陶广仅率第六十二师陶柳部开往浙江，归刘建绪指挥，担任金山卫海岸防守，被日寇击溃后，经嘉兴退至杭州附近。一九三七年冬，第一九二师胡达部由湘开往浙江，拨入该军建制，担任浙江防守。一九四三年一月，陶被调充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唐式遵，指挥四川部队），成立副总司令部，指挥第二十八军和新编第三十师张璠基部，并收编杭、嘉、湖淪陷区土匪邓义等部，编组为挺进第一纵队，以鍾光仁为纵队司令，仍担任浙西防务及杭、嘉、湖三角地带的敌后游击。此时，第五十二师（中央部队）归入第二十八军建制，调升陶柳为第二十八军军长，以刘璣浩继任第六十二师师长。刘璣浩虽是中央军校出身，但是醴陵人，且系刘建绪的族叔，在刘建绪部由连长历升至师长，

算是第四路軍的老干部，因此这时的第六十二师还保持了第四路軍的封建色彩。一九四四年一月，第二十三集团軍副总司令部改为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一九四五年初，第二十八軍在浙西孝丰与紅軍作战惨败。是年夏，第六十二师师长刘璣浩被撤职，顧祝同派譚道平（中央軍校毕业）接替。迨后，蔣介石又将陶柳調赴重庆受訓，派李良荣（黃埔軍校一期学生）接任第二十八軍軍长，派曾振（中央軍校毕业）接任第一九二师师长，并将第六十二师改归八十八軍建制。从此，何鍵軍事集团的基本部队——第二十八軍为蔣介石吞并无余。

抗战胜利后，浙苏皖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撤销。陶辞山东綏靖区副主任新命，在杭州經商，解放后病死在杭州。

在刘建緒任第十集团軍总司令后，李覺升任第七十軍軍长，仍兼仅轄的第十九师师长，率部赴上海参战（归陈誠指揮，經理和人事仍屬第四路軍总部），迭次遭受巨大损失（由湖南調保安团补充）。上海淪陷后，被調往皖南，旋又調赴江西。武汉会战前，刘建緒将第一二八师顾家齐部拨归該軍建制，第七十軍始拥有两个师。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寇在九江附近的姑塘登陆，将第一二八师击潰，陈誠趁机撤销第一二八师番号，将残余部队編并于其他軍、师，并将顾家齐交付軍法会审。第七十軍又只剩一个师。南昌会战后，刘建緒請准以第一〇七师段珩部拨归第七十軍建制，蔣介石又加拨預备第九师給第七十軍，凑成該軍的三个师。一九三九年李覺交卸第十九师师长兼职，由旅长唐伯寅升任师长。一九四〇年，第十九师与第一百軍的第八十师互調。从此，李覺脱离了他的基本部队。第十九师拨归第一百軍建制后，由某集团軍总司令王耀武指揮，受尽排挤。不久，师长唐伯寅也被撤换了。后来，这个师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被彻底歼灭，何鍵起家的第十九师的下場就是如此。

李覺脫離他的基本部隊後，率領第七十軍開往福建，升為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由陳孔達繼任第七十軍軍長。陳是王東原的助手，屬於陳誠系統。李覺的軍銜雖然維持到解放戰爭時期，但實際兵權則早已被剝奪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蔣介石令調王東原的第十五師開赴上海，原令其經贛浙轉滬，王為了避免路過浙江時復受劉建緒的牽絆，乃報准陳誠改經漢口輪運至滬，旋即升任第七十三軍軍長，僅轄第十五師一個師，仍兼任師長。不久，王在上海戰場，禮貌性地電駐杭州的劉建緒請辭師長兼職，並請以旅長汪之斌升任。此時，劉仍妄想控制該師人事，竟復電不准所請。王東原乃逕向陳誠請准了。劉不勝惱怒，曾電告尚在長沙的何鍵，說：“東原已向辭修（陳誠）辭去師長兼職，恐云波亦將受影響（其時，李覺任第七十軍軍長，仍兼第十九師師長）。”這是劉在憤懣之下，挑撥何、王之間的手法。此後，劉建緒對於王東原和第十五師就無從過問了。王調離湖南後，成為蔣介石的嫡系，不數年間由師長而軍長，而第三十四軍團長，而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並一度兼任陸軍大學政治部主任。抗戰勝利後，先後充任湖北、湖南省政府主席，地位與劉建緒埒，而受蔣的親信則遠勝於劉。至於王東原的基本部隊第十五師也始終在第七十三軍的建制內，從未分割，繼王充任師長的，先後有汪之斌、陳為韓、梁祇六（王的內親）、梁化中、楊明等，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才在萊蕪戰役中被徹底歼滅。

一九二師於一九四〇年夏進入杭嘉湖地區，接替第六十二師任務，擔任敵後游擊。一九四一年，胡達調充蘇浙邊區游擊副總指揮，由副師長王堉升任師長。由於處境特殊，這個師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蔣介石編遣。

劉建緒入浙時率有三個暫編旅，暫編第十二、第十三兩個旅經

合編为一〇七师，已如前述。另有暫編第十一旅（旅长周燮卿）原为陈渠珍旧部（三十四师第三旅），因改編为一二八师时不愿受顾家齐指揮，遂改归总部直轄随同入浙。抗战开始，調归薛岳（似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揮）指揮，薛将其所屬两个团分別編入广东部队的两个师内，而将周調至另一师充当旅长。周不从，遍电各方指責薛岳不应分割其建制，吞并其部队，請求收回成命。薛乃将周扣押，所屬两团始遵命就編。未久，該两团均在战争中消灭，周亦被释。

第十六师自彭松龄于抗战初期在上海交卸师长职务后，由旅长何平繼任。何交卸后由副师长杜道周接充，并即撥交俞济时（时任某軍軍长）指揮，从此脱离四路軍建制。

第六十三师自师长陈光中在一九三八年因刘建緒的控告被押于第三战区长官部后，师长职务由陈誠亲信談經国接任，所屬旅、团长更換殆尽。明年，由富春江調赴皖南，归上官云相（某集团軍总司令）指揮，宣城之战被日寇击潰，談去职，由王佑繼任。尔后几經編并，面貌全非。

一〇七师于一九四〇年随刘建緒入閩，师长职务已由宋英仲（曾充湖南保安司令部及十九师參謀长）接任。一九四二年，宋調建延师管区司令，由黃华国接任师长。該师曾一度調赴台湾担任接收，尔后不知所終。

何鍵軍事集团是以反共急先鋒而又投靠蒋介石所发展起来的，早在全国解放、蔣匪帮被彻底击潰以前，就被蒋介石視為异己的“杂牌”，处心积虑地加以彻底瓦解和各个吞并了。反动派的本质决定了他們之間必然互相排斥、互相吞并，直到被人民群众彻底消灭为止。何鍵軍事集团为蔣匪帮所瓦解所吞并，蔣匪帮又为人民解放軍所击潰，这是必然的結果。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第四路军在湘、黔、滇阻追红军 北上抗日的经过

李 觉

一

一九三四年七月，湘鄂赣边区红军在萧克将军的指挥下，突然集中于湘赣边的武功山脉地区，向湘粤边区方向前进。当时何键的四路军总部（即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西路军总部）并不明了红军的企图，估计他们可能是为了集中突击某一点而集结的部队；因此只令各部队加强封锁线，严阵以待。八月初，红军在湘南的汝城，同当地恶霸头子胡凤璋的部队发生战斗后，继续西进，宜（章）、郴（县）地区告急。四路军总部当即令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各部迅速向郴、桂（阳）方面集中，以观动静。这时，萧部红军由湘粤边境经宜章、嘉禾、新田、永明地区向广西的全县方向前进，蒋介石电令广东、广西、湖南各省部队从事堵击。但各方面仍不知红军这一行动的企图，估计可能要在湘粤桂三省边区发动大规模“流窜”，以便牵制三省的兵力，使对赣闽边红军主力的决战有利，或在不利时便于突围，以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各省都为自己的安全打算，忙于堵截红军，使不致威胁自己省区的腹地。因此，虽然互相联系，并不通力合作。

当湘南永明、道县地区发现情况时，我奉命率领在邵阳集中的第十九师的部队，经永明县向宁远、道县方向前进。当到达永明时，

知道紅軍已進入廣西全縣附近，繼續向西。我們判斷紅軍有向城步、綏寧地區逃出的可能，因改道經零陵的鑊子坪向東安前進。這時知道桂系的部隊已向全縣、龍勝方面前進，阻止紅軍向南進入廣西腹地，但彼此聯繫不上。

四路軍總部為了保證湖南境內的“安全”，除令警備長沙的獨立三十二旅（以下簡稱獨立旅）車運武岡協同地方團隊防守外，令十九師急速由黃沙河經東安、新寧星夜向武岡前進，大約在八月中旬，兩部在武岡會合。這時紅軍已經由龍勝入湘，到達綏寧境內，該縣保安隊（約一個營）已退到長鋪子附近待援。第十九師迅速向長鋪子，並跟蹤紅軍的進出路向金屋塘、瓦屋塘之綫前進。獨立旅則在第十九師後尾跟進。因為這個旅雖然成立已有兩年，訓練和裝備都比較好，但從來沒有參加過戰鬥，連長途行軍也還是第一次，所以不敢放手使用，只能把它作為預備隊。當第十九師到達瓦屋塘時，才發現紅軍主力已轉向通道縣。除派地方團隊在紅軍後尾名為追擊，實際是監視“送行”外，第十九師和獨立旅即向靖縣推進，目的在壓迫紅軍離開湖南省境。

大約在中秋節的前四天到達靖縣和通道附近時，接到總部電令，知道廣西已派廖磊率領桂軍四個團向湘、桂、黔邊境堵截紅軍，指定湘軍各部隊歸廖磊統一指揮，協同“圍剿”南“軍”的紅軍。湘、桂兩省的軍隊，從北伐以來，經過“東征”、“西征”及蔣桂戰爭以後，各因利害分歧，不無隔閡；同時桂軍將領素來自命不凡，認為他們的部隊能征慣戰，戰鬥力比別人強，看不起別人；又在蔣桂矛盾之間，湘、桂軍曾有好幾次互相攻訐，彼此已有成見。這時雖是共同對付紅軍，但各省都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在行動上並不十分協調，聯絡也不確實，就不免鬧出笑話。記得在中秋節的前後，第十九師在通道附近繼續追擊紅軍時，在離通道不遠的一個地方（地名記不

起了)，我师先头连突然发现情况，因双方都在急进，来不及考虑，便横冲直撞地打起来。等到我们检视对方死者的符号，才发觉是友军，可是已经互有伤亡，演出了一场哭笑不得的丑剧。从这次误会中，我们对桂军能征善战的谜也打破了，他们只是一支有名无实的部队。当我见到廖磊（廖磊早年在湖南第一师当团长时，我当过他的营长）时，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第七军的老兵已经复员了，现在大部分都是新兵，只有班长、副班长和部分上等兵是老兵，部队训练还不久，因情况紧急，只好临时凑合使用。

湘桂军会师后，红军已进入贵州，到黎平附近去了。我们虽然仍不了解红军的目的是何在，但各有各的想法：广西方面是要把红军送远一点，免得威胁广西；我们则要阻止这部红军到湘西去与红二军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番号）会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我们和广西的想法不同，但把这部分红军送得离湘桂两省远一点的目的，却是相同的。我当时同廖磊商定：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以便超越到红军进路的前面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北进，并压迫其远离湘黔边境地区；桂军则由贵州黎平跟踪在红军的后尾追击，压迫红军向剑河、镇远方向北进，使不致向南转趋广西；同时电请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派兵到黄平、凯里一带协同“围剿”，并请随时告知部队到达位置，以便联络协同。这样，我们企图从三方面包围红军。

当部队进入贵州后，到处山高路险，行军、宿营、补给都非常困难。那时贵州的部队，多以营为独立作战的单位，主要是因为地势险要，大部队施展不开。而我们那时有五个团的兵力，在行动上很迟滞，因此也组织了两个轻装的追击队，进行远距离的搜索。当我部到达镇远时，红军已绕过镇远，向余庆、石阡方面去了。桂军此时也到了镇远附近，主要是解决补给问题。到此时止，我们原来

的計劃已完全落空，湘桂兩軍都沒有同紅軍見到面。至于貴州部隊，我們按王家烈電報指定的位置去聯絡，但一直沒有聯絡上。據聯絡人員的報告，說黔軍根本沒有派出部隊。後來才知道貴州的軍隊是集結在貴陽附近的龍里、貴定一帶，以保衛省會安全為主要目的。

我同廖磊在鎮遠見面後，判斷當面紅軍有與湘西紅軍會合的企圖，初步決定：湘桂兩軍應以鎮遠、石阡之綫為基地，阻止其向東與湘西紅軍（紅二軍團）會合，並盡量將其向西壓迫，以迫使貴州部隊出來堵截，然後壓迫紅軍于烏江江畔強行決戰。於是，桂軍以鎮遠為中心，向北延伸到羊場附近；湘軍以石阡為中心，左接羊場，右翼向北延伸至大壩附近，構成一條縱貫南北的封鎖綫，然後派出小部隊向西搜索。

彼時紅六軍團（當時並不知此番號）經過長途的急行軍，部隊已很疲乏，沿途掉隊的戰士不少，需要作短時的休整，因此在石阡、鎮遠以西的山地中停止未動。這一帶山高路險，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有許多地方，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誰想消滅誰都不可能。同時，我們雖然補給比較方便，但在長途行軍之後，也相當困乏，必須加以整補。最困難的還是這個地區軍民關係太壞。因為當時黔軍軍紀之壞，在反動軍隊中要算最突出，官兵每人都有兩支槍，一支烟槍到處抽鴉片，一支大槍到處搶掠，真正是“軍行所至，雞犬不留”。所以當地人民，只要看見軍隊，就都逃入高山岩洞中避難去了。我們每到一地，都是人煙絕迹，必須由當地政府派人到各處把地保人員找回，才能辦理補給。地保人員，又要從中敲詐，大事貪污，人民畏之如虎，被迫送來的柴米菜蔬，也不敢收錢，丟下就跑。部隊所花的錢悉被這些人中飽，結果還是得不到夠量的供應。在這種情況下行動，自然困難很多。後來，我們也仿效紅軍的辦法，在先頭部隊的前方，組織一支小的宣傳隊伍，向地方說明來意，並

用現洋直接向人民購買東西，不經過地保人員轉手，以便收買人心。但因國民黨的軍隊本來就不好，而黔軍的壞影響更深，儘管我們作了這些工作，也不能使人民的態度和看法轉變過來。因此，部隊行動大受影響，不得不在石阡、鎮遠之綫暫時停止前進，就地防守，封鎖紅軍，不使向東發展，防止紅二、六軍團會師。這樣，既可節約兵力，便於集結主力，應付兩面紅軍的夾擊，又可確保主動地位，便於派遣小部隊，搜索敵情、地形，避免在行進中遭受突然的襲擊。

我們在石阡、鎮遠之綫，相持了約七、八天。紅軍有幾次在夜間試圖突過封鎖綫，都被我們阻止折回。後來在九月底的一個晚上，紅軍乘雨夜陰暗並得到當地一個老獵人作嚮導，由石阡以南約四十里處（地名記不起了）的獨立旅正面，沿着一條不通人迹的谿溝安全溜出了封鎖綫。我們在第二天拂曉發現有掉隊的紅軍戰士時，才知道紅軍主力已經過去，離封鎖綫起碼已有二三十里之遠。當時除派隊跟踪搜索外，我們的主力部隊也只好在失望之下開始集結。

紅六軍團既已突圍向湘西會師，桂軍認為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準備開回廣西，要我直接向四路軍總部請示我部今后的行動。王家烈則一再電約我們要在石阡集會，商討今後湘黔兩省如何聯合對付紅軍的問題。廖磊也只好暫時留下。等到第三天，王家烈才從余慶來到石阡。經三方面初步交換意見的結果，我們知道黔軍內部複雜，王家烈本身也不能統一指揮，即使作出決定，仍是空談，反正他說的不能算數。大家敷衍了兩天，並無結果。我們就決定於次日各取捷徑回防。王家烈因地方善後尚待處理，決在石阡再留幾天。

二

當我們在石阡和王家烈、廖磊會談結束，決定在第二天即開始回防的時候，當天夜間，忽接何鍵的特急電，命令第四路軍入黔部

队昼夜兼程回省，并指示：独立三十二旅到达沅陵后，即车运长沙担任警备省垣；芷江区团队在洪江集中，十九师全部迅速开到祁阳，零陵地区集中待命。何在电令中并未说明原因，我们考虑一定是出了重大问题。由石阡到祁阳，通常最快也得半月时间，但格于命令，我们只好尽速前进。待赶到芷江，知道闽贛边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集中，准备突围北上抗日。我们才想到前次红六军团之突然向西行动，原来是替中央红军当先遣队，来侦察湘粤桂黔各省情况的。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我个人先行到邵阳参加总部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时进一步知道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后，已向湘粤边方向前进。为了不使红军扩大在湘境的活动范围，我们决定利用湘江主流为障碍，在耒阳、永兴间及衡阳、祁阳、零陵间构成几道防卫线。并作了如下的部署：以第十五师在耒阳、永兴之间，第六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在衡阳、祁阳、零陵之间筑成碉堡线，沿河固守，所有当地团队，交各师就近指挥参加防守；第十九师和第十六师到零陵集中待命。时西路军总部已奉令改为“追剿”总部，率第十九师之一一二团进驻衡阳指挥作战。

由于几年来红军在江西五次“围剿”中，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疲憊不堪，被歼何止三数十万，尤其像黄振堂率部起义参加红军的事实，对国民党军心震动最大。所以当时湘粤桂三省的地方部队，谁也不敢迎头堵击红军。湖南因有长沙失守的教训，当局更是极度紧张，人心异常浮动。这时，在湖南境内，已有许多国民党军在江西的整补部队及补给机关，利用水陆交通向衡阳、邵阳、芷江方面转移。这些部队过去在江西“围剿”中执行碉堡政策，即所谓“乌龟”战术，战斗时部队交互前进，不敢脱离乌龟壳稍远，十天半月才有一次行军，距离也不到四、五十里；构筑工事的能力是加强了，可是行军能力非常薄弱，经过几天的急行军，落伍及逃亡的已经不少。

有的通过衡(阳)、邵(阳)时，所余不到半数，且已疲惫不堪，大部分的枪枝，都是雇人挑着走，可以說是毫无战斗能力。

湖南军队那时大都沒有固定的防地，行軍時間比較多；因此，在急行軍中还能保持一定的員額，同时在本省行动，收容补給都比較方便。尽管如此，但看到蔣介石的中央軍那种情况，我們对于截击紅軍誰也沒有信心。湖南当局的想法，只是如何能使紅軍迅速通过，不要在本省境內停留下来，就是万幸。士气既不高，行动上自然不免消极。当我率領第十九师到达零陵时，紅軍主力已通过广西全县向湘黔边境前进。原来指定沿湘江設防的各部队，也刚到达指定地点，尚未开始构筑工事。这时，由薛岳、周渾元所指揮的几个“追剿”縱队的先头部队，已通过我們集中的地点——零陵和广西的全县，在紅軍后尾紧追。湖南方面松了一口气，就开始讓各师分別在衡阳、郴县、邵阳一带集中，稍事休整。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帮助汝城、宜章、临武、道县、永明一带的地方团队，对紅軍經過的地区作所謂“清扫战場”的工作，收集紅軍和国民党軍的伤病落伍員兵，分別遣送收容。四路軍总部认为紅軍已入黔境，并已有中央大軍跟踪“追剿”，湖南省內的追堵任务已告一段落；但在湘鄂赣边、湘赣边、湘粤边及湘鄂川黔边境地区，遺留的紅軍部队甚多，應該繼續“清剿”，因向蔣介石提出，希望解除“追剿”任务，以便从事湖南省內的“清剿”工作。蔣的指示是：已由陈誠組織宜昌行轅，統一指揮湘鄂川黔各省部队及一部分中央部队对湘西紅軍（此时紅二、六軍团会师組成紅二方面軍）进行“围剿”，并指定第四路軍所部归陈誠指揮，执行对湘西紅軍的“围剿”任务。

三

1934年11月 陈誠开始对活动在湘鄂川黔边境的紅二方面軍进

行“围剿”。他令第四路軍所屬各部队及地方团队担任从南正面沿澧水流域对以桑植一带为中心的紅二方面軍的“围剿”任务。其防綫从东面的澧县起，經石門、慈利、大庸、永順、保靖以至龙山。除右翼利用澧水下游为障碍外，并于石門、慈利、大庸、后坪、鸡公垭、石堤溪、永順、龙山之綫，构成碉堡封鎖綫，从事固守。同时指定总指揮部推进到常德城，即时开始部署。总部当时指定入湘之川鄂部队郭汝栋、徐源泉等部担任澧县、石門、慈利至溪口之綫的守备（1935年夏，郭徐等部他調，該綫曾由“中央”部队樊崧甫师守备了一个时期，尔后則由各該县保安部队担任守备）；第十九师附六十三师之一八九旅及常桃地区团队，担任联系溪口經大庸、鸡公垭、石堤溪到永順（不含）之綫，师部在石堤溪；第十六师右翼联系第十九师担任永順以北之綫的守备；第六十二师联系十六师担任永順西北地区的守备，后期且以一部进驻龙山、洗车之綫，以增强新編第三十四师的守备；新編第三十四师則駐永綏、保靖、乾城、凤凰、龙山等处。（第十五师这时已由湘桂黔边境調至湘川边境的酉阳、秀山，担任防守烏江东岸。在湘西“围剿”的全部过程中，除所屬汪之斌旅后来調駐永順外，其余并未調来。）

我指揮的第十九师（缺一团）这时由零陵經邵阳、安化集中桃源后，再向慈利、溪口、大庸前进。当时，总部认为第十九师的防綫比较长，故加配以第六十三师一个旅及两个保安团，共有九个团的兵力。部署大要是：从溪口到大庸之綫，主要由保安团和第十九师的第五十五旅（缺一团）負責守备；衔接大庸（不含）到石堤溪之綫由第五十五旅的一个团担任；石堤溪至永順（不含）之綫，由第五十七旅（缺一团）負責；留一个团在石堤溪师指揮所附近为預备队。各部队的接合部都互相衔接，于沿綫构筑碉堡。碉堡材料以木料为主，中間筑土，外面涂一层厚的泥料，以防火攻。每一个碉堡

群由母碉附若干子碉編成，母碉用磚石構築，比較大而堅固。在碉堡外有寬大的外壕，重要地點并加設鐵絲網。由這樣的碉堡群，組成一個個堅固的據點，以盡量減少守兵，集中較大的預備隊，依靠碉堡的掩護，保持行動的主動性。

第十九師于十一月中旬由桃源、慈利、溪口向大庸前進時，紅軍剛離開大庸縣城向永順撤退。省方軍隊以大部隊進入陳渠珍的防區，這還是歷史上第一次。當時紅六軍團已與紅二軍團會師，在湘鄂川黔邊區展開活動，一時聲勢浩大，陳渠珍部退守永順、古丈、鳳凰地區。大庸、桑植地區只有一些地霸土匪武裝，各據一點，凭險固守。我們去時發現這些人所報的情況多不可靠，為了慎重起見，必須先了解情況，然後行動。因此，將部隊以大庸城為中心，沿澧水設防，并派第六十三師陳子賢旅（一八八旅）的一個團，到后坪附近對雞公壩隘路的進口處設防封鎖。雞公壩是有名的隘路，它的兩側，一面是屬於武陵山脈的崇山，一面是澧水，只有沿崇山山麓有一條狹長的路通過，非常險要。過去北洋軍隊在這裡曾有过全軍覆滅的教訓，我們是早已知道的。這時為了使部隊安全通過這條隘路，決定先對崇山方面加強搜索，相機占領雞公壩隘路出口前方，以掩護大部隊的通過。其時第十九師主力已在大庸集中，派出一部在后坪附近搜集船隻，架設浮橋，以待各部到達指定位置集結。第二天早上，陳子賢旅由隘路進口封鎖線派出小部隊，向隘路內崇山山麓的森林村莊蔭蔽地進行廣泛的搜索。大約在上午九時左右，突聞隘路內有斷續槍聲；不久，槍聲愈來愈密，搜索部隊都在逐次抵抗後退回封鎖陣地上來。據報告：在崇山山麓的森林地和凹部後方，發現有大部隊紅軍集結，有待我軍通過雞公壩隘路時實行截擊的企圖。此時，紅軍以企圖已經暴露，即迅速向占領雞公壩隘路入口處的陳子賢旅猛攻，戰鬥極為猛烈，陳旅告急。我当即以在后坪附近的第十

九师第五十五旅馳援，將陳旅正面一個團的陣地接替，并向左右延伸占領陣地，掩護十九師主力的作戰。因我方陣地在隘路入口處，陣地前面一邊瀘河，一邊是大山，正面不大，封鎖很為嚴密，沒有迂回包圍的威脅，對方必須冒正面進攻的危險。但我陣地後方正處在瀘水彎曲部的前面，在地形上必須背水作戰，這是我不利之點。這時，紅軍則集中兵力從正面攻擊十九師陣地的一點，從午前十時開始攻擊，輪番沖殺，愈挫愈烈，犧牲頗大，我方傷亡亦不少，因將十九師五十五旅全部在陣地後作梯次配備，輪流迎擊，一直戰鬥到午夜稍後，攻勢才逐漸減弱。我方即乘機調整部署，準備迎接第二日拂曉攻擊。直到天明仍未見有攻擊的跡象，只聞有零散的槍聲，我們判斷紅軍可能撤退，或重新調整部署，伺機進攻。但為慎重起見，除加強陣地防守外，並派出小部隊進行搜索，發現紅軍已在拂曉前全部撤走。當即派一部沿隘路左側山麓搜索前進，並迅速占領鷄公壩隘路前方的出口，以掩護主力部隊通過隘路。

在這次爭奪隘路的戰鬥結束後，我留一部兵力在大庸、後坪及鷄公壩隘路進出口筑壩防守，主力即於第三日進駐永順、石堤溪一帶。據當地老百姓說，當面紅軍已經從石堤溪向塔臥方向撤退，主要是因為彈藥缺乏。於是，十九師決定在銜接永順（不含）經石堤溪、大庸、溪口到慈利（不含）這一綫上，構築碉堡及大規模的防禦工事；並嚴令在碉堡封鎖綫上的各部隊，如在自己的防守綫上被紅軍突破或鑽隙通過，各該防守部長應負防守不力的完全責任。

當時，我們的設防部署雖然按指定之綫完成了，但就地形上說，瀘水本身並非不可逾越的天險，特別在冬季枯水期間，徒涉的渡河點是很多的。由慈利經大庸到永順之間有一百八十公里的正面，除慈利經大庸、後坪至鷄公壩一段，可以依瀘水為障，隔河防守外，由鷄公壩至永順一段則系山地，雖地形起伏，有利於設防，但並沒有

不可通过的悬崖绝壁，誠如俗話所說：“山山有路，路路相通”，对于行动矫捷的紅軍來說，也可以說无險可守。当时第十九师及其配屬部队以九个团的兵力，担任这样宽的正面，在部署上真是处处設防，处处薄弱，既有守住的任务，却没有足够守住的兵力。何况湘西方面的紅軍，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地形，比我們熟悉得多。我們认为澧水流域很可能成为紅軍选择的突击点，因此，除了用电报以外，并用书面詳細繪图呈报，說明理由，要求增加兵力或縮短防綫。我之所以这样小心，主要是我对陈誠这个人向有戒心，他一貫利用机会整人家的部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过去他在江西时，用“作战不力”的罪名，編併了不少的杂牌部队。我自然不能不加以警惕，事先将情况上报。第四路軍总部也把情况向陈誠轉报了，但均沒有得到任何指示。

当面紅軍在鸡公垭、后坪战斗后，由大庸撤到桑植，战事沉寂了一个时期。不久，突然在大庸附近发现有被紅軍俘获后遣散的零星士兵。經查訊結果，知道在大庸北面有陈誠指揮的一个旅（不記得番号）被解决了。可是我們事前并不知道这个旅的位置。我們把情况轉报后，接着又听說湖北方面徐源泉部又有大部队被歼灭。当时宜昌行轅方面还有电責备我部对大庸北面被歼的那个旅沒有支援，并要追查責任。我申訴，当时那个旅向桑植孤軍深入，虽說离大庸我部的防綫頗近，但他們事先既不同我們联络，而且在被解决时，我們始終沒有听见槍炮声；自然无法支援；同样，对于被解决的徐源泉部，我們事先也不知道他們的位置，当然也无法从战斗上进行协助。我除申述以上情况外，并請他們重視澧水防务，增强守备力量，但仍沒有得到任何答复。我們这时很耽心紅軍从湖北这两个部队取得人員、武器的补充后，又可能回过头来对付我們。可是，我們的防綫非常单薄，虽有几个月来所做的工事和碉堡駐有部队防守，

究有多大效力，連自己也很怀疑。在防守期中虽有好几个月沒有发现重大情况，但精神上一直是很紧张的。只好一再加强工事和守备，并尽可能抽集机动部队，以求战斗时能保持主动地位。

四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紅二方面軍主力突然在大庸潭口之綫的第十九师防区内强渡澧水，突破封鎖綫，初向常德方向佯动，嗣經桃源、沅陵間地区向溆浦、辰谿方向前进。我当时除將紅軍突围情况上报外，并将第十九师所屬各部集結待命。总部得报后，即以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等部編入第四縱队战斗序列，仍以我为縱队司令，指揮各部跟踪紅二方面軍的前进路綫尾追。先是，当年二月下旬，何鍵曾將第四路軍进入湘西的部队和协同作战的友軍，区分为四个縱队，第一縱队司令为陶广，第二縱队司令为李云杰，第三縱队司令为李韞珩，我为第四縱队司令。旋第二、第三两縱队被調入黔，但我的縱队司令名义仍未撤銷。此时，我既奉令追击，因以在邵阳、武岡整补的第六十三师(缺一旅)迅速集中安江堵截。第十六师于集結后隨即經古文向泸溪方面追击；第十九师从大庸跟踪紅軍前进方向追击。紅軍到溆浦、辰谿、新化后，繼續經芷江、晃县向貴州进出。

湘軍各部在追达芷江以前，除了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在浦市与紅軍后卫部队小有接触外，都沒有发生过战斗。我們当时估計紅二方面軍的目的在北上，沒有同我們决战的必要，所以对追击任务也同前次对中央紅軍一样，抱着送行的态度，以避免部队的損失。但想到此行可能是一次长途行軍，将要远离省境，我考虑部队出境后，湖南局面会受影响，就有意識地把行动放慢；如果紅軍进入貴州，任务有了交代，就可想法要求把部队調回。所以当各部在芷江集中

后，我就把第十六师推进到便水，用稍事休整再行前进的办法来迁延部队的行动。先是，陈誠在这次紅軍突围的第二天，曾电令四路軍总部将我撤职查办，并将守軍团营长扣押。好在我已将兵力单薄及布防情况上报，并要求增加部队有案，四路軍总部即将过去要求的詳細經過电复。陈誠說他原先沒有看到这个报告，既然事先已經呈明，就不便要我負責了。但四路軍总部为了敷衍陈誠的面子，此时仍以防守不力的罪名給我記了两次大过。我既然已經是有过之人，自然再不好拖延时日，只好将部队繼續推向晃县，作进入貴州追击的准备。

貴州方面，自前次中央紅軍长征入黔后，蒋介石已乘机将国民党中央軍大量調进，并将王家烈的主席职务撤了，由吳忠信任省主席。同时由顾祝同以行营前进指揮部的名义，駐在貴阳指揮軍隊，且在該省留下了不少蔣的嫡系部队。当时我以为只要紅軍到达貴阳附近及其南北地区，我們的任务就算完結，因而只想推进到黔边，交差了事。大約是阴历腊月二十四日左右，我們繼續前进，指定在便水的第十六师繼續担任掩护，俟十九师由芷江到达便水（相距約十五公里）后，再向晃县前进。我們在芷江休整期間，並沒有发现紅軍的情况，据报是已經向貴州撤退了。我們还以为这次追击，不过是照例执行命令而已，並沒有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过湘黔边及黔境全屬山地，容易中伏，我們对此是有戒心的。因此，規定部队在前进中应有广正面和較远距离的搜索，每到宿营地，应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占領警戒陣地，以防突然袭击。

可是，当第十六师向晃县前进，越过便水約七、八公里的地方，大約是下午一时前后，在行进路的右側方突然发现槍声，当时估計可能是搜索部队遇到了土匪（因为这一帶經常有股匪出沒）截击部队，夺取槍械弹药。旋聞槍声漸趨激烈，才知道有了情况。据搜索

部队报告說是紅軍的掩护部队。当即令第十六师迅速占领陣地，掩护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在便水以南地区集結待命。跟着前方便开始发生爭夺战，显然不是掩护部队的战斗。于是又令第十九师向第十六师的左翼延伸，准备向紅軍的右侧背侧击；第六十三师除一部掩护十六师的右翼安全外，其余控置为預备队。从午后三时起双方发起冲锋，战况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大。当时我們认为紅軍总是要撤退的，可能是由于我們追得太紧，紅軍为了主力行軍的安全，故派出一部或大部占领侧面陣地，給我們以突然袭击，迟滞我方的追击行动。我們为一劳永逸計，也决心打一仗。因此，将十九师全部和六十三师的一部也都投入了战斗，其中以第十六师九十三团唐肃部打得最激烈。到黃昏以后，槍声逐渐沉寂下来，估計紅軍已开始撤退。但这一帶山高林密，地形不熟，不敢輕进，只稍为調整一下陣地，准备第二天拂晓的战斗。到第二天拂晓，証实紅軍已經脱离战場，除派一部向晃县搜索前进外，各部即着手清扫战場。到第三天，部队全部到达晃县，先头部队已进入贵州的玉屏。这时离春节很近，部队要求在春节时能休息一天。但上面对追击进程严加限制，催促迅速追击前进的电令如雪片飞来。这时实际同紅軍的距离已經远了，为了符合命令規定的行程和時間，我們按地形道路和宿营地的情况，采取以多报少的办法，安排出春节休息一天的行程来。我記得从晃县經玉屏到达岑巩的龙頸坳，是腊月二十九（1936年1月23日）午后三时，但我們向上报告的到达地点是玉屏附近。就这样把休息一天的行程捏报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有电向何鍵請求，說該师初由毕节、大定东返，旋师劳累，随又在湘境內参加了一段追击，亟需休整。他同时向我表示，不愿再入貴州。我认为这时已不需要这样大的部队，加以貴州地形的限制，部队大了，行軍宿营补給成問題，因而同意了他的要求。适陈誠亦

来电令該师駐江口休整，因此，該师就停止在江口沒有随我們前進了。

春节的第二天（1936年1月25日），部队繼續出发，經黃平、馬場坪、貴定、龙里到达貴阳附近。这时紅二方面軍已从貴阳东北方向渡过烏江，繼續西进。我們以沿途伤病及落伍人数甚多，在貴阳附近大約休整了一个星期，又奉令开到安順，随經普定的水城向威宁前进。沿途并无情况，也沒有得到全般情况的通报，究竟紅軍到了哪里，我們都茫然不知。我們既不明瞭这种行軍的目的何在，只是每天按照命令的規定行动，黃昏报告到达和宿营的地点而已。当到达威宁的第三天，忽然得到十万火急的电令，限第四縱队于电到第二天黃昏前到达七星关，并将先头部队到达的时间 and 指揮官的姓名报备；如有貽誤，以“縱匪”論罪。使人奇怪的是电令中並沒有說明当面紅軍行动的情况。从威宁到七星关，計有二百四十里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峻岭、羊腸小道，部队行走，每天走九十里已是万分困难；这样大的部队，如何能如期到达呢？我們完全知道顧祝同的指揮作风，他本人毫无主見，一切都听參謀摆布。国民党軍队的參謀，部分是陸軍大学毕业的；他們一般只晓得紙上談兵，沒有帶兵和作战的实际經驗。当时国民党部队里有这样一句話：“參謀划一筆，部队跑一七”。图上作业是非常容易的，实际行动起来問題就大了。好在老的部队长都知道这一套，能說出一个未按命令行动的理由，也就可以过去了。因此，当我接到那个电令以后，便想出一个办法：选拔約一百名比較精壯的士兵，留出百分之三十的徒手，完全輕装，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队，帶一部小电台和必要的乾粮，并預发犒賞費，叫他們不論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派出警戒，立即发出“已占領七星关”的电报。當他們第二天中午到达七星关时，甚么情况也沒有发现。以后顧祝同来电說紅軍已繞道进入川滇边境。

因此，我部在七星关休息了三天，等大行李到后，又奉令折回水城，再到普定集中。

五

这时大家认为追击任务已告一段落，官兵都要求回湖南，我也曾电何键要求调回。但得到的复电，却是令“追剿”军刘建绪所部樊崧甫、李觉、郭汝栋等三个纵队继续向云南前进，到云南后，改归龙云指挥。这时，我们知道蒋介石有意把湖南部队远远调离本省，很可能乘机打我们的主意。因此，今后如何更好地掌握部队，保全实力，以应付环境的变化，便成为必要的课题了。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减少掉队病兵，我们决定没有必要时不作急行军，每天只按驛站的距离走六十里，必要时还在中途休息一两天。当时前方并无敌情，而命令总是要我们迅速前进。我揣想，可能是假追击红军为名，把我们调到西北去，以分散何键的力量；也有可能象对付贵州一样，用我们去对付云南。何键当然也顾虑很大，所以虽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要我们积极进军，但同时也在我们将要进入云南之前，打电报给龙云要他给予照顾。我们在将要进入云南之前，也有电给龙云，表示接受指挥，并请指示部队行动。我们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到达云南平彝（富源）时，龙云当天就派汽车把我接到昆明。当时因部队还要一些时间才能达到昆明附近，我与龙云接触的时间比较多，我除对他表示服从命令之外，并微露衷悃，表示我们是同属一个类型的非蒋嫡系部队，需要互相照顾，不必存什么顾虑；云南如有什么不利，必要时可以互相协助。这些表示自然能获得龙云对我们的谅解和放心。龙云明了我们的态度后，就给我们以最大的方便；但对郭樊两纵队则是另一种态度。郭固早已寄靠“中央”，但其军队原是四川地方性武力，且此次入滇又系行动于川黔滇边境，距

昆明尚远，影响不大，所以龙云对他既无好感也无恶感。樊崧甫既是浙江人，又是带的“中央”部队，是龙一向厌恶的，加以樊性情粗鲁，对云南的许多措施动辄指摘，更引起龙的不满。所以在我們进入云南后，龙指定樊纵队从会泽向盐边、盐源方向前进；对我这个纵队则指定經曲靖、馬龙，从昆明外围繞到富民，再經祿丰、楚雄向祥云方面前进。龙云对我說：“现在反正追紅軍是追不上的，讓他們去追好了。你們（指第四纵队）从这一条道路前进，补給交通都比较方便，可以休整部队。”龙并准許刘建緒的总部率一个警卫团进入昆明，表示非常关切；还拨两个师的单軍服給我們更換。对樊崧甫有什么要求，則一律拒絕，要他直接向蔣介石請求。过去蔣軍追击紅軍入滇时，龙对任何部队都不准进入昆明城，昆明四周都以云南部队駐守，以防万一。这次龙對我們的部队給予特殊的待遇，我們自然也以同样的友好态度对待他們。如当时我們部队的薪餉，按云南的物价來說，每个士兵每月至少可节余法币四至五元，云南部队是按新滇币計算，要新滇币二元才能合法币一元，待遇悬殊頗大。因此，过去可能有許多云南士兵逃走，补入“中央”軍。当龙云总部的參謀长要求我們部队不要收补云南逃兵时，我們都严格执行了。

我們在云南这段时期，蔣介石曾亲自来云南一次，召見了三个纵队司令，每人都送了一万元法币。他要我們好好了解云南的地方情况，好好維持部队軍風紀，以保持中央部队的威信。蔣还坐着飞机在部队行进路上的空中盘旋了一会，表示对部队的慰問。我們部队到达祥云和大理后，对紅二方面軍的追击行动告一段落，部队即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因两广“六一”事变爆发，第四路軍的“追剿”部队奉令开貴州，“追剿”任务完全結束。

第四路軍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围剿” 和“追剿”入滇的概况

郭雨林

(一)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赣紅軍突围入湘，蔣介石于十一月二十日任命西路軍总司令何鍵为“追剿”軍总司令，指揮其原領的第四路軍及薛岳、周渾元等部驅追之。何乃由长沙移駐衡阳（其參謀长郭持平随行），区分“追剿”軍为五路：第四路軍为第一路，以第二十八軍軍长刘建緒为司令；第三路軍为第二路，以該路軍总指揮薛岳为司令；第三十六軍为第三路，以該軍軍长周渾元为司令；第二十三师为第四路，以該师师长李云杰为司令；第五十三师为第五路，以該师师长李韞珩为司令。全軍成多数縱队取广正面向湘桂黔边境“追剿”。到达湘黔边境后，复將軍队区分改为两个兵团，以第四路軍的各师及李云杰、李韞珩两师組成第一兵团，派刘建緒为总指揮；以薛岳、周渾元等部組成第二兵团，派薛岳为总指揮。时我任第二十八軍軍部即第一兵团指揮部作战參謀，随軍行动。至一九三五年刘建緒任总指揮后率部“追剿”入滇，我仍任总部作战參謀，后任作战科长。

十一月三十日，刘建緒統率第十五师王东原部，第十六师章亮基部（原师长彭位仁在上月以“剿匪”不力被何鍵撤职，章以旅长升代师长），第六十二师陶广部，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等共四个师

与紅軍在全州之覺山、朱兰鋪一带接战。其后，何鍵即由衡阳移駐邵阳，令薛、周等部經洪江、晃县、鎮远繼續西追；李云杰、李韞珩两部向黔东北地区进出。时李觉的第十九师在“追剿”蕭克將軍的紅軍到达貴州石阡后，回防湘南，先以之集結零陵，准备参加“堵剿”，旋又調赴湘中。

十二月中旬，原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紅軍第二方面軍，以一部入桃源、攻常德，駐常德之黔軍罗启疆旅（轄三个团）及湖南的一个保安团凭城固守。时李觉师已由湘南开抵益阳，何鍵委李为第六路司令，使之馳援，围以解。旋川軍郭汝栋师由贛北开抵常德，何鍵委郭为第七路司令，令向慈利进击。已抵石門之鄂軍徐源泉部张万信师亦向慈利續进。紅軍遂返漆家河。

一九三五年元月，何鍵由邵阳移駐常德，郭汝栋、李觉、张万信等师抵慈利、大庸、桑植境。中旬，北上紅軍已渡烏江，紅二方面軍集大庸。何鍵令刘建緒抽調陶广、章亮基两师，后又抽調王东原师的汪之斌旅向大庸、永順境进击，連同先到湘西之李、郭等师，統由何鍵直接指揮，担任对紅二方面軍之“进剿”（但何仍回駐长沙，对部队行动以电报遙制）。刘建緒則率陈光中、李云杰、王东原等三个师（王师缺汪旅）轉向湘黔川边境，駐守酉阳、秀山，并在思南以南亘沿河至四川龔滩、烏江东岸之綫构筑工事，防堵北上紅軍“回窜”，刘駐銅仁指揮之。

何鍵对紅軍东攻西守之部署既定，也就造成了对新編第三十四师陈渠珍部包围的态势。（陈渠珍当时号“湘西王”，拥其土著部队久駐湘西，形成割据局面者多年，为何鍵之軍令政令所不及。）二十四日，何鍵发布命令，飭陈师按乙种师（三旅六团）編制改編，由总指揮部按月点名发餉（原該师有李可大、顾家齐、周燮卿、龔仁傑、戴季頌等五个旅共十多个团），余槍收繳，余員遣散。其自

立之地方武装名目，自設的軍械修理、制造机构，自設的稅收关卡等概予撤銷（原令十項，我不能尽忆）。陈迫于大势，悉順受之。

二月十五日，蔣介石令撤銷“追剿”軍总司令部，委何鍵为“剿匪”軍第一路司令，使专任对紅二方面軍的“清剿”。何于十八日派刘建緒为其前敌总指揮，刘遂撤烏江之防。

当刘回抵沅陵将半月，烏江防守部队正在东撤之际，接蔣介石电說：“据报，該部烏江东岸防守部队已擅自撤走，殊屬非是！着即返防固守，并将兵力直接配备于江岸，严防‘匪軍东窜’。倘不遵办，即治王、李两师长任一人以纵‘匪’殃民之罪。”刘乃于三月九日仍返銅仁，部队亦各返原防。何鍵此时曾一度由长沙去沅陵指揮。

这时，蔣介石已令陈誠經設了宜昌行营，統一指揮湘鄂川黔各省部队及調到該四省边区的“中央”部队对紅二方面軍“进剿”。何鍵既已分兵在黔担任烏江防务，蔣介石即有乘机拆散第四路軍实力的企图。四月二十日，刘建緒接得蔣介石帶試探性的电报，詢以可否率部繼續向貴阳“追剿”，望与何鍵商决。是时，正紅二方面軍已先后攻克永順、龙山、桑植，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复灭（陈师屬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部的战斗序列，时徐駐澧县）。蔣介石既已令何鍵負湘西北地区“进剿”的专責，同时又令徐源泉以总司令名义率軍入湘西。一个地区，两个主帅，宜昌行营又未及时作出統一的“进剿”部署，而是各不相屬，各自为战。但未久徐部調鄂，大庸、慈利震惊。刘因此急电告何，略以湘西北“匪情”紧急，桑梓糜烂，而入黔之“匪”，既已北渡金沙，长追亦无济于事，不如舍緩图急，請即調他回湘。何复电認可。刘遂于二十三日回抵沅陵。李云杰、王东原、陈光中各师則仍暫留烏江原防未动。未久，李、陈两师由宜昌行营調赴黔西，脱离了何、刘的指揮系統，未参与湘西的“围剿”（陈师于一九三五年冬仍調回湘南参加过湘境内的一段

“追剿”，为应付两广“六一”事变，曾一度被陈诚调往广东英德）。

(二)

第十六、第十九、第六十二各师，自元月进入湘西北地区以来，由何键造制，在慈利、大庸、沅陵、永顺等县范围内往复驰驱，零敲碎打，没有总的作战计划，部队苦之。在此期间，与红二方面军发生的战斗，有：二月间的大庸后坪战斗、鸡公垭战斗，沅陵大窝坪战斗，永顺塔卧战斗，慈利溪口战斗；三月间的大庸战斗；四月间的塔卧战斗，永顺战斗，桑植战斗等。每个战斗实际参加的兵力都没有超过一个团，而且一城一地得失无常。迄四月间刘建绪由铜仁回到沅陵，才按照宜昌行营指示，着手选定阵地，策定筑碉“匪剿”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刘建绪在永顺王村商同第六十二师参谋长曾广国拟定的，我在旁作纪录），呈准实施。碉线的概略位置是：由澧县经石门、慈利、大庸、大庸所、后坪、石堤溪沿澧水南岸之线，复延经永顺以北之钓鱼岩、塔卧转经龙家寨、招头寨至龙山之线；右翼与湘北“剿匪”部队、左翼与鄂西南方面的碉线衔接；全长六百余里，由第十九师（缺一团，附第六十三师陈子贤旅及两个保安团）、第十六师、第十五师之一旅、第六十二师（缺陶柳旅）、新编第三十四师及沿线各县保安团队分段据守筑碉（由慈利至西北九十里的江垭沿澧水北岸，有一条碉围支线，原系樊崧甫师构筑，后由刘建绪派保安部队据守）。刘建绪则亲驻王村督促，并不时前往碉线巡视。其中东起慈利西至洗车河以北长达四百余里的碉线，于九月间最后完成，耗费人力、财力、物力难以数计。其由洗车河转北至龙山之线，即属于新编第三十四师陈渠珍部负责筑碉的地段，则始终没有形成连贯的碉线，该师仅沿线择要点构筑少数简易碉楼派兵驻守而已，虽曾一度由陶广派兵协助，但加强的程度不大。

綏遠部隊在筑綏期間的最大困難是缺乏糧食。緣當時湘西貧瘠，軍隊無法就地取糧，軍糧全賴漢湖各縣運濟，而這年又值洪水為災，湖區亦窮于搜括。各級糧食機關迫于軍令，鋏四盲張，顆粒皆寶，搜一粒算一粒，零零碎碎地向軍前接濟。而湘西交通困難，湖區之糧，輪運及桃源而止，由桃源經沅陵至王村的河道，則灘險流急，換用小木船，五百余里之程，恒半月始達。糧到王村以後，只能肩挑背負，男女民伕重荷于崇山峻嶺間，炎灼于上，鞭笞于后，受盡虐待。而每一批運抵前綫之糧，常不足飢軍一兩日干稀搭配之食，此後又須等待三數日才能繼續運到一批。而有的部隊長與軍需人員復從中剋扣以高價出賣，故軍食更形緊張。劉建緒電告何鍵，有“唱籌量沙，苦無計矣，啜粥莫飽，飢卒難驅”之語。而各部隊在答復劉建緒“出剿”或“限期完成綏綫”的命令時，輒以“軍糧不濟，無法分遣”或“苦于糧罄，無法施工”為對。這種情況使劉建緒對於“圍剿”工作一籌莫展。入秋，糧食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

正當糧食缺乏的時期，何鍵又連續在六、七、八、九等四個月不發給部隊的薪餉。原因是當他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出任西路軍總司令時，指揮十四個師和一個旅，其中只有五個師是屬於他自己的西路軍的，對於此外的九個師以上的部隊，他也要經常拿出一筆錢來貼補，這都是挪用西路軍的經費。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他就挪用了五百萬元上下（一說為二百余萬元）。他滿以為蔣介石會彌補他，不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西路軍總部撤銷時，蔣竟不核銷他這筆錢，他只好停發全軍薪餉數月，以資彌補。在這幾個月當中，部隊既吃不到飽飯，又拿不到薪餉，因而官兵怨懟，士氣消沉增加了身臨前敵的劉建緒在指揮統御上的困難。

在綏圍期間，紅軍沒有發動全面的攻擊，只先後對塔臥、龍山兩據點進行了比較激烈的圍攻。

大概是六月間，据守塔臥的陶广师钟光仁旅的一个团被紅軍围攻数日，弹粮两缺，情势危迫。何鍵数电李覺师抽調部队赴援。李部終不发。钟憤而独往。紅軍返桑植，围遂解。陶与李原不协，此后則齟齬日甚。

七月初旬，紅軍围攻龙山。据守龙山之陈渠珍师第四团（团长刘文华）坚守十余日后渐不支。时刘建緒因升充第四路軍总指揮应蒋介石召赴川未归，何鍵由长沙电令陶广师由塔臥經洗車河赴援。陶初怯于野战，且有坐視陈师耗损实力之意，以抽兵不易且粮匱难行为由，迟迟不前。刘团日夜呼救于前，何鍵屡电趣战于后，而兵終不发。嗣知陈渠珍、刘文华正先后遥电蒋介石的宜昌行营請援，行营且空投了一部分粮弹到龙山接济，并給刘团奖金三千元。陶惧以逗留受譴，始率該师主力并指揮陈师周燮卿旅以行。軍抵招头寨，遭紅軍邀击，激战一昼夜后，紅軍东移，龙山之围遂解。时已七月下旬，刘建緒已由四川回抵沅陵。

先是，当刘建緒于四川到达沅陵着手碣围时，何鍵即已令他兼办湘西綏靖事宜，但未明令給以职銜。六月七日刘請辞。二十八日伪湖南省政府省务會議議决，設立湘西綏靖处，駐沅陵，以刘兼任处长。綏靖区域为：慈利、石門、大庸、桑植、龙山、永順、保靖、乾城、凤凰、古文、永綏、芷江、黔阳、麻阳、晃县、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十九县，每四县或三县划为一个行政区，設置专员以加强督導。慈石庸区以危道丰为专员，駐慈利；永保龙桑区以陈国鈞为专员，駐永順；乾凤古綏区以余范传为专员，駐乾城；芷黔麻晃区以张其雄为专员，駐黔阳；沅、泸、辰、溆四县，由刘直接掌握，未設专员。以上四个专员，除陈国鈞为留美生外，其余都是湘籍的老牌軍人。刘受命后往长沙，率同四个专员同日就职，随即各赴駐所。关于綏靖方面的措施，我只知道它与当日軍事上有关联的几点是：在政治

方面为組織民众、严密保甲、遣散“胁从”、收编散枪，并悬赏五万元购买贺龙将军之头，以及立价收缴红军枪械等（如缴获重机枪一挺者奖洋叁拾元）；在经济方面为对红军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特别是粮食、食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绝对不许流入苏区。

当日湘西地区的地方武装，大多是地主、恶霸与土匪三位一体相结合的，有时还挂上乡保联防等头衔。他们各视其实力的大小，霸占若干乡镇、村寨为“防地”，谁的“防地”就是谁的天下，生杀予夺由他主宰。他们之间也常因争权夺利而明斗暗杀，致使地方更糜烂不堪。刘建绪对于这些人的处理感到棘手，一方面对一些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而没有直接掌握武装的所谓“贤达”、“绅耆”进行拉拢，给以顾问、秘书、参议等名位，赋以在绥靖处、在专员公署、在县、在乡的大小不同的任务；并不时召集他们来沅陵或王村会谈，或亲往乡县访问。这样礼貌周到，无非要他们促使地主武装协力“剿匪”。另一方面对顽不受命，抗拒故技，以致“妨害绥靖”者如永顺某人（忘其姓名），则收缴其武器并当场把他击毙（一九三五年夏，刘建绪在王村嘱我拟密令稿，令第十五师驻永顺的旅长汪之斌执行的），立威以儆其余。刘建绪当时就是这样运用多面手法对付、争取地主土匪武装来协同“剿匪”的。至于他那时收编了多少枪，编成了若干队，收编后的经费何出，装备何来，事属“绥靖”业务，我不了解。

（三）

八月梢，刘建绪据报，红军将突围。未久，又获悉红军每人准备了楠竹一根，将于突围时作扎筏渡水之用，惟突围的具体时间和将选择何处为突破点，则无从侦悉。（当日的侦探很难进入苏区，所以不能直接获悉红军方面有系统的材料。情报来源是：一、宜昌行营的通报；二、地主武装供给；三、由苏区进入碉线个别老百姓

所叙述的片断情况。)刘建緒乃囑我拟电稿二件：一为将情报轉知礮綫各师，令詳細偵察并加强礮綫的防守。一为向宜昌行营建議，說：現設礮綫无纵深配备，突破堪虞，应請东自常德沿沅水南岸經沅陵、泸溪、乾城直至永綏，啣接川鄂边境，构筑外围礮綫，以期严密。同时，刘又亲拟一电給宜昌行营，大意說：如以上礮綫尚未完成，而萧、贺即已向南突“軍”，即拟集結我主力于芷江附近地区与之决一死战。以上給宜昌行营的两电，都得到复电嘉許，但构筑外围礮綫一事，則未得其通令实施，于是刘建緒只好把希望仍然寄托在既設的礮綫上。

九月下旬，刘建緒率少数人員由沅陵到永順，住两日，分別与陶广、李觉有所商談。离永时，对參謀处长余賢立和我說：“‘共匪’突围的迹象日益明显，我軍礮守亟应加强。永順西北地区我軍兵力較厚，且王师駐酉阳、秀山可資活用，‘共匪’必不願在这方面找我們的主力来碰。只有永順——大庸——慈利之綫，我軍防广兵单，又有保安部队參杂配备在綫上，且一入冬季，澧水可徒涉的地方很多，无所屏障，在兵力上、在地形上都是弱点，应特別加强礮守。我因急需去南京开会（系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員）不能亲往那一綫視察。你（面向我說）今天就出发，到这一綫去視察一次，凡是礮堡还没有完成的，就要他們赶快完成；假設礮与礮之間的空隙太大，不能构成火力封鎖的，就要他們添筑中間礮堡，要点上应多筑子礮，形成礮群”。繼又对余賢立說：“假使在我沒有回来以前，‘共匪’就突围了，我軍应如何行动，我已在王村对參謀长（彭松齡）說了，他知道的。”我受命后，当天就出发了。余賢立也在这天返沅陵。

我在永、庸、慈这一段礮綫上检查了十多天才完成任务回沅陵。这一綫的礮防設備，基本上达到了周密巩固的程度，大庸、慈利两

县的城防尤坚。不过旅、团长等都苦于兵力不敷分配，以致未能留置机动部队，将无法应付事变，深以为虑。此时我就想到六月間李师之没有派兵去援塔山，是有其实际困难的。

十月二十三日夜，风雨交作，红第二方面军突然在大庸城附近的大庸所、潭口之綫突围。該綫为第十九师李觉部邓南骥旅周岷源团周崙源营和大庸保安大队的碉防接合部，是配备上的弱点。双方未經過激烈的战斗，红军即已突围成功。先是刘建绪去南京时，就已对其参谋长彭松龄預作指示：无论红军在永顺以东大庸、慈利之綫的任何地点突破碉綫，除派一部兵力尾追外，应迅速集結主力分別向黔阳、芷江、晃县間地区堵截，强其决战。如其突围后不西去，而轉向常德、长沙方面行动时，则战守机宜听令于何鍵。至是，彭乃将碉围部队仍沿用本年二月間进入湘西地区时由何鍵所区分的纵队名称（当时系以陶广为第一纵队司令，李云杰为第二纵队司令，李耀珩为第三纵队司令，李觉为第四纵队司令。旋第二、第三两纵队被蒋介石逕調入黔另有任务，而第一、第四两纵队的名称仍未撤销）移于“追剿”，令李觉纵队（即原有的第十九师及其配屬部队并将由貴州毕节、大定旋湘刚抵武岡附近的六十三师編入序列）以一部对红军尾追，主力逕趨黔阳、芷江間地区堵截；令陶广纵队（即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除以陶柳旅仍旧駐守洪江外，主力經保靖、凤凰向晃县、芷江間地区堵截。（陈渠珍师仍駐永綏、保靖、龙山、乾城等县地区，王东原师由酉阳、秀山調回湘西，均担任“散匪之清剿”。）

方红军向桃源、常德方面佯动及渡过沅水期間，駐岳阳的保安区司令罗树甲就致电刘建绪（彭松龄暫代）說红军久駐湘西貧瘠之区，自知难以为繼，故冒死突围，无非乘虛进占常德，企图广領滨湖上腹区域，并威胁长沙省会之区，壮其声势，以图再振。长沙警

备司令胡达，亦致电刘，說紅軍进攻长沙的可能性較大。而駐邵阳的保安司令晏国涛更急电数至，說紅軍必攻邵阳，請速增防（倒是駐常德的保安司令王育瑛，其防区首当其冲，只邊刘令防堵，却无只字告急）。湘中、湘西南各县县长及地主阶级人物，尤惶恐万状，日夜急电請兵。这次紅二方面軍突围，几乎震惊了整个湖南。

迨刘建緒由南京回沅陵行抵常德时，紅二方面軍已在清浪滩附近渡过了沅水并截断了常德至沅陵的公路交通。刘在常德住两日俟公路交通恢复后才到沅陵。此时他对紅軍今后的行动判断有二：一为进入雪峰山区重新建立根据地，但将先在沅陵、辰谿、安化間地区作短时间的休整；一为进攻益阳、长沙，但可能性甚小。于是，作了如下的处置：一、第十九师仍执行原任务；二、令陶广所率的两个师（缺一旅）轉向辰谿、泸溪方面进出，与第十九师协力，相机对紅軍堵截或側击；三、令駐常德的保安司令王育瑛率所屬保安团队向安化烟溪側击；四、令駐邵阳的保安区司令晏国涛率所屬保安团队向新化、隆回間地区堵击，保卫邵阳；五、令駐在洪江的两个保安团船运沅陵增防（順水直下，三百余里之程，一日即到）。

未久，紅軍进入了溆浦地区并繼續南进。刘建緒乃令陶广、李觉两部仍向晃县、芷江、黔阳間地区堵截，并令原駐洪江的第六十二师陶柳旅死守該地，其刚調来沅陵的两个保安团仍馳返洪江。在这一时期，各部队均未与紅軍发生主力战斗，只有在十一月下旬某日下午四时许，李觉师唐伯寅旅先头刘湘輔团在浦市近郊与紅軍遭遇激战約二小时，紅軍退出浦市，因时已入暮，未予追击，次日晨組織追击，則已不知紅軍去向。刘建緒在这一段时间內的指揮，表現得很忙乱，对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随令随改，处处陷于被动，參謀、譯电員、无綫电队都有时忙得通宵达旦。刘建緒自己也因睡眠不足，显得面色蒼白，而且心情恶劣，怒火易燃。适凤凰、麻阳、

芷江、会同、靖县、绥宁等县县长，纷纷一再来电请兵增防，惊惶万状，刘更懊恼。

十二月上旬，陶广、李觉两部与红军在黔阳、会同、绥宁、洞口间地区迴环打圈、互相捕捉之余，陶广部与红军相遇于金屋塘、瓦屋塘之线，打了一晚比较激烈的仗。但是打到天明，又不知红军去向。陶部经休整了两天并侦明了红军的去向后，就开往洪江转沅陵。刘建绪令其将第十六师拨交李觉指挥，经黔阳、芷江向晃县“追剿”。刘本人于十二月下旬由沅陵经溆浦移驻洪江。时宜昌行营已将原在湘鄂川黔边区担任“围剿”的上官云相部（一个军）和樊崧甫、郭汝栋、董钊等师调到洪江、黔阳、芷江等地。

李觉率领章亮基的第十六师、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他自己的第十九师（缺傅团驻常德）继续“追剿”。农历十二月下旬某日，先头第十六师行抵晃县境内的便水、溆州之线时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战斗，打了一个下午，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都各以一部投入了战斗，以第十六师第九十三团唐肃部打得较为激烈，手榴弹消耗不少，还被击毙营长一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战斗激烈，章师前线动摇，频向李觉告急。李即拟抽调第十九师唐旅增援，正派参谋向章联络时，红军攻势已减，章为了面子关系，又不愿唐旅参与了。入夜，红军脱离战场，战斗结束。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三师在原地休整补充几天之后才向湘黔边境继续进，脱离红军就远了。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此时分电陈诚、何键、刘建绪，说该师甫由贵州毕节、大定东返，长途劳累之余，又参加了湘境内的一段追击，亟需休整，请暂缓远遣。陈诚即令该师就地（江口）休整。该师就脱离了李觉纵队的战斗序列。

这时，宜昌行营令刘建绪指挥第七十九师樊崧甫部，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附独立旅罗启疆部）和他原率的第十九师（缺一团）

和第十六师繼續“追剿”入黔。这些部队，区分为三个纵队，即，李觉指揮的两个师为一个纵队，樊、郭各为一个纵队，并列前进。当时似乎沒有把各纵队冠以番号，但习称为李纵队、樊纵队、郭纵队。

(四)

一九三六年春节前夕，各纵队概抵湘黔边境綫上，刘建緒亦到达晃县龙溪口。农历正月初三，刘离龙溪口入黔，督率各纵队追击前进。其部署：樊纵队在右，李纵队居中，郭纵队在左。后来，郭纵队有时在李纵队之后，有时与李纵队行进交叉而出李之右。刘本人則始終循李纵队的行进路綫行进。各纵队所历道路是：李纵队沿湘黔古道行进，且大部分地段有了公路路基，有些地段还勉强可行車，全程在行軍、宿营、补給、联络、指揮、掌握等方面的条件都比較良好。樊纵队的行进路綫，大多是丛山峻岭，地形险阻。樊崧甫在这一点上牢騷滿腹，认为是刘建緒因与陈誠向有嫌隙，此时利用机会把陈的部队整一下，以快其私。他有一次在刘建緒发給他的作战电令上批着这样一句話：“一日一令，不理。”（这是刘派往樊纵队的联络參謀熊培鎮对我說的）樊崧甫在給刘的电报中有一次說：“雪迷山径，人馬堕悬崖深澗而死者十数起，职躬爬絕岭，誓图报称。”这自然是牢騷話。他們两人之間的摩擦，直至刘建緒到安順派人携礼品前往樊处慰劳之后，始趋和緩。郭纵队行进路綫虽多迂繞盘錯，但未聞有齟齬之事。

刘建緒从龙溪口出发，行三日抵鎮远，在此逗留十余日之久，仅以电报遙制各纵队的行动，似不欲再向西进。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保存实力，沒有与紅軍作战的决心。但是对蒋介石的命令又不能不应付，所以后来直到滇西都是追而不“剿”。沿途曾多次发现

过紅軍預先留下給追击部队的字条或壁报說：“我們已經在这里休息了三天（或两天），換洗了衣服。想你們同样有休息的需要，請你們也就在这里休息三（两）天吧。”追击部队也就真的在这里休息三天或两天，有意識地放弃“啣尾”的机会。入黔以后，虽接蔣介石来电，要追击部队由兩側超越紅軍先头予以拦击，或与紅軍并列行进后予以截击，不要以尾追为已足，但追击部队並沒有执行这个命令。另一个迟迟不进的原因，是刘建緒不愿太远太久地离开其留置于湖南的第四路軍主力和湖南老巢。其在鎮远逗留，是靜候各追击縱队到达貴阳附近地区，如果蔣介石更換追击主帅（时薛岳似在貴州），他就可以摆脱这一任务。

元宵以后，蔣介石一再来电趣行，总部始繼續向西行进。行前一日，刘对我及主任副官周崇洛作了指示：此去貴阳大約七日之程，打算走一天休息一天，期以半月到达。你們于途中处理公文（指拟命令、通报、报告稿）及設营、补給，可本此意去作。总部行一日抵施秉，我即通报总部人員和直屬部队：明日在原地休息。夜間突接何鍵轉来蔣介石的电令說：“新任貴州綏靖主任刘兴，辞不就职，該缺着以“追剿”入黔之刘建緒代理。”刘当即把电报交給秘书邹同觀，要他拟呈复的电稿，說：“啣命馳驅，計日可达貴阳。”随又对我說：“明天不休息了，繼續前进。此后逐日按驛程宿营，以六天到貴阳。行止情况按日上报。”翌日在行进中，他对周崇洛說：“我到貴阳后（指就綏靖主任职后），首先就要把这条湘黔公路修好。”其心情已变得很愉快了。

不料当刘馳抵貴阳时，刘兴已先两日由南京飞貴阳就职了。这对已啣命到达貴阳的刘建緒又如何发落呢？恰好顾祝同为了指揮黔境的軍事也在这时到了貴阳，任新成立的“貴阳行营”主任。他了解了这个問題，就呈准蔣介石任刘建緒为“追剿”軍总指揮，并正

式頒發關防。除原由其指揮的樊、李、郭三個縱隊仍歸其節制外，还把在黔的萬耀煌、郝夢麟、李家鈺、李雲杰等師各編為一個縱隊，統交其指揮。本來以上的這些部隊都是由顧祝同直接指揮的，為什麼又要設一個“追剿”總指揮部這樣的双層指揮機構呢？這可能是因為劉建緒沒有得到貴州綏靖主任的職位而因人設宮，以此安定他的情緒。劉對此也應付得很好，他不但沒有表現不高興，而且鄭重其事地通電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貴州的劉興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宣告在貴陽就職；同時專電呈報何鍵。又為了避免在指揮上的重疊，適應敵情，將“追剿”總部由貴陽一下移到扎佐，一下又移到清鎮，最後移駐安順（約在農曆三月上旬）。劉到安順不久，就因病返貴陽，並電催其參謀長彭松齡由湘來黔代理其職務，旋即告假回湘休養。

劉建緒在黔指揮七個縱隊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自農曆正月下旬至三月中旬），一切秉承顧祝同的意旨行事，所表現的作戰行動，僅僅是在黔西北地区與紅軍互相捕捉、迴環打圈而已。處置恒出於被動，部署尤變更無定，竟使所擬定的作戰計劃成為官樣文章，根本無法依照實施。除郭縱隊在黔北地區與紅軍發生過一兩次戰鬥外（第二十六師有營長一名被擊斃），其餘各縱隊均無戰鬥。但顧祝同、劉建緒和各縱隊三者之間，則書信絡繹，電報紛繁。凡關於作戰的文電，顧既已送致劉，又同時逕達各縱隊，而劉又將顧之來電按照公文程式首尾加上例語向各縱隊轉達。各縱隊既受顧與劉疊床架屋的指揮，則上報之電自需同時分呈兩處，而劉又向顧轉呈一次。於是同一事由的文電，竟一發再發，一受再受，無聊已極。因此當時在幕僚中流行著“打仗就是打電報”一句話。

(五)

紅二方面軍于四月上旬渡过盘江向滇境西进后（記得当时我所拟的电报稿，有“萧贺东日渡盘”一語，当为四月一日），刘的“追剿”总部也由安顺移到盘县。顾祝同令其率领原来的樊、李、郭三个纵队向滇境继续“追剿”，而在黔交其指挥的各部队则仍留黔省。先是，刘建绪自到贵阳以来，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剿匪”軍第×路总司令龙云（其时何鍵为“剿匪”軍第一路总司令，刘湘为第二路总司令。龙云是第三路或第几路总司令？我記不确实了）电讯往还甚密。而在刘将提兵入滇时，向龙发出多次电报，尽管措詞特別客气（如对龙的称呼由习用的平輩称法“龙总司令”改为下級对上級的称法“总司令龙”，且加上“鈞鉴”二字），均得不到复电。“追剿”总部意識到入滇尚有問題，不得不率部暂时停留于黔滇边境。这时陆續由滇境传来消息：龙云已把由平彝至昆明公路的汽車一概扣留在昆明，断絕了这一路的交通運輸，并提高滇币的币值以与“法币”抗衡，甚至还傳說拒用“法币”。这当然是龙云不愿意外籍軍隊尤其是“中央”势力乘机挤入云南直接威胁他在云南的統治地位。其所以忽然停止与刘建绪的文电往还，乃閉門不納之意，是与他整个的拒外态度一致的。

在贵阳的顾祝同，当然了解这个情况，他及时电告刘建绪（彭松龄代理）說，他即日飞昆明会商“剿匪”事宜，要“追剿”总部指挥各纵队继续前进。我們进入滇境后，顾已在滇事毕回黔。彭松龄去电給龙云，說拟即日先来昆明晉謁，請示机宜。旋得龙复电欢迎。彭即乘汽車先行，“追剿”总部乃由余賢立率领前进，行抵馬龙，就乘坐經龙云許可由昆明鼎来的几輛卡車直达昆明。总部人員、警卫部队和直屬部队均駐城内，这是龙云的特許。纵队的部队則一律

不許入城，只准在离昆明五十华里的地区經過或休息。“追剿”总部到达昆明的第三天，龙云派卡車二輛送来了酒、肉、水果、餅干、香烟、毛巾等犒劳的物品（他对各纵队此时还没有这个表示），并津补总部經費二万元。从这些表現可見顧、彭昆明之行的作用。

几天以后，蔣介石飞抵昆明，当日召見了彭松齡。次日，蔣邀龙云同机視察了各部队后仍返昆明轉飞貴阳，并邀彭松齡随行，密詢以对龙云的軍事力量和政治态度的看法。翌日由貴阳行营派飞机仍将彭送返。彭返昆明后，当被龙云召見，以昨与蔣在貴阳談話的內容相詢。彭詭以垂詢入滇部队的紀律和第四路軍的情况答之。龙未深信，固詰不已。彭答仍如前，始罢。仅此一事，足見反动派內部互相猜忌之深。

刘建緒在湖南是何鍵的前敌总指揮，在貴州是顧祝同的“追剿”总指揮，入滇后又改为龙云的前敌总指揮了。他在蔣介石离昆明后不几天，由湖南經重庆飞抵昆明。他很理解龙云对他疑忌的心理，但对他沒有对蔣介石嫡系那样严重，而是可以运用一些手法来消除的。果然，龙云在刘的多方面应付之下改变了对刘的看法，两人之間在表面上相处得很好，而且后来刘在六月間率部离滇时，还博得龙云的热烈欢送。

刘建緒究竟用的一些什么手法来应付龙云的呢？除了他与龙云密談的內容不得而知外，就我所了解，他采取了如下的一些办法：一、他一到昆明，即贈送龙云一份厚礼，中有大幅湘綉一件。其时龙已在滇軍中抽調八个团編为一个纵队，以孙渡为纵队司令，交他（刘建緒）指揮。他也同时送给孙一份礼品。二、他請求龙云派聯絡參謀到他的总部去，依慣例，派遣聯絡參謀，一般是上級采取主动；同級单位互相調遣时，主动权在于派遣之一方。这次刘破例以下級主动向上級請求派聯絡參謀，是为了对龙云表示“恭順”。但当

龙派了一个少校参谋（昆明人，名忘）来到总部时，刘又暗中嘱咐我：“假使有要紧的东西（文件），就不要给他（联络参谋）看到了。”

三、龙总部的参谋长某（名忘，曾留法学陆军）纳妾，刘赠礼五百元（法币，合滇币五千元）。这在当时说来，是一份厚礼。当然也是为了讨好龙云。刘在湖南是从来没有拿这样的重礼赠人的。四、对一些脱离了军籍住在昆明的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人，尤其是与龙云有些关系的人，大拉同学关系，不吝过从，谦逊备至，并且委他们为总部的顾问、高级参谋等职，按月致送津贴一百至二百元，个别的达四百元。刘拉拢这些人是想造成对他有利的“舆论”，从而获得龙云对他的好感。这本是他的一种权术，在离滇之后，对他们就概不理落了。五、刘由大理返昆明后，以盛筵和包场戏招待龙云和在昆明的滇省高级文武官吏，博得了他们普遍的好评。据闻，以一个外籍统兵大员而对龙云这样“恭顺”的，刘还是第一个。六、对于滇军的官佐来会者，刘一律亲自礼见，这同样是“敬其上而礼其下”的一种手法。有一次，在昆明的一个滇军排长来见刘，刘照例延见。该排长怒气冲冲而入，唐突地对刘说：“你们军队的钱多餉多啦！我排一个兵潜逃了，你们就收补，这是你们勾引的，我一定要人……”刘毫无愠色，善言遣之。

（六）

刘建绪在昆明俟红二方面军已进入滇西北地区将入西康之时，他就率总部由昆明去大理（彭松龄此时告假回湘），驻东门外七里桥。这时除孙渡纵队已进入西康，次第到达会理、盐边及德昌、盐源之线外，其余各纵队均盘旋滇西北地区，成半休整状态。

刘驻大理约半个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两广异动，要他即率樊、李、郭各纵队迅速开贵阳待命。我依照刘的指示，选择定了

各纵队旋黔的路綫，将拟好的命令稿亲自送核时，适刘不在，見其桌上置有龙云拍来的寥寥两語的一个电报和刘亲拟的复电稿。龙电說：“两广事变，吾兄态度如何？”刘的复电稿說：“某电奉悉，职唯鈞座馬首是瞻。拟即日赴昆晉謁，請示机宜，乞派飞机到祥云接职。”（当时滇西只祥云有机場）龙电措詞直率莽撞，刘則玲瓏圓滑之至，足見他們之間的戒备心理。

旋师命令既下达，刘建緒即經祥云飞昆明謁龙，其总部也移駐昆明，时为端午节前数日。刘到昆明与龙就两广問題会談的内容，外間虽不得而知，但就他們在昆明酬酢过从的情形来看，可以判断他們在意見上是沒有多大分歧的。

六月底，各纵队已分途到达昆明附近地区，刘即离滇返黔，为时八个月的所謂“追剿”也就結束了。

刘建緒离昆明之日，龙云派出宪兵（龙自建的宪兵）、警察各两个团，还有各机关官吏，学校学生和部分紳商所率领的群众在东郊沿公路列队长約十里，热烈欢送。据客居昆明多年的湖南人說，除了唐繼尧离滇时，昆明举行过这样一次大規模的欢送外，这一次算是空前的了。

部队在黔停留不久，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刘即率章、李两师回湘，旋复率其第四路軍入浙。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回忆湘西“剿共”的几次战役

戴季韬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紅軍多次进出湘西，其中有几次較重要的战役。即：南（县）、华（容）、津（市）、澧（县）之役；桑植和桃子溪之役；永順、沅陵之役。前一战役，陈渠珍只派我和陈运夔、田少卿等率少数部队参加，后两次战役，則均以陈部为主。

在这段時間，我任陈部的团、旅长，直接或間接参加反共战争。因就回忆所及，概述当年的作战实况。

一、南、华、津、澧之役

一九三〇年七月紅軍攻克长沙，何鍵急調駐常德的第十六师四十七旅（戴斗垣以副师长兼旅长并兼湘西“剿匪”指揮），投入反攻。

戴既不能抗命，又恐部队調动后，常、桃原有防地被何鍵乘机夺去，使自己进退失据。乃商請陈渠珍乘何鍵用全力跟紅軍作战无暇西顾的时候，派部队开駐常德协助其留守处控制常、桃。陈早有意向外扩张，便派我率警卫团（陈的基本部队，有人槍三千余）于八月中旬由沅陵开往常德。何鍵一見陈渠珍的势力乘机扩张到常、桃，大感不安，借口南、（县）华（容）告急，严令我部即日开赴津、澧，待命向南、华增援。陈恐我一个团处在何鍵的势力范围内因孤軍远悬而吃亏，随即加派第一团（团长陈运夔）于八月二十三日由永順开到澧县策应。

九月初，紅二軍團連克石首、藕池，十五日逼近華容屬之梅田湖。二十三日紅軍鄺繼助部攻占華堰，一部分向南縣進攻，南、華同時告急。何鍵慌忙電請駐石首、監利的川軍賴心輝的新編第十一師第三十一旅張英部（後來張接充師長仍兼旅長）開安鄉，第三十二旅馬塋山部開南縣，督同南華安沅區指揮宋壽梅所屬各縣保安團和湘西“剿匪”指揮部的向克權團向紅軍進攻，並電令我和陳運夔團趕日向南華“進剿”。適因澧縣北鄉有王文齋、荀達如兩部紅軍進入，所以，陳團仍留澧擔任“堵剿”，我則率警衛團向南、華增援。到安鄉後，獲得紅軍有向津、澧進攻的情報，因即率部折回津市。南、華方面我僅派少數部隊和聯絡人員前往偵察而已。

當“進剿”各部在南、華附近和紅軍小有接觸後，紅軍主力即向石首、公安一帶撤退。張英部追至安鄉而止。紅軍主力雖已遠去，鄺繼助部卻留在條關（距華容60里）附近游擊。十月十八日，鄺部復逼華容縣城。主力紅軍也分兩路：一路由石、監進攻南縣，一路由岳陽直趨華容。兩路紅軍於十月二十二日同一天攻占南縣和華容。二十六日克三仙湖，沅江吃緊。

何鍵為了挽救湘西北危局，在平洵軍事吃緊中，抽調第十六師師長彭位仁率部於二十九日開赴草尾。此時，蔣介石已將原駐沙市的李云龙師，和原駐公安的新編第七師川軍李宗鑑部調到湘鄂邊境策應；第四十八師徐源泉部徐清佑旅且於二十九日糾合“江貞”兵艦攻陷監利，分兵由調弦口，鮎魚須向南、華“抄剿”。縱戴斗垣（戴已於八月下旬在瀏陽文家市被紅軍擊斃）為湘西剿匪指揮並兼任第二旅旅長（轄第三團何英，第四團向克權部）的戴恢垣也糾結久駐湘西、一向受編不受調的該部第一縱隊司令李國鈞（李刺殺陳漢章，領其眾）率眾趨南、華。川軍張英等部同時從安鄉出動。這些“進剿”部隊都歸彭位仁統一指揮。歸彭指揮的還有我和陳運夔

团以及滨湖各县的保安团队等。同时，何鍵还派了策划“馬日事变”的一头凶恶的鹰犬余湘三为督战官。

紅軍自打下南、华、攻占三仙湖后，偵知国民党部队已由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因在彭部到达前一天即十月二十八日午后主动由三仙湖向中魚口撤退。早已开抵草尾的戴恢垣部由八百弓乘机进占三仙湖。彭部刘济人旅到达后，随即由三仙湖、聶魚口进攻紅軍段炳鈞部，并間道由左方向太阳山撫紅軍之背，紅軍向扇子拐撤退。此时川軍一部也从麻河口、三汊河向南县推进，并在太白洲架設浮桥，企图抄袭紅軍右后；一部經澧、安边界攻占梅田湖、鮎魚須两重鎮后，逕向华容进攻，三十日占領华容屬之沙口。彭位仁見“进剿”部队均已到达指定地点，乃于三十一日下令总攻。次日，紅軍主动撤离南县城向华容轉进，一部在三汊河强渡，被川軍和刘济人旅堵击(据說紅軍損失很大)，乃折向藕池方向退走。紅軍主力在梅田湖、官增一带与川軍张英部接战，战斗激烈。十一月一日彭位仁率四十七旅之九十四团由草尾踵至，即向梅田湖增兵，紅軍随即向华容撤走。

彭位仁随即分三路向华容进攻，

第一路，川軍张英之一部由梅田湖經鮎魚須进攻华容。馬堃山旅分途进攻响水窖、官增至焦圻綫之紅軍。

第二路，彭位仁亲率第十六师刘济人旅和戴恢垣部由甄家咀、中和垸、赤松亭直攻华容正面。

第三路，宋寿梅指揮的保安团队由烏咀、长春垸攻击紅軍側面。

三路水陆并进，同时围攻。川軍遭遇紅軍节节抵抗后退占官增、响水窖。紅軍主力在彭部尚未到达前即由华容北門用浮桥渡河向鄂边石首、松滋方向撤去。其中一部撤向澧北边境。彭位仁部于十一月二日进入华容城，即日分由华容、岳阳开回长沙。戴恢垣部回防

常德、李国钧部开驻汉寿；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回驻监利和新堤；张英师开回安乡。

在彭位仁等“进剿”部队撤走的同时，红军却已折向津、澧。时我正奉何键令率部支援南、华，行抵安乡。闻讯，即令团附陈孟炳打电话告诉陈运夔。陈那向为其母亲大做其寿，对敌情毫无戒备，他回答说：“要你们团长不要胆虚，有我陈运夔在，怕什么！”当时驻防津、澧的只有我和陈运夔的两个团。情况紧急，而守兵单薄，驻安乡的川军师长张英要我昼夜回防。在张英处还会见了张部派驻长沙与何键联系的官鼎良（四川人，在何总部挂了参议名），他对我和张英说：“我在长沙时，听说何键有意利用红军消灭川军和湘西部队，作战时，须特别小心防范。”我于二日晚率部赶回津市，即电话与陈运夔联系，并将官鼎良说的话告诉他，要他注意。但陈此时仍不识大局，还以津、澧驻地问题的夙怨同我闹意见（我团与陈团开津、澧时，陈渠珍指定我团驻津市，陈团驻澧县。陈以津市为特税收入地区，他没有占据，对我非常不满），所以在战守问题上不能一致。当时我考虑到：第一，红军南进后一路连克重镇，士气旺盛，锐不可当，且贺龙将军在津、澧一带威德素著，人民群众对他有好感；第二，我部孤军深入，何键正好借红军之手消灭我们。因此，我坚决主张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走，决不和红军打硬仗，替何键卖命。陈运夔却因夙怨，说我团是拥有人枪三千多的加强团，装备优良，训练有素，质问我：“为什么不可一战？为什么要在何键面前坍湘西人的台？”他还认为我团驻在有特税收入的津市，关系官兵餉糈，应该主动迎击红军，确保津市。由于我与陈的意见难得统一，我们就召集两个团营长以上官佐在津市开紧急会议。会上，我团副团长彭达武提出分区布防的调解意见。我们只好勉强作出布防决定：津市方面，警卫团负责，由彭达武率刘文华、白树庭两个营一千八百多人

在白洋堤一帶布防，我率特務連和劉鼎霄千多人為總預備隊；澧縣方面，由陳團副團長劉宗魯率滕傳光、張健兩個營約千餘人占領大堰壩、王家廠之綫，掩護津市側背，陳運夔則率譚文烈營固守澧縣城，相機出擊。我們就這樣連夜倉卒布防。

十一月三日，紅軍以一部監視白洋堤守軍，主力猛撲守大堰壩、王家廠的滕、張兩營陣地。激戰兩小時，守軍遭到重大傷亡後潰退，紛紛搶渡王家廠河逃命，但渡口已被紅軍機槍的猛烈火力所封鎖，該團副團長劉宗魯同百十成群的官兵一道溺斃了。後來檢查，這一戰鬥計溺斃傷亡官兵三四百人，被俘的百餘人，共損失人槍五、六百。

紅軍在解決滕、張兩營後，當日即轉過頭來，向白洋堤我軍猛攻，滿堤遍野，殺聲震天，激戰約三小時彭達武被擊斃，官兵死傷百餘人。我見戰鬥不利，乃令迅速脫離戰場向津市轉移。此時，澧縣方面的槍聲突然加劇，我眼見戰況轉變得如此迅速猛烈，恐津市澧縣間的通路被紅軍截斷，不敢死守，下令放棄津市，向澧縣撤退。

十一月四日起，澧城東、北、西三門被紅軍重重包圍，南門稍弱。我率部於當晚到達澧縣城郊時，因東郊的多安橋已被紅軍占領，無法衝進澧縣，遂率部繞向宋家渡過河，進駐中和鋪，與澧城成犄角之勢。五日晚，我派兵襲擊圍城之紅軍，守城部隊亦開城出擊，內外夾攻，遂將圍南門之紅軍擊退。同時，我團劉文華營率同沿途收容的陳團潰兵五百餘人，共一千五百多人，乘紅軍不備，由劉家河偷渡，安全進入澧縣，協同陳團固守。我則率部仍在中和鋪一帶遙為呼應，並聯絡新開到新安州之川軍馬塋山旅和由漢壽趕到的李國鈞部相機反攻。不久，陳渠珍派來新近收編的田少卿團增援。我與各部會合於澧縣城郊，在何鍵所派督戰官余湘三的監督下，分向津澧猛攻。

在這以前，紅軍接連攻占石首、華容、南縣、藕池、公安、監

澧、津市、石門等城市，歼国民党軍官兵數千人。但他們从来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當我們反攻時，又機動地從津、澧城下撤走了。當時，蔣、馮、閻中原大戰業已結束，蔣介石正南調兵力向紅軍根據地進攻，同時，紅一、三軍團早已從長沙附近撤退。這可能是紅二軍團主動解津澧之圍的原因之一。

澧縣之圍雖已解除，但是我們又被內部矛盾困住了。

陳渠珍鑑于戴斗垣的部隊被何鍵時編時調，打仗有份，補充無望，實力消耗大半，將有被全部吃掉的危險。而自己的部隊在津、澧戰鬥中損失很大，同樣得不到補充，恐愈拖愈瘦，蹈戴的覆轍。因此無意再讓自己的部隊遠離老巢，繼續與紅軍作戰。曾一再電令我率警衛團和陳、田兩個團撤回湘西，退守慈、庸。但陳運夔卻恃守澧州有“功”，想借與紅軍作戰機會，要求何鍵補充兵員械彈，以彌補損失。他在余湘三的支持下，拒絕接受陳渠珍的命令。余湘三更挾何鍵之命阻止我團撤回湘西。我再電陳渠珍請示，陳仍嚴令撤回。當時，我考慮警衛團是陳賴以統御各部、統治湘西的基本力量，這次接常德之防，弄巧反拙，被何鍵抓住，難以脫身，如果繼續與紅軍打下去，再遭到更大的損失，則陳的實力將被消滅大半，在湘西的地位勢必發生動搖，我們亦將無所依附。至于陳運夔因遭受重大損失，無顏“回見湘西父老”，事已至此，必不可強，強則生變。如適當處理，或能為陳渠珍保存這一部分殘余力量，爾后可以相機恢復。于是決定要田少卿團協同陳運夔留駐澧縣，我自己則于十一月上旬不顧余湘三的留難，由澧縣向常德鰲山廟方向撤退。紅軍此時尚占領新安、合口一帶，聞訊尾追至鰲山廟，我部改道經湖沼地帶由常德下游的牛皮灘渡河直趨桃源，退回沅陵。當我到鳳凰向陳述職時，他指出何鍵企圖消滅我們的陰謀，對我們替何鍵出死力去跟紅軍硬拼和陳運夔抗令不撤表示非常不滿。

不久，何鍵致电陈渠珍說我擅自撤退，应予通緝法办。陈擱置未理。但想当这个警卫团长的却大有人在，乘机爭夺开来。陈为避免内訌，将警卫团三个营扩充为三个直属团，任原来三个营长为团长，計第一团团长刘文华，第二团团长白树庭，第三团团长刘鼎，我虽暫被編余，但仍参与机要。这三个团不久即編为新三十四师独立旅，陈渠珍兼旅长，我任副旅长，負实际責任。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紅二軍团再攻津澧。前此，紅二軍团在湘鄂西进出期間，虽沒有巩固占領的城市，但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在鶴峯解决了川东土著武装秦伯卿、甘占元等部，繳槍数千支；在南华津澧各役中，除成批繳获陈运夔部槍五、六百支外，陸續虏获其他“剿匪”部队的人员械弹亦不在少数，得到很大的补充。所以这次进攻声势也比前次更猛了。其时，李国鈞等部在第一次津澧战斗结束后即开回汉寿等地，所以守津市的馬塋山旅，守澧县的陈运夔、田少卿两团，都抵挡不住，紛电何鍵、陈渠珍告急。

何鍵除派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一百零九团（团长刘建文，屬邓南騷的五十六旅），一百一十三团（团长庄文枢、屬段珩的五十七旅）督同石門保安团（团长罗效之）和李国鈞部向津、澧增援外，并請第十一师师长陈誠和陈渠珍等火速派兵馳援津、澧。

陈渠珍听到紅軍比前次来势更猛，并有經津、澧进入湘西老根据地的消息，大感不安。且陈、田两团又已被紅軍围困在澧县，急待救援。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又向津、澧增兵。陈任命新三十四师第二团团长顧家齐为慈庸“剿匪”指揮，率第二团和独立团（团长张晋武、新近收編）由大庸逕赴澧县，并加派新收編的川軍周燮卿旅由大庸向津澧增援。我則替他掌握津、澧方面作战情况。

十二月初，李觉指揮各部进攻石門皂角市一带的紅軍，李国鈞、

周燮卿、顧家齊等部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奪路潰退。時第十九師劉建文團在瓜子峪擔任掩護并相機抄襲紅軍左側的任務；莊文樞團駐新安掩護側背。該兩團聞李國鈞部失敗，均不救援。紅軍打敗李部后，繼向劉建文團進攻，而莊文樞團又不策應。李覺兩次下手令要劉團向新安撤退，劉以李覺不明瞭敵情，拒絕向新安集中待命，致被紅軍各個擊破。李覺隨即組織反攻，復命劉建文團打沖鋒，激戰至烈，紅軍小挫。這時華容城亦為第十一師第六十五團（團長莫與碩）和新十一師張英部於十二月十三日攻占。紅軍見前進受阻，側背又遭到威脅，因此主動地從津、澧城下撤去（日期記不清了）。

津、澧解圍后，李覺在石門召集所指揮的各部隊團長以上的幹部開會，會議總結了第一、二次津、澧作戰經驗，檢查了在石門皂角市作戰失利時互不相救援的教訓。當會議進行中，忽接到紅軍前委在松滋縣楊林市舉行會議的情報，得悉：紅軍內部對爾后行動方向，意見不一致，有的主張退回鄂西根據地，有的主張在當地與敵周旋；甚至說賀龍將軍已離開部隊。消息在軍事會議上傳開，所有與會的人，個個喜形於色，一致主張乘機越界“剿匪”，以竟全功。特別是湘西部隊的軍官，如張晉武、田少卿等人過去當過賀龍將軍的部下；顧家齊也跟賀共過事。他們都深知“一把菜刀鬧革命，打遍湘西無敵手”的賀龍將軍的神勇，最怕跟賀將軍打仗。此刻一聽到賀龍將軍離開了部隊，他們的反動氣焰也就陡然高漲，摩拳擦掌，“要扳回打敗仗的本錢來”。李覺在會上決定指揮所部越過界去打楊林市，並在会后親自赴津市和張英、馬塋山商量作戰計劃。他們共同決定了分進合擊的作戰方案，各按作戰計劃，揮軍急進，跟在紅軍后尾窮追。李覺所部追到楊林市打响了。

紅六軍在楊林市、街河市地區，紅二軍遠在公安，由於內部意見分歧，部隊行動猶豫，使李覺得以從容布置，並以優勢兵力壓迫

楊林市之紅軍。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李覺率部由津市到張家廠，其先頭部隊在張家廠附近與紅軍接觸，紅軍退走，李部進占西齋（屬鄂境公安）、王家壩、楊寨鋪、石子灘之錢。張英師于同日由官壩、黃山頭分向公安、藕池進擊，企圖截斷紅軍交通，會合李覺所指揮的各部協同第十一師莫與碩團分向公安、石首之紅軍進擊。

十八日晨，李部與孫德馨的紅十師和紅十六師，紅十七師（據當時被俘紅軍戰士口述），在元山一帶高地激戰竟日，肉搏十餘次，紅軍不支，向楊林市撤退，李覺所指揮的各部跟踪尾追至楊林市。攻楊林市打先鋒的是石門保安團羅效之的一個加強團（附重機槍一連）最賣力氣。李國鈞部兩個團先後投入戰鬥，向楊林市正面猛攻。周燮卿旅，顧家齊部則由西齋向街河市進攻。這一仗紅軍沒有打好，損失頗大，分向公安、松滋方向退走。（事後據李國鈞部繳獲的文件中提到楊林市之役，損失過巨，紅六軍軍長段德昌免職。）

張英部十九日由茅草街渡河，將抵藕池時，據報：在楊林市失敗的一部紅軍正向石、藕撤退。該部當即截斷由楊林市向藕池撤退的紅軍退路，激戰在距藕池約四里的地方。紅軍不支，退至河岸強渡時，戰士落水而死者甚多。

李覺自取得楊林市的勝利之後，揮軍急進，于二十日攻占公安。紅軍向東西兩個方向撤退。東撤的紅軍會合藕、石的零散部隊，占領藕、石，抵抗張英師的進攻。李覺則于二十六日率第十九師莊、劉兩團由西齋出發進駐公安後，除令李國鈞部蒲仕勝團留駐張家廠，李國洪團駐芝麻咀、大堰壩至鄂邊各地，陳運夔、田少卿兩團分駐石門、澧縣外，以戴恢垣部（戴本人留津市開善後會議）和周燮卿旅，顧家齊部以及川軍馬堃山旅為追擊隊，向鄂境追擊西撤的紅軍。紅二軍團主力被迫退往湘鄂邊的五峯、鶴峯根據地。至是南、華、

津、澧战役告一结束。是役结束后，陈运夔病死澧县。该团残部编并于田少卿团，随同周燮卿、顾家齐部开回湘西。

二、桑植和桃子溪之役

一九三二年冬末，贺龙将军率红三军（红二军团改编）由陕南经川东进入湘鄂边境，再占鹤峰，向桑植挺进，声势浩大，全湘震动。此时，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的部队还在洪湖一带（后移五峰），何键的主力军也远在中央苏区附近，湘西的反动武装，只有陈渠珍的新三十四师和所属的保安团队。何键奉蒋介石命令将陈部“剿匪”部队划归徐源泉指挥，时陈部教导旅长龔仁傑正请假逗留长沙，得讯，当即以奉陈命赴徐部请示机宜为名，进行个人地位活动。龔原与徐有旧，徐派龔为湘鄂边区“剿匪”指挥官。陈渠珍在凤凰闻讯，恐龔大权独揽，将来尾大不掉，乃极力保委第三旅旅长周燮卿兼副指挥官，桑植保安团长王尚质兼指挥部参谋长，并要王在龔仁傑未回湘西之前，先去永顺组织指挥部，编组兵力。当时编属该部的部队有：

新编三十四师第三旅（旅长周燮卿，辖杨少卿、何翰丞两个团）；

第一旅第一团（田少卿）；

独立旅第一团（白树庭）；

独立团（团长张晋武）；

新编第三团（团长朱际凯）；

永顺保安团（团长罗文杰）；

桑植保安团（团长王尚质）。

除周燮卿旅还在桥头一带“剿匪”任务，朱团守桑植城外，其余部队均集中永顺待命。

陈渠珍之所以保王尚质当参谋长，其用意有二，一是监督龔、

腐；一是要他听命行事，不要跟紅軍打硬仗。在出兵桑植前夕，陈对王面授机宜說：“如果賀龙真的被消灭了，我們还有什么可干；我們打紅軍牺牲了，誰給补充；何鍵對我們是不怀好意的，心里應該明白。只要賀龙不来搞我們，做到互不进攻，便可相安无事。你照着我的意思去办，有事随时打电话商量。”看来陈是没有对紅軍作战的决心的。据我所知，当时有曾率大庸土著部队投向紅軍、为賀龙將軍所收編、并派到陈渠珍处做地下联络工作的覃甬丞来到凤凰，陈特为覃設密室于凤凰大桥头蔣家，待为上宾。陈利用这条线主动向紅軍提出“互不进攻”的建議。事为陈部副官长双景五所知。双为报服陈不重用的宿怨，将这一事件向何鍵告密。何派一个姓楊的參謀到凤凰偵知后，向陈索覃，并尽力破坏。一九三四年底沅陵战役之后，何解决陈时借口說陈勾結紅軍，即以此事为据。当时陈并没有将覃交出，陈垮台后，何才得将覃逮捕，关押在常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我被何編余去上海经过常德时，送过一百块銀洋到监狱給覃甬丞，自此之后，覃的消息我就知道了）。

陈渠珍当时其所以要采取两面手法，主要是因与何鍵有矛盾。他常和我談及，我們处在何鍵的控制之下，不能不阳奉阴违，敷衍塞責。何鍵是老虎，誰碰着他，誰就有被吃掉的危險。他认为賀龙当过他的支队长，并曾帮助他打走川軍熊克武、湯子模，交还在川軍手里所夺回的湘西各县地盘。一九二六年賀龙为赵恒惕所迫，他也曾掩护賀从澧县安全退入貴州，他們之間是有交情的。他說：“現在賀龙当了紅軍，我們还可以利用旧情虛与周旋，借以自重。要是‘活龙’远走高飞了，何鍵足有余力对付我們，那我們垮台的日子就不远了。”由于陈有这些看法和顧慮，所以愿与紅軍进行談判，表示紅軍只要不打他，他决不打紅軍。

在紅軍方面，我們也約略知道，賀龙和关向应两將軍鉴于紅三

軍这次經豫南、陝南进入湘鄂边，在前进的途中跋山涉水，斬关夺隘，虽然粉碎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消灭了許多敌人，但也存在着严重困难，有意使部队暂时得到休整，徐图充实、发展，以配合中央紅軍作战。当然，他們对于陈渠珍，可能还有更高的策略問題。因此，他們主张与陈部談判。但紅軍中另有人反对和談，使談判沒有获得良好結果。而反对談判的人又不經切实准备，遂命令疲惫之师进攻，終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桃子溪遭到严重的挫敗。

战斗經過是这样的：

当紅軍向桑植进军时，桑植城守軍朱际凱团，迭电陈渠珍告急求援。陈派周燮卿旅馳援，在周旅未到达之前，朱团即已聞訊逃到水獭鋪去了。桑植县城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为紅軍攻占。十三日拂晓，周旅繼向桑植城挺进，馳抵县界，为扼守周旅进攻必經的三磴岩壁道路的紅軍部队所阻。当时大雪封山，道路尽被冰雪所沒，用兵极感困难。相持至十九日，扼守三磴岩之紅軍，毀掉数丈險道而退。周旅未与紅軍接触，不明紅軍去向。二十日据探报称：桑植县城紅軍全部退走。周发电探詢慈利、永順方面的情况，据悉慈利方面并无变化，永順則有紅軍分三路，一路由苦渡河，一路由泥湖塔，一路由墓阴界向县城进攻之說。周认为紅軍素以用奇兵見长，相持数日，不战而退，其中必有机謀。他据此判断，决移兵永順。乃于二十一日过温塘、桥头开抵黃家台、桃子溪一带，扼守泥湖塔、墓阴界之綫。

桃子溪是永順的門戶，离桑植城三十里，是个山窩，一条鵝卵石大路穿邨而过，直通永順。四面是高山，地形險隘，利于守而不利於攻。紅軍于二十三日晚在泥湖塔展开，分三路向桃子溪猛力进攻。其第一路是由岩壁向桃子溪。周除留两个营在桃子溪为預备队外，其余各部均立即出迎，集中全部机槍向来攻的紅軍

扫射。周亲率预备队和机炮各营居中指挥策应。激战两小时，红军退至岩路口，凭险抵抗。周部主力从正面仰攻，一部分从两翼林缘分道抄袭，于午前攻占岩路口。红军第二路由姚家湾迂迴攻击周右翼的细沙坝高地，集中全力猛冲，战斗至为激烈。周集中机炮和迫击炮以旺盛火力压制来攻的红军，并派预备队抄袭红军侧背，红军攻势顿挫，不支退去。第三路的红军由汉湾包抄桃子溪后山，周分兵由黄家台经万灵反抄汉湾的红军后路，激战至夕，红军向泥湖塔退去。周部乘胜猛追，夺占泥湖塔，红军向桑植城撤退。据周燮卿后来对我说，这一仗红军损失很大。

桃子溪战后，如果反动派乘胜猛追，新败的红军可能还要吃点亏。可是他们内部矛盾发生了，红军得以从容转移。原来陈部弹药缺乏，龔仁傑虽代陈渠珍向徐源泉请领了一批子弹，可是陈没有及时运补周旅，周大为不满。且周素不甘居龔下，桃子溪侥幸得胜，更助长了他的驕气。他说：“老子冒生死危险打胜仗，得不到补充，龔仁傑却坐收渔人之利。”龔周之间既有矛盾，所以在龔于一月二十五日回到永順，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进剿”问题的时候，周借口前方吃紧，拒不出席，連代表也沒派一个来。而到会的各团长在交换“剿匪”的意见时，都表示怕跟賀龙打仗，如田少卿说，“黑胡子（称賀龙將軍）不好惹，他这次打输了，是要捞本的，要小心谨慎。”其他团长都只附和这样看法，始終提不出一点具体意见。

二十九日龔率部抵桃子溪，他明白自己是个空头指挥官（只带他自己的两个直属营），不得不迁就周燮卿，于是偕同王尚质先去拜会周燮卿。一见面，周燮卿就说：“打仗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子弹。有了子弹，那怕賀龙再狠，打胜仗老子是包了的。”龔当晚回到黄家台驻地，要王尚质打电话给陈渠珍催运子弹，并根据和周商定的结果，下了一道作战命令。可是周接到这道命令之后，又借没运到子弹不

能打仗的由头，大发脾气，打电话向王尚质说：“陈师长不发我的子弹，怕我造反嘛！还打什么仗呢？我不干了！”龔忍气吞声，只得和王尚质商量把我的独立旅士兵所佩带的子弹，分拨一部份给周旅，才算勉强敷衍过去。

由于反动派的内部矛盾，拖延了预定的作战计划，让红军赢得了休整时间。当“剿匪”部队于二月二日进抵赤溪河时，红军早已从从容容地向洪家关撤退了。

周燮卿首先听到红军撤退的消息，他不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而由朱家台渡河，抢先进桑植城，夺得克复桑植城的“首功”，当即打电报向陈渠珍报捷。这样一来，打乱了计划，其余部队也只得跟着进城，于是又发生了争功的矛盾。周燮卿目空一切，因此各团长都对周不满，按兵不动，让红军安全地经洪家关向鄂西撤退。而陈渠珍又主张对红军不打硬仗，所以他这次对龔、周按兵不动，也装聋作哑、置之不问，始终没有打出一个要龔周继续追击红军的电报。还是王尚质觉得在桑植一住五天，任令红军退走，连表面追的样子也不做一下，恐尔后遭到何健、徐源泉的谴责，乃向龔仁傑提出继续追击的意见。龔当即要王把周燮卿找到指挥部，三个人一碰头，决定了分两路向鄂西追击前进。这就是他们尔后在战报中宣扬的所谓“桑植军事会议”。

龔仁傑率同田少卿、朱际凯、白树庭、张晋武、王尚质各团及直属一、二营为一路，经晏家垭追到走马坪。由于沿途老百姓尽逃匿山中，找不到粮食，找不到伏役，官兵不耐艰苦，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回驻苦竹下。周燮卿率杨少卿、何翰丞两个团及其直属各营的这一路，经五道水追抵鹤峰附近，回驻桑植。

战役结束后，徐源泉撤销了湘鄂边区“剿匪”指挥部，复任龔仁傑和周燮卿为湘鄂边区“剿匪”支队的正副司令。但这个空头名

又沒有起絲毫作用，外人也很少知道。

三、永順、沅陵之役

提起紅軍在永順十萬坪打埋伏的史事，當時湘西很多人都能够活神活現地說出這一個有名的“口袋陣”來，不過一般人把地名傳訛了，將十萬坪訛成龍家寨。此時我率獨立旅駐守沅陵，十萬坪的這一仗，我雖未親自參加，但戰前會議和戰後檢查是在場的；且戰鬥情況，因與沅陵防守關係太大，所以隨時注意收集掌握，了解甚詳。

一九三四年十月間，紅二、六軍團在貴州印江木黃鎮會師後，賀龍將軍、任弼時政委提出了向湘西創造以永順為中心的根據地的號召，所以紅軍在會師後不幾天，就繼續向永順、大庸、桑植一帶進軍。

紅二、六軍團在離木黃之初，即在酉陽西邊兜了一個圈子，把國民黨的部隊調到酉陽以西，然後回過頭來，打下龍山，馬不停蹄地直向永順挺進。

永順四周各縣，一向是陳渠珍的部隊駐防，此時他的新三十四師第一旅、第三旅和教導旅都調到黔東幫助車鳴翼去打王家烈（貴州省主席）去了，第二旅則遠駐辰谿一帶，永順僅有羅文傑的一個保安團駐扎。而羅又疏于警戒，對敵情毫無所知。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進抵永順城郊時，羅團在一無準備的情況下，棄城而逃。紅軍只花了一早晨的功夫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永順城，跟着向四周擴張開來。陳渠珍聞訊大起恐慌，馬上把該部第一、三旅和教導旅由黔東星夜調回來防堵。在黔東被王家烈打敗的皮德沛、楊其昌、雷鳴九等師和自稱黔軍總指揮的廖懷忠部，統統跟隨陳部由黔東退來湘西就食，陳概予收容，並使之參加這次防堵紅軍之戰。

各部于十一月十天左右集中凤凰、乾城两县。陈为讨论攻守问题，在凤凰召集所有新旧头目开作战会议。在讨论中突出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我们这些陈的旧部一致认为：永顺是个山城，物产较丰富，且邻近川、黔、鄂边界，北通津澧，东去常桃，进可攻，退可守，红军向来把它作为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好，贺龙又是湘西人，所部官兵多是湘西子弟，人情风土，极为熟悉，红军这次复来，是不会轻易退走的。且二、六军团会合，势力比前强大，如果贸然进攻，定遭打击。但红军远来，粮弹均不充足，我们如果坚壁清野，接受一九三〇年守津、澧的经验，以沅陵为支点，扼守沅、酉两水各重镇，互为呼应、徐图进取，当为上策。且徐源泉在沙市来电说他“已令驻藕池的张万信师和周万仞师全部开津、澧，与刘运乾联络，堵匪东窜”。我们等待该两部达到津、澧后，同时从两面“进剿”，不难一鼓歼灭。但是新进的黔军头目们的意见就大大与我们相左了。他们以就食湘西，人多食繁，必须迅速恢复陈的防区，经济上才有办法，大家才有饭吃，因此他们主张乘红军立足未稳，马上反攻，夺回龙、永。

陈渠珍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联合黔军即日向永顺进兵。

为了统一指挥，大家临时抬出一块“湘、川、黔联合办事处”的招牌，公推陈主其事。陈基于会议结果，决定采取分进合击办法，并组织“剿匪指挥部”，委派龔仁傑、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所有军队则区分为四路“剿匪”纵队，由龔仁傑、周燮卿、楊其昌、皮德沛分别兼任第一、二、三、四路纵队司令。

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剿匪”部队，迅速地由凤凰出发，经永綏、保靖成梯队向永顺进军。

此时红军已经在永顺休整五、六天了。战后得知：贺总部在永顺时就决定了打伏击的战斗方案：到处设伏，先骄纵，后引诱，设

法把敌人誘进既設的口袋，全部吃掉他。所以“剿匪”部队于十一月十三日一到永順城郊，紅軍为了引誘敌人，故示虛怯，把永順城西的大木桥燒掉，然后撤出了永順城，向通吊井岩的山沟退去。同时，又在皮家坳留置了少数警戒部队，以誘敌深入。当他們与皮德沛部接触，稍事抵抗，即緩緩地沿着主力撤退的路綫撤退了。

吊井岩离永順城十多里。由永順城东門出城只有里把路，就进入一条两山高聳的山沟，沟中一条石板大道曲曲折折通向吊井岩，长约十余里。紅軍順着这条山沟过了吊井岩，然后又抄小路回到吊井岩，埋伏在南北两边山上，只等敌人尾追进沟，馬上把两头山口子一断，扎紧袋子口，准备抓活的。他們沒有料到“剿匪”部队十三日进了永順城就住下不追了。

第二天（十四日）紅軍又故示虛怯，由吊井岩出发，沒有沿大道去塔臥，而是向北翻六十里的大山，退到龙家寨，在鎮子兩面的山中，照样把部队摆成了一个大大口袋，只等敌人追进来，又准备全部吃掉他，那晓得“剿匪”部队追到吊井岩，又住下不追了。紅軍又空守了一夜。

周燮卿等对于紅軍本来是畏怯的，但連日来見紅軍好象只有逃跑的工夫，毫无还手的力量，于是他們也就驕傲起来。因而他們并把賀龙將軍燒桥看成是怯战的表現。所以第三天（十五日）在战术上出現了最大的錯誤，由梯队变成一字长蛇陣，魚貫啣尾而行，且周燮卿自告奋勇率領所部打先鋒。他率兵由吊井岩翻北山到龙家寨，探报“紅軍剛走”。他誤認紅軍是被他們吓跑的，乃率兵急进，冲进南北两边都是高山，中間一条約兩里路寬，十多里路长，两面山上尽是茶树林的“十万坪”的夹谷中去了。部队到十万坪入口的官地坪时，太阳已經偏西。他在馬上对他的官兵說：“黑胡子今晚一定會在杉木榔（十万坪尽头的一个榔落）睡覺。快追，搗他的被窩去！”

他不顧一切地督促部隊往前趕，經官地坪和碑里坪（在十萬坪中心點距官地坪和杉木邨各五里）時，也沒停下歇腳，前面也沒派兵搜索，大搖大擺地一直向杉木邨撲。龔仁傑比周燮卿略為小心點，他率領的部隊跟進到碑里坪時，已經下午四點來鐘了。他開始意識到身入險地，有點害怕起來，準備在那里宿營。他親自到附近偵察了一遍，並馬上派了一個參謀率領一個營，上北山去搜索並配置警戒。

搜索隊剛爬到山頂，忽然紅軍高舉無數紅旗從茶樹林中衝了出來，把龔仁傑的部隊壓進到一條小山溝里，幾十挺機槍朝着潰兵們猛掃。龔仁傑率部向南山突圍，埋伏在南山的紅軍也是萬槍齊發，把龔部復壓進山溝，東沖西突，怎么也沖不出來。好在天色很快就黑了，龔仁傑才與潰兵們從山溝里爬了出來。

當龔仁傑遭到伏擊時，周燮卿正率部撲向杉木邨，忽听得後面那麼突然發出天崩地裂的槍聲和殺聲，才清醒過來，大呼：“中伏了！”他本想繼續向杉木邨突圍，他的部下立刻阻止：“那是袋子口，必定被封死了，沖不過去。”于是他率部向南山突圍，準備逃往塔臥。部隊剛到烏龜洞山頭，却被早在这里埋伏的紅軍主力，以泰山壓頂之勢，從山上壓了下來，周部傷亡成堆。周燮卿在黑夜中鑽進一個小茅屋里換上便衣，化裝向永順溜掉了。許多逃往永順的殘兵，也被預先埋伏在永順城北山上的紅軍俘獲。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紅軍復占領永順。

這一仗搞掉了陳渠珍的基本部隊三分之一，損失人槍萬余以上。楊其昌部隊比其他部隊損失更大，因為他是客軍，官兵不熟悉地形，在碑里坪驟一聽到急促的槍聲，就亂竄了，滿山遍野，狼奔豕突，被打死的生俘的有千多人，他這個僅僅有一千五、六百人的師，這時剩下的只有三、四百殘兵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紅軍復入永順後，當即揮師向永、沅

边界的王村移动，有进攻沅陵模样。陈渠珍闻风丧胆，本拟放弃沅陵退守北河南岸，巩固凤凰老巢。他在凤凰打电话对我说：“我们的部队在十万坪一仗，损失太大，一时又得不到补充，再不能跟红军硬拼死打了，如果一旦势力消耗殆尽，消灭我们的不是红军，而是另一伙（指何键）。我们必须保存实力。你可在适当时机放弃沅陵，向北河撤退。”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传播出去了。湘西的大官僚地主豪绅修承浩、许应卿都有大量财产在沅陵城内，惟恐沅陵不守，遭到损失。闻讯后，立即直接打电话给陈渠珍，要求死守沅陵。陈在电话中委婉地拒绝了。而修摆出架子，在电话中大肆咆哮，训斥一顿之后，即联合湘西各巨绅打电报请何键严令陈渠珍死守沅陵，并请派大军进入湘西“痛剿”。何复电陈渠珍要他死守沅陵。

陈渠珍在大军逼和地主豪绅的压力下，只得下令固守沅陵。于是我开始积极从事备战活动。

我首先对守沅陵主阵地的选择，反复进行了研究，根据沅陵的地形特点，认为以一部兵力驻守后山一带外围据点，而以主力守城，是最理想的。但沅陵城年久失修，墙垣坍塌，加以四周房屋很多，射界极不宽广，不但难以发挥火力，且不易与外围各据点保持联络。而红军又最善于利用复杂地形地物接近城根，如城垣不加固，并赶修工事，特别是射界不扫清，很难形成独立支撑点，一旦被突破一門，势必全城瓦解。最后我决定再加派军工和民工（一月前即已开始）日夜抢修城防工事。

我考虑到大批拆毁民房，必遭群众的反对，因此就商于豪绅修承浩、许应卿等。他们听到我军决心守城，自然赞许，于是由他们出面压制居民的反对。并威吓说：“如有反抗者，以通匪论罪。”他们还派民工协同军队强拆逼迁，总共拆毁民房千栋以上，东城和西城沿城墙脚的所有民房，尽被拆毁。我们在这些废墟上构筑起据点，

巧为偏成上、中、下数层射击设备的火网。修改城垛，进行瞰制射击；挖穿墙身，编成地面水平的交叉火网；下层工事还有防御云梯和爆破攻击等的坑道；城上准备着用铁丝系住塞棉花灌洋油的竹筒，作为夜间的守城灯具；复以沅陵河道过宽，部队往来不便，将沿河所泊船只集中，在中南門至对河驛碼頭搭成浮桥一座。

其次是如何加强防守实力的问题。最初陈渠珍指派在湘西就食的“黔軍总指揮”廖怀忠率领他仅有的“大軍”两百余人来到沅陵助战。廖一到沅陵，就抬出他的空头“总指揮”头衔，四城大贴告示，虚张声势。我以廖来，将妨碍统一指揮，于守城不利，因电請陈将在古丈落叶溪整补的周燮卿残部調来沅陵参加防守战。同时，将我部駐柳林溪的王尙质团也調进城来赶修工事。

十一月二十三日紅軍由永順向王村移动，企图进攻沅陵，我得报当即派兵堵击。陈渠珍此时又任命第三旅旅长顾家齐为“剿匪”前敌指揮，指揮所部經由古丈分向王村和永順、桑植“进剿”，在永屬之薄西坪与紅軍接触，激战三小时，紅軍向大庸、慈利方向退去。二十八日，紅軍进攻慈利之溪口受阻（不記得是哪个部队駐溪口），当即回师大庸，稍事整頓后，再向沅陵挺进。

我在沅陵接到情报，得悉紅軍于十二月五日进抵沅陵的紅树坪，六日到离沅陵五十多里的馬尿水，当即通知守后山的周燮卿旅并命令各部进入陣地，严陣以待。当天下午三时许，紅軍与我馬家鋪的警戒部队接触后，随即进围沅陵城，首先向駐守沅陵外围据点鴛鴦山、丁公庙一带的刘鼎团和王尙质团发起攻击。周旅在后山凭险頑抗，发生激战。此时城内的地主商人大起恐慌，紛紛搶过浮桥，逃往南岸，造成极大混乱，不利作战。且紅軍勇敢异常，数次向刘、王两团冲锋，該两团虽集中机枪拒守，亦难以阻挡。我和周、廖商量，决定将王、刘两团撤进城内，参加防守。同时派人折断浮桥，

表示与城共存亡，才得以阻止逃难的人所造成的混乱。入夜，将事先准备好的夜间守城灯具点燃，悬挂城垣四周，照耀如同白昼。由于红军没有大炮，仅凭枪弹和手榴弹是一时无法在灯光下接近城墙架设云梯的。激战达旦，红军发起拂晓攻击。北门、东门城垣坍塌的很多，虽早经修复，究不太牢固，红军攻抵城根，几乎破城而入，战斗甚为激烈。适此时顾家齐部已由古丈经过距沅陵三十里之乌宿向沅陵增援，红军恐怕遭到内外夹攻，乃自动撤离沅陵，直趋桃源属之梧溪河去了。

这时罗启疆的独立第三十四旅已于十二月六日由澧县经常德，进至梧溪河一带构筑工事。他们认为红军此刻在沅陵与我们相持，且常、桃兵力雄厚，安如磐石，红军决不敢进窥，因此未加戒备。不料红军于十二月八日主动于沅陵城下撤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梧溪河。罗旅梁軫（希华）团猝不及防，纷纷败退，溃不成军。罗启疆适在梧溪河视察工事，几乎被俘虏。红军于十六日攻占桃源，十八日早向常德进攻。罗启疆乘汽车逃回常德后，督同所部残兵及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所属齐某的保安团，堵塞四门，死守待援。何健急电催“追剿”军第七路司令郭汝栋率七十八旅（旅长王镇东）和“追剿”军第六路司令李觉率第十九师附独立旅陈子贤部以及各保安团队，星夜驰往常德解围。又派飞机轰炸进攻的红军。红军于十二月十九日由常德撤退，二十三日进占慈、庸，创造了以永顺为中心的根据地，直接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这是陈渠珍拥兵割据湘西，指挥他的部队“剿匪”的最末一仗。陈在这一仗之后，“湘西王”的宝座随即被湖南军阀头子何健搞垮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蔣軍第五十三師追擊紅軍經過

李清猷

1934年紅軍長征後，蔣介石令第十六軍軍長李韞珩（號抱冰）率部跟蹤追擊。第十六軍是一個空頭銜，實際只有第五十三師一個師，李兼任師長。軍部和師部一起辦公，不過每月可多領經費一千元。戰時，李每以軍長名義，指揮臨時隸屬的部隊。五十三師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教導師第二團，以能戰著稱。大革命失敗後，成為反動派的鷹犬。但蔣介石始終以雜牌軍視之，抗戰初期仍借故把它編併了。一九三四年追擊紅軍時，何鍵任“追剿”軍總司令，第五十三師歸其指揮，我任該師第一五九旅旅長，率部經湘黔入川康，與紅軍有過多次接觸。現就記憶所及，將作戰經過概述如后。

（一）

1934年十一月，第五十三師由江西永新縣移駐遂川，旋奉令參加對紅軍的追擊。部隊經湘南輾轉至晃縣，沿途無戰事。但聞王東原、郭思演等部曾在寧遠與紅軍打過仗，下灌的戰事還比較激烈。長途行軍，士兵落伍甚多，部隊遂在晃縣休整。

1935年三月，全師由晃縣向貴州進發，經玉屏到達石阡。某日，忽奉令限我旅於四天內由石阡趕到遵義，解第四十七師裴昌會之圍。當我旅用三天半的時間趕到遵義時，紅軍已他去。我們遂在遵義建碇（第一五九旅擬在构筑遵義以南三十里處的工事），以防

紅軍的突然襲擊。自從江西出發，每到一地我們必修建工事，駐扎的時間略長，又必建碉堡。爾後直入川康都無例外。

四月上旬，當蔣介石與薛岳正坐鎮貴陽指揮時，忽報紅軍主力向貴陽前進，駐守養龍站的第九十三師師長唐云山告急。養龍站位於息烽以北，烏江渡口以南十五華里處，距貴陽不到二百華里。當時貴陽附近無大軍駐守，因此人心惶惶，蔣介石也慌了手脚。大約是四月九日，五十三師奉令南下，並令派一個旅於一天內先趕到養龍站。電令中嚴格規定：先頭旅如限到重賞，違限重罰。師部要我率三一三、三一五兩個團先行，並將師與軍委會聯絡密碼電本交我，以便到達目的地後直接與蔣介石聯繫。遵義至養龍站一百五十華里，我以急行軍於當夜趕到，一面接防，一面分電蔣介石和李韞珩報到。次晨，畏敵如虎的唐云山，交防完畢將開息烽時，再三要求我，路上如聽見槍聲，希望我救他一救。我當時答應了。蔣、薛見我如限趕到，甚為滿意。薛岳即在電話中親交任務，要我迅速派兵占領黑神廟、盤腳營等處陣地，並囑做好工事，沉着應戰。李韞珩也專人送來一封三個十字的信（舊軍隊中，送信以划十字表示速度，划三個十字的表示飛快送到），我拆開一看，不是什麼命令，而是抄的孫中山昔年寫給蔣介石的一副對聯：“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乎仁義之中。”李書此聯贈我，意在為我打氣。

我與薛岳通話不久，與貴陽聯繫的電話綫路就中斷了，周圍也開始响槍，槍聲愈來愈密。旋據各防守部隊報告，各處多與紅軍接觸。距養龍站十五里的黑神廟且發生較激烈的爭奪戰，官兵頗有傷亡。午後，我偵知陣地前方山上尚有大隊紅軍，電請貴陽派飛機來轟炸掃射，不久即見蔣機飛來投彈。戰鬥至黃昏前，槍聲漸稀，紅軍主動撤走，養龍站之戰即此結束。蔣介石據報，要我派出小隊伍多組，手執火把，乘夜追擊，扰乱敵人，毋使遠颺。我以官兵通宵

未眠，又作战一日，疲劳已极，未照派。

黑神庙战事亦较猛烈，因此，当时后方报纸称这次战役为黑神庙之役。养龙站之战，解除了红军对贵阳方面的威胁。当时报纸大肆吹嘘，说蒋介石躬亲指挥，“追剿”大捷。甚至说，朱德总司令也被“击毙”了，等等。在我的记忆中，这次战斗并不算什么激烈。当时虽暗笑报纸过分夸张，但内心还是感到很舒服，将错就错，把它作为丑表功的资本。蒋介石在嘉奖手令中，说我“忠勇敏捷”，并奖赏四千元。李韫珩高兴地说：“李旅长的考绩，不要我操心了，委员长已经考过，以后填李旅长的考绩表时，填‘忠勇敏捷’四字就是。”

养龙站战事结束的第二天，我奉令仍率两个团向息烽西北的潮水追击前进。傍晚到息烽附近稍有接触，待到次晨，发觉红军已向底寨方向撤退。当晚复奉令向底寨追击前进。到底寨也只随便打了一下，红军又撤走了。潮水和底寨之战，红军大概是掩护性质的，所以都是小接触。但据李韫珩说，在息烽城内的唐云山听到底寨枪声，却已吓得面色惨白。由此可见一般国民党军官害怕红军的心理。

底寨战后，我旅开赴息烽南十五里的羊朗坝与师部会合。蒋介石听说红军东进，怕危及湖南，又飞调五十三师东开。我们日行百余里，到达黄平后，忽又奉令西进，还是每天走百余里，经都匀、贵定、龙里等地，于四月中旬某日到达贵阳。这段期间无战事，但路却跑够了，沿途官兵落伍的很多。特别是问路非常困难，因为贵州的集市，都以赶“场”期按地支、生肖取名，如未日赶集的便叫“羊场”（未属羊），卯日赶集的便叫“狗场”。这些羊场、狗场、牛场、马场在地图上到哪儿都有，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的目的地呢？往往走错了，更增加部队的疲劳。

我們到貴陽后，蔣介石請李韞珩部將官吃飯，应邀前往的有李韞珩、軍參謀長沈鳳威、副師長周后鋒、師參謀長陳維斌及我共五人。我們一去，他的假牙還沒安上，就快步出來迎接，對我們慰勉有加。負責接待我們的柳際明（浙江人，與我是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同學），在入席前告訴我，蔣介石請客從來不備酒，但今天却破例用酒。我想大概他對我們這些鷹犬這次的努力追逐是很滿意的。席間，蔣對紅軍大肆誣蔑，說：“共軍離了老巢，東流西竄，紀律很壞，老百姓不附和他們。這次的‘追剿’，與國軍在江西‘圍剿’時，情形大不相同。我們一定可以解決他們，你們必須有信心。”他對紅軍爾後的動向也極其狂妄地作了分析判斷，說：“目前一般人判斷共軍的動向，第一，竄回老巢。我看公算不大。第二，北竄四川，那里山高水急，人煙稀少，石達開就沒有成功，我看也值得研究。第三，盤踞盤江八屬（貴州與雲南交界的安順、盤江等八縣，稱盤江八屬）。照目前流竄情況看，也不可能。總之，共軍已陷于我天羅地網之中，我們就是要窮追猛打，不使其有喘息機會。”

蔣介石在貴州時，曾通令各部隊研究孫子兵法“挂地篇”，其中說明在挂地被圍時，要多方以誤之，意在使自己由被動變成主動。但當時蔣介石却往往為紅軍的多方所誤。紅軍機動靈活戰略戰術，敏捷果敢的戰鬥行動，常使蔣軍手忙腳亂，莫知所措。所謂“蔣的嘴，我們的腿”，意思就是說，蔣介石一開口瞎指揮，我們官兵的兩條腿就要吃苦頭。

蔣介石見我們連日行軍跑得太疲勞了，要我師在貴陽稍事休息。李韞珩對我們說：“委員長放了假，大家可以隨便去玩。”於是，我們就大吃大賭了兩天。

(二)

我們在貴陽休息了两三天，即沿安順、盤江进入云南，开抵曲靖。这时已經是四月下旬了。某日，忽报共軍率部由昆明方向北进。蔣介石电令堵击。李韞珩乃召集第五十三师和临时指揮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将官會議。会上，我主张派十三师或本旅到曲靖西三十里处的某鎮（鎮很大，是南北必經之路）堵截，重兵駐曲靖支援。李頗贊成。但万耀煌默然无言，似害怕与紅軍作战，會議遂无結果而散。不久，紅軍果由該鎮附近經過。李韞珩聞訊，仓忙率兵去赶，但已来不及了。当时我很恨万耀煌之胆小，致坐失“立功”机会。

在曲靖停留了几天，全师即北开，經东川、蒙姑，到达巧家。沿途无战事，但气候变化很大，給行軍带来困难。如未到东川时天气很热，官兵都把棉服內的棉絮扯掉变成夹衣，但一到东川，天候驟变，都冻得发抖。我們到东川时，东川县长早已“挂冠”而去，县政无人主持，我們也感到有許多不便，想物色一个东川人出来負責。正好我們在某家打牌，房东是个讀書人，對我們很客气，我們就請他出来当县长。后来龙云也真的就委派了他。

巧家县位于金沙江东岸。我們部队开到时，紅軍罗炳輝將軍部在对岸阻我过河，船只都被集中到西岸。师部临时造了一条船，令我旅强渡。我选择巧家北十五里处偷渡成功，即向紅軍据守的山头攻击。紅軍对突然而来的攻击，稍事抵抗即且战且走。我正追击中，忽奉令限我旅几天內赶到会理，解川軍刘元璋旅之围。当时，本师部队已因西岸之船而源源渡河，我遂率部向会理进发，巧家的軍事情况，我就知道了。不久，李韞珩率另旅也赶到了西昌。

我率部赶到会理，已无紅軍踪迹。据三一七团先头营营长郑鼎

报告，他先天黄昏到达时，与红军有小接触。是否属实，当时我未详察。刘元璋听说我军赶到，喜形于色。但四城仍然紧闭，派人出城要我的军队住在城外，要我从城头进去。因此，我是爬刘安排的梯子进城去的。刘为我设行轅，招待很客气。他告诉我，他在西门督战面部负伤，还说那里还有死人气味。但我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伤痕，也没嗅到什么死人气味。特别是他为了扫清射界，将城外许多民房纵火烧光，反诬蔑是红军杀人放火。当时我对刘元璋这些欺騙之詞，总是含糊应答，认为只要解了会理之围，“功劳”就算不小，还要管他红军到底围城没有，到底打得怎样干什么呢。后来，蒋介石通电全国，說刘元璋挡住了红军，守住了会理，并晋升他为中将。我想，蒋介石当时不見得不明白会理战事实况，可能是借此以籠絡川軍为他卖命，其用心是非常阴险的。

在会理稍停，又奉令馳赴西昌，解刘元璋（他与刘元璫、元琮、元璋等都是刘文輝的侄子，均第二十四軍的旅长）之围。我到西昌后，始知红军根本未到西昌。当刘元璋出城迎接，陪我进城时，約有数百名老百姓跪在道旁，有头顶状紙的，有手拿状紙的。我不解何故。刘向我解释說：“西昌南門外的商場比較繁榮，可惜被红军烧光了。这些人就是告红军的。”他一面讲一面叫人喊老百姓回去。我也远远地揮手要他們回去，并說一定替他們伸冤。我心里很明白，红军是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絕不会烧老百姓的房屋，何况红军并未到西昌呢。我想起当年自己在江陵打紅六軍，放火烧了沙岡，但上报說“匪焚沙岡而逃”。反动军队大都是这样无耻的，老百姓向我告状，自然毫无作用，我管不了，也不会去管，各色反动派都是一鼻孔出气的。

刘元璋为什么要謊报红军围城并烧毁民房呢？問題很简单。当时川軍为了应付蒋介石，或者向蒋介石邀功，多謊报軍情，常发出

告捷电报，說在某地击退紅軍，或攻占某地，等等。刘元璋既請派兵解西昌之“围”，所以也要制造一些战后的惨象以矇蔽外人耳目。因此，老百姓就遭殃了。

(三)

1935年六月，我师由西昌出发，經礼州、泸沽到冕宁县后，即經彝人区到达安顺場。因长期的民族压迫造成的民族隔閡，通过彝人区是頗有困难的。但因川軍某团原已捉了他們一个重要首領作人质，有問題就叫他下令命解决，所以我們能順利通过。到安顺場后，李韞珩率另旅赴康定；我旅則过大渡河，再北出富林，开抵泸定县。当时听說有一部分紅軍要在西藏立足，蔣介石要我师暫留西康。我們的布署是：师部及一五七旅駐康定，我旅所屬之三一三团駐康定北之大炮山，三一七团駐瓦斯沟，我率三一五团駐泸定。当时，川軍有十个团駐丹巴，由旅长余某指揮。川軍刘元璋旅駐金湯县。这些川軍都临时划归李韞珩指揮。

我到泸定时，发觉这里也出現了会理、西昌同样的情况：房屋烧光了，只剩下一个县衙門，泸定桥的鉄索也砍断了，两岸交通断絕。县长张純嘏又把这罪过强加在紅軍头上，說房屋是紅軍烧的，鉄索是紅軍砍断的。我也沒去管这些，只是征集竹子編成蔑索，架了蔑索桥，沟通了两岸交通。

十月，紅軍来攻（据說是朱德將軍指揮的），駐丹巴一带的川軍十个团首先被击破，金湯的刘元璋仅以身免。紅軍乘势繼續南下，川康大震，蔣介石急調薛岳率部馳援。某日，紅軍先头部队与我駐四及的三一七团一部接触后轉而进攻泸定，在泸定北十五里处的九叉树与我三一五团守兵接战。我一再增援，經過几度冲击，終于穩住了陣地。紅軍主力經天全、蘆山与薛岳部打了一仗后，分兵

攻泸定，与我相持至十二月，紅軍始撤兵他去。同时，大炮山方面也屡有接触，我軍都能守住陣地。泸定解围时，我指揮三个团在泸定北的昂州邀击，頗有“俘获”（大約“俘获”百余人，步槍二百余支，机槍二挺）。泸定战后，我旅集結康定附近，我兼任康定警备司令。

1936年四月，紅軍朱德、徐向前两將軍率部南下，任弼时和贺龙將軍率紅二方面軍北上，西康大为震动。李韞珩令我旅西出雅江。我軍經折多塘、东俄罗它、高日寺山等地西进，在雅江城西六十里处与紅軍接触，四月六日攻占雅江。此后即与紅軍对峙于雅龙江，直到六月十三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我軍强渡成功，紅軍他去，战事始結束。不久，我率部回駐康定。当年十一月，部队离开西康，开駐重庆，追击任务即告結束。

战事結束后，李韞珩去見蔣介石，蔣要他将追击紅軍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李回部队即組織編纂委员会，派駐渝办事处主任凌元洲（湖北蕪春人，一九五三年病故）主其事。以各次战役經過为主，并多方搜集沿途民情风俗、兵要地志等資料，写成《西征紀录》一书。这部书如果还能找到，对研究国民党的反共軍事史料，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參事室供稿）

何鍵在湖南的搜刮概況

刘岳厚 毛倜群

甘 融 左仲文*

何鍵統治湖南时期，为了維持其不断增大的軍費开支，以及滿足个人欲壑，曾巧立名目，大肆搜刮。田賦方面，除正供外，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同时征收苛捐杂稅，一再加征盐稅，向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剝削。这样敲榨勒索仍不滿足，又征收特稅，发行公債，开办銀行，盜卖矿砂。掠夺的巨額現款，大部进了私囊。我們当时都在湖南工作，現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經历和見聞，并參閱了有关史料稿件及当时的报刊資料，写成本文。錯漏在所难免，希望目睹身受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苛重的田賦附加

苛征田賦，是何鍵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一种毒辣手段。湖南在何鍵統治时期，田賦附加特多，情况十分严重。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长沙《国民日报》（省政府机关报）公布的材料，田賦附加与正賦比較，大部分县每正供一元附加四元左右，有些县的附加在五元以上。新化、道县、新田、宜章、临武、临澧等六个县的正供賦額

* 何鍵主湘时期，作者刘岳厚曾任省公路局局长，毛倜群曾任省保安司令部团款清理专员，甘融曾任长沙营业税兼产销稅局局长，左仲文历任西路軍总部监护处总务主任、常德分处处长。

共計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五元，附加額竟達九十四萬七千七百一十一元，為正賦額的五點三六倍。其詳如下表：

縣 別	正賦額(元)	附加額(元)
新 化	41,228	202,707
道 縣	37,707	204,248
新 田	25,193	121,213
宜 章	19,995	107,976
臨 武	27,261	146,000
臨 澧	25,111	165,567

以上材料，錄自何鍵的御用報紙，實際附加數額并不止此。如據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長沙《市民日報》載，慈利縣田賦每兩正供附加團款十元，地方費二元六角、學款一元，共十三元六角。這是經省方核准有案的。實際上在核准附加之外，又有臨時特別捐，計一九三二年每兩正供附加共收六十元；一九三三年附加仍有三十九元二角之多。

隨田賦正供征收的團款附加，何鍵規定由各县匯解省保安司令部。有的縣份則由各区保安司令、保安團長直接派兵坐催逼繳；稍有遲緩，即令槍兵到處搜捕。團款附加不僅隨各县田賦加征，並擴大到其他方面。一九三四年，第四區保安副司令陳子賢（李覺兼區司令，陳負實際責任）在洪江設卡征收竹木稅，名為繳解省庫，實則收歸自用。省保安司令部知道後，馬上派員前往成立團捐監收處。該處在洪江征收過境竹木稅，每月可收到二三十萬元（稅收旺日可達萬元以上），全部解送省保安司令部經理處。後因陶廣的反對，才不得已取銷了。

團款附加之外，又有所謂路款附加，由財政、建設兩廳分區派員查提。何鍵借修筑七省聯絡公路名義，從一九三三年起，在田賦

項下加征路款三成，實際上修路已有的款（棉紗附加、鹽稅附加、公路營業收入及中央補助，等等），這裡不過是巧立名目，加重勒索而已。

據文斌提供的材料，除了田賦正供附加之外，建設廳還征收所謂湖田草山執照費，在滨湖地區設立了南華安、常漢澧、湘岳沅三個征收所，大約每年可收二十萬元左右。

種種苛捐雜稅

何鍵取得湖南政權後，採取各種手段，征收苛捐雜稅。一九三〇年七月紅軍攻占長沙，旋即退出。何鍵在事後以構築城郊防禦工事為借口，強迫人民繳納“要塞捐”。並成立善後委員會，派員向各縣勒索所謂“善後捐”，雖湘西邊遠縣份亦不能免。一九三一年春，國民黨政府宣布取消厘金及類似厘金的一切捐稅後，南京財政部月撥湖南裁厘補助費十萬元，後增至二十萬元。何鍵貪心不足，除開征營業稅外，並巧立名目，征收各種稅捐，無異變相恢復了厘金制度。其苛細程度，超過厘金遠甚。據當時的統計材料，湖南各縣除正稅之外，普遍增設的附加稅有苗捐、房捐、教育捐、團防捐等多種。此外尚有醴陵的土瓷消費稅，茶陵的竹木捐，瀏陽的紙塊捐，乾城、鳳凰的白沙貨捐，長沙市的碼頭捐、堤工捐、鋪戶捐、筵席捐、警捐、花捐、乞丐捐，等等，名目繁多，列舉不盡。就中如堤工捐一項，據文斌回憶，建設廳每年可收二十餘萬元（一九三一年冬催收積欠，一次收回二十萬元），實際上均被挪作他用，並未用之于修堤。弊竇之大，尤為驚人。如經征人員楊某，貪污中飽竟達數萬元之巨。

一九三一年六月，何鍵以財政積虧，政費支絀為理由，通令各縣開征出產稅。到了十一月間，又擴大為產銷稅，規定無論外省輸

入、本省輸出以及行銷本省境內的大宗物品如竹木、茶葉、紙張、煤炭、石灰、雜糧、麵粉、南貨水產、藥品、綢緞呢絨布匹、磁器料貨、皮毛、牲畜、五金及其製品等，都要征收產銷稅一道。產銷稅開征後，各處設立征收、查驗機構，其稽征手續與厘金大致相同，無異厘金局卡的復活。如原來設有厘金局的三汊磯、岳陽等處，都已掛換招牌，恢復原狀。凡商船經過，勒令停泊，納稅後始准通行。這種需索留難的行為，過往商旅怨聲不絕，而財政部門則生財有道。省財政廳常常在不得過關的時候，就要長沙產銷稅局開出期票，交該廳會計主任譚漢初持向各大錢莊拆現應付。當時譚漢初的實際權限，等於省金庫的經理。出進幾百萬元的單據，常常夾在他的皮包里。

產銷稅最初開征時，何鍵曾表示這是由於財政已陷絕境，出於不得已的苦衷，原係一時權宜之計，到相當時期即行撤銷；省建設廳長譚常愷也在南京向湖南同鄉解釋，“此項產銷稅之設立，系因中央補助湖南政費，業已積欠四月有餘，常款無出，故臨時有此辦法。如果中央能照常協助，則此稅即可停征。”結果如何呢？連續征收了好幾年，並未裁撤，而且變本加厲，更加苛刻。如借口“清剿匪共”，挪支庫款甚多，從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起，全省產銷稅加征二成，以一年為限。此項加征之款，不另填給憑証，即於稅票上加蓋“征抵補清剿墊款二成”戳記。一年之期將滿，又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宣布繼續征收，俟墊款清償，再行停征。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起，又以“團餉積欠甚巨，無法彌補”為理由，在產銷稅項下附加一成，連前共加三成。據估計，全省產銷稅收入年約五百多萬元，附加款項尚未計算在內。

何鍵一再宣布延續和加征產銷稅，當時引起了各方公憤。省商會聯合會以及各县商會，紛紛呈請減免；旅寧（南京）湖南同鄉會呼呼和制止；監察委員羅介夫、于洪起等提出彈劾；地方報紙也有著

文抨击的；所有这些，何鍵都充耳不聞，并且征斂繁重，更甚于前。

在开征产銷稅的同时，何鍵又征收了船捐。全省木帆船每年須納捐两次，捐額按船只大小繳納，分二、四、六、八元四等，由各地产銷稅局代征。

一再加征盐稅

一九二九年，何鍵的第四路軍剛編成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即核定由湖南盐稅項下每月平均撥发七八十万元，烟酒印花稅每月約六万多元，也悉数撥抵軍費。后来何鍵派參謀长刘膺古往南京請求增发，結果确定由盐稅項下月撥九十万元，烟酒印花稅照旧撥付。

一九三二年一月，何鍵又借口軍費支絀，大規模加征盐稅軍事附加，計每包附加二元五角。他在省政府扩大紀念周上說：“值此时局变化未定，邻境匪氛猖獗，为保全全省治安計，未雨綢繆，舍附加盐稅外，别无他法。……不得已，乃于盐稅項下附加二元五角，以为清理积欠之用，以一百五十票为限。”与此同时，还宣布盐稅附加公路捐每包五角。按，每盐一票，計四千包。每包加征軍費及公路捐共三元，一百五十票总計应征收一百八十万元。各地奸商探知盐稅将加征軍費，串通先期发售，从中漁利分肥。如省方所派委員龔光守到沅江后，利用职权，先夜售盐，提前出仓，加价发售，故意縱使商人瞞稅。因此，在除夕那天，籬夫挑运盐斤，彻夜不息，自一九三二年元旦日起，沅江各商店盐价每斤突漲三分，直接受害的当然是广大老百姓。

配合这次加征盐稅，四路軍总部下令設立緝私处三处，由当地駐軍負責查緝。其中岳澧緝私处由第十九師經理处长江国章兼处长；衡永郴緝私处，由第十五師經理处长张干群兼处长；宝新緝私处由

監護大隊長謝龍兼處長。各地緝私處成立後，更增加了軍隊利用槍杆子向商民敲榨勒索的機會。剛剛宣布加征鹽稅，四路軍總部就以舊历年關密邇，準備清餉一月為理由，通知權運局派銷引鹽三十四票（一十三萬六千包），限在十天內將派銷引鹽的正稅附加全部繳解總部經理處。

這次加征鹽稅，本來規定以一百五十票為限。實際票額早滿，並未明令取消。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軍事附加仍在征收。不但如此，還加征了地方附加。據這年六月四日長沙《市民日報》所載，湘岸鹽稅一九三四年度地方附加，已經省府核定為二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元，其中教育附加一百二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慈善附加六萬一千七百七十三元，公路捐六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元，淮鹽加余斤稅及貼邊費共一百零五萬一千二百八十三元。連同撥作軍費的正稅約一千二百萬元，全省負擔鹽稅共達一千五百萬元。除這以外，各县鄉鎮地方借辦教育或公益事業名義自行附加者，尚不在內，估計數目也不小。

粵鹽銷湘，向系自由競賣，商民稱便。何鍵在加征鹽稅的同時，又利用粵商泰利公司包運粵鹽，以圖肥私。泰利公司壟斷入口粵鹽，使競賣變為專賣，任意抬高市價，影響民食，並且直接妨礙几十万粵鹽挑販的生計。當時，湘南各界代表蕭度、黃士衡、陳九韶等再三要求何鍵明令撤銷，并向南京政府呼喚，何鍵概不理會，照常發包奸商承運。

包運鴉片，征收特稅

在何鍵統治時期，湖南雖不是主要出產鴉片的地區，但湘西一帶栽種罌粟，勒收苗捐，為數可觀。而雲南貴州兩省鴉片的運出，絕大部分都要假道湖南，經過洪江、邵陽再轉銷華南及長江下游各省。

因此，征收鴉片烟稅，即所謂特稅，也是何鍵的重要財源之一。

一九三〇年起，南京政府財政部在邵陽設立“清理湖南特稅處”，征收特稅，每次烟幫到達，都由四路軍總部派兵護送。何鍵則派四路軍總部三等軍需正歐正榜坐駐邵陽，經收護運費。到一九三〇年十月底止，就收得護運費二百七十多萬元。繼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邵陽設立四路總部監護處（唐贊宇任處長。一九三二年三月，與特稅處同時遷駐長沙辦公），規定烟土護運費每担征收一百八十元至二百元，所有護運費均直解四路軍總部。監護處初期設有洪江、常德、津市等三個分處，武岡、綏寧、汝城、益陽等四個辦事處以及數以百計的查緝所。

一九三二年春，湖南特稅處、四路軍總部監護處所屬各分處一律合併，改設洪江、邵陽、常德、津市四個分處及益澧、郴州、汝城三專員。在監護處未成立以前，烟幫經過每個部队的防地，須向駐軍繳納防地費每担自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名義上也叫護運費。監護處成立後，四路軍總部通令各地駐軍，不得私收防地費及護運費等。最初各部队尚多陽奉陰違。一九三一年，第十九師李覺部在益陽征收防地費五六萬元。烟商持收據向監護處抵稅，監護處除照數扣抵外，並報請四路軍總部在該師軍餉內扣還。此後其他各地駐軍即不敢效尤了。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底止的一年零九個月中，監護處共計收得護運費八百八十多萬元，均陸續解繳四路軍總部（監護處次任處長張崗鳳、末任處長王家鼎經收護運費數字更大，無法估計）。此外，在一九三二年春，何鍵又借口軍費支絀，向南京政府爭取，分得湖南特稅收入之半數，以資挹注。其時全省特稅收入每月約為四十至六十萬元，何鍵分得二三十萬元。

一九三三年夏，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設立十省禁烟督察處，名為禁烟，實系收稅。清理湖南特稅處改為禁烟督察處湖南分處，四路

軍總部監護處依然存在。湘境特稅前次劃歸四路軍作軍費的，仍照原來協議不變，僅所屬基層稽征機構有所裁撤。

為了護運鴉片毒品，何鍵專門成立了一支武裝部隊，在湘黔邊境和洪（江）邵（陽）綫上進行武裝護送。一九三〇年冬，何鍵派醴陵人謝龍在邵陽成立四路軍總部監護大隊，下轄九個步兵中隊及三個重機槍中隊，全部兵力相當一個正規步兵團。一九三一年冬，大隊部由邵陽移駐洪江。以後雖在一九三二年春撤銷監護大隊番號，改為第六十二師一八五旅三七〇團，實則換湯不換藥，照常擔任武裝護運工作。鄒繼衍回憶當時護運煙土的情況，說：由貴州下司到洪江一段，一般採取水路運輸，以下司為航行起點，利用當地特制的狹長輕快的苗船裝載，沿沅水直達洪江，部隊隨船押運。煙土集中洪江後，通常經龍船塘、岩鷹、司馬、涼山三界到洞口，然後直達邵陽，每幫數量，多則一千多担，少亦四五百担（每担老秤一千兩），護運部隊少則兩連，多至一兩營，沿途警戒，如臨大敵。邵陽以下，無論運銷兩廣或武漢，水陸都較平靜，戒備不如前段緊張。由長沙雇船運往武漢的，船上挂有四路軍總部差輪旗幟，押運部隊持有四路軍總部的護照，以違禁品冒充“軍用品”，竟能暢行無阻。

發行救國公債及建設公債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我國山海關，繼而大舉進攻長城各口，沿長城綫駐軍配合義勇軍奮起抗戰。這時，何鍵認為搜刮發財的機會到了，揚言準備出兵抗日，舉辦救國借款及救國捐。後來又將救國借款改為救國公債，用途限於抗日“剿匪”。根據當時的統計材料，救國公債總額三百萬元（原議發行五百萬元，後核減為三百萬元。名為救國公債，實際上並無債券，只發了臨時收據），經募時另由各县在田賦項下抵列公費六萬九千四百二十一元，合計

三百零六万九千四百二十一元。其中长沙市公債派額六十萬元，按当时人口計算，每人平均攤派將近二元；长沙、湘潭、衡陽等县債額各为十二萬元，常德县債額九萬元，債額在六萬元以上的有醴陵、益阳、湘乡、邵阳、衡山、澧县等县。一般群众除輸納正額及公費外，其余如征收員伙食招待費及額外需索，为数也不少。

这次公債发行时，正值各地灾情严重，农村經濟破产，商場凋敝。何鍵又借口前方“剿匪”軍需浩繁，派兵坐催，急如星火；繳納稍迟者，即由槍兵綁进衙門。广大人民迫于国民党軍閥淫威，不得不竭其膏脂，以图苟全性命。岳阳黃沙街彭家岭中医吳朴初被攤派公債一百多元，因槍兵上門催索，只好卖掉一石多田，湊足繳清，而区长江与民富甲一乡，却未派銷分文。长沙市药业、紙业、米业、苏广南货等业公会委員黃菊翹等八人，因各业攤派債額过重，要求减免，措詞稍为激烈，即被省会警备司令部于十一月十八日逮捕押解江西萍乡西路軍总部訊办。黃菊翹等被捕后，虽經长沙市商会呈請释放，《市民日报》一再发表評論呼吁，国民党官方一概置之不理，直至十二月初始释放回省。何鍵对中小商人雷厉风行，但对豪商巨紳則又采取优容政策，不敢得罪。长沙巨商傅南軒派額三萬元，仅繳五千五百元了事；李某派額兩萬元，亦仅繳五百元。

何鍵拖欠了所屬部队軍餉，把各县应繳的債款直接抵解部队餉糈，通知各部队自行派遣員兵坐追。如在邵阳所派債額中拨付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五万二千元；安乡、南县各派銷三万六千元，全部拨作第十九师李覺部軍餉；攸县公債項下，划拨第二十八軍司令部二萬元，第一縱队司令部一万二千元；湘阴派銷公債五万四千元，指定拨解第六十二师陶广部四万五千元；新化派銷三万六千元，也全部拨給陶广部；道县債額二万七千元，拨給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

各地派銷巨額債款，无力負担，紛紛請求减免。单是在长沙各

报上陸續发表的文电，就有三百多起，可見民怨沸騰，閭里騷然之一斑。

何鍵在天怒人怨中发行救国公債，勒索了三百多万元。他貪心不足，又于一九三四年呈請国民党行政院批准，发行建設公債一千万元。他的最初企图是自己掌握公債的保管权和使用权，美其名为投資“建設”，實則妄想挹注軍政費用。不料行政院在核准湖南发行此項公債时，明确規定除以一部分抵还前湖南省政府积欠銀行旧債外，其余悉數作为建筑邵阳桃花坪至洪江的輕便鐵路之用。并規定筑路工程由鐵道部派員主持，經費应存儲中国、交通、上海各銀行及湖南省銀行，由行政院指定政府人員及金融实业界領袖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實則所謂銀行旧欠三百多万元，原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中国銀行派江苏人沈誦之来湘筹設分行时，向赵恒惕政府貢獻的一笔政治費用，既无約据，又无抵押品。現在，中国銀行利用何鍵請发公債的机会，勾結行政院批准收回这笔烂帳。上述輕便鐵路虽未动工兴建，何鍵也惹出不少的麻煩。建設公債核准发行后不久，曾养甫来到长沙督修湘黔公路，他借口这条公路关系“剿匪”軍事，必須加紧进行，限期完成。至于筑路工程費，可以拿湖南发行的建設公債去抵借。結果湘黔公路修筑竣工，絕大部分費用都是拿建設公債抵押支付的，本息合計近两百万元，而南京政府对此項筑路工程用款，仅仅颁发了二十万元。

据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南京《华报》所載：湖南省财政厅长何浩若报告湘省財政現况时供认：“……省政府呈准发行建設公債一千万元，現已抵押借款者，計票面額約八百余万元。現存額不足二百万元。”何浩若将上述債款列入前任财政厅长张开建亏欠数內，而筑路費用不过一百七十多万元，仅为抵押借款的五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何鍵还是通过建設公債的发行，捞到了一大笔橫財。

开办銀行，操縱金融

何鍵通过种种手段，搜刮到大量贓款。他把这些贓款投資到金融界，在省内外大办銀行，倚仗官僚資本的优势，进一步大发橫財。

首先是勾結改組派恢复农商銀行。何鍵在一九三三年前后，探悉原在北京开业的农商銀行停业已久，仍保留有发行鈔票之权。他认为有机可乘，随即指使四路軍总部駐南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与該行旧股东陈卓甫等联系。同时勾結南京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改組派巨头），并运动财政部有关人員，使該行获准在上海复业。經過三方面协商（陈公博、何鍵、农商銀行旧股东），各出資一百万元作为复业基金，在上海宁波路租用一栋新建大厦，設立总管理处。总行之下，又在上海、杭州、汉口、长沙等地設立分行，除經營一般銀行业务及发行鈔票外，兼做投机买卖。該行复业后，由陈公博任董事长，实业部司长梅哲之任总经理，张慕先任协理。汉口、长沙分行的經理，都是张慕先的亲戚；上海、杭州分行的經理，則属于陈公博和旧股东方面。总行陸續发行了一元券一百多万元，仅此一項，获利不少。何鍵认为此举既勾結了改組派，又插进了銀行界，一举双收，确是得意之作。后因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不許私营銀行发行鈔票，該行在停止发鈔后，又經營了一个时期，始宣布歇业。歇业后，所有資金及利潤，在拆股的形式下分了贓，何鍵尝到了甜头。

大約在农商銀行复业的同时，上海有一家大中銀行，是安福系巨头李思浩任董事长，由他出面經營的。何鍵見財起心，通过张慕先的关系与之勾結，投資五十万元。投資后，张慕先被推为协理，并安插了一部分行員。該行在北平、天津、汉口、长沙等地設有分

支机构，广揽军阀官僚奸商的往来，进行高利贷放，兼营投机买卖。后来继农商银行宣告歇业。何键在拆股中收回了本利。他的小老婆王仪贞，也是在行员中挑选来的。

大中银行歇业后，何键即将其长沙分行（行址设在坡子街）改牌为大懋银行。该行资金为五十万元，都是由何键及其亲族凑集的。他的大女婿李觉（第十九师师长）任董事长，三女婿殷德明任经理。经营业务以吸收省内军政机关存款，进行高利贷放为主，也兼做投机生意，攫取暴利。抗日战争前，该行不仅操纵地方金融，并在国民党的锦业统制中捞到一大笔钱。据章执中回忆，事实经过是：一九三六年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长沙成立锦业管理处，以刘廷芳任处长，规定由资源委员会提供资金，统制锦砂贸易，盈余则会、省各半。锦业管理处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操纵国际市场，存锦滞销，求售无主。这时，何键就以筹措军餉及地方政费为借口，向该处索取统制锦业的利润。刘廷芳拿不出钱来，无法履行盈余各半的协议。他与殷德明密商后，用偷天换日的手法，由大懋银行出面，在香港、长沙两地分别收购了几百吨纯锦。其中仅部分货款是大懋银行在长沙付出的贷款，另一部分则根据“盈余会、省各半”的协议，抵作应付省方的贓款。不久抗战爆发，锦砂外销转旺，何键在海外高价抛售，获得暴利，并利用这笔外汇资金，在国外大做买卖，得到巨额利润。

除了以上几家银行以外，由刘建绪为首组织的复兴银行，何键也投资不少，成为该行的大股东之一。

縱使譚常愷盜賣矿砂資敵

一九三一年七月，譚常愷由于投靠了何键，出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上台后不久，就在何键的纵容下，盗卖矿砂资敌。

湖南白鉛(鋅)砂出自水口山，錳砂出自湘潭錳礦，每年產量豐富，當時專恃日本為銷場，日方則用以製造軍用品。“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舉國共憤，一致主張對日經濟絕交。這時，譚常愷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竟將湖南所產錳砂悉數售與日本。譚常愷上台不久，沒有得到何鍵的同意，是決不敢如此胆大妄為的。這種喪心病狂的賣國肥私行為，經湖南旅滬人士通電揭發後，民情憤慨，輿論沸騰。國民黨行政院據報後，密令實業部查明具復，該部即派視察蕭弘毅來湘徹查。蕭到長沙後，曾往主管礦務的建設廳第三科及礦產營業處調查，均遭到狡詞推諉，毫無結果。後來找到岳雲中學英語教師易克崇作翻譯，往見長沙關英籍稅務司摩爾根，告以實業部派他來視察湖南實業情況，想了解一下有關礦產出口的数字。當時翻查了礦產外運的稅單，証實自“九一八”事變後，出口礦砂仍然為數不少。事後摩爾根出函詳告：自一九三一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共運出白鉛砂一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一担，錳砂十二萬零五十三担，純錫及生錫共八萬五千二百五十二担。並注明由民船火車裝運者，無法查考，以上只是海關出口的数字。同時又查出日商委託長沙同昌公司、中央貿易公司等企業單位收購鉛砂錳砂，直運武漢交貨，漢口收貨者為日商三井洋行。向例，運出礦砂，海關須查驗建設廳填發的運單，方准放行。據該廳掌管運單的技士蕭大勛証明，“九一八”事變後，共運出白鉛砂八千零五十噸，錳砂七千零一十一噸。

蕭弘毅調查譚常愷賣砂賣敵屬實後，即返南京復命。實業部據以呈報行政院處理；湖南礦業技師李昌郁等聯名呈請明令查辦，以彰國法；國民黨監察院監委羅介夫也提出彈劾；結果，行政院作出譚常愷撤職查辦，停止任用十年的處分。何鍵總綰湘政，對此賣國營私案件，不僅沒有引咎自責，反而多方為譚開脫，請求南京政府恢復任用。

搜刮来的錢哪里去了

何鍵通过以上种种手段，橫征暴斂，捞到了巨額橫財。但是，地方財政仍是百孔千疮，捉襟見肘。当时省級机关的經費，拮据万分。財政厅有时仅发三至五成，有时虽按时签发支付通知，而省金庫无款可付；甚至批明提前拨发的急款，也往往无法兌現。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派員到稅局去守候；有的将支付通知或稅局开出的期票拿到錢庄去抵押拆現。最奇怪的现象是：长沙市某些錢庄，有一个时期竟公开挂牌，收买財政厅的支付通知，照額面出六七折甚至对折付款（受害最多的是教育界）。錢庄拿了这种通知，又轉卖给亏欠公款的人，如数抵还欠款；或者串通稅局人員兌付，大家“混水摸魚”，利益均沾。当时省府財政窘迫，經常庫空如洗，而一般錢庄奸商却笑逐顏开，生財有道。伍蔚湘开的裕順长錢庄，积資巨万，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政費如此，軍費也不例外，各部队經常欠餉发不出。一九三二年一月，四路軍总部經理处长王翰对长沙新聞界招認，湖南各部队欠餉已达十个月之久，其中一九三〇年六、八、九三个月，一九三一年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七个月，都只发给伙食，未清餉項。后来又借口为官兵儲蓄薪餉一个月，每年仅发十一个月餉，实际上这十一个月餉也还是拖拖欠欠，从未按时清发。

民脂民膏刮尽了，軍政經費发不出，錢到哪里去了呢？何鍵几次挪用軍餉投資办銀行，用去几百万元；无止境的揮霍，穷奢极侈的享受，也消耗不少；为了緩和外界的反何空气，何鍵对蔣介石左右亲信如戴笠、邓文儀等，汪精卫及其党羽周佛海、唐有壬等，在南京的湖南人士如譚延闓、赵恒惕、覃振等及其他重要人物，一送就是几千元到几万元；反动文人胡适来长沙“讲学”一次，何鍵送了

五千元；何鍵接設道人（段正元）來湘，送旅費一萬元，後來臨走時又送了兩萬元；雜牌軍師長李韜珩、李云杰、岳森等臨時撥歸他指揮，也以送特別費的名義，每月贈送幾萬元不等。劉岳厚組織乙派勢力為何鍵植黨營私，前後在四路軍總部經理處開支特別費達二十萬元左右，一九三六年卸任公路局長後，何鍵又送了兩萬元。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我們粗略估計，何鍵為了籠絡各方面，巩固反動政權，每年致送乾薪、三節餽贈及臨時贈送等項，至少開支一百多萬元；九年之中，數逾千萬。

何鍵除了到處用金錢賄賂和大辦銀行以外，還大置房地產。他在長沙中山东路、南門外禮賢街、北門外十間頭，醴陵關家巷、上海及香港等處，各有西式公館一所；長沙小吳門外和江西廬山，各有別墅一所；漢口青島路有購自英商的五層大樓一座。南岳山下安樂村附近，有何鍵的大片果木林，大善寺以南，有他的一處大莊園；山上磨鏡台附近，有何鍵的別墅和他的女兒、女婿們所共有的俱樂部。所有何鍵在南岳的房產、莊園、果林，均歸他所派的醴陵人吳昌孔負責經營。此外，他在南縣大通湖還占有洲土兩萬畝，在醴陵也占有不少田產。

購置房地產，為數還不大。何鍵搜刮的民脂民膏，悖入悖出，大部分都被他的家屬瓜分了。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

在何鍵的部屬中，劉建緒、凌璋、鍾光仁、陶柳等，也花了不少的錢，在各地廣置田地房產。其中劉、凌兩人在解放前卷走大批現款，逃往海外。

* * *

作者附記：

我們在撰寫本稿時，訪問了何鍵主湘時期在湖南工作過的現任省人委參事室參事文斌（曾任省府建設廳科長、湖田主任）。

吳健人(曾任省保安司令部視察員)、陳鵬南(曾在湖南特稅處工作);參閱了下列史料稿件:李大梁《湖南在反動政府時期財政之鱗爪》、文斌《何鍵統治時期財政紊亂簡況》、鄧繼衍《監護大隊回憶》、張人惕《何鍵搞銀行勾當的內幕》、章執中《何鍵摧殘湖南礦業史實片斷》、易克崇《譚常愷二三事》;初稿寫出後,政協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邀集部分老人座談,訂正和補充了某些材料;謹致深切的謝意。

我駐軍湘西時和主黔政後與何鍵的關係

王家烈

我與何鍵在蔣介石反人民的內戰中以及軍閥混戰中，在軍事、經濟方面，都有過一些勾結。謹就記憶所及，分兩部分敘述如後。

駐軍湘西期間與何鍵的關係

一九二九年夏，蔣（介石）、桂（新桂系）之戰展開前夕，蔣介石痛恨貴州省主席兼軍長周西成聯桂反蔣，遂電令雲南省主席龍雲，派兵支持貴州另一軍閥第四十三軍軍長李榮，由雲南出發攻打周西成。是年四月，滇、黔兩軍激戰於關嶺縣屬之黃栗樹、鷄公背。周西成戰死，李榮乘勝進據貴陽。蔣介石發表李榮為貴州省主席。七月，周西成的副軍長毛光翔，師長王家烈、猶國才等在遵義匯合，反攻貴陽，李榮敗走雲南。蔣介石只好電令毛光翔接任第廿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我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

一九二九年秋，蔣介石發表我為討逆指揮官，任務是率部開赴黔桂邊境老堡口，牽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後方。實際上，我只開到榕江巡迴一趟，就轉到銅仁。次年七月，我在銅仁接何應欽（武漢行營主任）來電說，紅軍由瀏陽、平江進占長沙，何鍵踪跡不明，命我部開到湘西洪江，待命前往“會剿”。正這時，原駐洪江、黔陽、芷江一帶的獨立旅（土匪受編的）旅長陳漢章，被其部下團長李國鈞刺殺，李自稱旅長。當時地方秩序很混亂。我為安定

湘西，打通入湘道路，決定先解決李部。我的部署是：由銅仁出發，經天柱，派簡文波團取道會同進攻洪江，我率直屬部隊及蔣德銘、李成章兩團取道甕洞、沱口進攻黔陽。蔣團到黔陽時，與原駐黔陽之李國鈞部隔河對戰。我以隔河對戰不能取勝，除留蔣團在原地對敵監視外，親率其餘部隊取小道迂回攻擊。走到中途，得報：簡文波團攻取洪江已經得手。我就率部跟進，於七月上旬到洪江。

我進駐洪江後，立即派部隊取道太平場，向黔陽進攻。進駐黔陽後，復派本部副官長胡德淵指揮簡文波、蔣德銘兩團進取芷江。我部走到榆市水環口，與李國鈞部又打了一仗，李部敗走，我軍跟着就進駐芷江。

我接到武漢行營通報說，何鍵率部協同中央軍反攻長沙，紅軍已退走，長沙被何鍵恢復。因此，我部無再前進之必要，就在洪江、黔陽、芷江各縣駐扎。

何鍵回到長沙後，也來電表示歡迎我駐扎洪江。此時，蔣介石已改任我為湘黔邊區“剿匪”司令。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紅軍李明瑞、張雲逸部由廣西邊境到湖南綏寧一帶活動。蔣介石來電，命我派兵協同何鍵的第十六師師長章亮基前往“會剿”。我又派胡德淵率簡、李兩團，聯合章亮基部追紅軍到武岡，打了一仗，即回原防。

通過這次反共反人民的表現，蔣介石來電嘉獎，並發給我德造九子步槍壹千枝，子彈四十萬發。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誕辰，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定我為軍隊代表，赴京出席。蔣囑何鍵邀我一路到京。我就取道邵陽到長沙，與何鍵初次見面。彼此寒暄之後，何就提出運鴉片煙的問題。緣貴州、雲南出產鴉片煙，名為特貨，常是取道四川、湖南、廣西三省外銷。所經過地方，應繳納

“产場稅”和“通關稅”，統称为“特稅”。当时“特稅”章程規定：从貴州产地販运特貨，通过湘西，到达武汉这一段，每担（一千两为一担）共納稅二百六十元至三百元。先在貴州繳納“产場稅”一百元；剩下的一百六十元至二百元，通过长沙和到达武汉时分两处繳清（长沙与武汉如何分贓，不甚明了）。南京政府为了統一特稅征收事宜，設有一个专门机构，名曰两湖特稅清理处。总处設在汉口，长沙設一个特稅分处，洪江設一个特稅检查所。据当时洪江特稅检查所的負責人統計，貴州特貨商帮取道洪江的，每年有三万担以上。我駐洪江两年中，正是特稅收入暢旺之时，每帮約有七、八百只木船，两年約有三万担，稅款在六百万元至九百万元之間。何鍵与蔣介石分贓，收入还是大有可觀。倘若改道川、桂，这些稅款，何鍵就不能染指了。

因此，何鍵对于烟土运湘，十分关切。他对我說：“湘黔唇齿相依，需要互相支持。希望你在貴州的烟土运銷方面，多多帮忙，彼此餽源都有着落。此后，你需要什么东西（指武器），我当帮助向中央想办法。”我回答說：“組織烟帮，我当尽力而为。关于武器补充，希望你支持。”（不久何鍵就命他的衡阳兵工厂，代我造了重机关槍六挺，子弹十万发。）第二天，我同他一道經汉口赴南京。

由于我大力肃清了清江河一带的土匪，使特貨运行无阻，从而增加了特稅收入，蔣介石令两湖特稅总处每月拨济我軍餉三万元。何鍵复按月拨济我两万元。

除此以外，何鍵在政治上还有利用我的一着：湘西有一个陈渠珍，他繼田应詔之后，长期割据湘西，有“湘西王”之称，一向反对何鍵，何視陈为肘腋之患，亟欲加以扼制。我駐到洪江以后，可以限制陈渠珍的势力向下湘西一带伸展。因此，我駐洪江，对何鍵的政治、經濟方面都有好处。当然何鍵对我也有好处。我与何鍵，就是

在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勾結起来的。

回黔主政后与何鍵的关系

这里首先应该叙述何鍵帮助我創設貴州航空处和建筑飞机場的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我在南京作政治活动后返洪江。次年元月，毛光翔电邀我回黔。蒋介石发表我任第廿五軍軍长兼貴州省主席。所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一职，以我的部下何知重接替。在此以前，蒋介石曾提升毛光翔为国民革命軍第十八路总指挥。我回主黔政后，本省内部意見分歧，虽力图补救，終至无法挽回，酿成毛光翔出走黔北，蔣在珍首先在遵义发难，犹国才乘虛从安顺袭击貴阳。我被迫于十二月初仓皇出走，退到榕江。不久，我率部反攻，于一九三三年元月恢复貴阳，犹国才敗退盘江八屬，蔣在珍敗退黔北正安一带。从此我和他們信使往还，貴州軍閥混战也就告一段落。他們对我口头上表示听命，实际上，西犹、北蔣受云南龙云和四川刘湘暗中支持，还是貌合神离。

一九三三年秋，我为了防备犹国才勾引滇軍再来禍黔，认为只有从湘、桂两省爭取支援。当时湖南和广西都設有航空处，长沙、洪江及柳州均辟有飞机場。我想在貴州也創設一个航空机构，建筑一个飞机場，以便与湘桂两省加强联系，既可由空中購运武器，又可借邻省的飞机来壮一壮軍威，借以吓唬犹国才，使其不敢妄动。因此我就致电貴州省府派駐长沙的代表胡霽說：“犹国才在盘江蠢蠢欲动，以致道路不靖，特貨商都不敢通行，望何主席派两架飞机来貴州助一下声威，并帮助筹建貴州航空事宜。至于飞机着陆場，有貴阳南門外团坡练兵操場，加工整理后，可以利用。”胡霽回电說：“經施，已得到何主席应允。”

一九三四年元月下旬，何鍵派其參議官鼎良為代表，由其航空處處長黃飛親率飛機師四人（我只記得裡面有一位名周一平），分駕小型運輸機二架和偵察機一架飛黔。由於湘黔兩省過去沒有航線，他們這次是冒險飛行。有一天，我接到都勻、獨山兩縣縣長的電話報告，說他們駕的飛機被迫降落，機身小有損壞，幸未傷人等語。我一面令該兩縣縣長妥為接待，一面派工協助修理，使其早日飛到貴陽；並先派汽車把官鼎良等接到貴陽。官到貴陽後，對我說，何鍵希望貴州的煙幫，源源而去，協助軍餉；何承認在蔣介石面前幫我講話。何鍵還送了我一架飛機。我首先滿足何鍵的要求，抽撥了一部分煙幫，取道湘西出口。接著，我向官提出，我想留下一位飛機師，幫助我籌建貴州航空事宜。官電告何鍵，得到何的同意，把飛機師周一平留下。我就發表周為貴州航空籌備處主任。另由周推薦一位廣東人當副主任。

幾天以後，我親自同周一平到貴陽以北的砂子哨勘察機場。因該處需占用民田太多，恐老百姓不同意；又同他到清鎮縣屬之平遠哨勘察，認為該處比較相宜。於是大興土木，著手建築，定期半年完成。所需民工，由貴陽、清鎮、平坝三縣就近征用。一九三四年七月，清鎮機場建成，舉行典禮之時，廣西白崇禧派飛機一架由柳州機場起飛，來清鎮機場巡禮。

清鎮機場建成後，在我主黔政的最後一年中，對這個機場只用過四次。第一次使用它，是在一九三四年冬月，紅軍長征初進貴州，我派仅有的何鍵贈送的一架飛機，從空中偵察紅軍行動。我在平越馬場坪軍部指揮所，接到這架飛機投下一次通訊袋，告知偵察所得情況。第二次使用它，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蔣介石派武漢綏靖主任何成濬，由重慶乘飛機來貴陽。第三次使用它，是在何成濬來貴陽一星期後，蔣介石由重慶飛貴陽。第四次使用它，是在同年五月三日，我被蔣介石逼下台，搭張學良的飛機，由貴陽飛往漢口。

解放后，这个机场因嫌太窄，已改作国防体育机构练习滑翔之用。

后我离开贵州，在南京见到报上披露：湖南航空处长黄飞，因在贵州贩运吗啡案发被捕，在南昌被枪毙。其中内幕，我事前未曾知悉。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参加蒋介石举行的京杭国道秋季大演习时，在溧阳南渡遇见十省禁烟督察处的特务头子邱国基。我问他，黄飞贩毒案，究竟是个什么情形。他说：“黄飞早就干过运吗啡的事。这次运毒到武汉，被我们发觉，将他逮捕了。关于你的事，我们早就侦察清楚了。你帮他们揩一下算了，不然还要杀好多人。”

其次还要略叙一下何键派兵来贵州，联合黔、桂军阻挡红军长征一段事实。

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旬，我在贵阳得到情报：萧克、任弼时率红六军团由湘，桂边境经湖南城步、靖县，有进入贵州模样。何键先得到这个消息，曾派朱骝襄为代表到贵阳与我协商黔、湘两省“会剿”办法，他准备派六个团的兵力参加“会剿”。同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派代表张蘊良来到贵阳，磋商“会剿”问题，他们准备派九个团的兵力。

九月下旬，红六军团果然由上述路线进到贵州锦屏附近。何键派师长李觉，白崇禧派军长廖磊，率部尾随红军之后，先后到达锦屏。我派前敌总指挥王天锡率黔军部队，联合湘、桂军，进行“会剿”。我本人随同军的指挥所由贵阳出发，到平越县的马场坪，指挥作战。先后在石阡县属之路腊、大地方和施秉县属之紫荆关一带，与红军激战了两昼夜，红六军团同红二军团在印江胜利会师后，即向四川酉阳、龙潭方向而去。我由马场坪进到石阡，在该处与李觉、廖磊等会晤。会后，湘、桂军各回本省。我与何键直接的关系到此结束。

（万式炯记录整理）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记何键在湘西设厂制造吗啡

戴季韬

何键统治湖南时期，陈渠珍割据湘西，闭关自守。何几经施展兼并伎俩，未能得逞，不得不另筹对策。何了解湘西虽产鸦片，为数不多，但邻近川、黔，当烟土输出之孔道。陈平时在其割据地区抽收鸦片烟税，作为其军政费用的主要财源。何乃以和陈合伙在湘西设厂制运吗啡为饵，企图暂时将陈羁縻，然后伺机加以解决。

一九三一年冬初，何键方面派一个与政治毫无关系、一贯做吗啡生意的刘益章（上海红帮头子黄金荣的徒弟）到凤凰牵线。刘通过他在贵州做鸦片生意时相识的陈景尧（贵州人，时任陈渠珍部军法处长）、禹清吾（沅陵木关护送处长）二人的关系，辗转向陈传达来意。陈这时还没有搞清楚刘跟何键的关系，不免有些怀疑，未作明白表示。我当时任陈的独立旅副旅长（陈自兼旅长），率该旅驻在沅陵，此刻正因他事到上海去了。陈打电报到上海，要我急速回来和他商量此事。而刘益章已在陈景尧处得到陈要我回来的消息，随即到沅陵找禹清吾商谈。禹要他在沅陵等候。我一回到沅陵，刘经禹介绍便和我见了面。在几次谈话中，他们把何键方面想和陈合作的意思以及刘和在上海红帮中颇有地位的谢宝逊（湖南人）的关系详细地谈了。刘为了取得我的信任，送了我一张他的老师黄金荣的照片；并说他曾和四川军阀范绍增、兰文斌等合伙制运吗啡到上海销售，获利甚丰，他还替范、兰在上海购运了大批武器；如果

我們同意合作，也可替我們在上海購買武器，通過何鍵的關係運回湘西。他們提到謝寶遜，這人和我們早有交往。我也了解一點何鍵同謝的關係，如：何鍵每次到上海，通常都是謝替他保鏢，外出時必乘謝的汽車，才不致被綁票；何派人上海做嗎啡生意，也得到他們這幫人的庇護。因此，我對何鍵這次派劉益章來牽綫，深信不疑，認為可以干一下。陳渠珍當時正感軍政費用支絀，械彈來源缺乏，也亟想打通鴉片出路，運銷圖利。他考慮與何鍵合作，既無損于自己的政治利益，經濟上還可得到一些好處，甚為合算。當我到鳳凰向他報告與劉接洽情形和我的意見後，他欣然表示同意。隨即於一九三二年初派禹清吾、陳景堯隨同劉益章到長沙與何鍵方面聯繫。

禹、陳等在長沙，主要是和保安處副處長宋英仲、十九師參謀長黃素符等接頭。協商結果，決定在鳳凰設廠製造嗎啡，利益均沾。但以事關“禁令”，為防將來事情暴露，可以推卸責任，雙方約定，高級人員不直接出面，一切由雙方派出的代理人秘密協商進行。

協議初步達成，禹清吾和陳景堯帶著何鍵方面新派來的代理人李厚坤於是年春末轉回鳳凰。他們將在長沙協商的結果向陳渠珍和我作了匯報。陳基本上同意協議精神，但對何鍵始終有所戒備，不願多與何方人員接觸，要我代他主持一切。

這年夏初，雙方的代理人在沅陵就設廠的具體問題，作了如下決定：一、在鳳凰設廠製造嗎啡，雙方共同負責，利益均分，嚴守秘密。二、雙方派人在湘西和貴州征購煙土。貴州方面由陳景堯去銅仁拉攏車鳴翼（毛光翔的親信師長，時駐銅仁）入伙，由車供給部分煙土。三、廠內設備和常德以上地區的運輸事宜及安全措施由戴季綽負責，常德以下由李厚坤負責。四、製造技工和上海方面的銷售問題由劉益章負責解決。

設廠籌備工作很快完成，這年夏末，在何鍵大派禁煙委員、大抓走私煙販、到處張貼“鴉片流毒，為害民生……”的韻文告示的同時，鳳凰嗎啡製造廠開始投入生產。該廠廠址設在鳳凰北門昭忠祠，由禹清吾、劉益章、翁小齋（車鳴翼的參謀長，此時車已被拉入伙）等主持，每月生產用鴉片煙土約一百餘担。後來因為運輸不便，於一九三三年夏將該廠遷至沅陵府城巷一號，由劉益章、禹清吾主持，繼續生產。為了擴大生產，不久又在沅陵的柳林溪獨立旅第三團團部內另設分廠，由李厚坤、禹清吾主持，該團團長劉鼎則負掩護和押運之責。沅、柳兩廠每月各用煙土約二百餘担。我曾到各廠去參觀過。每廠技工十餘人，都是由劉益章從上海請來的。據劉說，這些技工的制毒技術是在上海跟日本人學的，所用藥水（不知道名稱）都是日本人賣給他們的。廠內設備很簡單，只是一些玻璃制的瓶瓶罐罐。

嗎啡運出，最初是利用郵包，後來改為水運，成品在沅陵裝箱上船，由我派部隊護送到常德後，交李厚坤派武裝押運出境，轉銷漢、滬一帶，獲利極豐。但確實數字，我也不知道。

我在制運嗎啡這件事情上，如此為陳賣力，當然也有我個人的打算，無非是牟取經濟和政治利益。這在後來都得如願以償。由於伙同製造嗎啡的關係，何鍵通過新三十四師駐長沙辦事處處長張玉洲，以半賣半送的方式，賣給我步槍三百支，每枝配子彈一百發，賣價僅五十元；又准許我運回向南京軍政部賒購的德式自來得二十發手槍三十六枝，每槍配子彈五百發。以上兩項槍彈均由何派人運到沅陵。我即以這批武器成立了一個特務營，作為我的基本部隊，使我得以掌握獨立旅的實權，從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一九三四年春，何鍵忽借口製造嗎啡風聲太大，怕蔣介石責難，示意停辦。真實原因則是：何這時已根據過去與王家烈的協議，促

王出兵黔东，首先解决車鳴翼，然后合力进攻湘西。何既决定对陈实行武力解决，合伙制嗎啡的事，自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繼續下去了。

这次王家烈虽已进兵黔东，何鍵則因奉令堵击湘贛紅軍，未能配合行动。至是年底，何利用其部队追击紅軍、集結湘黔川边区的机会，一举解决了陈渠珍。何、陈合伙制造嗎啡的罪恶勾当，也就随之結束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編者按：关于何鍵勾結陈渠珍制造嗎啡的事，虽然当时双方都保守秘密，不使风声外露，但仍有一些人知道。王尚质在一篇来稿中曾提到过此事；曾任四路軍总部参謀长的彭松龄，也有所了解，并就此写过一篇短稿。

黃飛販毒被捕記

程藩斌

何鍵統治湖南期間，曾秘密設廠製造嗎啡，並使其航空處長黃飛利用飛機運毒，結果案發，黃被蔣介石槍決。此事雖曾轟動一時，但知其內幕者不多。筆者當時在湖南航空處工作，對此案有所見聞。茲記其梗概如下。

在敘述案情之前，有必要先將黃飛這個人作一簡單的介紹。

黃飛，長沙人。其父黃靜仁，在北洋政府當過財政部司長、國會議員，私囊頗裕，脫離政界後，在漢口組織中原實業銀行，自任總經理。其兄黃伯承，隨父做銀錢擋手，也做過交易所經紀人，是一個十足的市儈。黃飛出身於這樣一個官僚資本家的家庭，自幼放蕩不羈，終日與一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吃喝玩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黃飛自費赴法留學。他在法國呆了兩年，掛名學航空，實際學的是跳舞、游泳、打撲克拳這類玩意，航空技術並沒有學到多少（直到當了湖南航空處長以後，才勉強能夠單獨飛行）。黃飛回國後，在上海混了一個時期，結識了一班買辦商人，更大過其荒淫無恥的生活。通過朋友左紀楨（醴陵人，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惡霸，解放後被鎮壓）的關係，結識了第十九師師長李覺，經李轉薦於何鍵，在四路軍總部搞到一個閑差事。

一九三〇年紅軍再度進攻長沙後，何鍵一心想在湖南辦航空事業，而苦於不得其人。黃飛乘機吹噓自己在法國學過航空，一再向

何条陈举办航空事业的必要，表示愿为效忠；同时拉攏何左右有力的人代他进言，并得到李觉的支持。一九三一年五月，湖南航空处成立，黄被任为少将处长。

航空处向美国买了十多架飞机，除有两架较大的运输机外，其余都是很小的教练机。这两架运输机时常被用来贩运毒品。黄飞奉何键之命，曾多次去贵州从事运毒勾当，也曾去过上海，每次都由队长林安駕駛飞机，連机械員也沒有带一个，行动是鬼鬼祟祟的。

一九三四年七月間，黄飞与林安駕駛一架去貴阳，几天以后即回到长沙。隔了两天，我到落星田他的家里去看他，只見他行色匆忙，說有事还要到上海去一趟。翌晨，他和林安及他的小老婆一同坐飞机走了。据在机場目睹的机械員說，他們三个人上飞机时带了两口大皮箱。过了几天，传来消息，黄飞在汉口被捕了。其經過情形，根据当时的傳聞，綜合文心珏（时任十省禁烟督察处科长）的回忆，大致如下：黄飞一行所乘飞机，原来只打算在汉口机場稍停，加油后即飞上海。因黄的小老婆要在汉口看朋友，遂决定在汉停留一天。禁烟督察处（設在汉口）事前得到长沙方面的密报，知道何键将有一批毒品經武汉运往上海，于是在武汉水陆交通要点遍布眼線，严密查緝。当黄飞一行在汉口机場下飞机后，即有便衣偵探尾随監視。黄等住汉口特別区两仪街总商会招待所。禁烟督察处便于当天晚上派武装部队会同当地公安人員将黄寓所包围，进行检查。从黄的住房床下搜出皮箱，打开一看，內藏嗎啡一百五十包，每包重十两，共重一千五百两（价值約九万元）。在贓証俱获的情况下，黄飞犹故作鎮靜，并摆出官架子，威駭緝查人員，說：

“这是何主席运到上海去制西药的，你們一錢也动不得！”緝查人員心中有数，沒有理他。他見威駭不成，又改了一套腔調，說：“都是自己一家人，凡事都好商量，何必这样为难呢！”緝查人員也沒有理

他这一套，而将他和林安連同查获的毒品一起带到禁烟督察处去了。

黃飞販毒案破获后，轟动了武汉三鎮。消息传到湖南，何鍵惊恐万分，当即派人到武汉进行活动，企图求得圓滿解决，即使不能将贓物归还，最低限度也要使黃飞获释。徐家棚警察局长匡新之（湖南醴陵人，何鍵的同乡）为何鍵大卖气力，积极向禁烟督察处活动。傳聞何鍵曾以湖南产的鴉片給予禁烟督察处公卖，作为了結此案的交換条件。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鴻頗为所动。該处緝私主任邱开基（軍統特务）則坚决反对妥协，主张将全案解送南昌行营訊办。他认为这样既可表現工作成績，向蔣介石邀功固宠，又可得到巨額獎金，鼓励緝私人員。同时，武汉的輿論，特別是一些反对何鍵的人，也主张此案应予严办。李基鴻在內外压力下，只好將黃飞等解送南昌行营。案子演变至此，何鍵自知將被牽連，洗刷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替黃飞求情了。他曾暗中托人向黃示意，要他独自背起这口黑鍋，不可牽連別人，以便徐图挽救。

这年十月，湖南航空处奉令撤消，归并中央，我們也到了南昌。当我们去看黃飞时，他仍泰然自若地对我們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現在各方面都在替我想办法。老太爷（指其父）已托人請孔部长（孔祥熙）向委員長（蔣介石）說情，大概沒有多大問題，不久即可出去。”可是就在十二月間，黃飞終于被槍決了。

据聞，蔣介石对黃飞販毒一案，明知牽涉何鍵，在处理时不无顾虑。由于湖北省主席張群力主懲一儆百，以利禁政的推行，蔣才决定將黃槍斃。黃案结束后，何鍵有苦难言，內心頗为不滿。蔣为了安定他的情緒，曾派邓文儀来湖南进行疏通。不久，又以邱开基对部下貪污失察为借口，將邱撤职下獄，实际也是敷衍何鍵的面子。蔣介石的奸詐阴險，固屬人所共知；邱开基以办黃案而招禍，則是做梦也沒有想到的。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何鍵解决陈渠珍经过紀略

王 尚 质

一九二九年，何鍵取得湖南政权以后，亟欲統一全省軍令政令。时陈渠珍以湘西屯边使和独立第十九师师长掌握着四个团的基本部队，加上招安部队共約一万五六千人槍，割据湘西，負隅抗命。他将嫡系部队集中于老巢凤凰附近，而以杂色部队分駐各县，严密戒备；同时与南京方面的反何人物賀耀組等互通声气，通过他們同蒋介石直接拉上关系，致使何鍵惴惴不安。尽管何、陈在反共反人民方面是一致的，但在爭权夺利方面存在着尖銳的矛盾。何視陈为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后快。经过几年的反复曲折的斗争，何鍵终于达到了改編陈的部队和迫使陈离开湘西的目的。其经过大致如次。

何鍵上台之初，立脚未稳，复忙于“討桂”和应付紅軍，无暇顾及湘西，对陈渠珍不得不拉一把。他了解陈对地方性的职銜較有兴趣，乃投其所好，繼續安排他为省政府委員，并将独立第十九师的番号改为省防軍第一警备司令部，任陈为司令，允許他的部队駐防湘西。何此举的目的，在于籠絡和利用陈，防止他和蒋介石勾結。陈的独立第十九师的番号，虽系蔣所給予，但部队并未得到蔣的补給。因此，对何所給第一警备司令部名义，欣然接受。

陈部原来实有人槍，已达一万五千以上，因为受了蒋介石的限制，沒有全部上报。改为第一警备司令部后，他便将部队正式扩編为五个团（警卫团，戴季綽任团长；教导团，黃光炎任团长；第一、

二、三团，陈运夔、顾家齐、龙云飞分任团长），另外还编了永顺、龙山两个县的保安团和永绥、保靖、桑植等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以后陆续有所发展。何键对陈扩编部队，最初采取默许态度，因为他了解陈的实力早已超过编制，不如让它公开，比较易于控制。但陈将部队扩编起来以后，他又感到不安，企图用剋扣餉械的办法，加以限制和削弱。陈不顾这些，仍大肆招安，并自筹餉械，不仰给于何。何对之亦无可如何，唯一的办法，只有命令陈部参加“剿共”，暗中釜底抽薪。何首先想利用戴斗垣进行内部分化，委戴为湘西“剿匪”指挥，驻常德堵住湘西大门，以牵制陈，并相机进取。戴原系陈的旧部，早年因谋独立发展而与陈脱离，辗转归属何键。他也明了何的阴险用心，此刻仍有意联陈防何。为了消释前嫌，他派胞兄戴恢垣（时任戴部团长）和他的参谋长戴鸿勋赴凤凰与陈洽谈。戴季翰（时任陈部团长）亦以和戴的宗族关系参与斡旋。结果双方达成谅解，愿意互为支援。一九三〇年八月，红军再度进攻长沙，何键企图顽抗，急调戴部增援。戴在当时，既不能抗命不动，又恐部队调开以后，常、桃防地将被何键乘机夺去，自己进退失据，乃商请陈，趁何全力对付红军，无暇西顾的时候，派部队进驻常德，协助其留守处控制常、桃地区；自己则遵令率部开往长沙（不久，戴在浏阳文家市被击毙）。陈固早有意向外扩张，于是派戴季翰率警卫团立即由沅陵开往常德。何键对陈此举大感不安，乃借口南县、华容告急，严令戴团即日离常，开赴津市、澧县，待命向南、华增援。陈以自己的部队，既已远离老巢，在“剿共”的命令之下，又不便撤回，只得命戴团开赴津澧。但又恐该团孤军远戍，遭受不测，随又派陈运夔率第一团由永顺开往澧县策应。戴、陈两团在第一次津澧战役中，被红军歼灭过半，陈团损失尤大。陈渠珍闻讯，坚决要两团撤回湘西。陈运夔拒不撤退，戴季翰则率部撤到沅陵。不久，在

第二次津滬战役中，陈团被红军围困于滬县，处境危殆。陈渠珍迫不得已，派田少卿、张晋武两个团和周燮卿、顾家齐两个旅前往解围。何键又命陈部援兵归李觉指挥，参加杨林市之战。各役陈部损失很大。何键利用戴斗垣分化陈部的企图虽然没有实现，但借“剿共”削弱陈的力量的目的总算初步达到了。

陈渠珍在所部参加“剿共”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又得不到何键的补充，眼见实力逐渐削弱，不得不急谋补救。他一方面继续收编地方武装（土匪），以之与红军周旋，而将嫡系部队控制于凤凰、沅陵一带，进行整训补充，以保存和扩充实力；一方面以“剿共”为借口，通过贺耀组等人的关系，直接向蒋介石要求补充接济。

贺耀组是一向反对何键的人，亟想伺机取代何键，回湘主政，因而也需要陈渠珍的支持。一九三〇年秋，南京方面反何的人，抓住何键两次弃守长沙这一弱点，对何大肆攻击，何键处境相当困难。贺亦认为时机已至，积极进行活动。时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贺任徐州行营主任兼新兵招募训练处主任。他一方面向蒋请求给陈以新的番号，补助其餉械，准其扩编部队；一方面示意陈拥他回湘主政。是时，我在南京中央军校高敬班受训。贺派我为招募委员，回湘西募兵，并托我带信给陈。信的末段说：“湘政不纲，万方同慨，苟可以替代贤劳，以图补救，则亦私心之所祷愿也。”他的秘书贺炳青对我说：“贵公（贺耀组号贵严）希望陈先生打电话给谭院长（谭延闿，时任行政院长），这是他要你回湘的主要目的。”这年八月，我回到湘西，向陈转达贺的意思，陈慨然同意，立即电谭，请推荐贺回湘主政。蒋介石虽然没有同意贺耀组回湘代何主政，但也有意培植地方势力，对何键起牵制作用，遂又委派陈渠珍为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

陈受委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后，大肆扩充部队，编成五个旅（第

一旅，旅长李可达；第二旅，旅长顾家齐；第三旅，旅长周燮卿；教导旅，旅长龔仁傑；独立旅，旅长戴季韬）和一个教导团（团长黄光炎）；另外还編了五个保安团，并将有屯七县的屯兵改編为三个独立营；合計入槍达两万多，較之第一警备司令部时期，实力又有增加。

中原大战結束，招兵工作停止，我仍回南京受訓。为了謀求补充，我向陈渠珍建議，設立新三十四师駐南京办事处，以李济民（沅陵人）为主任，在南京进行活动。陈采纳了我的建議，并派我为办事处副主任。由于賀耀組、何成濬的支持，得到蔣介石批准，按月发給新三十四师補助費三万元，并获得部分械弹补充。

一九三一年春，南京的反何分子仍然鬧得很凶。新三十四师办事处暗中出錢支持。何鍵到南京时，被搞得很难堪。为了緩和斗争，解脫困境，乃施其卑鄙慣技，用金錢收买反对者，拉攏一些中上层人物。南京的湘籍中上层人物如周佛海、邓文仪、罗君强等都接受过何的厚礼。李济民和周佛海是小同乡，常在一起鬼混。由于周的斡旋，何愿与陈妥协，答应回湘以后，考虑新三十四师的补充問題。陈得李济民报告后，打电給我，要我回湘接洽。六月十八日，我在长沙会晤何鍵，彼此寒暄几句之后，他对我說：“湖南人就是不团结，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上次我到南京，与賀貴严他們交換意見，我們拥护中央，团结救国，是一致的。希望玉璠（陈渠珍号）先生能彻底合作。”我說：“陈师长无任何野心，惟深感餉需困难，渴望得到补充。”他說：“补充問題，可以考慮。但中央給予新三十四师的補助，也是扣了四路軍的經費的啦！”我心想这是鬼話，便說：“就我所知，中央所发三万元，不在四路軍經費之內。湘西部队多，困难大，这点補助是很不够的。李济民告訴我，主席允許增加，不知能加多少？”他只好說：“讓我和他們（指經理处）商量一下再說吧。”接着他就談

了一些五倫八德和“剿匪”之类的道理，并留我吃了午飯。我的任务完毕，向陈作了报告，就回南京去了。不久，何鍵派傅子京和另一个人为代表到凤凰去同陈談判。何答应給予陈部補助費三万元；如果南京的三万元停发，还可增为六万元。但附有两个条件：（一）撤消新三十四师駐南京办事处；（二）免去龔仁傑的旅长职务（因龔系叶开鑫的人，叶是反何的，故何忌之）。陈权衡利害，接受了何的条件。旋即将龔調为訓練处长；将駐南京办事处改为通訊处，派龔典五、陈子光前往接替。賀耀組对陈此举很不滿意。李济民也不服气，暗中搗鬼。結果，南京方面給新三十四师每月三万元的補助費馬上停发了；而何鍵許下的六万元並沒有兌現。陈渠珍在南京的活动，至此完全中断。陈感到哑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一九三二年夏，陈采纳我的建議，派郭蜀江（原为賀耀組部屬，时任南京第一陆军医院院长）为駐南京通訊处主任，这才恢复了与賀耀組的联絡。

何鍵虽然与陈渠珍暂时取得了某种妥协，但眼見陈的实力不仅沒有削弱，反而有所增长，仍然寢食难安，因此，更坚定了解决陈的决心。他在准备对陈实行武力解决的同时，还搞过一次与陈合伙制运嗎啡的事，大概是想再一次使用籠絡手段，并麻痹陈的思想，使之疏于戒备。

何鍵这次对陈渠珍实行武力解决，是和王家烈合作行动的。先是，王家烈由貴州退到洪江之初，曾与陈渠珍合伙护运滇黔两省烟膏，获得巨利。何鍵对此十分眼紅，极力向王兜攬，改道經由邵阳运往广东。通过这桩合伙生意，何、王进一步勾結，秘密达成協議，先由何支持王回黔夺取政权，再由王协助何解决陈渠珍。根据这一協議，王在广西購得大批械彈，得到何的保护，安全运到洪江，扩充了军队的实力。一九三二年春，王回黔主政。在何鍵的催促下，王于一九三四年夏出兵黔东，拟先解决車鳴翼部（車系毛光翔的亲

信师长，所部时駐銅仁，与陈渠珍有勾結），然后配合何軍对陈实行前后夹攻。这个消息，經由黔东車部逃回的陈的联络員傅少谷向陈报告，陈聞之大为震惊。

陈在軍事上向来不怕前攻，只怕后袭。这次王家烈受何鍵慫恿，出兵攻打与他唇齿相依的車鳴翼，威胁他的后門，在他看来，是个生死存亡关头。何鍵采取这一手，据曾任陈的副官长，因失宠而没何的双景五后来告訴我，是他向何献的策。陈于六月底在凤凰召开紧急軍事會議（我当时任湘鄂边区“剿匪”指揮部參謀长兼独立第二团团长，参加了这次會議），决定全力援車，将第一旅、第三旅和教导旅开赴黔东，与車部并肩作战，而以独立旅和第二旅向东警戒。又派我前往廬山，以“剿匪”为借口，向蔣介石請求补充。蔣电令武汉行营批发临时費三万元，子弹十五万发。八月初，我經长沙回湘西，深恐何鍵留难，想找关系疏通。恰巧在潘伯强家遇到李覺（时任十九师师长、保安处长，代理保安司令），他开口就說：“王參謀长这次搞了很多子弹来吧，”我說：“正要找司令請求放行哩。”他慨然允諾。第二天，李約我到 he 家里談話。他說：“陈玉公和我們之間的关系，必須搞得更好，任何問題，都可商量解决，但希望他停止对黔作战。”我說：“这一点我保証可以作到，只要王家烈不侵犯湘西。”他說：“这我可以負責。”談話之后，他設宴招待我，并指定他的亲信幕僚李厚坤和我作进一步的商談，解决了一些有关的具体問題（如我根据陈的意見提出的撤換桑植县长陈策勋等）。我回到凤凰，向陈报告此行收获及李覺的态度。陈对李（实际是代表何鍵）所提要求，表示可以接受。这时車鳴翼因战斗失利，自愿罢兵言和；而紅軍又于十一月初占領永順，陈奉命防堵，遂将援車部队全部調回。当王家烈攻打車鳴翼时，何鍵并未按原定計劃遣部向陈进攻。这倒不是何改变了主意，真的想要与陈“搞好关系”，而是因为此时江西“剿

共”战事紧张，他的部队正奉令全力防守湘贛边区，抽不出力量来对付陈。至此，极度紧张的何、陈关系，又暂时缓和下来。

其时，在黔东被王家烈打败、逃到湘西就食的川黔軍，有廖怀忠、皮德沛、楊其昌、雷鳴九等的残部共約四千五六百人槍，悉为陈渠珍所接納。陈的实力，大大扩张，人槍超过三万。与此同时，陈部旅长顾家齐在廬山軍官訓練团受訓后，去到南京，通过賀耀組的关系，領得一批新式武器（小鋼炮之类）运回湘西。这又引起何鍵对陈的更大的猜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当紅二、六軍团由貴州进入湘西占領永順后，何鍵令陈渠珍严加“堵剿”。陈遂将剛由黔东調回的第一旅、第三旅和教导旅，合新接納的黔軍楊其昌、皮德沛两部，統归以龔仁傑、周燮卿为正副指揮官的湘鄂边区“剿匪”指揮部指揮，参加对紅軍作战。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在追击紅軍的途中，被埋伏在十万坪附近的紅二、六軍团打得大敗，損失人槍万余（其中黔軍楊、皮两部損失最大，次为周燮卿部）。接着，紅軍围攻沅陵，戴季韬的独立旅、顾家齐的第二旅和周燮卿的残部，又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陈部实力，大大削弱。何鍵在陈部遭受紅軍的重大打击之后，故意夸大敗績，向蔣介石报告，說陈“剿匪”不力，并有“通共”嫌疑。其目的显然在为他解决陈渠珍制造借口，并取得蔣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三五年春，何鍵趁其“追剿”部队集中湘黔边境，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一举而解决陈渠珍。他以第十五师进驻秀山，第六十三师进驻印江；刘建緒（时任第二十八軍軍长兼“追剿軍”第一路司令）自率一个旅駐銅仁，居中指揮，威胁陈的側背；另以第十九师进至大庸、后坪之綫，第六十二师进至永順、塔臥之綫，第十六师进至王村。表面上佯为对付紅軍，但按兵不动，只保持警戒，实

則以优势兵力，对陈部进行压迫，使其前受紅軍攻击，后受何部包围，不敢輕动。部署完成之后，何鍵对陈渠珍发布命令，命令内容共有十項，我只記得其中七項：（一）部队（指新三十四师）按三旅六团編制，点名发餉；（二）各县保安团队归还县的建制；（三）收繳編余槍枝及地方散槍；（四）撤消軍械制造机构；（五）撤消所有私設关卡；（六）各級行政人員概由政府任命；（七）各县屯粮仓库一律归政府派員接管。（編者按：客籍部队全部遣回，是否也算一項？）根据这个命令，陈的部队将要大大縮編，行政权力亦将大大削減，要想維持湘西的割据局面是不可能了。当时陈部旅长如李可达、周燮卿等均表反对，主张抗命。陈考虑到自己这时的力量有限，不能与何对抗，因而力排众議，全部接受何的命令。

陈的新三十四师被縮編为三个旅（第一旅旅长李可达，第二旅旅长顾家齐，第三旅旅长周燮卿），每旅轄两个团，另有工兵营、炮兵营各一。陈名义上仍为师长，实际不能过問部队的事。部队归第二十八軍代理軍长陶广指揮，被調到保靖、永順一带去“追剿”紅軍。陈本人則被指定駐乾城办理屯务（陈当时尚兼任屯务处长，处下轄屯兵三营）。旋何鍵又派余范传为第三区行政督察專員兼屯务处副处长，余大权独攬，置陈于閑散地位。未几，何便利用顾家齐倒陈，保顾代陈任新三十四师师长，陈則力保戴季綽任副师长。周燮卿旅也在此时脫离新三十四师建制，成为独立旅。在紅軍长征以后，該师、旅被調赴浙江，改为第一二八师（仍由顾、戴任正副师长）和暫編第十一旅（仍由周燮卿任旅长），隶属浙皖贛閩四省边区，归刘建緒（任四省边区主任）指揮（第一二八师不久又归入李觉的第七十軍），抗日战争开始后，在苏、浙、贛一带参加抗战。一九三八年，薛岳（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指揮）以“抗战不力”的罪名，将第一二八师解决，顾家齐交付軍法审判（后宣布无罪），戴季綽調軍政

部任职（未就，仍回湘西），部队被编散。与此同时，暂编第十一旅亦被刘建绪解散，周燮卿以“尅扣军餉”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才获释。

在陈的部队被调出湘西不久，何键便派人将陈渠珍接到长沙，专任省政府委员。割据湘西二十多年的“湘西王”，不得不暂时离开他的老巢，直到何键垮台，张治中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后，才再度回到湘西，招兵买马，重建他的“基业”。

作者附白：此篇的写成，承戴季韬先生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志谢。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一九二九年常德兵变真相

陈扬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常德兵变，是何键在湖南部队中排除异己的事件。

当时驻在常德的部队是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尚，副师长熊震。何键暗中支持熊震发动兵变，排除吴尚。其时我在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代理人参謀，略知梗概。兹就回忆所及，概述如下。

吴尚，号隶庭，湖南益阳人，生于一八八六年，陆军大学毕业。其人好大喜功，不甘居人下。大革命时期，吴由湖南陆军暂编第十八团团团长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二师第八旅旅长。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第八军扩编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军。何键由原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升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后又升第八军军长，后来部队整编，调任第五十二师上将师长。由于何、吴两人的资历相埒，平时关系不够深，何键攫得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四路总指挥以后，一跃而为吴尚的顶头上司，吴颇怏怏。何则以吴非其嫡系，内心对吴亦不无芥蒂，但表面上仍多方敷衍，始则任吴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原内定兼民政厅厅长），吴仍闷闷不乐；继而又将号称湖南富庶之区的常德地区，划归第五十二师驻防，并面许吴保荐驻防地区的县长、县警察局长、税务局长等等，吴始表示愿供驱策。后来，何键违背诺言，对于吴所推荐的县、局长，多未发表，因而凡何所委派在常德地区的县、局长，吴亦遇事

予以掣肘。至是，何吳之間的矛盾遂漸趨表面化。

熊震，号印圭，湖南益阳人，生于一八八七年，保定軍官学校毕业，名利心很重，善于玩弄手段。熊与何鍵，不但是保定軍官学校的同学，而且两人历来接近。北伐前，何任湖南陸軍第四师第九旅旅长的时候，熊即充任該师第十五团团长。正由于熊、何之間的关系較深，何遂利用吳、熊之間的矛盾，暗中支持熊震的阴谋倒吳活动，企图吞并第五十二师为自己的嫡系部队。

吳尚是熊震的妹夫，又系同乡同学，同时任团、旅长和师长，原来私交甚厚。“西征軍”入湘时，第八軍軍长李品仙逃回广西，吳尚升任第八軍軍长。其时，第八軍第一师师长张国威早已被杀，所部瓦解，吳尚請准将湖南省防軍第一师(师长熊震)改編为該軍第一师，并以熊震为副軍长兼第一师中将师长。由于熊震的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不甘屈居吳下，彼此之間遂不免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不久，吳尚丧妻，与林采之結婚。林系留美学生，乃一拜金慕势的典型少女。熊震則以胞妹新丧，又有遺孤，曾一再劝吳以善于撫育儿女为择配条件。吳认为熊是干涉他的私生活，深为不满。吳、林結婚后，熊更憤懣，遂进一步加深了吳、熊之間的隔膜。

不仅吳、熊之間有矛盾，吳、熊和參謀长赵恩煦、第一五四旅旅长閻仲儒、第一五五旅旅长門炳岳、第一五六旅旅长王需之間也是矛盾重重。除門旅系新編入該师，单独为一个系統外，其余两个旅和师直屬部队又分成三个系統。第一五四旅的第二团 万方治部(由原第八軍第三师整編的)是閻仲儒的基本部队，成为一个系統。第一五四旅的第一团李立部、第一五六旅的第五团陈紀良部和第六团唐鉞部、师直屬工兵营黃紹英部、特务营章紫云部均是吳、熊的基本部队，其中又分为吳、熊两派：吳派以第十八团为基干，赵恩煦、王需、陈紀良、唐鉞等屬之；熊派以第十五团为基干，张敬兮、黃

紹英、章紫云、欧阳恒等屬之。从师部官佐直到部队中的连排长，都分成吳、熊两派，互相爭夺，互相排挤，为了干部的升級升职，經常吵鬧不休。

一九二八年十月整編軍隊时，由第八軍原有的三个师、九个团縮編为独立第一旅轄四个团；旋又改为第五十二师，轄两个旅、四个团。当时角逐团长职位的达二十人之多，其中参加爭夺最为激烈的，吳派中有原第八軍第一师參謀长李立、第二团团长唐鉞、第六团团长陈紀良；熊派中有原第八軍第二师副师长叶虎臣、第一团团长张敬兮、第三团团长章紫云、第四团团长黃紹英、第五团团长欧阳恒等人；另有閻系的第七团团长万方治也参与爭夺。由于粥少僧多，顧此失彼，經過多次爭吵，仍未解決問題。于是熊震裝病，閉門謝客，想以拖的办法来挾制吳尙；吳則認為机不可失，趁熊在病假中，即召集參謀长赵恩煦、原第三师师长閻仲儒、原第一师副师长王翥等商定：除以熊震为整編后的副师长兼第一五四旅旅长，閻仲儒为副旅长，王翥为第一五六旅旅长，赵恩煦仍蟬联师的參謀长外，以吳派中之李立为第一团团长，陈紀良为第五团团长，唐鉞为第六团团长，閻派中的万方治为第二团团长；而将熊派中的张敬兮調任第一五六旅副旅长，欧阳恒調充师參謀处长，章紫云为师副官处长兼特务营营长，黃紹英为工兵营长，叶虎臣为駐省办事处处长。整編以前，九个团长中，熊派占四名，閻派占三名，吳派只占二名。整編以后，四个团长中，吳派却占了三名，閻派占了一名，熊派一个也沒有。熊遂大为不滿。加之，熊所兼第一五四旅所屬第一团团长李立是吳的嫡系，第二团团长万方治是閻的嫡系，熊更認為吳对于第一五四旅的人事安排，显然是把实权交給副旅长閻仲儒掌握，准备閻来接充旅长，而自己不过是过渡性质的挂名旅长，因而表示不愿兼任旅长。吳尙則以熊既不肯就任旅长，正合己意，即以閻仲儒

升任旅长，熊不胜愤激，遂毅然请辞副师长职务。其时，熊自以为在这个师里，自己的干部多，在基层的势力大，吴决不敢批准他的辞职，原意只在要挟吴尚，为张敬兮、欧阳恒、黄绍英等争夺团长职位，决不料吴尚对于他辞副师长一职，仍不慰留，当即保荐周武彝继任（周末到职）。至是，吴、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张敬兮、欧阳恒、黄绍英等在失意之余，复从中兴风作浪，煽风点火，一面公开责骂吴尚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一面暗中表示拥护熊震别树一帜，他们誓死相随；同时分向蒋介石和何键控诉吴尚，企图拥熊倒吴。

熊震比较接近何键，而吴尚则深为何键所嫉忌，已如上述。当吴、熊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何键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企图排斥吴尚，从而把他所视为杂牌的第五十二师改编为自己的嫡系部队。当时，何键一方面表示同意吴尚免去熊震的本兼各军职，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熊震的倒吴活动，并以省政府委员兼第五十二师师长职位饵熊，遂使熊震有恃无恐地发动常德兵变。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吴尚回益阳省亲，熊震密派范泽鸿（熊的外甥）、蔣炎光等潜赴常德，与张敬兮取得联系后，鼓动工兵营营长黄绍英等率部围攻师部，将师部库存粮餉、械弹、被服、装具等掳劫一空。先是，张敬兮和黄绍英等认为如果只赶走吴尚，仅熊震一人可能当上师长，对他们自己并没有好处，因而暗中决定将旅长王需、团长陈纪良、唐钺一并赶走。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事成之后，由熊任师长，张敬兮任旅长，黄绍英、欧阳恒分任第五、第六团团团长，然后用行政命令撤免李立，再由章紫云接替第一团团团长。张、黄等于围攻师部的同时，复指使驻在常德河汊的第一五六旅的营长隆振安、聶家美等率部叛变，将旅长王需、团长唐钺等击毙。第五团团团长陈纪良闻讯大怒，兴师问罪，率部围攻常德的叛军指挥部，反被黄绍英、聶家美等包围击溃，所部遂化整为零，纷纷投靠地方。

保安团队。后来何鍵委任陈紀良为湖南保安第六团第一营营长。

兵变时，吳尚远在益阳，消息隔絕。张敬兮率領人槍三千多投靠駐在澧县的李韞珩（独立第九旅旅长）。李韞珩驟然获得这七个营的兵力，实力陡增，遂报經蔣介石批准将独立第九旅扩編为新編第二十师，旋改为第五十三师，李升任师长，而以张敬兮为第一五七旅旅长，陸振安为副旅长；黃紹英改名为黃主，任第三一三团（由原工兵營和原第五团的一部分所編組）团长；歐阳恒改名为歐阳律卿，任第三一四团（由原第六团的大部分所編組）团长；范泽鴻的一营（由原特务營的大部分所編組）則編入第一五九旅第三一七团建制。李韞珩部扩編为师以后，即开往湖北沙市。

张敬兮湖南长沙人，保定軍校毕业，与何鍵有同学关系，原以投何为宜。但黃紹英等多出身行伍，不但是李韞珩的旧部，并且多是李的小同乡，与何素无渊源。因此，黃紹英等投李心切，张敬兮遂亦被迫投李。

常德兵变后，何鍵将第一五四旅改編为独立第五旅，仍以閻仲儒为旅长，归何鍵直接指揮，令其开赴邵阳整訓；将第一五六旅改編为新第八师教导旅，以张敬兮为旅长，令其开赴宁乡整訓。其时，张敬兮已率部投靠李韞珩，沒有接受何的任命，仅由章紫云率領該旅残部及师直屬部队之一部分投何，章被任为新第八师經理处长，所部被編散在新第八师。不久，独立第五旅的第一团团长李立又率部叛变，投靠桂系去了。何鍵遂将閻仲儒免职，派其亲信钟光仁繼任旅长，并将該旅編归他的嫡系部队陶广师的建制。

第五十二师瓦解后^①，何鍵仍敷衍吳尚，促其来省，专任湖南

^①按当时叶开鑫被任为第五十二师师长，系另一部队，仅承袭第五十二师的番号，并不是吳尚原来的第五十二师。吳尚的第五十二师是完全瓦解了的。

省政府委員。至于熊震虽与何接近，但非何的嫡系，何只利用熊搞垮吳尚，并无用熊的必要，加之张敬兮率部投李，何更不满于熊，因此，兵变后熊反一无所获。

熊之倒吳原是采用两面手法，一方面企图在何的支持下，驅逐吳尚，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暗中与李贛珩勾結，准备倒吳万一失敗，还可以拖一部分队伍投李，为日后伺机再起的打算。并且熊部骨干多是由前第八混成旅带过来的，与李都有旧屬关系，投李自为多数人所乐从。兵变时，熊匿居长沙，沒有露面。张敬兮既已率部投李，李部开赴沙市后，熊遂亦潜赴沙市投李，由于熊、李之間素有嫌隙，初为李所拒絕。

先是，李贛珩在北伐前任第八混成旅旅长时，熊在該旅任营长，曾經率部投靠趙恒惕，得以升任湖南陸軍第四师第十五团团长，因而开罪于李。常德兵变前夕，熊曾向李表示：“震愿率部追随抱公”（李贛珩号抱冰）。兵变后，熊的亲信张敬兮率領人槍三千余众投李，使李驟获七个营的精銳兵力，得以升任第五十三师师长，旋又升任第十六軍軍长。至是，李乃捐弃前嫌，于接任軍长后，保荐熊为副軍长。但李对熊仍不无戒心，当时对熊說：“印圭，你身体不好，宜长期休养。关于薪餉，已飭經理处按时电汇給你。如不够用，可写信特支。”这显然是暗示熊不必到职，仅支干薪而已。熊当然明白。加之，吳尚自从部队瓦解以后，經常向人罵熊“狼心狗肺，丧尽天良”。熊感到四面楚歌，問心有愧，遂托病回乡，过他的地主生活去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參事室供稿）

蕭學泰案(寧案)始末

李定國

一九三二年寧鄉縣在“清鄉鏟共”中發生蕭學泰案件，當時稱之為“寧案”，曾經轟動全省，一直鬧到南京，歷時一年又三個月，始告結束。“寧案”是反動派內部的派系鬥爭，開始是寧鄉縣團防系與國民黨縣黨部之間的鬥爭，後來發展為依附CC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與何鍵集團之間的鬥爭^①，結果以何鍵集團失敗而告終。

一、“寧案”發生的遠因和近因

寧鄉團防系是個大土豪劣紳的集團，它的骨幹分子有：大澗鎮的楊致澤等，同文鎮的劉學廷，劉卓吾、黃振蘇、蕭澤生、岳壽南（縣人稱之為“硫磺硝藥”）、張雲安（譯名張五雷公）、張潤藩等（統稱為同文系）；湯泉鄉的劉毓卿、廖季海、叶和風、陶溶川等，望北鎮的張叔昆等，靳水四鄉的蔣隆權、王叔槐、劉茂貞等，洋泉鎮的劉楚楨、袁陶父等，龍從鄉的朱幼安、曾吉光等，獅顧鎮的周壽堃等，城昭鎮的李衡熙、元誼之、王家鼎等。他們或歷任團防局

^①當時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和包括寧鄉在內的多數縣黨部，都是為彭國鈞、張炯集團所把持操縱的，而彭、張集團又是得到CC支持的。故“寧案”發生後，以CC和湖南省黨部為一方同以何鍵集團為一方，圍繞這一事件，展開了尖銳的鬥爭。關於這次鬥爭，《湖南文史資料》第三輯劉岳厚所撰《國民黨湖南甲乙派的鬥爭》一文，也有記述，可以參閱。

长、团防总办襄办，或历任自治局长，或以教育界和地主豪绅的身分，依附这一集团，伙同一起，把持县乡政权，无钱不要，无恶不作，统称之为团防系。其中襄陶父虽籍隶洋泉镇，但长住县城，与李衡熙、元誼之等沆瀣一气，出入县政府和县属各机关团体，把持操纵，武断横行，兴风作浪，作恶多端，被目为城狐社鼠，实为团防系之重心。大革命时期，县乡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并成立特别法庭，对于他们仅略予惩创。“马日事变”后，这些傢伙卷土重来，凶焰益张，曾伙同县长朱德龙勾结当地驻军许克祥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县农民自卫军首领文经西被其杀害；县工会委员长姜凤韶、特别法庭委员石味疏同在必杀之列，因事前闻风，得以逃脱；特别法庭委员喻棣芳被其拘捕解省，监押两年始获保释。其他被加以“共暴”罪名而遭杀害者不可胜数。

“马日事变”后，宁乡县党部的组织变更频繁，一九二七年成立改组委员会，党委大都依附团防系；一九二八年改组为指导委员会，仍为团防系所利用；一九二九年秋始由各级代表选举委员组成县党部。至此，宁乡反动派的内部斗争开始表面化，县党部开始对团防系采取对立态度，反对团防系揽权操政，例如反对刘毓卿出任县挨户团副主任，反对王叔槐任河帮八元堂堂长，反对李子楷任贫民工艺厂厂长，反对李衡熙任学款经理员，反对元誼之任教育局局长。此时，团防系对县党部即已怀恨甚深，对于县党部委员辄加以“准共”、“暴徒”等等罪名，进行倾陷。

一九三一年县党部第三次改选，萧学泰、夏元彬、李定国、喻曜岩、文仰莲、宋旦父、杨味根、李宽远等当选为委员，萧学泰被推为常委，李定国兼教育局课长，张光干继续担任《宁乡民报》编辑；潘仁刚经县党部推荐为县农会干事长。这届县党部继续反对团防系，彼此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宁乡反动派的内部斗争更加尖

銳化了。

蕭學秦為縣黨部前任常委蕭淑瀉之子。蕭淑瀉在民國初年任寧鄉玉潭小學校長時，與寧鄉下游教育界為校長問題發生過爭執；以後玉潭小學校舍被焚；又與李衡熙、元誼之、袁陶父、詹文光等構訟有年。迨寧鄉縣黨部成立，蕭淑瀉被推為常委，更與團防系和阿附團防系的李衡熙、元誼之、袁陶父等冰炭不能相容。此次蕭學秦又被選為縣黨部委員，且被推為常委，團防系遂轉而仇視蕭學秦，必欲去之而后甘。

黃錫恭原為縣黨部委員，旋被選為省黨部候補委員。黃舌鋒甚利，因李衡熙奸娶寧鄉第一女校學生為妾，曾罵李為衣冠禽獸，喪盡廉恥，李因而恨之入骨。一九三〇年秋，紅軍攻入長沙，何鍵棄城而逃。黃曾為《寧鄉民報》撰寫《豈能一跑了之》的社論，指摘何鍵未能實踐“與城共存亡”的誓言。當何鍵率部回長路過寧鄉時，適以縣黨部為行轅，瞥見該報這篇社論，大為震怒；加上團防系的人們從中挑撥媒孽，何遂認為寧鄉縣黨部有勾結共產黨的嫌疑。

張光干於一九三〇年春任《寧鄉民報》編輯時，曾寫社論，評論蔣介石統治下的政治作風（主要是指摘貪污腐化），剛印出一版，被當時任縣黨部常委的蕭淑瀉瞥見，認為這是惹火上身，密將已印出的報紙焚毀，不料沒有全部燒盡，尚有殘余的幾張，被縣黨部干事姜國琛拾得，未加細察，順手送給大西門轎行姜合泰老板姜大挨拋糊窗，被同文鎮著名惡霸劉學廷發現，如獲至寶，即從窗上撕下，轉入李衡熙手中，將以此作為攻擊縣黨部的有力佐証。後來此項報紙因李收藏不慎而遺失。但亦可見當時團防系對縣黨部是隨時都在搜尋証據，企圖進行陷害的。

我在任寧鄉第四高小校長期間，曾於一九二六年秋將該校遷入葉家灘葉開鑫的住宅（曾經湖南逆產清理委員會指為逆產）。團防系

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而加我以“准共”，“暴徒”的帽子。一九三二年喻克祥任县教育局长，我兼任该局课长时，以同学关系，推荐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李甲农为林山小学校长，该校又聘请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尹澍涛为教员。团防系认为喻克祥和我狼狈为奸，公然勾结共产党混入教育界，由是嫉我益甚。

潘仁刚任县农会干事长，原系萧学泰所推荐，并为萧的得力助手，被团防系目之为萧的死党。夏元彬系前届县党部常委，曾在教育界服务多年，与团防系积不相容。故他们也同为团防系攻击的对象。

萧淑澍在县党部常委任内，曾建议财产保管处拨款开办印刷所，又创设递步哨，并推荐革命先烈王凌波的胞兄王凌霄为印刷所经理兼办递步哨收发事宜（两机构均设在县党部内）。迄萧学泰任县党部常委，王凌霄仍供原职。又早先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伊始，该会曾据姜姓族众来呈转请全省清乡司令部准将姜梦周（共产党员）保释。这些都被团防系抓住，作为县党部“通共”的材料。

以上所说的团防系和县党部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的种种事实，都是“宁案”发生的远因。

一九三二年春，朱鼎三继吴东成为宁乡保安大队长。其时，曹明陞被何键任为湘（乡）、宁（乡）、安（化）、益（阳）四县清乡“剿匪”指挥官，授权指挥所辖各县保安队，从事“清剿”工作。团防系认为推翻县党部和教育局，一网打尽他们所仇视的党务和教育工作人员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衡熙、袁陶父、陶藩川、廖家栋、刘学廷等积极活动，伙同朱鼎三请得曹明陞率部来县清乡。他们先到滴水上游，包围林山小学，捕杀校长李甲农、教员尹澍涛（教员何树芬、罗叔陶化装逃脱），次至汤泉乡，枪杀刘子槐（曾任农民协会委员长）、萧秀春。县城小学教师王邦亨也在严刑逼供后，惨遭杀害。

凶鋒所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三、四月間，曹率部來到縣城。團防系勾結曹、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縣友會幹事長潘仁剛逮捕；同時派兵包圍我的住宅，進行搜捕。我事先聞訊，星夜逃往長沙。旋與黃錫恭創辦《寧鄉評論》期刊，對團防系勾結曹、朱，枉殺無辜等罪行予以揭露，並對李衡熙、蔣隆欽等嫖賭揮霍的陰私有所舉發。期刊出版後，曾以數千份寄至縣黨部轉發各界。其時正值寧鄉縣行政會議開幕，團防系分子聚集一堂。他們看到《寧鄉評論》，莫不相顧失色，切齒咬牙，認為期刊上的資料定是縣黨部所提供的，於是謀傾縣黨部之心益切。正當團防系積極謀劃對付縣黨部的時候，適有共產黨員蕭梅雨（即蕭謨，曾經自首，後復入黨）被捕，供稱蕭學泰有“通共”嫌疑；同時，李衡熙在蕭學泰的妻子潘基德家裏撿得蕭梅雨約請蕭學泰吃飯的信件，竟被指為蕭學泰“通共”的實據。至是，轟動一時的“寧案”遂即爆發。

二、“寧案”的經過和結果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紀念日，縣黨部舉行紀念會，八時左右，縣城東門梅花橋一帶布滿了保安大隊之兵，如臨大敵，縣黨部和教育局尙莫明底細。隨即有隊兵數十名包圍縣黨部，將委員蕭學泰、夏元彬、文仰蓮、喻曙岩、楊味根，幹事李吉臨、李錫迅、劉肇俊和印刷所經理王凌霄，縣財政委員喻仲衡等逮捕，同時在教育局逮捕了局長喻克祥和產款經理員喻震寰。兩處共捕十餘人，解至保安大隊部，以“共產黨”的罪名押候訊辦。縣黨部全部檔案均被搜去。民報編輯張光千亦在必捕之列，事先聞風逃脫。其時，朱鼎三猶恐案內“人犯”逃逸，並預防有人馳省報告事變消息，曾在西門外汽車站附近密布隊兵，阻止汽車通行。喻克祥之子喻昭武系汽車司機，已經得悉其父被捕，認為必須到省報告教育廳，方有獲

救希望，便伪装試車模樣，乘队兵不备，加快馬力，开到长沙。当日下午，黃錫恭和我从喻昭武和其他乘間逃来长沙的有关人們得悉事变情况，当即馳报省党部，請速派委員前往宁乡調查，并将被拘人員提省处理。省党部派委員朱浩怀、干事張曼真会同省政府所派科长陈南阳馳往宁乡实地調查。旋又于十八日召开會議，作出如下決議：一、电請中央派員彻查；二、由本会再派員彻查后，再行核議；三、函請全省清乡司令部将在押党务工作人員提省依法訊办；四、向何委員鍵报告案情并請速回省垣（何鍵当时在廬山开会）。会上还决定派委員刘岳厚再赴宁乡調查，并守提蕭学泰等来省。

在蕭学泰等被押的当晚，曹明陞、朱鼎三等曾安排刑具，亲自审讯，企图以暴力迫使蕭等招认为共产党员，然后就地“正法”。蕭等未为所屈。曹、朱复强迫县长赵观成同意将蕭“就地正法”，赵亦不肯負責，因而未敢貿然行事。刘岳厚去宁乡以前，全省清乡司令部执法处长李琮已經到了宁乡。李是支持曹明陞、朱鼎三，主张对蕭等严办的。刘到宁乡后，以此案关系重大，罪証不足，如輕率处理，恐于何鍵不利，因对李、曹、朱等表示，必須提省訊办。李这时有些犹疑，曹、朱則不同意。經刘再三交涉后，乃得将蕭学泰、夏元彬、喻曙岩、李吉临、王凌霄、喻克祥等解省审理；文仰蓴、喻仲衡等則在县里交保释放。

蕭学泰等被提解到清乡司令部后，一方面，省党部以清乡司令部执法处长李琮素以善于罗織人罪著称，深恐他对蕭等横加誣陷，逕行处决，遂专函清乡司令部，郑重声明在省党部未参与会审判定以前，所有該案內一千人等，不得逕行处决。随即推定黃家声、朱浩怀、彭国鈞、孟庆暄为“宁案”会审委員。另一方面，宁乡李衡熙、廖家栋、陶濬川、刘学廷等受曹、朱指使，召开會議，成立了宁乡“鎮共”委員会，推举反动軍官廖家栋为主任委員，协助曹、

朱从事“清剿”。廖等随即糾合全县土劣，并收买一批流氓地痞赴省，向清乡司令部請愿，請求速将“首犯”萧学泰正法，并严惩案內有关人員；同时派人分赴各乡鎮，宣传萧学泰为“共党首要”，胁迫群众向清乡司令部請愿，从速将萧处决。群众未为所动。

先是，省党部得到萧学泰被捕消息后，即已意識到此案牽涉何鍵集团，他們与何之間將有一場尖銳斗争，何軍政大权在握，决非省党部所可左右，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因即推派委員萧逢蔚馳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宁案”情况，請求“中央”派員来湘彻查。据何汉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訓練部处长）說，他在南京接到黃錫恭等求援的信后，曾向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組織部长）探詢他的意見，陈很气愤地說：“这明明是何鍵摧残党务的把戏，此风絕不可长；現已决定派方覺慧、洪陆东两委員前往彻查。”国民党中常会旋即派方、洪两人于七月二十日到达长沙。

方、洪到达长沙时，何鍵尚在廬山未回。在此以前，萧学泰等已經李琼連日审讯。李曾以刑具威逼、疲劳审讯甚至更改供詞，企图取得萧的供認，但均未得逞。及方、洪到达长沙后，李已不能毫无顾忌地独断独行。此后，提訊萧学泰时，不得不請方、洪两人陪审。当萧学泰詢問坐在陪审席上的是誰，李惟恐萧得知中央派来大員查案，便厉声对萧說：“他們是陪审員，你不必問。”經過方、洪陪审后，李复逼迫他們在审讯紀錄上签字，将萧槍决。方、洪告以：“我們系奉命查案，只能将查得的案情报候中央核办，此时无权处理。”李亦莫可奈何。

方、洪两人到省之初，团防系所糾集的請愿人众曾向方、洪坚决表示，必待杀萧后方才返县。方、洪預料彼等將糾纏不休，遂密赴宁乡，进行調查。他們在宁乡面詢商会委員袁錫遠及有关人士，得悉萧学泰和同案諸人均非共产党员，此次被捕，出自有意誣陷，

又探得县城各机关职员几乎全数离县到省请愿去了，机关都是空的。乃借访友为名，潜入“鑄共”委员会办公室，伪装看书模样，抽开廖家栋桌上的抽屉，发现簿据一本，备载该会收买流氓所花费用数日，从而知道此次请愿纯系假造民意。调查结果，案内诸人均无犯罪证据，遂迳返长沙。其时，何键也已由庐山回抵长沙。

此时，对于“宁案”，省党部与何键的清乡司令部已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省党部方面既已搬得国民党中央的大员来湘，更觉有恃无恐，力主将“宁案”诸人解京审理；何键方面则坚持将萧学泰等“就地正法”，反对移解南京。双方于直接的争执之外，都曾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外力支援。省党部方面除请得国民党中央派大员来湘助阵外，并发动各县县党部出来帮腔。在方、洪未到以前，即有长沙县党部通电主张实究虚坐，耒阳县党部呈请保障党务工作人员；方、洪到达以后，又有长沙、湘潭等市、县党部代表向他们陈述意见。

何键方面，除指使他们所控制的部分县党部派代表向方、洪陈述意见，并由清乡司令部将“宁案”经过以《来件》分登省垣各报，企图造成舆论，淆乱听闻外，还采取了以下一些办法：首先是组织所谓各界“民众代表”数百人于八月四日上午齐集青年会（方、洪住所）向方、洪请愿，反对将“宁案”解京处理，要挟方、洪将萧学泰等就地处决。虽经方、洪一再解说，仍是叫嚣不休，一时秩序大乱。正在难解之际，何键的亲信谭常愷突然站出来，表面上为方、洪解围，骨子里仍是支持何键的主张。最后由“民众代表”提出三项要求：（一）当众报告萧学泰等是否“共匪”；（二）电请中央收回“宁案”解京办理成命；（三）在“宁案”未解决前，方、洪两委员暂勿离湘。方、洪对二、三两项当已接受，惟对第一项，则表示仍须请“中央”判断。于是有所谓宁乡“民众代表”三十余人，竟然向

方、洪环跪，泣請槍決蕭学泰等，磕头不止。方、洪睹此情形，异常窘促，亦只好下跪。台下秩序愈乱，叫嚣迅速答复。方、洪被迫答复后，又被要挟当众签字。方、洪复签字。所签的字句为：“本日民众环請‘宁案’根据清乡司令部审問共产証据为标准惩办，特为轉致清乡司令部。方竟慧 洪陆东（签字）。”有人将所签的字向台下朗讀后，“群众”又以文字狡猾，不肯散会。方、洪无可如何，只得又在末尾批“另有証据确实”六字，所謂“各界民众代表”始“凱旋”而去。他們繼至清乡司令部請愿。比由何鍵亲自接見，將处理經過情形作了詳細报告，并說：中央对本案既已来电要解京处理，对于“各界民众”的請愿，实有不便接受的苦衷。后由“民众”代表請求两点：（一）暫勿将蕭学泰等解京审理；（二）将“民众”請愿情形轉达中央，准将蕭案仍归清乡司令部处理。何当即表示完全接受。

其次是指使衡阳、邵阳、湘乡等許多县的保安团、队长电請迅將蕭学泰等就地处决；策动清乡司令部全体职员采取罢工手段呈請总辞职；策动四路軍各师长分电中央及清乡司令部准将蕭学泰等明正典刑。各师长呈中央的电报，是八月四日发出的，电报內說：“宁案发生，为时已久，迟疑未决，遐邇惊惶。……今宁案首犯蕭学泰等經湖南清乡司令部公布証据，罪状显然；国有常刑，岂容狡脫。职等奉命討赤，职责攸关，部屬环請，群情憤激。用敢电請当机立断，准将该犯等明正典刑，以慰牺牲之先烈，而励‘鏖共’之决心。”

最后，何鍵以清乡司令部的名义分呈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軍事委员会。茲录該項电文如下：

“宁乡共党蕭学泰一案，供証确凿。职复提案亲訊，并与方、洪两委员会审，亦均供認不諱。茲奉东电，正呈解間，旋据湖南各界民众代表周鼎燮等三千余人（作者按：实际只有数百人）及宁乡民众与本党党员数百人，环向方、洪两委员及本

部請愿，当請求三点：（一）請本部轉呈中央收回解送萧学泰赴京交法院办理成命；（二）請本部迅速解决此案；（三）鍾共不应分別特殊普通两种。长跪泣涕，激昂异常。职以胸情坚决，未便过拂，比答复准予緩解，并据情轉呈。同时复据湘乡、衡阳、邵阳、武岡、宁远、道县、新田、沅江等县保安团队长，紛紛电呈恳予就地迅速处决。非据本部全体职员，以国民政府十九年八月一日密字第十一号密令，軍事机关处理共党案件，具有全权，其已送法院者，尚須迅予交回軍事机关办理，独对于萧学泰一案，即特別解京指定法院办理，法律既失平等，清乡机关犹同虛設，呈請总辞职。复据各师师长王东原、彭位仁、李觉、陶广、陈光中，陈渠珍等联电吁請前来，若不迅予法办，关系清乡前途，殊非浅鮮！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乞示遵。”

何鍵在这里拿出了他的最后王牌，要第四路軍的六个师长联名打电报，其窘迫之状，可以概見。

八月四日上午方、洪两人在“群众”面前受窘后，当日下午又有所謂各市县“党员代表”一百多人包围他們，历数彭国鈞、张炯等操纵把持党务、树派营私种种罪恶，要求方、洪轉达中央，迅予撤惩。他們只得允許照轉。当晚十时，他們未向何鍵辞別，即潛赴車站，乘方的学生某所管轄的鉄甲車离湘赴汉，轉回南京。他們到达武昌后，始电何表达感謝招待之意。

国民党中央获得何鍵方面（包括所屬六个师长）堅請将萧学泰等就地正法、反对提解南京的电报后，只好拿出蒋介石这张王牌来压他。八月九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处电知何鍵，

“关于宁乡县党委萧学泰等共党嫌疑案，現經中央决定委托蔣委員長中正就近处理，并令湖南清乡司令部即将全案人証解送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案。除分別函电外，特电达查

照。”

湖南清乡司令部也同时奉到蒋介石的“手諭”，飭即将全案人証解送汉口“剿匪”总司令部。至是，何鍵再无抗拒延宕的余地了。除喻克祥早先已由教育厅长曹典球保释外，萧学泰、夏元彬、喻曙岩、李吉临、王凌霄等均于八月十日被解往汉口。案子移解以后，何鍵犹恐“剿总”不予严办，又組織了所謂湖南“各界民众代表”請愿团和宁乡“各界代表”請愿团，先后馳赴汉口，向“剿总”請愿。

萧学泰等被解到汉口后，“剿总”执法处又奉蒋介石令将全案移送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剿总”执法处以夏元彬、喻曙岩、李吉临、王凌霄等嫌疑較輕，当予交保开释。萧学泰則于九月上旬被解往苏州。据說，在萧被移解到苏州后，何鍵还有电报給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請其致意江苏高等法院当局，对萧务必严办。

江苏高等法院对萧学泰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偵查、审訊。在偵訊过程中，萧对湯子固（曾参加共产党，旋即自动脱离，是在萧被捕之前被捕的）所供他曾与湯等开会商組共产党支部并加入共产党各节，矢口否認；且称：“民国十六年八月間，我湖南宁乡县共产党非常猖獗，若明白拒絕，必有意外危险，所以我佯为答应；旋即請李志衡报告团防局（即挨戶团）派兵捉拿湯子固。”（見江苏高等法院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对萧学泰的判决书）此說并“經李志衡及前宁乡县挨戶团总局副主任蔣隆权、前高露乡挨戶团分局主任何念先等一致証明屬实。”（見同上判决书）法院从而断定“如果被告确有加入共党之事，断无复托李志衡密請挨戶团捉拿湯子固之理”。“况方洪两委員曾赴当地查明被告并无共党嫌疑，且为鏟共最力之人”。

（均見同上判决书）結果，萧被宣布无罪，其他諸人不用說更是无罪了。

肅案結束後，黃錫恭、李定國、張光干等曾列舉何鍵的“摧殘黨務”、“破壞教育”、“濫殺無辜”、“販賣鴉片”等罪行訴請國民黨中央轉飭行政院將罪魁何鍵和助桀為虐的李琮（時已調任省會公安局長）、曹明陣、朱鼎三、趙觀成（已卸寧鄉縣長）等撤職查辦。其時，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轉來上項呈訴後，除何鍵軍政大權在握，對之不敢議處外，即令飭何鍵將李琮、曹明陣、朱鼎三、趙觀成等一律予以撤職處分。何鍵接到行政院的命令，不勝憤懣，竟向各報發表談話，說：“共產的不辦，反將鍾共的撤辦，真是是非倒置，不能令人折服，要請行政院收回成命。”何旋即訴諸蔣介石，蔣據以電達行政院，請以“免予置議”了事。

蕭學泰等雖然得到了自由，但已不能在何鍵統治下的湖南立足，CC都一一予以安插，蕭學泰被任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普通組織處幹事，黃錫恭進民訓部編審處當幹事，張光干到江蘇省民政廳工作（當時江蘇省政府主席是陳果夫，民政廳長是余井塘）；我經張炯介紹，先到浙江仙居縣政府當科長，後來又到江蘇東台县黨部工作。我們這些人都繼續參加了反對何鍵的鬥爭。

（附注：本文採納了周調陽提供的部分資料。）

（民革湖南省委員會供稿）

罗介夫被刺真相

吳健人

蒋介石利用刘建緒夺去何鍵的兵权后，复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阴升暗降地免何湖南省主席职，調他长內政部閑曹。明年夏，过去那些曾在CC策动下、并获得賀耀組等支持的湖南政教界倒何分子，如罗介夫、方克刚、宾步程等，摆出了打落水狗的陣势。他們在各报刊登启事，发起組織湖南各界清算委员会，准备对何鍵的九年囊刮进行清算。其中奔走最力的是国民党监察院的监察委員罗介夫。

何鍵主湘时，罗曾多次提出过对何的弹劾案，也曾再三向何需索，后来經何鍵拨付五万元作为广益中学办学基金（罗任广益中学董事长），这样才使罗与何言归于好。当罗介夫等发起向何鍵清算时，社会风传，議論不一。有的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事，并可以昭戒来兹；有的传说清出何鍵的特种开支总数达一千四百多万元；也有略知内幕的人則认为清算也者，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事情正鬧得滿城风雨，罗介夫忽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由三汉磯乘轎进城时遇刺殞命。罗被刺杀后不久，就陸續有方克刚等人登报声明退出清算委员会，这场清算风波，也就随着烟消云散。社会上但认为罗之遇刺与发起清算有关，然始終不明真相。一九四一年，我在成都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偶然得識刺罗凶手，因获悉刺罗經過及其余波甚詳。

原来，何鍵調长內政部后，在重庆又搬出一貫愚弄人民的那套

尊孔讀經的戏法，发起組織孔学会，尊孔祥熙为会长，作为諂諛孔的进門礼物。并出版《孔学月刊》（后改为《中国学报》），借宏揚孔学为名，以达到他庸俗捧場和投靠孔門的目的，他希望从这里去开拓他重理旧巢的蹊径。正当他苦心图溫旧梦之际，罗介夫等却在湖南故意使他下不去，旧恨新仇，促使何鍵下了毒手。

一九三八年八月初，何鍵密派內政部警察总队中队长刘明善回长沙偵察罗介夫等的行动，要他相机采取有效处置。刘回湘后，即匆匆赴南县找来原在长沙担任过邮电检查員的孙毅（别号阳昇），交付他三百元費用和两支拨壳枪。孙毅完成暗杀罗介夫的任务后，也就离开了湖南。

当我在成都軍校認識孙毅之后，他知道我与何鍵經常接近，頗得何的信任（那时我任撫恤委员会办公厅上校厅附），因对我特別亲近。临到快結业回重庆时，他忽然伤心地向我傾訴暗杀罗介夫的原委。他极端抱怨刘明善埋沒他为何鍵平息清算風潮的功劳。他說刘明善窃踞处长高位，却不讓他接近何鍵。他要求我向何鍵代为申述他的委屈。但我考虑到一向高談八德、道貌岸然的何鍵，我怎敢冒昧地去揭开他的伪装呢？因此我一直抱着明哲保身，存而不問的态度，从旁观察他們的动静。

后来，孙刘之間，刘何之間，为了这个案件不断暗中爭吵，弄得何鍵头昏脑脹，无法应付。当一九四二年春何鍵利用刘与主任秘书邓阳軾的矛盾而設法将刘外調时，更遭到刘明善声言要公开投案的要挟。事过一年，何鍵才使了一个丢包誘狗的办法，委托刘明善回湘代为出卖中山东路的房产（現在省人委交际处的前栋房屋），并投資經營舞場、电影院、洗澡堂等企业。刘以有利可图，欣然就道。随后，何又調任刘为駐湘撫恤处长。刘到湘后，通过何鍵旧部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协助，将全部房屋折价五万元卖给省参議会作会址。

听说五万元房价只给何键二万元，其余以股金名义全部为刘明善所截留控制了。孙毅则由何键的后妻王仪贞乘她的姘头郭寄嶠调任甘肃省主席时（郭原任重庆卫戍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保荐为甘肃运输处长，使多年纠缠不休的问题，暂时清静下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的罪恶史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前 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①当时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的刘岳峙，却表示十分不满，极力加以反对，胡说什么“这简直是赤化了！”刘岳峙是当时湖南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也是湖南当时一个重要的反共团体“左社”的头子。

为了征集有关刘岳峙的历史资料，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长沙邀集了几位熟悉刘岳峙生平事迹的老年人士进行座谈。应邀参加的有省人委参事室参事文斌、秘书吴剑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蕊、张平子、张知非，刘岳厚和文任武。这次座谈会，所得材料不多。特别是关于刘岳峙的为人，在农村的土地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很少谈到。

为了彻底弄清刘岳峙的历史，我们在七月上旬到衡山县进行了八天的调查工作。时间是比较仓卒的。在政协衡山县委员会的协助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应邀到会的有黄幼山、赵斌、廖立三、谭庆麟、阳安烈、黄云奎、陈锡圭等八位老人。我们仔细听了他们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一版，第15页。

譜》；在新湖大队（解放前叫和恭村）看了刘岳峙的老屋、家祠以及坟山墓碑。据文兆丰同志反映，土地改革时还在刘岳峙家里翻出过他多年的日记和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稿。这自然是很重要的反面材料，可惜久已散失，我们没有找到。

本文是根据调查的材料，并参阅了座谈纪录和有关文稿综合整理的。初稿写出后，曾在油麻田完全小学邀请被访问过的贫农进行座谈核对，补充了一些材料。油麻田完小唐春娥等十一位教师和社会工作队干部，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刘岳峙的出身和起家

刘岳峙，号梅斋。衡山县油麻田人。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农历十月二十七生。他的父亲刘云軒，流氓出身，在衡山县北街三牌楼雷家祠堂开饭铺（当地人叫歇家，指既留歇宿，又替人家做状纸），专门包揽词讼，结交豪劣，成为当地的一个讼棍。刘岳峙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进城，在私塾读老书。后来间常在店里招呼些生意，与来往客商接接头。因此，认识了一些洪门兄弟，介绍他加入哥老会。他青年时在科举制度下进了学，是个秀才，当过塾师。后又辞馆回家，经常在外面写状纸，放高利贷，诱奸妇女，干些不正当的勾当。

刘岳峙的第一个老婆文氏，早死。继娶衡山南冲一个姓谢的女人为妻。清宣统年间，他在油麻田街上天符庙新办的小学堂教书，认识了附近一个贫苦船工马贵。马贵帮人划船，在家日少。其妻姓段，湘潭人，面貌生得秀丽。刘岳峙心怀不良，多方勾引。初则暗中来往，继而公开强占。一九一三年，他由岳阳卸任县知事回家，带着段氏一道，马贵恨之入骨，又慑于威势，无处伸雪。有一天，刘岳峙饱食无事，在麻油田街上闲逛。马贵以为他晚上一定会回家，

便帶着一把利刀躲在由油麻田回刘家必經的大霸桥下，准备伺机干掉他。事为刘岳峙的亲信文兰臣所知，立即通风报信，当晚他就留在街上未回家，逃避了这场杀身之祸。我们这次在乡下调查时，好几位老年农民都谈到这件事。

刘岳峙要尽流氓手段，强夺馬貴之妻为妾后，馬即孤独終身，絕了后代；他的老婆謝氏因受刺激过深，从此癡癡懵懵，神經失常，直到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在油麻田病故。我們在油麻大队一位貧农家里查看了《刘氏族譜》，又在新湖大队查看了謝氏坟上刘岳峙所撰的墓碑，都載明她是在民国十一年壬戌（即刘岳峙强占馬貴之妻后十多年）农历九月間死的，并非象有些人說的那样，刘岳峙是在老婆死后才强占馬貴之妻的。陪我們去看刘家坟山的貧农顏中生告訴我們，他过去曾听到他的母亲說过，謝氏病危时，身上长疮生了蛆，刘家没人愿意照料，常喊他母亲去抹洗。

平日“道貌岸然”，大談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人生必求尽人道，方足以异禽兽”的刘岳峙，竟是这样一個残酷无情的衣冠禽兽！

辛亥革命以前，刘岳峙因加入了会党的关系，認識了常来衡山活动的同盟会會員刘重欽（宝庆人），彼此有所往来。长沙光复，焦达峯出任都督，各地会党聞訊风起，聚众响应。衡山当时也是会党活跃的地区之一。焦达峯被害后，譚延闓篡夺了湖南政权，繼任都督。他一反焦达峯的作风，派人分赴各地，大肆鎮压会党。刘岳峙奉派在衡山办团练，他秉承譚延闓的意旨，招集会党五千入，設法予以羈縻，杀其首領，遣散余众，最后衡山会党全部瓦解了。子虛子（唐乾一）在《湘事記》中，提到了这件事。

譚延闓以刘岳峙鎮压会党有功，派他为岳阳县知事。一九一六年，譚延闓二次督湘，刘岳峙跟着刘毅在湖南水警厅做过一个短时期工作。刘毅下台后，荐他到刘建藩处，任湖南营产管理处总务股

长。一九一七年，刘建藩任零陵鎮守使，举兵独立，赶走北洋政府所派的湖南督軍傅良佐。驅傅以后，省公署实行三厅制，刘岳峙因有刘建藩的支持，出任政务厅长。次年，北洋軍閥张敬尧入湘，譚延闓在零陵称湘軍总司令。刘岳峙随譚左右，为之出謀划策，挂着民政处长的空官銜。这时，直系軍閥吳佩孚駐軍衡阳，勾結西南地方势力，与皖系軍閥段祺瑞对抗。刘岳峙奉譚延闓之命，往返于湘桂間，联系桂系軍閥陆荣廷。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出走，譚延闓三次督湘，刘岳峙又因在湘南时期的奔走功劳，出任政务厅长。但为时不久，就在这年十一月間，同譚延闓一起，被赵恒惕撵下台了。

赵恒惕是衡山白果人，屬南岳后山，刘岳峙的老家油麻田，屬于前山，当地有“前刘后赵”之称。两人为了扩张个人势力，发展政治野心，明爭暗斗，积不相容。因此，在赵恒惕統治湖南时期，刘岳峙暂时退出了官場。

一九二六年六月，唐生智出任国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揮，取得湖南政权，設临时省政府于衡阳。刘岳峙因受赵恒惕的压迫，不得已而参加了革命，并出任湖南临时省政府財政处长。北伐軍进入长沙后，正式成立省政府，他改任財政厅长。

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也正式宣告成立了，由秘密轉为公开活动。投机政客刘岳峙，又伪装进步，攫得了省党部执行委員兼农民部长的重要职位。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的领导人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刘岳峙則是湖南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的典型，是国民党右派的头目。他利用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的特殊地位，糾合一批官僚政客学閥，暗中組織“左社”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湖南党政的领导权，恢复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統治。衡山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廖維藩、陈容、周安汉、李琼等，都是这个反共团体的重要

骨干。其他重要骨干还有当时省、市党部的重要人员王凤喈、李毓尧、毛懋勋、陈嘉任、王璟以及当时担任湖南纺织厂筹备主任的刘召圃等。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左社”当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迅猛地开展起来的湖南农民运动。刘岳峙以大恶霸地主兼“农民部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农民运动纲领——“湖南第一期农运计划”，公然反对农村中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之改良进步”，主张由国民党（实际上是由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管辖各级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究处”。刘岳峙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发表后，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上，刊载了《何物左社》和《一封未发表的信致刘梅斋先生》，彻底揭穿了刘岳峙破坏革命的罪恶阴谋。紧接着，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又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发“左社”的反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二月，长沙市党部宣布开除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陈容、王凤喈、毛懋勋、王璟、谢清和等八人出党；湖南省政府通令各县严缉“左社”分子归案究办。刘岳峙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前就逃出湖南，后来，直接投靠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他与流亡宁沪一带的湖南军阀政客宋鹤庚等沆瀣一气，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先后充任反动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马日事变”后刘岳峙的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阀何键（时任第三十五军军长）指使反动军官许克群等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马日事变”以后，全省各地都展开了清乡

屠杀，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刘岳峙趁着这次反革命复辟的机会，推荐他的亲信爪牙欧阳澗出任衡山县长。欧阳澗是衡山的大地主，与刘岳峙居同乡里，曾随他在湖南省财政厅及江苏省党部工作，关系十分密切。这个地主当权派回县出任县长后，处处秉承刘岳峙的意旨行事，有权有势，无恶不作。如组织衡山县清乡委员会，以恶名昭著的譚鉄耕主持清乡反共，摧残革命力量，种种毒辣手段，罄竹难书。我们在衡山县城直接访问的几位老先生都谈到，没有刘岳峙作后台老板，欧阳澗决不敢那样心狠手辣地在衡山胡作非为。其中有位老先生说：“当时任用县长，一般都要迴避本籍。欧阳澗能以衡山人出任本县县长，完全由于刘梅斋的有力支持。”

“馬日事变”后半年，刘岳峙又回到了湖南，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西征軍”入湘后，这个贡緣奔竞卑鄙无耻的政客，又多方钻营活动，出任湘鄂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管湖南财政事宜。不久去职。魯滌平任湖南省主席，刘岳峙复任财政厅长；其他“左社”重要骨干也在省級机关担任了負責工作。

卷土重来的刘岳峙，他的反共立場是始终如一的。管的是财政金融，却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举行的两湖善后會議上，他和反共老搭档刘召圃一唱一和地大肆叫嚣“近今共党横恣，裹胁潰兵痞匪，乘間抵隙，逞其不断之劫掠烧杀，致社会上之丧失生存权者日多，斯共匪之毒焰乃益熾。”（《两湖善后會議录》，第58頁）在魯滌平主持的一次省政會議上，他建議“今后处决共匪，应选择边缘地区执行，并禁止吹冲锋号，以免助长杀气。”原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多在长沙教育会坪（今省人委会前坪），众目睽睽，民愤更大。刘岳峙挖空心思为反动派出謀献策，便于杀得更多，杀得更惨！

一九二九年魯滌平倒台后，刘岳峙带着搜刮到手的民脂民膏，

溜回衡山老家，买田置产，修建庄园，当起“土皇帝”来。

解放前二十年間，刘岳峙武断乡曲，横行霸道，一般人把油麻田喊作“油麻国”；当地劳动人民当面不敢不恭维他为“刘老爷”，背后则喊作“梅大王”、“油麻国王”。

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

刘岳峙由一个穷秀才发展到年收一千多石租谷的大地主，完全是劳动人民的鲜血和汗水养起来的。当地群众反映，刘岳峙的祖父刘黄甲手里，仅有四石多田，当出了两石，其余佃给同村一个姓夏的农民作了十多年。他的父亲在衡山开饭铺，当讼棍，家里也只剩几间茅屋，并无田土。辛亥革命后，刘岳峙当了县知事、政务厅长，开始买田置业，收租剥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家一年可以收到三百多石租谷。“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刘岳峙当了儿任财政厅长，刮钱不少，回乡后明买暗夺，强占勒索，油麻田附近的田地，一块块归到他的名下。到抗日战争前，他家每年收到的租谷，就在千石以上。

刘岳峙究竟有多少财产，我们所得到的材料不充分，还不能肯定。但是已经知道，解放前，他家占有的田土，遍布现在衡山县三樟市公社油麻、新湖、新塘、柏林四个大队，南岳后山方广寺附近，湘潭县下湖田、毛塘，长沙县西乡周家坝等地，总计一百二十多石田，可收租谷一千二百多石。他在油麻田和恭村（现属新湖大队）有西式洋楼老屋一大栋，家祠一栋（名“刘黄公祠”，为纪念他的祖父刘黄甲而建的），黄茅冲（现属油麻大队）的新屋有两进四十多间，是当地农民送工送料或者仅付最低的工价替他修建的。油麻田完小一位女教师谈起这样一件事：刘岳峙在起新屋时，逼迫贫农刘迪斋拆屋，搬到牛栏里去住，让出地基给他起新屋。刘迪斋不肯迁让，他

就吩咐狗腿子强制拆掉了。据不完全统计，单在衡山、南岳、湘潭三县，刘岳峙就有庄屋十二栋。此外，他花了好几千元在衡山南门外三角坪买下了聶家大屋，准备大兴土木，在城里做公馆；南岳山上也买了房产，以便避暑消夏，优游岁月。

这些大量的田地房产，都是刘岳峙吮吸农民的血汗得来的。在他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下，无数农民倾家荡产，失去了土地。

刘家年收一千多石租谷，在当地方圆几十里内、是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每到秋天，农民肩挑車推，忍痛揮泪，把一年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送进刘家大門。几位作过刘家田地的老貧农异口同声地告訴我們：佃戶送去的即使是十粒五双的上等干谷，也要經過他的老婆亲自掌风車使劲車淨，再用大斗量进仓库。风車轉得快，地面掉下的秕谷中大部分是壮实的谷粒，又无偿地作了他家的鸡饲料，佃戶是不敢帶回顆粒的。

刘岳峙占有大量土地，对貧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地租剥削。他規定佃戶一律交“額租”，就是在租地的时候講定，无论虫荒水旱各种灾害，須按固定租額繳納，不得短欠顆粒。貧农文开甲說：“刘家写田給佃戶，要写給屋里不少飯吃，又会作田的人家。佃戶求他减租，不管年成怎样坏，他总不肯减，說：‘不講生意’。”貧农文春英也是刘家的老佃戶，她說：“我家佃了刘家两石田，民国二十三年遭天旱，禾干死了，求他减租，好話講尽，高低不肯。”貧农梁方生的父亲梁梅連，佃了刘家四石八斗田，应交租谷三十八石。一九三四年遭了天干，只有少半数收成。梁梅連再三請求减租，刘岳峙一斗也不减，算下来短欠二十石。又經梁苦苦哀求，减了一年息谷，但三年后就利上加利，共欠三十六石。結果梁家标了两次会，卖掉一床帐子，才把这笔帳还清。中农周长生佃了刘岳峙三石六斗田，应交“額租”二十九石。有一年天旱歉收，交租不起。周长生苦苦要

求减租，刘岳峙也是颗粒不肯减，逼得他忍痛出加二五的重利借谷完租。交完租谷，当天家里就断粮了。许多农民反映，刘家不仅规定交“额租”，还要佃户交进庄钱，一般是每石田交二十元，也是分文不能少。贫农文兆丰的父亲，一九四七年托人找刘岳峙佃了两石三斗田，就是卖掉一只木帆船折谷十六石缴进庄钱的。

刘岳峙占有这么多土地，是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掠夺来的。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他所采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一、放高利贷，剥削收入愈积愈多，大买田土。刘岳峙通过放高利贷进行重利盘剥的对象是劳动人民。但他不相信穷人，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的时候却很少，除非交出文契抵押。贫农文开甲就这件事发表了意见，他说：“到梅大王家里借谷，没有文契抵押是不借给你的。五荒六月里，穷人家莫说借谷，想到他家杂点米都困难。民国三十五年，我去他家想杂斗把米，连去三次都没杂到手。后来又叫孙子去杂，也没杂到。”贫农文春英也说：“刘家的租谷，都是一船船卖到衡山县城或湘潭王十万。我是轻易不到他家去杂米的，又怕恶狗咬，又怕遭骂。”据目击者谈，湘潭猫山嘴农民文自立，借了刘岳峙二十石谷还不起，逼得投塘自尽，被人救起来。后来还是还不起，只好牵着一头牛来油麻田，忍痛杀牛还债。七十多岁的贫农夏金梅说：“梅大王真狠，是个‘铁算盘’。他在春上放债谷，一定要等当地的积谷、救荒谷都出完了，外地地主的租谷也‘平果’光了，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把关在自己仓里起了霉的陈谷放出来。”据龚炳林提供的材料，刘岳峙每年放高利贷的谷在两千石以上。

二、规定农民交“额租”，农民交租不起，把自己仅有的土地折卖给他，抵还欠租；或者逼着退佃，吞没进庄钱。佃中农刘金秋作了刘岳峙六石田，应缴“额租”四十八石谷，一九四六年遭了旱灾和虫灾，将近两石旱田颗粒无收。他因欠了二十石租谷交不上，只

好把自己的四斗好水田拆卖；刘岳峙在灾荒年成短收了三十石谷，却增加了四斗水田。贫农梁桃生的父亲梁成年，佃了刘家四石多田，交进庄钱八十多元。他因子女年幼，劳动力少，又碰上虫灾旱灾，收成歉薄，欠了租谷还不起。刘岳峙逼着他退佃，把八十多元进庄钱全扣了，又逼着他的哥哥梁梅连（也是刘家的佃户）连带赔了二石四斗谷。退佃后，梁成年没有片瓦寸土，生计断绝，只好把孩子送给人家看牛，自己飘流外乡，就这样害得他家败人散。此外，有的农民因紧急需要，把自己的少量土地当给刘岳峙，到期无钱贖回，便将当地变为卖地了。据我们调查所知，“认契不认人”、“要红契不要白契”，这是刘岳峙收当的原则。农民拿了白契找他收当，他叫人家先到县里税契回来再讲生意，因为人家登门求当，他就想到下一步变当为卖了。

三、不择手段地强占强买，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汗。贫农陈祖和在和恭村大鸡头有一块山，挨着刘岳峙的山地。一九四七年农历十月初一，他的老婆死了，准备埋到自己的山上。刘岳峙出来干涉，硬说这块山是他的，不许进葬。陈祖和怕吃眼前亏，只好把老婆改葬到同村的张家园山上，平白地丢了一块好柴山。新潮大队第九队贫农王大河的父亲王九林，一九三一年因为荒年缺粮，被迫把仅有的和恭村长凹地方的一块山卖给刘岳峙，结果只得到一斗米。虽然事隔三十多年，贫农袁冬生、周扬名记忆犹新，他们说：梅大王斗米买块山，威风真不小！

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玩弄虚伪狡诈的手法，吞并外地地主的田土。外地地主有田在油麻田附近地区，每年秋收时，刘岳峙凭借自己勾结官府，地位特殊，卡着不准将租谷运出境，要留在本地，来年春荒时“平糶”给农民。这样，外地地主有田收不上租谷，又惹不得他，只好将田土低价拱手卖给他了。衡山县城大地主柳崑

山有二十~~十~~石田在油麻田，就是这样轉移到刘岳峙名下的。其他中小地主的田被刘岳峙吞并的也不少。

刘岳峙成为年收千多石租、放债两千多石的大地主，就是这样用尽各种阴险毒辣的方法发家致富的。

横行霸道，武断乡曲

刘岳峙外表上一貫装着一副悲天憫人的道德先生的面孔。他于回乡后过大紳士生活时，常在人前自詡为“半耕半讀，負耒橫經”。他写了一部宣揚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詩說稿》。在这部书稿的序言中，刘岳峙写道：

“予自幼誦讀詩书，习为文化事业。中年矢志革新国政，冀循三民主义与国人同建新邦，致力其間者亦久之。願以碌碌素餐，无能为役，乃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义，蟄伏耕讀，求寡过以修身。”

“蟄伏耕讀，求寡过以修身”，这个貪婪地吮吸农民血汗养肥自己的大恶霸地主，恬不知耻地說得多么漂亮啊！

我們这次在衡山县城和乡下調查所知，刘岳峙解放前乡居二十年，仗着地位的特殊，一貫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数事例很清楚地說明，刘岳峙的“道德”，实际上是吸血鬼的“道德”。

刘岳峙在乡間的威风不小，不但本地方的地主、恶霸、地头蛇都听命于他，外地来的江湖朋友，也要到他那里拜碼頭。他的魔爪上通官府衙門，下通打家劫舍的土匪。

衡山的新任县长上任后，都要到油麻田来拜訪他，請他“指导”县政。当地群众反映，抗战初期的衡山实验县县长彭一湖，后来的县长熊希顏、王强毅、刘树鵬等，都不远几十里而来，做过他家的座上客。凭他的一紙八行书，可以向县政府随便荐人。一九四六年秋，刘岳峙介紹他的狗腿子周天寿到县政府找事，刘树鵬本来无法

安靜，也碍于他的情面，派为額外办事員。油麻田与湘潭馬家堰仅一河之隔，边缘地区常有土匪打劫，而刘家富甲一方，却从沒有被劫过。不但如此，馬家堰的著名土匪馬少武，还送过一支快慢机短槍給他。

他通过心腹爪牙王遵义、段椒、王民范等，长期操纵衡山县国民党党务工作，鎮压进步力量。据赵斌提供的材料，共产党员賀尔康，湖南湘潭人。他在中共湖南省委所办的湘江学校毕业后，即从事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負責湘潭农会工作，并往来衡山指导青年运动。刘岳峙恨之入骨。“馬日事变”后，他唆使国民党省党校學員王遵义、王穉山、段椒等（均衡山人，認識賀尔康）明查暗訪，必欲得之而置之死地。有一天，賀在长沙街头为王遵义等撞見，當場被捕，一九二八年四月惨遭牺牲。王遵义等被賞光洋三百元。由于鎮压革命有功，王遵义在刘岳峙的支持下，出任国民党衡山县党部执行委員。新湖大队第八队貧农蕭子荣的父亲蕭雨成，“馬日事变”前加入共产党，担任农会銀行主任，“馬日事变”后在外面躲了几年。一九三〇年潜回家乡后，被捕解县，拘押两月。刘岳峙写了一封信到县里，上午信到，下午蕭雨成就被害了，死时年仅二十九岁。“蟄伏耕讀，求寡过以修身”的刘岳峙，就是这样刻骨仇恨共产党人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岳峙搬进了黃茅冲新屋。为了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并控制地方武装，他勾通县政府，在山冲里設立了一个警察局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先設在他屋右边的一所新屋里，后又搬到左前方的雷祖殿。我們亲自看过，两处都隔他家不到半里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县政府調周天寿来当巡官，派出所实际上成为刘家的警卫队。周天寿招認，他由县里来到差时，警察局长廖焜耀交代他：“刘梅老在那个地方，你去了要好好照顾。”

刘岳峙还直接控制着乡政权。乡保长对他唯命是从，稍有手脚不到，位置就保不住。当过乡长的譚道、罗世光、罗明松、廖鴻翔，保长夏仲耀、刘元兆、刘义丙、罗敦奇、罗順先等，都是他的亲信爪牙，农民有冤无处诉。他的狗腿子文兰卿、夏金成、禹荣生等，虽没有当上乡保长，在乡间任意行凶作恶，群众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坏傢伙，有的在解放后已经镇压了，有的现交群众管制。

刘岳峙多年武断乡曲，乡里大小事情他都要管起来。天符会的公产，地方的救荒谷、积谷，都归他操纵把持。任何事情，他不到场，便不能解决。每遇荒年歉收，农民想借点谷度过难关，都要服服贴贴地听他摆布。

公产、积谷等被他操纵，教育事业也被他把持了。和恭村原有一小学，后来搬到大桥湾。刘岳峙凭借自己的权势，又把它搬回来了。抗战以后，他指定大儿子刘定亚当校长；干儿子夏道生和内姪謝黄谷，先后充任教务主任；姨姪夏仲亚和外甥秦先桂，先后充任总务主任。学校请教员，先要经他点头认可。他到校左侧的家祠祭祖，学校里要办酒菜接待。在学生的成份方面，据我们了解，一百多个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子弟，贫苦农民的子弟几乎没有。目前，油麻田完小有十个班，三百八十八个学生，贫农、下中农的子弟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油麻田这个地方，姓刘的特别多。刘岳峙仗着自己当过几任厅长，有钱有势，自封为刘姓的族长。方圆几十里内，姓刘的都要受他管束。他利用封建宗族大权，统治和压榨农民。刘族的人吵架，吵不赢的就说：“我不同你讲，你同我到凹里去。”（凹里，指刘岳峙的家里，因他家的老屋起在山窝里）他逼着同族的人献工献料，在黄茅冲新屋附近修建了“刘氏宗祠”，每逢年节，都要大办筵席祭祖。这时，他又可以运用族长的权力，打开祠堂门，大敲竹槓。

民送了刘家的田租，交了官府的粮款，又要交祠堂的捐款，一年辛苦，还能剩下什么呢？抗战胜利后，刘岳峙领头发起，在衡山县城南正街大修“刘氏总祠”。群众说他做了“油麻国王”还不满足，又想做衡山县刘姓的总族王。

地主生活种种

刘岳峙在油麻田的老屋新屋，都是高楼大厦，周围树木成荫。他家里有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还养了几只恶犬。和恭村老屋砌了石围墙，黄茅冲新屋前楼，有个对外了望放哨的房间。经常替他背枪保鏢的马三光，就睡在这间房里。由于恶狗多，穷人家不敢轻易进刘家的大门，去得不好，就要被狗咬得皮破血流。

刘岳峙的祖父就埋在老屋后山上。这里本来早有曹姓和梁姓的坟墓。刘岳峙横蛮地把后山围起来，不许曹梁两姓子孙上坟祭扫。曹家每年来上坟，只好忍气吞声地在围墙外烧纸燃鞭炮，望坟遥拜。有一次扫坟时，曹家找到附近农民颜兰田（刘家老佃户）搭楼梯进了山，刚在坟前燃起鞭炮，就被刘岳峙听见了，赶来痛骂一顿。梁家有一年要扫坟，好不容易得到刘岳峙的“怜悯”，带着进屋上山。但是带进不带出，敬坟用的鱼肉三牲，出门时都给刘家的恶狗偷吃了。这是贫农梁梅生对我们说的。

刘家雇了长工四人，女工一人，所有种田管山、看牛喂猪、烧饭洗衣递茶等事，都不要动一下手脚。刘家的人自己吃的白米饭，餐餐有盖碗，顿顿不离荤，而长工和女工则吃的糙米饭，食不下咽。贫农谭清梯在他家前后做过三年女工，她说：“做刘家的女工第一麻烦，半夜三更就要起来煮饭，饭后又是一大盆衣。有的人做十天半月就走了。”长工做事稍不如意，就要遭他们父子的咒骂或毒打。在他家做过长工的贫农刘金和、秦国芳，都被他大儿子毒打过。

除了地租剝削和高利貸剝削以外，刘岳峙还强迫佃戶給他送禮，帮工。貧农梁方生說得很风趣：“梅大王真乖巧。穷人家給他送禮物，他口里說‘不必，不必’，一只手就接过去了”。至于佃戶們做白工，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根本无法統計。

刘岳峙出門是不动脚步的，他从新屋到和恭村家祠祭祖，仅仅两三里路，往返也要坐轎。平时从石湾坐轎回家，轎夫抬了几十里，到他家里飯也賺不到一頓吃。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月間，刘岳峙做七十整寿，大摆排場。附近群众和亲族間送了七块金字大匾和几十副木刻寿联，还收到鸡鴨魚肉及其他礼物无数。醴陵北乡刘姓也来了几乘轎子，和他攀亲合族。前前后后熱鬧了半个月，城乡地主当权派都是他家的座上客，而附近每人湊谷六斗送匾的貧苦农民，却吃不到一餐飯，宁肯讓滿缸的寿桃、包子都馊了，作了猪潲。

解放前后的垂死掙扎

刘岳峙集恶霸地主、流氓土豪、投机政客等一切反革命之大成，具有丰富的反动政治活动經驗。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場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蔣介石的封建王朝开始土崩瓦解。刘岳峙这个作恶多端的老牌反共专家，預感到自己的末日已近，拚命作垂死的掙扎。

一九四九年四月，衡山县政府决定撤銷警察派出所，成立各乡的自卫队。刘岳峙糾合地主、恶霸和乡保甲长等在皇嘉里小学开会，罗明生、侯昆山、侯梧仙、康清潤、刘金生、刘岳林、刘元兆、阳振坤、周天寿等都到了。他在会上恶毒地誣蔑共产党，胡說：“中国数千年以礼教立国，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真是灭絕人倫！”最后通过成立筹款委员会，負責筹款买槍，由他的大儿子刘定亚和伪乡长

罗明生任正副主任；原来当派出所巡官的狗腿子周天寿，經他指定为自卫队队长，自卫队队部就設在他屋門口的雷祖殿。自卫队成立时，刘岳峙又胁迫农民带梭标查夜，为他自己保安全。我們这次找周天寿談話后，群众对我们說：“这家伙在乡里为非作歹，坏事做尽，如若不是解放时逃跑了，早就該鎮压的。”（周天寿在衡山解放时随刘岳峙逃到广西，混进某农場。近年被清洗回家，交群众管制。）

刘岳峙在乡里把反共应变措施部署妥当后，又跑到长沙观望时局变化。这时，人民解放軍已經渡过长江天塹，他在长沙落正街某旅館中和老朋友談話，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潰表示惋惜和痛心，捶胸頓足地痛罵蔣介石无能，弄得全国“赤化”。凭借过去的旧关系，刘岳峙还几次往見退居长沙的国民党华中軍政长官白崇禧，密商反共策略。后来往返于南岳、衡山間，并参加了白崇禧召开的南岳會議。又以著名反共劊子手的身份，作了蔣軍第十一兵团司令魯道源的上宾。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解放大軍雷霆万鈞的威力下，长沙解放了，白崇禧狼狽逃窜衡阳。解放战争的风暴吓得刘岳峙丧魂落魄，他自己躲在衡山城里，吩咐家人卷起鋪盖，带着金銀財物，装满三大船，溜到衡山。以后又和国民党衡山县党部書記长丁香芹一路逃到道县，最后到了桂林。在桂林时，他写了长篇的反共意見书，上給战犯白崇禧，并带着他的大儿子常跑白公館。桂林解放后，刘岳峙又夹着尾巴潜回湖南，躲藏在湘潭县三門他的大女家里，繼續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〇年春，湖南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了清匪反霸斗争。一贯反共、恶果累累的刘岳峙，被捕解回衡山。同年四月十三日，在石湾鎮公审处决，結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活閻王”胡凤璋

欧阳泗

胡凤璋是湖南汝城县的大土匪、大恶霸、大地主。他上与官僚党棍沆瀣一气，下与流氓痞匪相糾結，組織了一支反动武装，盘踞在湘南、粤北、赣西南一带达三十余年之久。他霸占的地方就是他的天下，人民遭其荼毒，乡里任其糜烂。三十年間，霸占的田土近万石，杀害的人民以千計。群众叫他“活閻王”。

“残忍成性赛豺狼，称霸称王据一方。宁見阴間閻罗主，莫碰世上胡凤璋。”这是过去湘南人民对他的詛咒，也是对他罪恶統治的控訴。

胡匪的血腥罪恶史罄竹难书，下面只是就个人見聞所及，略述其大概，尚不足以暴露其凶残面貌。

官 匪 起 家

胡凤璋是湖南汝城县石泉村人，出生于一八七六年三月。七八岁时父死母嫁，由其姐姐撫养成人。稍长，即不听管教，与一些地方流氓厮混，过着游蕩生活。为了欺压善良，也学得几手毛拳。二十岁前他即横行乡里。一八九六年，他在汝城县衙門当兵，駐扎在由汝城通往广东仁化县的必經要道——高排，专门对一些商贩拦路“收稅”。有天，一田姓农民下广东卖米，抄走小路以避稅卡苛索，当被胡凤璋截获，因互相糾扭，胡竟将田某活活打死。田族聞訊，乃联名控告。胡畏罪逃到广东韶关，投入駐軍蔡炳寰部当兵。当

他慢慢爬上排长职位时，蔡部忽有一部分官兵叛变围攻統領部，适胡凤璋排担任統領部的守卫勤务，保卫了蔡炳寰。由此获得蔡的信任，胡連續被擢升为营长。

胡匪愈是得意，就愈暴露了他的凶残本性。一九一五年初，广东乐昌八排山一带的瑶族群众，因不堪残酷的反动统治与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官兵屡受挫折的情况下，胡自告奋勇，带兵前往镇压，犯下了血洗八排山的滔天罪行。明年，海南岛少数民族举义，蔡炳寰部又被调往镇压，却被义军全部歼灭。胡匪仅以身免，逃回韶关、乐昌一带包办烟赌税。（关于胡匪出身，与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新湖南报》所载略有出入。本篇所述是胡匪旧部提供的资料。）

胡匪由于在粤北混了多年，与乐昌九峰圩大恶霸地主黎国助拜了把兄弟。一九一九年，胡闲居无聊，向黎商借了一部分武器，纠集了流痞数十人，开始过他的土匪生涯。胡率匪众流窜于坪石、青洞一带打家劫舍，綁票勒索，并利用各种机会扩张实力。由于匪势坐大，广东地方当局为绥靖地方，也曾收编他为“第一游击司令”，冀其悔罪图功。但胡匪贼心不改，一贯受编不受调，在北伐军事紧张之际，也不离湘粤赣边区一步。“馬日事变”以后，更与汝城反动派何其朗等勾结，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

一九二八年冬，胡凤璋被广东新軍閥围剿，离开了粤北老巢，流窜于湘赣边境。当胡匪正无所归宿，湖南清乡会办何鍵却看中了他。一九二九年二月，何鍵指派刘建绪部駐資兴的团长魏鎮（現任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負責收编。胡仍以不外调为条件，受编为“資永警备营”（后改“資汝桂警备营”），以胞侄胡湘为营长。

胡凤璋受编时表示“引退”，初未回到汝城。但暗地里却大肆活动，勾结土劣豪绅如邓邦彦、朱松畴等，取代何光天为汝城县挨户

团副主任（县长兼主任）。他于五月回县之后，逐步将原只百多人枪的地主武装扩大到五百多人枪。一九三〇年，更将警备营扩充为警备团。胡湘当团长后，没有以往恭顺。胡匪恶之，遂于同年十二月密使人将其绞死于黄草坪，毁其屍，并抄没其财产。其警备团匪众，则已事先活动得何鍵命令改編为保安第六团，任胡匪为团长。在党务方面，利用其族人胡宗霖与刘岳厚的乙派勾结，当了国民党县指导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自己从中操纵。尔后有何式、朱兆基、宋训孝、郑德行等相继盘踞县党部，均得仰其鼻息。在行政方面，则以武力挟制并孤立县长（当时的县长，新宁人宛方舟，为达其搜刮目的，极力阿承，所以在位最久，贼囊甚丰），如后来汝城县八个区的区长（兼国民党区党部的主任干事）朱超凡、何可权等就都是他的鹰犬，号称“八路诸侯”。他除了一贯在幕后操纵县政外，在他认为必要时或高兴时也曾由后台走出前台，亲自掌握政权。如一九四四年，他为了配合各路反动派更顺手地镇压革命，将县长贺钦（湘乡人）赶走，率性自己当起县长来。

当胡凤璋受抚后重回汝城时，汝城大恶霸何其朗早因与军阀范石生的矛盾而被迫出走，投到驻郴县的许克祥那里去了，造成胡匪独霸汝城的机会。尔后二十年間，胡凤璋任意鱼肉汝城人民，使汝城变为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积 极 反 共

“馬日事变”以后，胡凤璋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一头凶恶的鹰犬。其所以能在汝城和湘粤赣边境称王称霸数十年，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共反人民，得到何鍵的赏识。

一九二七年冬，由于“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湘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燃起了燎原的革命烽火。胡凤璋的老家石

泉村也成立了农会，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一九二八年初春的一个晚上，胡凤璋率匪众突然回到石泉村，袭击了农会，将农会干部胡悠厚、胡树才等十二人绑走了。不几天，这批人中的七个人先后被他杀害了，其他五人也被打得半死不活。

胡悠厚被抓走后，他的母亲和妻子迫不得已，只得到胡凤璋家里去求情。胡冷笑着說：“早知道有我司令官就好，现在来得太迟了。”最后才允許她們与自己的儿子、丈夫見一面。悠厚支撐着被打得遍体青肿的身体，对母亲和妻子憤憤地說：“快不要求他了，老虎不会有人心的。怕死就不革命，革命就不怕死。你們要好好撫育我的儿子，叫他为我报仇！”

不久，朱德將軍率起義軍經過坪石，胡率匪众进行袭击，反被起義軍包圍。其第三子胡成襄率三百余人由青洞赴援，也被全部歼灭，胡成襄且被击毙。胡匪势孤援絕，仅率十八人突围逃脫。后来紅軍由井崗山反攻湘南时，二十九团有一部分流散到乐昌、坪石、九峰一带，复为胡匪所消灭（毛选一卷也有所記載）。

一九二八年四月，何其朗勾結胡匪回县对东边山游击大队进行袭击。游击队在大队长刘雄领导下与匪軍激战雪洒山，损失很重。后来紅軍大队来到，才将两股匪軍击潰，并一度解放了县城。

以上是胡凤璋被何鍵收編之前的重大反共罪恶活动。受編之后，他擢得挨戶团副主任，历年之間，更积极反共，肆意屠杀和摧殘革命群众。如一九三二年袭击廖炳南等率領的东边山游击队；同年四月在江西文英堵击中央紅軍向贛南进軍，但这次不仅胡部匪首焦才等以下三百余人全部被歼，而且到五月間紅三兵团直搗汝城时，胡匪被困老巢十余日，几乎被擒。一九三四年，在汝城境內加固碉堡二百多座，并积草屯粮，坚壁清野，以阻撓紅軍北上。一九三五年冬，胡凤璋統一指揮黃、汝、桂三县反动武装联合“剿匪”，被西边

山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胡匪为了发泄惨败的怨气，实行三光政策，见房屋烧光，见财物抢光，见人就杀光，使百余里内廛舍为墟，人烟绝迹。

“七七事变”后，胡凤璋与其他顽固派一样，积极奉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他明目张胆地封闭了进步的“星光书店”和“星光半月刊”，解散了“星光读书会”和“星光剧团”，并打击进步的知識分子，解散、停办进步的学校。一九四四年，薛岳龟缩湘南后，他更在薛的支持下，利用叛徒何子鈞密捕暗杀共产党员。如湘南特委派去的宋颺庭和地下党员两人均被暗杀于何家坳并毁屍灭迹。其他被捕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达数百人，均經酷刑拷打，威逼“自新”，坚强不屈的人，则多遭毒害。一九四五年，他更配合薛岳的军队，在桂东、文英等地区公开截击王震将军率领的部队，使抗日力量遭到一定的损失。

以上所举这些事例只是筚苴大端，实不足以揭露其反共罪行于万一。

残害人民

胡凤璋是一个豺狼成性的刽子手，他残害人民的罪恶是擢发难数的。据我个人回忆和现在石泉村的一些老人揭露，他残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各种毒刑不下百种，有些简直是聞所未聞。如“晒衫”，就是使受刑者背牆而立，两手平伸，用釘子将手心釘在墙上，脚跟也釘上釘子；“站石灰桶”，是用木桶装上生石灰，把受刑者双脚捆绑站立其中，然后注入冷水，使石灰发生高热，将人噙死、燙死。其他的酷刑，还有割鼻、割耳、割舌、挖心、挖眼、鋼絲穿乳、竹弓分肢、鉄烙、活埋，等等。他在使用鋼絲穿鼻、穿耳时，常問受刑者：“你下世是变牛还是变馬？变牛就穿鼻子，变馬就穿耳朵。”至于

棍棒拷打、槍決、殺頭等，在他看來覺得是讓你死得太痛快了。這些酷刑使成百成千的勞動人民，或成了殘廢，或喪失了生命。

被害者受盡毒刑的痛苦，我無法一一敘述。但從胡狗奴的被挖心而死，可以看出胡鳳璋凶殘嘴臉的一斑。

胡狗奴是石泉村一個年方十八歲的青年農民，富有正義感，他對於胡鳳璋殘殺和迫害人民群众的兽行，感到非常不滿。有一次，他氣憤地說：“胡鳳璋這樣亂殺人，將來总有一天，會有人把他的心挖出來，看是不是黑的。”狗奴的這幾句話，馬上被壞人傳到胡鳳璋耳里，隨着狗奴也就被抓走了。

“狗奴，聽說你要挖出我的心看看，是不是？”胡匪高踞上坐，怒視着被捆綁推上前來的胡狗奴，並發出一陣獠笑。胡鳳璋有這樣一種習慣：當他露出獠笑的時候，就表示是要殺人了。“現在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怎樣的！”胡匪咆哮起來，不讓狗奴有說話的機會。狗奴也知道，和禽兽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第二天中午，匪兵們把被打得遍體鱗伤的胡狗奴拖到胡匪一貫殺人的地方——石泉村北鉄山坳。那里預置了三個木桩。胡匪手拿“文明棍”，凶惡地指揮匪兵們用鉄絲把狗奴兩手分開綁在兩邊木桩上，再用几寸長的鉄釘，穿過狗奴的掌心，把手釘在木桩上。然後一刀從狗奴胸膛戳進去，一下把心挖了出來。這時被趕來殺人場的群众，不忍再看這種慘狀，都流着泪把頭擺過一邊。但瘋狂的胡匪却怒猶未息，對着狗奴的屍體踢了一腳，向群众罵道：“你們都給我滾開吧！”

在胡匪的屠刀之下，光石泉村一個地方，就有六戶人家被他殺絕了，更多的人則被逼得遠走他鄉，妻离子散。

巧取豪奪

胡凤璋在残酷地屠杀人民的同时，对农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千方百计地霸占农民的田地和山林。

胡凤璋的近邻胡昭兴，祖父遗留下来六亩水旱无忧的好田，早被胡凤璋看中了。他指使伪保长去抓胡昭兴的壮丁。胡昭兴一家七口，只有一个劳动力，抽走后生活即将失去依靠。逼得没有办法，便向胡凤璋借了五十块光洋，请了一个人顶替。谁知把人送去后，伪保长说不是本人不能消差。胡昭兴只好再向胡凤璋借了二十块光洋送给伪保长，才答应送去试试看。

胡昭兴借了这笔“阎王债”，每年要交利息谷九石。头年恰逢大旱，次年昭兴又死祖母，真是“祸不单行”。胡匪看到昭兴无力还账，正是逼债夺田的好时机。就在快过年的前几天，派两个狗腿子去逼债，每人每天要一斗米的催差费；第二天，逼债的增加到三人，每人每日的催差费由一斗米增加到三斗米；第三天，逼债的增加到四人，每人每日四斗米。旧账还不起，三天内，又欠下催差费两石多米。胡昭兴没法，决定忍痛卖出点祖业。本村地主胡品珍开头愿意用三十二石谷买下门口几分秧田，这正好还清这笔“阎王债”。胡凤璋闻讯，立即把胡品珍喊去，威胁说：“红契在我手里，如果你胆大就买。”胡品珍吓得自然不敢买了。

别人既不敢买，昭兴只得去求胡匪，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胡匪还跳起脚骂他：“没人买就来找我了，你给我滚！”接着又威胁他：“你欠我的账，如果三天不交清，六亩田全部归我。”昭兴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把六亩多田全部卖给他，并说：“请你算一下，看还要找我多少谷？”胡匪一听，扳起面孔答道：“哼！要算账，那你就要准备点谷来找我。如果不提算账，就看在同村人的份上，两不相干算了。”

胡昭兴一家几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就是这样被胡匪夺去了。

胡凤璋在資、汝、桂等县占有許多山林，有些是用“走馬圈山”的办法强占来的，所謂“走馬圈山”就是在他看中了的地方立下他胡凤璋的界碑就算是他的产业了。有些是用微不足道的錢强买来的。如汝城东乡曹士家一块大杉山，价值五、六千块光洋，胡只給他三百元买了过来。对于他这种强占豪夺的行为，誰要敢于违拗，他馬上可以加你的罪名，連命也要了你的。一九三三年，胡凤璋在山田江买一小块杉山，再假造一张契紙，把周围二千余亩杉山都霸为已有。当地有些群众还不知官匪一家的道理，准备和他打官司。胡凤璋却先将为首的朱云林一家十余口抓到上古寨坐水牢，并威胁他：“不交出紅契就不放人，困死水牢，看你哪里去告状。”同时又揚言恐吓其他的人，說“不交出紅契就照朱云林的样”。朱云林一家坐了十多天水牢，为了保全生命，只好将紅契交出来。其他群众也只得忍痛交出紅契。大片的杉林就这样被胡匪强占去了。

这只不过是胡匪霸占成百成千亩土地山林的两个事例，而霸占也不过是胡匪經濟掠夺的一种手段而已。据了解，胡匪的掠夺手段多达二、三十种。比如打搶行劫、栽罪罰款、包賭抽头、設卡征税、贩卖鴉片、武装走私、霸山开矿、贩卖奴婢、杀人夺产，等等。

胡凤璋这样巧取豪夺所得来的财产，是无法計数的。有人大略作了一个統計，他在湘粵贛边境各县所掠夺的田土，每年可收租一万二、三千石；山林千余块，有一处方圓数十里；房屋二十九栋六百八十多間。至于他的金銀財宝，更无法統計。在他的老巢“上古寨”里筑有一个“藏金洞”，金洞修成后，为了灭口保密，他惨无人道地把参加修洞的石匠都杀死了。

販 運 鴉 片

在旧社会里，汝城县是一个鴉片烟吐納之地，云南、貴州的烟土，多經此輸送到粵北、閩西、贛南及湘东南各地去。何健当旅长駐軍湘南时，即曾为特商护运。收編胡凤璋匪众后，又在汝城設立“禁烟专员办事处”，借禁烟之名，从中撈取大批特稅和各种苛稅。胡匪受編后，除經常为特商护运撈取大量护運費外，还征收“入口稅”和“出口稅”，即烟土通过汝城时，輸入时收一次稅，輸出时又收一次稅。由于大批烟土通过汝城，汝城很多人（估計达四万人）染上了烟癖。因此，汝城县的烟館林立，大量販賣烟土的公司也有四家以上。胡凤璋開設的“安吉公司”，它的銷售地区遍及湘粵贛三省的許多县。

胡凤璋撈取大量的护運費、进出口稅和販運的暴利犹以为未足，他有时还对特商进行“奇妙”的搶劫。如有一次他护运一批烟土經集龙与文英交界处的“狐狸集”山隘，預先派一批便衣土匪埋伏在那里，等自己护运的烟帮一到，即一声暗号，互相打起来，护运匪兵佯装敗走，特商自然丢下烟土分奔逃命。如是，便衣土匪又用原伙将烟土运回胡匪的老巢。胡凤璋为了应付特商，又装出“賊喊捉賊”的样子，勒令狐狸集附近一带的乡保长和当地士紳交匪賠贖。結果是洗劫狐狸集附近数十里地区，搞得当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穷 奢 极 慾

胡凤璋吸吮了无数劳动人民的鮮血，过着穷奢极慾、荒淫无耻的生活。

他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强迫汝城十八万人民每人出光洋一元，重修他的老巢“上古寨”。經一年多修成，計有房屋百余

間，最高一棟達五層，室內全用羅漢磚鋪地。從山腳到寨上有青石階梯三百多級，厚四米、高十二米的圍牆，長達四百餘米，四周筑有十多座炮樓，房屋四周牆上還開有數百個槍炮眼。胡匪一家就住在这座富麗豪華的“宮殿”里，經常駐有匪兵保衛他們的“安全”。

胡匪有六個老婆，其中三個是強占有夫之婦。說是六個，也只是說長期留在他家裡的，其實被他蹂躪過的婦女是无法計數的。民間稍具姿色的青年婦女，如果被他看中，就很难逃出他的魔掌。他家裡經常養有一批丫頭，服侍一家大大小小，但每個丫頭都要被他父子糟塌。丫頭年紀大了，又將她們高價賣出去，陸續再弄來一些年青的。由於胡匪的荒淫，他的兒子也就青出于藍，二兒子胡韶也擁有五個妻妾，淫亂勝過其父。胡家還經常雇有十幾個長工，替他家做些喂豬、喂馬、養狗、煮飯和各種雜活。

胡匪一家穿的都是綢緞皮毛，大老婆的皮衣就有一、二十件。每個老婆都有幾十口皮箱盛裝着她們分得的各種贓物。

吃的更不消說，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胡匪每天不知要吃多少餐，每餐幾碗幾碟。早晨照例要來一碗“燕窩湯”，晚上還要進一杯“人參汁”。他家裡養的豬狗都吃得上豬油，花生油，而長工奴婢們吃的，却連豬狗吃的都不如。

若逢家裡有什麼紅白喜事，更是奢侈無度。一九四六年三月×日，是胡匪的七十歲生日。事先，他派出許多人，分赴廣東、廣西及湘潭長沙等地採辦各種名貴食物和好酒。還在石泉村搭了兩個戲台，喊了兩個班子唱戲。生日那天，遠近官匪豪紳都來拜“壽”，連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也送了禮。從這天起，吃喝玩樂一直鬧了半個來月。每天二百多桌，吃不完的東西，不甘送給窮人吃，一齊倒在門前池塘里喂魚，幾個月後還發出薰人的臭味。這一場“喜事”，花掉一萬多光洋，值稻穀三千多担，够全村人吃上

一年。

就 擒 伏 法

胡凤璋作恶多端，恐为社会舆论所不容。曾进一步勾结地主豪绅，收集一些封建余孽，给以“名位”，予以“俸禄”，成立修志局，让他们修撰县志。这班土劣和所谓读书人，在西垣何明亮家修了几年的志，翻云复雨，颠倒黑白，竟把胡凤璋杀人如麻，血迹斑斑的滔天罪行说成是“无量功德”；把他豢养的那些乌合之众说成是党国的“有功之臣”。这些蠢才，想以这种卑鄙手段掩盖天下后世的耳目，当然是徒劳的。

胡匪杀人越多，结怨也越深，他也怕别人报复，怕后代报复。他竟妙想天开，结交本族豪绅地主，按宗族字辈过继给自己为子为孙，妄想借这些“子孙”的势力压服被害人的后代，不敢报仇，而他就可以万代昌盛。如胡照亮、胡和常等六七人都是胡匪的过继“子孙”。这种氏族关系，在胡匪统治时期，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少的灾难。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九四九年，胡匪曾一度来到长沙，企图扩大土匪武装，进一步与人民为敌，幻想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由于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不仅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实现，而且他的罪恶堡垒，也终于被前仆后继的湘南人民摧毁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共产党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粤北支队的支援下，一举攻破了匪巢“上古寨”，活捉了胡匪。胡匪被俘后，仍阴使其子侄继续与人民为敌，袭击游击队，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这个统治湘南三十余年，满身血债的大匪霸，不久就在沙田公审伏法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关于湖南“左社”*

文干之

一九二六——二七年間，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胜利发展，参加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結合也起着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内的新旧右派势力以各种不同的組織形式相繼出現，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从革命陣营内部对革命施行破坏、进攻的阴谋活动。这一情况，在湖南地区也无例外。农民問題当时已成为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問題。自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軍入湘后，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暴风驟雨之势迅猛发展，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成为全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湖南农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震动了社会各阶级。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北伐軍内的反动軍官以及一切不满农民翻身的反动分子都起来反对农民运动，中間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惶惑、动摇，他們还不断试图进一步結合起来，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早在一九二六年春，长沙曾出現过“湖南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小集团，其骨干分子有张本清（晃县人，黄埔軍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楊伯儒（芷江县議員）、易家铨（字君左，汉寿县人，湖南法专教授）、阮湘（岳阳县人，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彭湃

* 本稿系根据张平子、李毓尧、刘岳厚、文斌、刘蕊、张知非、文任武、熊梦飞等来稿，并参考有关文献資料綜合整理而成。

(湘乡人)、黎世英、周小溪、袁鼎新、許松圃(以上四人均系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等人。是年冬，西山會議派分子曾傑(字伯兴、新化人)曾先后在长沙、常德教育界、新聞界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企图把所謂“真正国民党员”串联起来“反共救党”。由于共产党在湖南革命群众中享有巨大的威信，国民党中央有令严禁党内派别活动，而这些右派小集团又都臭名昭著，所以，他們很难在群众中进行組織活动。“湖南孙文主义学会”組織只是曇花一現。曾傑之流也因无法开展組織活动，鬧了一陣子之后，便灰溜溜地逃出湖南了。

这时，整个中国革命已出現了严重的右傾危机。湖南国民党内的右派虽然处境孤立，但他們还是千方百计地伺隙进行活动。孙文主义学会、西山會議派等右派組織的招牌既抬不出来，遂改头换面，披上“左派”伪装。湖南“左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与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甘乃光为首的一批投机政客曾在會議期間秘密聚会，发起組織“左社”小集团，参加者多为各省党部出席會議的国民党员代表。他們打着国民党“左派”的幌子，以“联俄、联共，反对西山會議派、拥护孙中山与廖仲愷的工农政策、拥护汪精卫为国民党領袖”等綱領为标榜，进行政治投机，企图攫取国民党的領導权，进而与共产党爭革命領導权。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刘岳峙、监委李毓尧也参加了联席会议，李毓尧且参加了甘乃光的秘密聚会，并受甘的囑托，于回湘后負責湖南“左社”的組織活动。

*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国民政府之組織及地点，召开国民會議、省民、县民會議，省政府之組織，省与中央之关系，省政府与省党部之关系，新政綱等問題。

他們回到长沙后，李毓尧还没有开始进行活动，刘岳峙就很快捡起“左社”这块招牌，对革命发起有计划有组织地猖狂进攻了。

刘岳峙原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反动政治活动经验的地主阶级分子，一九二六年因受赵恒惕的驱迫，混进革命阵营，攫得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等重要职位。当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形尖锐时，刘岳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际上已成为湖南国民党右派的头子。他利用其政治地位，逐步在革命阵营内外结成一个与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相呼应的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农民革命运动的反动集团。在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之后，他就以“全力从事党务工作”为名，辞去省政府财政厅长的兼职，倾全力从事破坏、进攻革命的阴谋活动。湖南“左社”，就在这时开始酝酿组织。

当时国民党中央仍严禁党内派别活动，刘岳峙一伙最初也不敢明目张胆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由于甘乃光以“左社”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这时还没有被揭穿，因而没有引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注意。刘岳峙在暗中活动时，就以“左社”的名义在骨干分子中号召，以这个伪装掩护它的反革命实质。但由于作贼心虚，他们始终不敢公开打出“左社”的招牌。

刘岳峙一伙最初是以议论时局的方式，在一小撮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中进行个别串联。及是年十一月，刘辞去财政厅长兼职时，国民党省党部正计划举办一个党员训练班，他们就企图由刘主持该班，直接利用训练班作为他们的活动基地，而不另立名目。后来，省党部举办训练班的计划改变，他们便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幌子，组织一个“研究社”，倡言“凡党内有志学术及党义研究者，均得加入”，实即以此结纳、培植党羽，为篡夺党政领导权作

組織准备。“研究社”設在純德女校內（純德女校校長为王璵），外面不挂招牌，每周开会两次，由“左社”头子刘岳峙及其他骨干分子輪流担任講演。

“左社”的骨干分子，有刘召圃、陈嘉任、陈容、王凤喈、毛懋勋、王璵、謝清河等。刘召圃，醴陵县人，岳麓高等学校毕业，是刘岳峙搞政治活动的老搭档。他早年曾任刘建藩零陵鎮守使署秘书长，后又与刘岳峙同在譚延闓的湘南护法軍总司令部充幕客，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兴时，任李宗仁的第七軍政治部主任，是年十月回湘任湖南紡紗厂筹备主任。陈嘉任，湘阴县人，陈树藩（炳煥）之次子，陈嘉祐之弟，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他曾参与陈嘉祐早年的軍事活动，也是一向追随譚延闓集团的投机政客，与刘岳峙、刘召圃均有旧交，时钻入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执行委員。陈容，系衡山县大地主分子，一向坚决反共，时任省政府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王凤喈，湘潭县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时任私立晨光中学校长、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員。晨光中学原系政学系分子彭一湖、鍾才宏、李剑农等所创办，北伐軍入湘前夕，彭等逃出湖南，王遂接充該校校长。王与刘召圃原系旧交，刘回长沙后，即被王拉为該校董事，王亦被刘拉入“左社”，成为骨干之一。他們盘踞晨光中学，以該校为“左社”在教育界进行活动的主要基地。

“左社”分子除了投机政客、失意軍人、駐长部队的中下級軍官和机关職員之外，还有一小撮反动的知識分子。后一种人多是通過王凤喈的关系拉进来的。他們以《民国日报》社（一九二六年八月在长沙創刊）为活动基地，糾合李式相（湖南省党部候补监委）、熊梦飞（长沙市党部执委）、张坦然（长沙市党部执委、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廖維藩（湖南省党部执委兼商民部长、私立三湘中学校长）、陈介石、易展甫、袁惠瞻（以上三人均为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教員)、蕭蓬蔚(第一師範訓育主任)、陳大榕(湘潭中學校長)、易萬之、趙璧(以上二人均為第一師範教員)等二十餘人。因為他們多畢業於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時人稱為北派。廖維藩原為北京中山主義大同盟分子，這時頗思以《民國日報》作為其進行政治投機的資本。這些傢伙有極端頑固的階級偏見，還有一套反動理論，替劉岳峙等的反革命活動提供“理論”根據。他們除了利用報紙散布反動的政治影響外，還在学校教職員、學生和新聞界、婦女界進行拉攏，擴大組織。但結果除了拉攏一些家庭婦女，湊成一個“家庭婦女協會”之外，其他方面几無所獲。

劉岳峙等還利用他們的個人關係，在外縣串聯各色反動分子，勾結土豪劣紳，破壞工農運動。衡山、醴陵、湘鄉、岳陽、臨湘等地都曾發見過“左社”的組織或個別“左社”分子的活动。估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左社”被揭發以前，其成員散布在全省者約有二三百人左右。

湖南“左社”的組織活動情況大致如上。

劉岳峙一伙在從事反革命活動的初期，還極力給自己披上一層“左派”的偽裝。劉岳峙原就慣于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悲天憫人”的正人君子，這時還裝出一副“積極維護革命利益”的姿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某次省務會議上，曾提出一個所謂“懇請嚴辦反革命案”。劉召圃在晨光中學與師生接觸時，每談及時事，總離不了說“我們左派需要有個組織”，有時甚至还自我表白說：“我是願意加入C P的，只因地位關係，所以至今沒有加入。”甚至一貫反共的陳容，在對人進行拉攏活動時，也常打着“我們左派”的招牌。熊夢飛等則經常以“站在最大多數工農一邊”相標榜。但是他們在“自己人”的談話中，則毫不掩飾他們的反革命目的。

“左社”分子最初的活动，主要是制造和散布种种反革命的謠

言，來誹謗共產黨和農民運動。隨着國內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日趨尖銳，他們反對和破壞革命的陰謀活動也就逐漸公開暴露出來。一九二六年底，蔣介石不顧國民黨中央的決定，堅持國民政府遷都南昌，以便利其背叛革命的陰謀活動。劉岳峙即利用職權扣壓省黨部贊成遷都武漢的電報，以支持蔣介石的逆謀。他們反對當時以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左派占優勢的省黨部領導，公然叫嚷“省黨部應當改組”，由“真正的”國民黨員當權。

劉岳峙一伙反對和破壞革命的活動，集中在反對農民革命運動。一九二七年初，當湖南省政府頒布“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成立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時候，他們忍耐不住了，索性撕毀“左派”的假面具，公開站到地主階級一邊，舉起反對農民運動的黑旗。他們四處散布對共產黨和革命農民的誹謗，叫嚷“共產黨要實行工農專政”，農民運動“太過火了”，農民運動是“惰農運動”“痞子運動”。當寧鄉八都大劣紳彭柏陔被鎮壓時，他們公開表示反對，叫罵彭柏陔是一個“正紳”，對其死感到“悲憤已極”。

是年二月，劉岳峙復進一步利用其省黨部常委兼農民部長的地位，公開提出他的所謂“湖南第一期農運計劃”，向農民運動挑戰。這個反革命文件的要點如下：

第一條，本期農運，除使一般農民了解革命意義、努力革命工作外，須注全力於農產物之增加、農業之改良進步；

第二條，本期農運，須消弭農民間之衝突而聯絡其感情，尤其聯絡鄉村之各界平民同立於革命戰線，惟不容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雜入農民協會，乘機操縱；

第三條，各县、區、鄉農民協會會員、執委，須令其多數加入本黨，受县、區黨部之指導，服從紀律。如違反者，应由各县、區黨部呈報上級黨部，轉知該上級農民協會審查、分別

改組究处；

第四条，农运专员負直接訓練农民之重任，凡經出資之农民部随时考核成績，分別留任、解职或更番調部訓練、研究；

第五条，本期农运須注意农村經濟活动，一般貧民沒有相当之生活，其一切策略，应与政府筹备地方自治，相輔进行，其筹备規条由政府頒定之。

（轉引自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之《战士周报》第三十五、六期

合刊所載：許生：《一封未发的信——致刘梅斋先生》）

他們在这个“計劃”中誣蔑农民协会会员为流氓地痞，反对农民革命，反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要求农民与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之改良进步”，反对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叫囂由国民党（实即刘岳峙及其一伙）直接管轄各级农民协会，如农协有不服从其“紀律”者，应予“究处、改組”。

当他們的这道反革命挑战书公布后，各地土豪劣紳和各色反革命分子再次聞風而起，向农民运动发动猖狂进攻。宁乡芳儲乡劣紳聚众搗毀当地农民协会和国民党区党部机关；衡阳土豪劣紳唆使流氓地痞混进农民协会，胁迫群众向县政府請愿，并搗毀农协机关；攸县土豪劣紳聚众劫獄，将全部在押豪劣尽行劫走；新化、朱亨农协机关均被豪劣搗毀；湘乡豪劣組織“保产党”“暗杀党”对革命农民进行反攻报复。

刘岳峙一伙对革命的猖狂进攻很快就遭到了革命力量的坚决回击，湖南“左社”的反革命組織很快就被揭发、粉碎。

原来当刘召圓脱离第七軍回湘时，烈士陈龙驥*也随他离开第

* 陈龙驥，长沙市人，原系国民党员，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馬变”后亡命安徽。一九二九年三月为湖南清乡司令部偵悉，派兵前往逮捕回长沙害。

七曜一同回到长沙。陈为国民党左派分子，回长后参加国民党市党部相关工作。刘岳峙利用“左社”活动时，以旧属关系拉陈加入。他对陈说：“国共合作的局面不会长久的，到时机成熟时，我们将掌握省府各厅处，现在要先作组织准备。”并许诺陈以重要位置。陈对刘的这套“知心话”极感诧异，当向市党部共产党员领导同志汇报。经市党部领导研究同意后，他就参加了“左社”举办的演讲及其他会议活动，从而掌握了“左社”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的一些情况。所以，当刘岳峙提出他的“农运计划”，公开暴露出他们一伙的反革命面目时，立即遭到了革命力量的坚决打击。

在刘岳峙的“农运计划”公开提出后几天，长沙市党部即假教育会坪召开群众大会，准备在会上公开揭发刘岳峙及其“左社”的反革命罪行。届时，因“左社”分子聚众破坏，致会议无结果而散。刘岳峙、刘召圃等见阴谋败露，大势已去，即于次日潜行离长，逃往南京。长沙市党部复于次日举行执监委扩大会议，由执委兼宣传部长陈龙骧公开揭发刘岳峙等组织“左社”反革命集团的经过及其阴谋活动的内幕。会议决定开除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陈容、王凤喈、毛懋助、王璩、谢清河等八人的党籍，查封替《左社》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民国日报》和《大公报》，封闭被“左社”分子盘踞以为活动基地的晨光中学、三湘中学、纯德女校。省党部除批准市党部以上决定外，还在《湖南民报》上公布湖南“左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并在全省各地追查“左社”分子的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还在省城处决了几个反动豪绅，以打退反革命的逆流，其中最著者为南县大地主劣绅夏炎和醴陵大劣绅彭志蕃。夏炎系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的贿选省议员。赵垮台后，他在南县勾结反动部队蔡鑑团，谋抗北伐军；组织“寅社”，把持县政，唆使蔡军横征税捐，勒收民租，逮捕学生；并组织临时省议会行轅，

企图迎赵复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被南县旅省学友会捉获。彭志蕃是个布商出身的大劣绅，曾充团总，以办匪为名，屠杀过不少的农民。一九二六年底，他以醴陵十五区联合团董身份，统率团兵，包围株萍铁路局，劫走铁路总工会与农民协会所存枪枝，阴谋对抗革命。革命政府除将夏、彭镇压外，还在澧浦、祁阳、桂阳、零陵等县镇压了一批豪劣。并在临湘将已经篡夺县党部领导权的“左社”骨干分子詹仙侠逮捕，予以公审处决。

“马日事变”发生后，刘岳峙一伙又卷土重来。一九二八年初“西征军”入湘，刘岳峙首先回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省政府财政厅长。至鲁涤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陈嘉任、刘岳峙、刘召圃、陈容等分别充任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秘书长，“左社”其他骨干分子如左国雍当了湖南省惩共法院副院长，李琼当了该院审判员，周安汉当了省会公安局局长，各据要津，弹冠相庆。这一伙在革命高潮时期披过“左派”外衣的牛鬼蛇神的反革命原形，至此彻底暴露了。

“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三)

“馬日事变”后醴陵大屠杀的片断回忆

程星龄 张知非 文 斌 阳伯震

李 敏 李味农 謝世基 陈乃一

“馬日事变”前，醴陵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为土豪劣绅所仇恨。当时醴陵分东南西北四乡，著名的土劣，东乡有易雨仙、陈盛芳、李达禅，南乡有漆英、易粹轩、丁伍樵、丁燕池、欧阳文楼，西乡有文湘岩、凌拔南、殷萃庭，北乡有刘西岩、傅君剑等，还有城区的史采岩、史民父子和楊钥源等，他們群向反共头子何鍵請求鎮压农民运动；“馬日事变”后，遂与何鍵沆瀣一气，大肆屠杀农民群众。上述著名土劣中有极少数人虽未回县直接参与屠杀，但鼓动和支持大屠杀甚力。其中回到县里直接充任刽子手的有文湘岩、刘西岩、殷萃庭、丁伍樵、丁燕池、史民等人。此外，还有黄励吾、江世永、程毅之、賀石生、刘訪年等都是地方上有名的刽子手。反动政府派到醴陵进行屠杀的著名刽子手先后有彭成美、王学林、郭天保和县长廖邦驊等。还有反动军队“进剿”中的大肆烧杀。在南乡某些地区（其中又以南四区为最惨）被杀得人烟絕灭，等于血洗。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七年“馬日事变”后到一九二八年的一年多的时间内，被屠杀的近万人，被焚毁的房屋达五千多栋。

“馬日事变”后，醴陵的中共組織仍繼續领导农民群众与反动派

进行激烈的斗争，曾经两次扑城，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間反动政府調集大軍开到醴陵，分向四乡大規模“进剿”后，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始撤离县境。其时，王学林率部駐县城，設立清乡司令部，普遍地进行疯狂屠杀，以状元洲和北門外的操场坪为刑場，每日总有十数或数十人綁赴刑場集体屠杀。被屠杀的絕大部分是农民，包括一些小学教师和其他劳动人民，罪名一律是“暴徒”、“共匪”。为了发泄他們的阶级仇恨，对被捕获的人們，每每施用各种酷刑以后，才行杀戮。有时，为了“省事”，就連姓名也不問，随到随杀。事后不仅没有什么案卷，甚至連名单名冊也都没有。因此，当时究竟杀了多少人，醴陵县政府已是无案可查。至于县城以外的各区各乡都有清乡委员会、剿共义勇队、清乡队、挨戶团等等屠杀机构，普遍地疯狂地进行屠杀。他們同样是或施用各种酷刑，或不經訊問，或解县，或就地屠杀，一律是随劊子手們的“意兴”办事。当时，不仅县长、县清乡司令部、县清乡委员会和駐軍头子都有杀人“权”，就是各区、乡的清乡委员会、剿共义勇队长、清乡队长、挨戶团主任以至“进剿”部队中的营、連长也可以任意屠杀，不必上报。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二八年八月間，醴陵清乡队第九大队大队长邹慕萧在醴陵北四区的黄达咀、官庄、潭塘、桃花、金桥湾一带方圆約四十里的地区，屠杀了八百多人，人們称之为邹屠夫。邹慕萧的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平日毫无人性地說：“一日不直殊（那时杀人的习惯是在罪状上或者名单上将被杀人的姓名用殊笔直一直）就打瞌睡。”被屠杀的多是农民，也有一部分小学教师。凡屬“馬日事变”前在农民协会担任过职务或者在农民运动中表現积极而为土豪劣紳所仇恨的，一經土豪劣紳捕送或到队部，或者經队部捕获后，立即就地杀害，即使经过审判，更不解送县里。为了多所株連，或者专为发泄他們的阶级仇恨，經常施用酷刑以后再

加以杀害。常用的酷刑有：“踩槓子”（将被害人推跪在地下，用粗竹两根，一根压在受害人的脚弯，另一根横绑着两只手，然后踩住下一根竹槓，再把上一根竹槓使劲向上抬，使得受害人的骨头喳喳作响，只要抬几下，把槓子一松，受害人便瘫痪在地）、“吊半边猪”（用绳索把受害人的半边手脚系住，吊在空中）、“美人桩”（用木桩钉在地上，把受害人的两个大拇指牢牢地绑在桩上，桩上原有劈缝，插上木尖，然后把木尖逐渐打紧，逐渐勒紧绳索）、“红烙铁”（烧红烙铁，任意烙受害人的身上）、“鸭公吃水”（用水桶貯满水，绑在受害人颈上）等等。平时指使队兵捉人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三千，不要漏跑一人。”邹屠夫在黄达咀一带屠杀的事例，略举几件如下：一、农民傅蒙寿，磅山人，因偷了一次小菜，适邹屠夫初到黄达咀，即将傅拘到，把傅开头刀，以显示下马威。二、朱名成化名王保成，唱花鼓戏的，住黄达咀长岭湾，曾参加农会，后来又加入红军，没有跟上队伍。邹屠夫悬赏银元八十元缉拿他，因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人告密，为邹所捕获，杀害在株抱樟的金桥湾。朱名成死前，为免使妻室受累，曾写了离婚书交给他的爱人，并交代她说：“如果邹要杀你，你只说朱名成已与我离婚，已无任何关系。”朱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农民万岁！”被害后，邹屠夫把朱的脑袋用绳子绑着耳朵，挂在金桥湾路边的一棵大松树上“示众”。三、台洲上有个姓江的，绰号“乌龟”，曾参加农会，被邹屠夫捉到，当晚就杀在沙洲上。杀的时候，江还没跪下，邹屠夫亲手用马刀在江的颈上一刀，没有把头砍断，江倒在地下乱抓，一小时后才死去，地上的草被抓了一大块，死得很惨。四、邓永，蕉源人，业中医，在当地颇负声望，人们称之为邓公。他的师弟解益农被邹捕获，他想去保，又怕邹翻脸，挨邹的板子（邹对待保人经常同加杀戮，至少也得打几十板底

股)，只好装做歇脚的样子到大队部去探望一下。邹见邓来，杀气腾腾地说：“邓公！你是来保蒋益农的吧！”邓连说：“不是，不是，我是顺便来歇歇脚的。”邹立即将蒋益农提出，绑赴门外杀害。杀人的地方离邓的座位很近，刽子手先用马刀上的黑布在邓的面上一挥，随后执刀杀了蒋。邓吓得魂不附体，一言未发，痴痴呆呆地回到家里，当晚就死了。当地人都说邓永年是被吓死的。以上仅就邹屠夫在黄达咀一带屠杀情况略述一二，据说，邹在桃花、潭塘、官庄等处屠杀的人比黄达咀一带要多得多。（程星龄）

“马日事变”后，醴陵城乡的屠杀机构约二十多个，皆有专杀之权。当时刽子手的头目如彭成美、郭天保都是何键所委派的。据我所闻，何键的幕府中有个屠杀策划集团，如凌璋、吴复、吴凯南等，都是醴陵的大地主大官僚。他们议决：凡属加入共产党及农民协会与夫参加暴动的均杀无赦，即系自己亲属，亦不得袒庇。凌璋的内弟汤沛生被捕，凌不许其爱人求情；吴凯南只一子，在县城被捕，吴也置之不救，他们自翊为“大义灭亲”。阶级仇恨之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于此可见一斑。其中又以凌璋为最狠毒。他的父亲凌恩凤被醴陵群众检举为八大土劣之一，因而他对共产党和农民恨入骨髓。一九二七年冬他随同何键逃到常德，喘息甫定，即派郭天保率兵一连回到醴陵，进驻南四区，大肆屠杀。当时有许多青年农民和学生藏匿在山洞中，一时不易搜获，郭天保佯许他们自首，一次被其诱至者达八十余人，在一夜中悉行杀害，无一倖存。到一九二九年五月间，这个地区的“暴徒”被其屠杀殆尽，白色恐怖才较和缓。

当时醴陵分为十五个区，区之下为境。在南乡区分为南一、南二、南三、南四四个区。那时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首推南四区，有“南四国”之称。次之南三区，有船湾、官村、荆温、柴湾、

东山諸境。开始担任清乡剿共义勇大队长的刘訪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即官村境人。他的大队部駐清水江埠。大队之下，各境有挨戶团，专门調查参加友运名单。刘起初动员全区挨戶团搜山，凡在山上搜出来的，即在山上槍毙。经过搜索“围剿”，山上已无法藏匿。以后逮捕縛送到清水江埠的都用馬刀砍头示众。其他各地都在疯狂地屠杀。如賀家桥（屬南四区）一处每日屠杀的达数十人，船湾每日屠杀的也达十余人。某日，船湾桥上一次陈尸达三十二具。在大障（屬南四区）某日一次用机槍扫射了七十余人。南四区著名土劣謝詎膺一个人就残害了他家周围的农民七十五人。在荆温南境，以潘疆爪家为中心，大肆屠杀。潘家住在仓下里，住宅被罗定（攸县人，有名的劊子手）烧了，烧屋时还杀了同屋住的潘老八。潘疆爪、潘清云父子二人是同在江西安福的太平寺捉到的（刘訪年誘令张唐龙、张庆礼、龙接荣等三人自首，“立功贖罪”，由张唐龙三人串通龙渭清，乃得捕获潘疆爪）。清云被杀害在清江乡；疆爪則解到长沙，游街后被杀害。与潘氏父子同时遇害的还有住在离潘家不远的胡嘯淮、胡自然父子。地泉境农民张文成隔潘家只一岭，正在田里犁田，也被捉去杀了。距潘家約一里的杉树塘，有郭祖培、郭登品、郭祖荣兄弟三人同时被害，死得最惨的为祖培。祖培做蔑匠，精拳术，杀害他的劊子手刘尔庆（即刘訪年之堂弟）用几付烙铁煨紅，先烙他的頸背，次烙脑腹，次头面，次四肢，被烙得皮焦肉黑、血流滿地，号呼之声震天。其弟登品系小学教員，被杀在东三区；其三弟祖荣从常德退伍回家，甫抵家，即被捉去砍了头。距潘家北面不远的大坡里佃农张开和只有一子，名黑乃，仅十三岁。他参加过童子团，曾收过人家的祖宗牌子和磬子，也被捉去。开和之妻追随其子到清水江埠，临斬时，紧抱其子不放，队兵多人强力解脫其手腕后，张妻即暈倒于地。黑乃的双手早已反縛，在地下乱

浪，刽子手刘尔庆手执马刀，一阵乱砍，血肉横飞。刘訪年还杀了住在窄冲的刘正和（仅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及住在楊木档新祠的张星（佃农），刘、张两人都是备受酷刑后被杀害的；还杀了两个伯叔兄弟，一名刘尔金，住界陂，一名刘尔宣，住曾家滩，距刘訪年家甚近。刘訪年杀了尔宣而夺其妻彭氏。刘訪年在此时期約計杀害了二百四十多人。（張如非）

“馬日事变”后，首先被何鍵派到县里进行屠杀的是彭成美。彭是东一区拓塘坪人，是个心毒手辣的流氓地痞。清末，他在县衙門充任刽子手，进了帮会，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一九二五年他在陶广部下当差遣，竟为何鍵所賞識。“馬日事变”后，何鍵派他回醴，充任清乡司令，到县后，即将县商民协会委員龔城、丁筱秋等槍决。是年中秋节日，彭成美为张国威部营长张毅中所捕杀。彭在县只两个多月的光景，屠杀了二百三、四十人，他不仅屠杀“暴徒”，并且借以勒索其他商民，遂为商民所控訴。张国威与何鍵一向有恶感，因此指令张毅中将彭捕杀。

文湘岩是醴陵著名的恶霸地主，屠杀农民最凶恶的刽子手。“馬日事变”后，他充任醴陵清乡委员会委員兼剿共义勇队总队长，勒令各乡組織挨戶团，到处清查戶口、搜山、杀人、烧屋、罰款，造成血腥恐怖。据不完全調查，經過文湘岩亲自审問和批准所杀害的近二千人。在文湘岩等主持下，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之間的九个月內，每日总有二、三十个到百来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被屠杀。杀了人，还要烧房子，罰“保人的和救火的与被害者同罪。明月乡大部分房屋被烧，場。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鉄江乡十四保保妙村的全村男女“拘捕，关在黃田荣家祠堂。反动派对这些无辜男女，进行了毒刑审訊，杀害了洪旺升、朱时华等数十人。他們还烧了不少的房屋，勒索了“在

逃的“共匪”家屬的“緝拿費”共三百三十元。××乡的郭登友被挨戶团捉到，用鉄絲穿着郭的手心牵着走，一路滴着血。文湘岩听说捉到××乡的人，不问情由，立即指使队兵把郭拖到門側的草坪里，朝着郭的肚上一刀，腸和血混做一团。共产党员周瑞生被捕，文錫彬来保，文湘岩把文錫彬連同周瑞生一起杀了。“馬日事变”前，朱攸磐（即朱少希，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館員、湖南省政协委员，已病故）任醴陵县长（其时，朱是共产党员，后来脫党），“馬日事变”后逃往上海。朱的父亲朱俊亭，业中医，乡里称之为忠厚长者，与文湘岩有戚誼（文的后母系朱的姑母）。由于朱攸磐是共产党员，文湘岩将朱俊亭拘捕，加以杀害。（朱攸磐还有两个儿子；一名朱广义，化名文希明；一名朱务义，化名匡游泉，均系共产党员，在岳阳被捕，解至长沙被杀害。）当朱俊亭被綁赴刑場时，文湘岩杀气腾腾地站在楼上，目送着朱俊亭被推出大門。朱回顾文說：“湘岩：你太狠毒了！”文湘岩厉声回答：“你的儿子是共匪，我就要杀掉你！”关于文湘岩屠杀农民群众的血腥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以上仅就我所知道的略述一二。何鍵对于“剿共功績”昭著的文湘岩非常賞識，曾委他为华容县长。文在华容任內，横征暴斂，作恶多端，去职后，华容民众为他建立了“遺臭碑”。血債血还。解放后，文湘岩这个著名的劊子手被鎮压了。

孙筱山，共产党员，“馬日事变”前，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委员、农民协会会长、特別法庭庭长等职。王学林来县后，曾懸賞五百元緝拿他。他因肺病严重，隱藏在东堡文广鈞（业医，孙的妹夫）家，为东一区区公所捕获，旋即解县就义。就义时，已病得枯瘦如柴，据說，所中槍彈的口子仅流出少許黑血。当孙被捕后，县政府以藏匿“暴徒”罪緝捕文广鈞，并查封他的家产。文逃来我家（其时，我在省政府建設厅工作），央我回县向县政府疏解。我隔夜

回到县里，会见县长廖邦驊。廖寒暄数語后，立即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是一个省級公務人員，應該知道窩藏暴徒首領的人家，犯的是什麼罪。文廣鈞的事，你不必关說，以免于你不利。”我回县保文的事为县清乡善后办公处主任萧翼鯤所悉，他立即托馬惕冰警告我火速离县返省，以免危險。我遂返长沙，不敢在阳三石車站（靠县城的車站）上車，步行至板杉鋪上車回省。后来文廣鈞家經萧翼鯤疏通，終被反动政府勒索銀元数百元了事。（文斌）

当时王学林的清乡司令部設在醴陵县东城（原遵道医院），并在县城附近到处設置检查哨所，严密盘查来往行人，只要匪軍认为可疑，立即加以杀害。当时失踪的人日有所聞，因而在城里的人不敢下乡，乡下的人不敢进城。除王学林而外，还有郭天保、彭成美先后充任清乡司令。他們不仅盘踞县城，天天杀人，并且經常率部清乡。南乡某地有农民兄弟两人，同在外面挑糞，累得汗流气喘，想回家歇息一下，刚刚进入家門，恰遇着清乡队兵进屋，看見他弟兄汗流气喘，形迹可疑，立被推出門外槍杀了。其他凡屬被搜出有梭标、烏銃、或其他队认为可疑的物件的，一律作为“暴徒”罪証，立即处死。一时无緣无故被匪軍杀害的不知多少。

郭天保率部駐在南乡某小市鎮上，看見一个少年妇女，即将司令部移駐她家，进行調戏。这个妇女的丈夫是个小学教員，因参加过农民协会工作，一时无处逃避，只好隐藏在家里的楼上。她为了营救丈夫，在威迫之下，遭受了郭的侮辱。她的婆婆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跪在郭匪床前，陈述儿子隐藏在家的实情，哀求救全他的生命。郭匪滿口答应，但当他率部他往，离鎮不远时，立即命令队兵折回他家，将她的丈夫捕杀在門首。

陈增，醴陵北乡人，在王学林部当营长，随王駐在醴陵。陈的老家的邻居刘福泉（农民）接到一封向他勒索的匿名信，比即带

着这封信进城想見陈面訴，行至城郊被清乡队的检查哨搜出信件，指为嫌疑犯，当即捆送司令部。当刘福泉进城时还有个同伴，刘被捕后，他的同伴急忙奔告陈增鴻。陈即时向王学林說明刘某被捕原由，請予保释。王当已允許，但未及开释。刘福泉的同伴不放心，守在清乡司令部附近探听消息。翌晨，听說司令部准备杀入了，提出十七人，其中竟有刘福泉。刘的同伴为之大駭，又奔告陈增鴻。陈轉馳司令部，果見刘等十七人正在上綁。乃囑劊子手們稍稍停候，跑去質問王。王竟泰然对陈說：“杀掉算了！”陈坚决要求保释，王始命将刘福泉释放了事。其余十六人被押往状元洲，用机枪扫射。王学林駐在醴陵时，每日必杀人，杀人时，只将被押“人犯”的名冊，随心所欲地勾画一笔，批上“槍决”两字，立即执行，既不經訊問，更不必說什么証据了。当时称之为“在冊者难逃”。王学林在醴陵屠杀的达三千多人（根据卜世藩为王母做寿序所述）。

当时东三区的最凶残的劊子手是李善阶父子。在一九二八年的三、四个月內，单在王仙鎮的洲上，每日都陈列着鮮血淋淋的尸体，在桥头的一个塔上，經常挂着几个人头示众。这些人都是李善阶父子所屠杀的。他父子手下有个李耀奎，綽号耀奎矮子，东三区人，被他用小刀杀死的人不知多少。我亲眼見過他押解农民，經常用鉄絲穿着人們的肩膀上的横骨，血淋淋地牽着走，使得旁观者都为之掩面。（阳伯霖）

江世永是醴陵东三区的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出身于地主和巨商的家庭，从小就橫行霸道，不务正业。約在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間，他繼承祖业，在白兔潭開設紫华斋南貨店。“馬日事变”后，当地土豪劣紳推荐他替区清乡委员会搞财务。他除了极尽敲詐勒索之能事外，还經常率領队兵到各乡村捉拿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从而获得何鍵和当地土

豪劣紳的賞識，一九二九年遂擢升為“鏟共義勇隊”大隊長兼清鄉委員。江“大權”在握，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大事培養親信，作為他的鷹犬。例如他的大隊里的一名排長李耀奎（當地人民稱之為李屠夫），先後殺害了二百多人。某次，他用馬刀接連砍下了九個農民的头顱。其他如第六隊隊長張余蓄、義勇隊隊長李昌炎、晏祖之、徐显、巫申國、易振玉等都是當地有名的劊子手。江世永還密布偵探劉春生、易華丁、周新根、石維欽、陳宗琪、吳旦生、李開發等於各地區，窮凶極惡地進行搜索燒殺。就我現在所能記憶的，這個時期被江世永殺害的有第八區黨部負責人蔣國志（又名蔣老四）、彭家聲以及共產黨員和區、鄉農民協會負責人馬先華、吳瑞琪、馮獻龍、馮忠期、馮忠永、陳章恩、吳銘茂、吳開齊、楊開榜等多人。一九三〇年江世永升為區長。這時他與反革命分子陳章應一道，燒掉了李覺非（共產黨員，本人在長沙被何鍵殺害）、李秀新、李秀元、李發培、廖贊昭、李秀泉、李紹鄴等人的房屋數十間。是年中秋節，江世永趁吳成友、吳成谷（共產黨員，鄉農民協會負責人）在他們的弟弟家裏吃飯的時候，將同桌吃飯的八個人一起殺掉，其中有一個是吳家的新女婿也無緣無故被連帶殺害了。接著又把吳成友等在荷田鄉界牌山的住宅和附近三個村莊全部燒光。在這一時期被他屠殺的共產黨員和農民群眾還有李秀富、吳榮茂、吳才性、李昌國、李傳友、傅文清、傅文誥等人。據不完全統計，先後被江世永所屠殺的約三百多人。解放後，這個血腥的劊子手逃往浙江金華，直到一九五三年九月才將他逮捕，解回醴陵予以鎮壓。（李敏）

陳奏凱，醴陵東鄉富里境馬家洲人，曾在第六軍當連長。一九二六年回鄉，因劫奪農民協會的槍枝，被捕送縣法辦，旋即獲釋。

“馬日事變”後，陳乘機報復，於一九二八年取得“清鄉鏟共”的職權，率部回鄉，大肆燒殺。農民協會職員馮獻農被其槍斃，連不

滿十六歲的馮貞英和李傳×都被他親手殺害。富里一帶被其屠殺的人很多。馮又村、李秀源、李覺非等十多家的房屋都被他焚毀。

廖淡空（曾任國民黨醴陵縣黨部常務委員）之兄廖曠然素以醫為業，並未參加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夏淡空逃匿鄉下，曠然留縣城營醫。反动派誣他為乃弟坐探消息，私通“共匪”，不准群眾保釋，立予槍斃。國民黨員龔城平日不滿共產黨，自謂可保無事，也為反动派所殺害。當龔被捕入獄時，典獄吏曾××（忘其名）說了一句：

“他好像不是共產黨，也要辦嗎？”立即被撤職。縣商民協會職員凌漢良、丁筱秋都非共產黨員，也自謂無事，沒有逃走，都先後被殺害。中共黨員孫筱山、易延學、汪澤嘉躲在家乡，李覺非、唐寄凡逃往長沙，都遭殺害。當時醴陵被屠殺最慘的地區首推南四區，據說，僅在一九二八年的半年左右就殺了六千多人。

易萃軒本是醴陵南鄉的土豪惡霸，他的孫子易湘佐並未參加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冬，易湘佐在他的岳家西陵的王繼宣家裏度過除夕，元旦大雪紛飛，他獨自一人進縣城玩耍。當他在岳家時，曾見地主王麓槐家附近起火，人們都說是王麓槐家被共產黨燒了。他在縣城遇見王麓槐，對王說：“你的屋燒了”。後來又有王的鄰人到縣，王詢知自己的屋並未燒掉，遂向清鄉委員會控告易湘佐是共產黨，到縣城刺探消息，並造謠攪亂。清鄉委員會立即將易湘佐逮捕，次日即予槍斃。（李味衣）

一九二八年農曆二月某日，醴陵縣政府在郵電檢查中檢出了一封信，是某某人寫寄縣城某街某號的，收信人名易湘清。信很簡單，只是向易湘清詢問龍某的通訊地址，請易回信西后街某號。縣政府即據此將易湘清逮捕。易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法官問易，寫信人和龍某是誰？住在哪？……什么的？和你有什麼關係？等等。原來寫信人用的是化名，龍某也是代名。易湘清什麼也招供不出。

县政府一面将易收监，一面派兵到西后街某号搜捕。不料某号住的只是几个细脚妇女和小孩子，没有可疑的成年男女。向这家询问写信人是谁，她们都回答不知道。县政府几次审问易湘清，几次搜查西后街某号，始终不得要领。

易湘清的胞兄易湘铭（与我有瓜葛亲戚，这事就是他亲口向我讲的）在白崇禧的指挥部当少校参谋，驻在长沙，闻讯赶回醴陵营救胞妹，奔走了几天，没有眉目。易湘铭有两个同学好友在王学林部下，一充参谋，一充副官。易找他们求计。二人以易湘清年才十三岁，无辜被捕，甚为不平，遂带手枪偕同易湘铭去找县长廖邦驊交涉。行近县政府，恰遇一伙枪兵押着插上了“标子”的易湘清赴刑场执行“枪决”。易湘铭等三人立即扯出手枪横街拦住行刑队伍，逼着他们把易湘清带回县府。三人同廖邦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易湘清得以不死，但后来三人都受了处分。易湘清被保释后，不久即病逝了。这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劫杀场”案。（谢世基）

许大冲，“马日事变”后任醴陵县政府法官，后来在复兴银行工作，与我同事，曾对我谈及一九二八年反动派在醴陵进行疯狂的大屠杀。有一次，南乡清乡委员会押解七个农民到县政府，县政府移送县清乡委员会办理。当日就听说清乡委员会已将这七个人全部“处决”。许即去刑场看看，布告内所列举被害人的姓名就是他所经办的移送去的那七个人；可是刑场上却摆着八个尸首。他去清乡委员会查问，原来这八个尸首里面有一个是忙乱时被错杀了的押解这七个人的狗腿子。因为当时县清乡委员会“处决”农民，例不详细审问，即便屠杀。当日县政府移送这七个人到清乡委员会时，清乡委员会的头目即时坐堂，仅吆喝一声：“一齐上绑枪决！”这七个农民号呼：

“我们并不是匪犯，为什么问都不问就上绑！”刽子手听得上面吩咐“一齐上绑枪决”，便把押解“匪犯”的狗腿子也绑起来了。狗腿子

分辨自己并非“匪犯”，为什么也上绑？在刽子手听来，狗腿子所说的和那七个农民所说的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便把他当作“匪犯”，一齐绑去枪毙了。因此，布告上明明只写七个人，刑场上却摆着八个尸首。当时，反动派“宁肯错杀三千”，多杀个把人不算一回事，因而事后也就没人去查问它的究竟。（陈乃一）

长沙东乡白色恐怖一斑

罗文温

一九三〇年秋，红军再度进攻长沙，平江、浏阳和长沙东北乡的农民群众以为翻身的时刻到了，纷纷起来组织农会，斗争地主，支援前线，给反动统治阶级很大的威胁。红军转移后，反动派在各地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仅长沙东乡的尊阳、清泰两都（旧乡镇）方圆数十里的地方，也杀人近千，出现了两名凶恶的刽子手。其一是尊阳都（现在金井、高桥一带）的金鼎（号宝华，解放后镇压了），杀人近三百；其一是清泰都（现在白沙桥、福临铺一带）的梁镇球，他杀害农民和进步人士三百七十余。在蒋介石、何健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政策纵容下，这些刽子手可以毫无顾忌地任意杀人，将农村变成恐怖世界。

我是清泰都人，关于梁镇球的罪恶事实多所闻见。但以事隔数十年，只能就记忆所及，略述其梗概，也可见当年白色恐怖的一斑。

梁镇球，由于他疯狂杀人，后来绰号“梁剃头”。他是清泰都白沙桥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曾充小学教员数年，后投入国民党反动军队，当过低级官佐，离开军队回家，复以贩卖土布为业。因

为他平时言論表現反动劲头十足，所以在紅軍轉移，何鍵开始清乡时，即被都总黃悌清和地主豪紳們物色出来充当清泰都上五区鑓共义勇区队长（下五区区长范觀熙），以鎮压农民群众。他的区队部設在白沙桥附近的天王寺。

清泰都与平江接壤，两县人民素多往来。梁鎮球見紅軍是从平江来的，說到长沙境内来的平江人都是“探子”，开始是捉到平江人就杀，后来是只要操平江口音的人也在屠杀之列。如龙冲里一个推长路車子的李炳仁，有个儿子李大，在平江学木匠。当时李大帶了几斤土烟叶回家探亲，被捉到天王寺。幸其父得訊，星夜用轎子抬了一个姓向的紳士去保救，才幸免于死。由于梁鎮球的疯狂屠杀，平江人聞风却步，都不敢再到长沙境内来。

平江人既不敢入境了，梁鎮球的凶鋒即轉向本乡人。凡在紅軍来时稍有活动和言論的，都被当作“暴徒”，有突遭捕杀的危險。被他杀害的人，許多連說一句話的机会都沒有。因为他常派队丁出去抓人时，事先交代在某地杀了就是；有时突然抓来了什么“探子”

“暴徒”，不要說問姓名，連天王寺的門也来不及进，就被在門前稻田里砍了头。但是，为了威胁群众，他也喜欢游行杀人。有时押几个或十几个人，从天王寺出发，走几里杀几个，杀完为止。記得当年农历九月初五那天，鑓共义勇队从天王寺綁出易界山（乡人称鋸木工人爲界山师傅）等十二人，一路游行喊口号，在师冲桥杀易界山和另一农民，其余十人解經我家对門清泰桥古大道至福临鋪对面的左公岭尽杀之。在許多杀过人的稻田里，因为沾染了劳动人民的鮮血，第二年，一团团的禾苗长得特別高，特別黑青。行人凭吊，多为之黯然。

梁鎮球杀人既然这样凶残和草率，往往有些被害者还搞不清自己犯了什么“罪”，就被槍毙或砍了头。大約是农历十月的一天，木

工周桂欽和篾匠李一，突然被抓到天王寺去，一言未問就被殺在寺門前。事后才知道是惡霸地主楊三益曾奸占石燕冲年輕女性鄭××，鄭同時又與周桂欽和李一來往。楊三益因爭風吃醋，以銀洋四十元賄梁，遂將周、李捕殺。此事發生后，群眾憤恨已極，而迫于淫威，莫可如何。在反動統治階層中也曾有人議論，但窮人的死活，畢竟不關他們的痛癢，還不是議論議論算了。

在梁鎮球瘋狂屠殺的時候，被害人的家財也常被“抄沒”，牲畜谷物，無所不要。由於財迷心竅，他由殺“暴徒”轉而變為公開的謀財害命。據現年八十的楊姓老人回憶說：“我的親家余二和常同嚴偉成到湖北一帶做棉花、布匹生意。某天，嚴偉成剛從湖北買回一些棉花，梁鎮球突然將他捉去，關了兩天就殺了，並將嚴家的棉花、布匹和衣物等盡行‘沒收’。在捉嚴的第二天，將我親家余二和也捉去了，幸亏他的族人余一和是有勢力的士紳，才把他保了回來。我親家是一個老實農民，遭到這樣一吓，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梁加給這兩個人的“罪名”是什麼呢？據說，有一隊丁在黃氏汀龍橋上拾到一張字條，上寫：“嚴偉成共產第一名，余二和共產第二名。”天曉得，這張條子是怎樣來的！又我的鄰居馬公塘譚某，在大革命時曾當過鄉農會委員長，“馬日事變”后，履行了“低頭伏罪”的手續，請了客，寫了“悔過字”，以后一直沒有參加過政治活動，辛勤耕種和做点小本生意，省吃儉用，頗有積蓄。梁覬覦其財富，說他是共產黨，突然派兵圍捕。譚去漢口賣布未回，免遭毒手。梁乃將其家產“抄沒”。譚的老父跪求將一只不滿二十斤的豬崽留下，反遭一頓毒打。

梁除了殺害農民和小商販，對於進步的知識分子也極力摧殘。被他殺害的許多人中，尚能記憶其姓名的，有小學教師楊蔭農、鄭家一（女，楊柳坡小學教師）。她們平時有進步言論，對現狀不滿，

为地主阶级所仇视。梁加以“罪名”，先后将她们捕杀。郑家一旦被非刑拷打，弄得手脚残废，口不能言，最后用独轮车载之，惨杀于杨氏秋月桥头。

梁镇球只当了三个多月的区队长，除杀了三百七十余人，也“没收”了不少财物。他将这些抢劫来的财物的一部分买了一百多担租的田，盖了一栋房子，成为当地的恶霸地主。

在梁镇球疯狂屠杀无辜群众，许多人家在痛哭失去的儿子、丈夫的时候，地主阶级却在额手称庆地说：“梁镇球真有魄力，有办法，快刀斩乱麻，杀得痛快及时！”有的说：“不搭帮梁镇球，那真不得下地！”当时城乡地主豪绅，如后来充当长沙县镇共义勇总队附的王籽科，湖南全省水警总队长李笔青，和缪梅亭、罗先国等，都认为梁是“闾里屏障”，极力支持他，向省、县当局表彰他的“功绩”，提升他为支队长。

湖南解放前夕，梁镇球又出任长沙县第×防区（县划分为几个防区）副主任，纠集地主武装二百余人，准备继续与人民为敌。他表示自己人虽老而杀气犹盛，说：“磨刀霍霍剑欲鸣”。言下不禁洋洋得意。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就到了东乡一带，这个刽子手的“壮志”未酬，即被大军缴了械。梁旋即被逮捕，长沙解放后，在东乡公审伏法。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馬变”前后反动派在临湘屠杀的片断見聞

呂日三

临湘地居湖南北部，与湖北省接界，西滨大江，粤汉铁路纵贯其間，在軍事上处于重要地位。地方封建势力历来极为猖獗，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压迫与剝削。在“馬日事变”前后，这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尖銳的地区之一。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入湘前不久，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农运特派員李中和来县，开展农民运动。李出身手工业工人，平江人，中共党员。他到临湘以后，积极领导农民組織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在一个短时期內，参加农会的农民达数千人，后来发展到万人以上。北伐軍过境以后，临湘农民运动由过去的秘密活动轉为公开活动。这时，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打击土豪劣紳，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正当革命的人民兴高采烈揚眉吐气的时候，地方封建势力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則忧心忡忡，心怀不滿，伺机进行报复。

一九二七年春天，国民党省党部內部已发现了“左社”反革命組織，以大恶霸地主刘岳峙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暗中进行阴谋活动，他們糾集各方失意政客及各类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組織地向革命猖狂进攻。全省好些地方也发现了“左社”分子的阴谋活动。国民党临湘县党部的领导权，为“左社”分子詹先甲等所篡夺。詹等与当地土豪劣紳秘密勾結，企图利用团防队的武装，破坏农民运动。

李中和及时揭露了“左社”分子的阴谋，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湖南省党部查明这一情况后，即下令解散临湘县党部，并于同年二月間派員来县，进行整顿。通过重新登記党员，健全基层组织等一系列的工作，新的临湘县党部在四月間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中共岳阳中心县委派員来临湘，秘密建立起县委机关，李中和参加了县委领导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原先畏罪逃往武汉的“左社”分子詹先甲，又潜回临湘活动。经过群众检举，当即逮捕了他，由县党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人心大快。随着党务农运训练所、农民自卫队的成立和詹先甲的伏诛，革命气氛空前高涨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临湘县党部委員李国廉等前往长沙开会。不料在他们离县期間（五月中旬），临湘的反革命分子以团防局袁定衡为首，率领地主武装向县城进攻。事出有因，变起仓卒，许多革命工作人员惨遭杀害，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先是，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部队狼狼潰退，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土豪劣紳們为了維持其封建統治，紛紛收購散落民間的槍支，在县城及各区鎮大办团防局，扩充地主武装。到一九二七年春，这样的团防武装，全县已有五六起，槍支总数近千。詹先甲虽被处决，但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并未彻底粉碎。党务农运训练所和农民自卫队成立后，訓練工作刚刚开始，还不可能成立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时，团防局方面就曾多次进行挑衅。由于处置得当，才沒有酿成大的事变。五月中旬，长沙方面反革命軍官許克祥等正在阴谋武装叛变，临湘反动派控制的团防局，就接到了上级反动派的密令，先行举事。分布在陆城、沅潭一带的忠区团防分局，有人槍三百余，一向收容土匪，无恶不作；这时，在分局长袁定衡的指揮下，突然

袭击县城，形势非常紧张。中共組織为了应付反革命事变，决定将各机关团体撤退到云溪。因为云溪团防分局长李秉章，表面倾向革命，其子李石鋒系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李秉章有人枪百余，如果与革命武装力量通力合作，是可以打击袁匪的进犯的。

李中和在撤退途中，和农民自卫队一道，与袁匪发生接触，终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当各机关团体人员及农民武装队伍共两百多人退到云溪时，詎料原先认为可靠的李秉章，突又与袁匪合谋，指挥团防武装加以包围袭击。经过一场混战，许多人被惨遭杀害，有些人则被俘了。李中和也就是在这次混战中不幸被袁匪俘获的。

李中和被捕后，袁匪曾多方威胁利诱，逼令通知解散各区农会，交出农民武装，均遭到他的坚决拒绝。袁匪恼羞成怒，竟施用毒刑折磨。李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骂不绝口，并唱“国际歌”，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于是割掉他的舌头，挖掉眼珠，最后剖腹挖心而死，真是惨绝人寰。

在云溪事变发生的同时，还有县妇女协会会长黄淑，由沅潭前往藕市。她刚骑马跨进街口，就在离福音堂不满百步的地方，被袁部匪兵逮捕了。袁匪审讯时，她也坚贞不屈，竟被挖掉耳鼻乳房，斩掉手足，最后剖腹殒命。黄淑是大革命时期临湘妇女界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李中和被害以后，桃区农协委员长李高峰，也被当地团防分局吴云生逮捕，严刑拷打，体无完肤。最后被敌人从头至腹砍成两边，分挂桃林港东西两岸，示众多日，见者无不心酸泪落。总之，在这次反革命事变中，临湘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反动派杀害的，不计其数。农民群众被土豪劣绅陷害而家破人亡者，更是不胜枚举。

临湘这次事变，发生在长沙“马日事变”的前几天。事变当中，

粵漢鐵路長武段曾一度被破壞，車輛停駛，因而長沙形勢更形緊張。不數日，而“馬日事變”作矣。

“馬日事變”以後，國民黨反动派在臨湘各地展開了瘋狂的清鄉屠殺，臨湘縣也陷入嚴重的白色恐怖中。據我個人的回憶和訪問所得的材料，舉例如下：

一、一九二七年八月，我友羅金榜因事到柳廠去，途中遇着團防隊長喻大道，殺害了學生柳欽之及農民劉某等六人，均指為共產黨。

二、據臨湘一中呂彪同志告我，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間，陸城鴨欄磯一帶，反动軍隊營長艾某，先後屠殺農民龔南生、彭德仁等三四十人。

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西塘农会負責人馮可安、馮國政，被袁定衡捕殺，暴屍兩天，不准收殮。

四、托坝农民馮其義，大革命時期加入過共產黨。一九二八年被袁定衡捕獲，將遭殺害。其父馮友初愛子心切，挺身而出，說自己是共產黨員，兒子不是的。結果父子兩人，慘遭殺戮。

五、方山人廖貞山，“馬變”前是岳陽縣农会的負責人之一，“馬變”後逃亡出外。一九二九年因病偷回家鄉，躲在他家的谷箱內。當地挨戶團分隊長夏鳳初得到密報，馬上帶領武裝到他家搜查，並鳴槍示威。廖悶閉箱中，終被驚死。夏等搜查無着，揚長而去，旋又折回再搜，在谷箱中發現廖屍，還灭绝人性地補了几槍。

“馬變”以後國民黨反动派在臨湘的屠殺，從以上幾個例子就可以想見其殘暴的程度了。這些片斷的材料，也最深刻地教育了我們：千萬不可忘記階級仇恨，千萬不可忘記階級鬥爭。

（湖南省文史研究館供稿）

“馬日事变”后湘乡屠杀概况

宁純宣 李良佐

一九二七年长沙“馬日事变”后，湘乡县也随即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遭了疯狂的屠杀。許克祥部营长罗鑫（湘乡人），湘乡县团防恶霸楊道南、蕭介藩、程希洛、刘咸熙、賀兆崙，以及后来的县长田稷丰等都是当时恶名昭著的刽子手。

“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三日），湘乡县許多因逃避农民斗争而聚集长沙的土劣豪紳，在彭某和罗鑫等主持下，假鱼塘街天乐居旅社举行会议，阴谋对湘乡地区的革命运动进行镇压。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湘乡县分会筹委会，以省救党委员会特派員楊民熙和罗鑫等为筹备委員。会后，他们还发出了拥护許克祥反共的通电。不数日，許克祥的部队就向湘潭、湘乡方面开拔了。

当“馬日事变”的消息传到湘乡时，共产党员胡叔尼（时任国民党湘乡县党部常务委員，后在长沙被何鍵杀害）和县农会委員長曾策，县工会委員長王揚，以及聶昭良、柳宗陶、李人麟、李少白、陈式南等，将湘乡的民众武装力量和工人糾察队、县政府的常备队等共四百多人槍，以及以梭标为武器的农民自卫队三百余人，編組为“湘乡县工农义勇軍”，准备应付非常事变。

五月二十八日左右，罗鑫的部队已由湘潭向湘乡推进。湘乡方面据报：即由胡叔尼、聶昭良、柳宗陶等率义勇軍誓师迎战。义勇軍刚开到馬坵鋪，即与罗营前卫連遭遇，甫交鋒，罗部即不支而退

至云湖桥。次晨，罗营全力反扑。义军被击溃于馬坵鋪、銅錢湾地区，伤亡不少。

罗鑫督队狼奔豕突地进入湘乡县城，即发出一通布告，逼走了县长姚彦文，以营部书记官李瑞麟取代。记得罗的六言布告前四句是：“照得姚逆彦文，久已包藏祸心。本军弔民伐罪，犹敢遣将调兵。”李之攫取县长，实先啣許克祥令，主要目的在便于筹集“军餉”，故旬日之間，即搜括得銀洋五万元以上。

罗鑫布置爪牙取得湘乡政权，随即与何达道、周肃助等组成国民党救党委员会湘乡县分会（筹常委楊民熙由长沙赶来时，也只能以特派员身份侧身其间了）。李瑞麟则召开各公法团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各地团防队，并特别召集大恶霸程希洛、賀兆崙等密謀鎮压工农群众。反革命群魔蠢动起来之后，即推派县商会会长刘富襄赴湘潭迎接許克祥。許到湘乡的次日，湘乡反动派举行了欢迎大会。他在会上致詞，极力誣蔑共产党，号召地主豪紳共同反共，以保“桑梓安宁”。这些大概都是六月上旬的事情。

許克祥匪部在盘据湘乡的短暫期間，造成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被他們杀害的人不知多少。同时，湘乡县的地主豪紳們也組織了一个“善后委员会”，作为县政的最高决策机关，以赵恒惕搞省宪时遗留下来的那批县議員为委員，以搞过省議員的大恶霸程希洛为主任委員。許克祥部离开湘乡后，該会即决定恢复团防局。原来，湘乡县的首、中、上三里都設有团防局，萧介藩、楊道南、刘咸熙分任局长。农民运动开展以后，这些团防局的武装，都被各地农民协会接收了。許克祥部到湘乡后，又协助各地豪紳将这些武装从农民手里夺取过来，逐渐形成有組織的地主武装。当“善后委员会”决定恢复团防局时，即仍以萧介藩为首里（今属湘乡县）团防局长，楊道南为中里（今属双峰县）团防局长，刘咸熙为上里（今属醴源县）

团防局长，負責各里的清乡“鎮共”任务。

一九二八年春，川軍向成傑師入湘乡，以其部屬四川人田履丰为湘乡县长。时湘乡善后委员会改为清乡委员会，田兼主任委员，程希洛为副主任委员。不久，川軍离去，田失去靠山，乃以屠杀工农群众和革命人士来取得地主当权派的信任。他对程希洛、萧介藩、楊道南等表示，只要团防局拿解共产党员及“暴徒”到县府去，他一定不讓生还一个。由于他与楊道南等沆瀣一气，疯狂地屠杀人民，也获得了何鍵的賞識，連任湘乡县长达六年之久。

罗鑫、田履丰、楊道南等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血腥罪恶是擢发难数的。茲就見聞所及揭举如下：

当許克祥的部队开到湘乡以后，地主阶级越发嚣张起来。他們紛紛組織武装与組織起来的农民对抗，各地大打小打的消息时有所聞。許克祥也派兵协助他們收繳农民的武器。蚊子山之役，王萼、李嘯山、王俊恒等领导的农民自卫队失败了，許多队员被杀害。谷水地区有一起約三十余人的农民自卫队，有天轉徙到谷水对河的土塘开会。他們为防敌人的袭击，将渡船停泊于谷水对岸。不料匪軍由谷水上游約四里处的桑榆堂偷渡，繞道包围了他們。待他們发觉时，已无法脫逃，而几杆梭标，也不能发挥作用了。这些人当时被匪兵們一頓乱砍乱刺，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兄弟二人同在参加會議，其父聞警，使其十二岁的孩子給他們报信，也被杀害。有一个队员被刺杀在隣屋樓上的大木桶內，几天以后滴下血水才被发觉。据罗季則回忆，匪軍在这一次屠杀后，繼續在谷水一带协助团防队清乡，許多农民家里遭到烧杀搶劫，在土塘洲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不知洒了多少农民的鮮血。他說，当时流传有这样两句歌謠：“劊子杀人不眨眼，农民血染土塘洲。”

刘庭甫，县农会的秘书。罗鑫匪軍进城时，趋避不及，遂被害。

彭銀和，馬鞍山人，某區農會會長，被土劣抓進城來，也為羅鑫杀害。

有个朱九瞎子，曾率領过农民数百，在青樹坪大地主刘敏吾家鬧过平糶。刘怀恨在心，偵得朱藏匿在汽車站附近，即以三千块銀洋賄通羅鑫，將朱逮捕槍杀。

鎮湘樓碼頭工人譚漢章，曾任工人糾察隊員，緝拿过大惡霸地主賀崇德。“馬變”后，譚仍在湘鄉附近以販賣瓦器為掩護。賀崇德乃以重金向羅鑫買得一副官名义，到处偵伺譚的行踪，終將他捕交羅鑫杀害。

上面提到的王萼，号芝堯，共產黨員，一九二三年在湘鄉東學學校教書，是年秋赴苏联留学，大革命时期回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作。“馬日事变”后，他潜回湘鄉与李嘯山、王俊恒等領導农民进行武裝斗争，蚊子山失敗后，轉入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夏，为楊道南偵知，捕解县城。田頌丰初誘其自首立功，为王坚决拒絕。程希洛說：“这是湘鄉罪魁，非杀不可。”王遂从容就义。

王力农，双峯梅山坪人，共產黨員。他以为自己搞革命活动是在外乡，湘鄉人知道的很少，乃于一九二八年春在家乡开办一所私塾，邀集一批青年就学。某晚，敲門声甚急。刚启門，楊道南的团防兵蜂拥而入，將师生关在一室，只問“哪个是王力农？”因王年輕，匪兵分不出師生，盤問甚久，学生都不肯指出。有一学生扯王衣，意欲其往后門溜走。王恐株連学生，遂挺身就捕。是年七月某日，王就义时，因在县政府大厅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田頌丰乃要劊子手將王押回，在天井里撿些石子，破布塞滿王口，不使再喊。原来本是决定用槍杀他的，田兽性发作，复改用刀杀。而刀又染滿血鏽，一刀仅將王砍倒在地，劊子手再一頓乱砍，致死者血肉橫飞，慘不忍睹。

王修翔，湘乡城关镇人，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湘乡县党部青年部长。“马变”后，王逃到衡阳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为叛徒刘汉所卖，被衡阳团防局逮捕，复被田稷丰、萧介藩提回湘乡杀害。

被田稷丰等杀害的共产党员，还有青树坪陈松柏、荷叶塘左济安和丁福贵等。田稷丰等所杀害的人，是否都是共产党员，那是搞不清楚的。记得一九二八年八月，湘乡县开教育行政会议和教育代表大会，每天都要杀一两个人，以向豪绅学痞讨好。同年十月开县运动会，田又说共产党会要捣乱，开会之前，也枪杀了两个人在运动场边。这些刽子手对于被害人，还使用了各种毒刑。共产党员丁福贵和被诬为共产党分子的湘乡公学英文教员胡子祺等，都被用香火烙背，至于一般的拷打则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湘乡许多搞团防的恶霸中，杨道南是一个最凶恶的刽子手。杨号子澄，以办团防起家，“马变”后更杀人无数。据他自己说，平生杀了一千二百人。他手下除有一批团防兵外，还组织了地主子弟朱雪樵、赵虞山等数十人作为他的鹰犬。他把这些人编成所谓“学生队”，每人自备手枪，到处侦伺他们所要缉捕的人。除前述被害者中，多是杨道南所捕送到县的以外，他还杀害了荷塘农会会长曾国强和永丰的萧衍、李嘯山等一些共产党员。下面我们再举一二血腥事例来看看他的凶恶嘴脸吧。

四十七区（现在的新泽公社）农会会长李履綬，原是杨道南的学生。杨曾劝李不要参加革命活动，为李所拒绝，因而恨之入骨。“马变”后不久，杨风闻李潜藏在马塘地方，乃率队往捕，离马塘不远，即派“学生队”潜入马塘附近侦伺，李遂为所获。李家人闻讯，即罗掘光洋五百元送给杨道南的兄弟杨树成，央其为李说情。但李被捕的第二天，即被杨解回四十七区准备杀害。临刑之前，李以为杨树成总会赶来保救的，为了拖延就刑时间以待杨至，伪装便急，呆在

廁所里。楊道南見一再催促，他總不肯出來，兽性就發作了。他自己跑到廁所里將李拖出來，大聲吼道：“今天不是先生殺學生，而是政府殺‘暴徒’！”說完，即將李槍殺了。

楊道南不僅殺進步人士，凡對他有所抗拒的，他都可以隨便加人死罪。如他不喜歡唱花鼓戲，凡捉來唱花鼓戲的都要打屁股。有一天在清水坪楊柳井捉了唱花鼓的木匠王益亭，照例打屁股。王以無端受辱，可能有點不服氣的表示，楊乃令匪兵加勁打。後來有人報告說，快要打死，實在再不能打了。楊却大聲說：“這是個土匪，拿去補一槍吧！”王益亭就這樣被他任意殘害了。

本篇所述史實極不全面，但即此可見當年反革命瘋狂屠殺的一斑。其中有些資料是胡慶典提供的。并此注明。

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

——记谢晋两次赴南昌的经过

谢 宣 渠

谢晋是我的父亲。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我在堵击由武昌城内突围出来之敌的战斗中负重伤，在汉口天主堂医院就医。当时，我的父亲也在武汉工作，在国民政府酝酿迁都武汉期间，两次奉派到南昌去和蒋介石、谭延闿等人接洽。

我直接间接地不止一次从我父亲处得知梗概。现在写述出来，供研究那个时期历史者的参考。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以反共为目的，在广州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革命的人们及群众，莫不对之具有戒心。由广东随军队参加北伐的共产党员，怀着满腔革命的热忱，在战争进行中奋不顾身，与强敌搏斗，以期早日到达武汉^①。九月间，正当北伐军直

^①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员，因受蒋介石的压迫（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和对其反革命阴谋的暴露，非常愤怒。有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共产党员，对当时党要他们仍然喊“拥护蒋校长”的口号，非常不满。周恩来曾对随军北伐的共产党员讲话，其中有：“亲爱的同志，你们安心地努力工作吧！革命是发展的，打到了武汉以后，我们就会有办法的……”因此，大家希望早日到达武汉。

搗武昌城下，漢口攻下不久，廣州方面和北伐前線的反蔣浪潮便在醞釀。中共前委負責人聶榮臻，在武昌近郊南湖文科大学（第四軍政治部所在地），召集在前方軍隊里工作的一部分負責干部蔣先云、陳奇涵等商討結果，認為反蔣可能影響前方軍事，主張暫時採取謹慎態度，並由聶榮臻電告廣州方面黨的組織。到了十月底，武漢三鎮的敵人被擊退，湘鄂贛三省確保無虞，全國革命形勢正蓬勃發展。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呼聲，隨之高漲。這時，國民黨中央已經決定由廣州遷往武漢，但蔣介石則挾持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及國民黨中央委員何香凝、朱培德、李烈鈞等十餘人，逗留南昌，力阻前往武漢。

按照當時國民黨的總章規定：中央黨部所在地，須為國民政府所在地。因此，雖有遷都武漢的決定，而政府主席及國民黨一部分中央委員，被蔣介石挾持在南昌，却无法行使國民政府職權，國民黨中央亦不能正式在武漢舉行全體會議。

基於上述情況與革命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派謝晉秘密赴南昌，聯絡被蔣介石挾持在南昌的譚延闓和其他一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促使他們前來武漢。謝晉遵照這個指示，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秘密到達南昌，住在譚延闓處。他促譚速赴武漢，商議對付蔣介石的問題。譚已同意，正擬設法離開南昌之際，為蔣介石察覺，極力阻止他到武漢去。譚迫於蔣介石的壓力，不敢貿然前往，乃促謝晉速離南昌，臨行時並交給密碼一本，約定爾後互通情報，密取聯繫。

謝晉於十二月底回到漢口，除向中共中央匯報南昌方面的情況外，並和中共中央×××等同志談稱：“譚延闓本人決心到武漢來，只是想多爭取幾個留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一同來武漢。何香凝一定會來的，朱培德、李烈鈞及×××（忘其名）等也可能前來。

必要时还可以劝蒋介石一同前来。最好求得公开地、圆满地离开南昌……

以上是謝晉第一次到南昌的概略情况和結果。

轉眼便是一九二七年的开始，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全国革命形势的繼續高涨，在武汉建立中央一級的革命政权，已經成为当时各方面革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共产党在武汉的各项工作，也是积极地圍繞这一要求布置的。

二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員（絕大多数为当时的左派）非正式地集会，决定推举謝晉、陈××两委員赴南昌，促請譚延闓、蒋介石以及留南昌的中央委員何香凝等十余人来武汉开会。

在这里先要叙明的，当时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中委，表面上虽为促請譚、蔣及留南昌的其他中委来武汉，实际上的用意是只要譚延闓及何香凝等其他一些左派中委来汉，以便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建立，行使职权；并举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免除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防止他实行軍事独裁。当时武汉方面推举謝、陈两人的用意是：謝是当时鮮明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中委，作为左派的代表，又因其与譚延闓的交誼較好，可能爭取譚积极地向左边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譚系为一般公認中間偏左的，到武汉之初还是好的）；陈系当时武汉卫戍总司令，在武汉有一部分实力（由第四軍扩編的第十一軍，陈任軍长），左派的人們及中共方面都知道陈是蒋介石在武汉方面的亲信，蔣完全賴陈得知武汉方面的情况，派陈往南昌和蔣見面，或者还可以减少蔣对武汉方面革命势力的恐惧；另方面，陈离开武汉后，可以更好地爭取他

的部下向左轉。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前后，謝晉、陈××由汉口一同到达南昌。蒋介石欢迎他们住到他的总司令部，并对谢表示特别殷勤。谢将武汉国民党中央方面致蒋介石的信件面交蒋介石，略谈片刻，即托病觅房休息，请陈××与蒋详谈，自己遂赴谭延闿处。

谭延闿见到谢晋时，劈头便问：“你住在哪里？”谢答：“我们到达南昌，蒋介石就派人把我们的行李接入他的总司令部，现在就算是住在他那里了。”谭很急促地对谢说：“你万不可住在蒋介石那里。你在那里很危险①。”谢说：“我的行李已摆在他那里，怎好搬出来呢？”谭说：“我有办法。你住在我处，我可以保障你的安全；不然，我是不能保护你的。”谭与谢略谈后，立即派人将谢的行李由蒋的总司令部搬到谭处（原来，谭有一亲信在蒋介石的交际处任职，谭一示意，谢的行李随即搬来了）。这时，谭对谢说：“现在我可以保障你的安全了。”

谢与谭商谈结果甚好。谭表示他决心赴武汉，并与谢一同努力说服蒋介石。当时商定几个步骤如下：

第一步、谭和蒋介石及留在南昌的全部中委一同到武汉去开会。这是上策。

第二步、蒋介石自己不愿去武汉，同意谭延闿及留南昌的中委赴武汉开会。这是中策。

第三步、蒋介石坚决拒绝，并阻止谭延闿及留南昌的其他中委去武汉，谭本人则决心逃出南昌，突破蒋的势力圈前往武汉。当时密商具体办法是：谭与谢率轻便随从间道由袁州（宜春），

①武汉方面推举谢陈两人赴南昌时，事先电告谭蒋。蒋接电后对谭说：“你说武汉方面无阴谋，现在派来两个代表，其中就有一个共产党员。”谭问何人是共产党员，蒋答，谢晋就是的，并露有加害之意。

萍鄉入湖南醴陵，再經長沙往武漢。這是下策。

謝晉在南昌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周旋，和蔣介石會談多次（有時是和譚延闓一道），蔣曾允與譚延闓及留南昌的其他中委一同赴武漢開會。謝將此情況電告漢口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同時電告漢口國民黨中央（措詞稍有不同）。但在臨行時，蔣與朱培德又突然中止。蔣並對譚說：鮑羅廷現在武漢指揮共產黨，倘到武漢，必遭共產黨扣留，云云^①。蔣雖如此說，並未阻撓譚等赴漢。譚與謝及留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包括何香凝、李烈鈞等）乃離開南昌，一道前往武漢。到九江後，譚對謝笑稱：“我真可以到漢口，你真安全了……”因當時南昌到九江的鐵路交通，系蔣系的陸福林^②（遺稿如此）掌握，隨時可以發生危險；程潛部隊駐九江，可保無虞。

在這裡要補述的，陳××同謝晉抵南昌後，僅在蔣處住一宿，即囑蔣命返武漢。當時武漢方面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方面，表面雖不動聲色，內中都知道，陳系暗中将武漢方面党政軍等情況密告蔣介石的人，認為蔣原準備赴武漢，臨行又中止，必系陳告密所致。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譚延闓、何香凝、李烈鈞等同謝晉到達漢口，當天即在漢口舉行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場革命氣氛高昂，情況極度緊張。會議決定，免除蔣介石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及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務，以共產黨員譚平山、蘇兆征分任農民和工人部部長。這就取消了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後，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召集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整理

①一九二七年一月間，蔣介石曾到武漢，又匆匆跑回南昌，急急地對譚說：“武漢方面完全成了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他們（指共產黨）厲害咧，去不得呀！”這樣的話，後來又反復地和譚談過多次。

②疑為陸福廷之誤。陸在黃埔軍校任過軍事教官，抗戰勝利後任隴海鐵路管理局長。

——編者注

「案」，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任职的限制的決議。

这次會議开始时，李烈鈞、陈××均到会，但會議进行不久，他们就乘人不备逃出了会场。李陈两人这一行动，一两小时后，就传遍了武汉，經四出查訪未获。从此以后，陈××便公开成为拥护蔣介石的人了。这也可以証明陈同謝晉赴南昌以前，武汉方面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对陈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革命人士的要求下，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中經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阻撓，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初譚延闓等到达武汉时，才算正式实现。